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博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hD Thesis

從韌性威權到民主賦權：

中國民眾價值觀的世代差異與政治支持

From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tic Empowerment: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and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

吳振嘉

Chen-Chia Wu

指導教授：朱雲漢 教授

張佑宗 教授

Advisor: Yun-han Chu, Ph. D.

Yu-tzung Chang, Ph. D.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March, 2014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從韌性威權到民主賦權：
中國民眾價值觀的世代差異與政治支持
From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tic Empowerment: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and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

本論文係吳振嘉君（學號：D96322002）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博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3 年 3 月 27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張 佑 宗

（簽名）

（指導教授）

張 佑 宗

徐斯勤

陳 光 章

陳陸輝

黃 弓 端

謝辭



一份博士論文的完成總是富含著歲月的痕跡，以及當事人努力穿越漫長幽谷的過程。可是，一份博士論文絕對不會只有它的讀者所能看見的，專業知識的積累而已。當論文逐漸成型，也總是包括了來自學術環境內外的各種支持。這樣的情況于我尤甚。

這本論文的最重要支柱是兩位學養兼俱的指導老師。朱雲漢教授的學問跟風範，被尊為當世大儒自不待言，身為他的學生，總是必須時時自我督促，希望學術能力可以達其萬一。張佑宗教授研究能力與經驗都十分傲人，並擁有相當好的性格，對我而言既是經師也是人師。張老師像父兄一般地關心我，同時照顧了我大多數的博士班生涯。這份論文如果在學術領域之中能有一點點的貢獻，我想都必須歸功於兩位老師在方向上與內容上的指導意見。而口試委員會的黃秀端教授、徐火炎教授、陳陸輝教授以及陳光輝教授，給予的修正建議也是這本論文得以完善的原因。

除了直接的支持之外，來自漫長學習過程的其他協助也十分重要。政大政治系時期的陳義彥老師、謝復生老師、洪永泰老師、何思因老師對我的實證研究有奠基性的教導；碩論指導教授劉義周老師與游清鑫老師、以及讓我擔任研究助理的郭承天老師，到目前為止都持續關注並督促我的表現；台大政治系時期，除了東亞民主研究室外，徐斯勤老師、陶儀芬老師給了我研究中國的適當視野，蘇彩足主任、王業立主任與蕭全政教授提供我許多學術服務的機會，博班導師林俊宏老師對我們照顧有加，黃長玲老師的開課則是我整個修業過程中追的最勤的內容。這些學術養分在我撰寫論文時都成為相當關鍵的助益。

來自學術環境之外，同學們的相互砥礪與取暖是筆者孤軍奮鬥時的最佳奧援。東亞民主研究室的同仁，恭安、維琪、珮如、頌恩與嘉璘，以及幫忙分擔交辦工作的兼任助理們，最重要的是信宏、家賢與彥廷，使我在研究工作上能夠有所精

進。另外，感謝台大博士班同學，承維、斌洲、軍瑋、天申、衍儒、亮宇以及婉萍，聚會時的插科打諢是研究過程中無可取代的調劑。也要感謝系辦助教辰元、小官與欣蕾，在行政事務方面的各項協助。

七年是一段不算短的歲月，尤其是當一般人都已經到了成家立業、小有成就的階段。這段時間中，家人親友對我的擔心無時或已，特別是我的母親與弟弟。在父親突然中風臥床後，母親一直為家中生計操勞憂心，弟弟昌聲則是負擔起幫忙關照家裡大小事務的責任，這些都是使我能專心投入論文寫作的重要支持。最後，則是感謝已經成為我的妻子的舒培，雖然未來的日子還有很多不確定，但是妳過去這段時間的無私陪伴，是我極大的動力來源。

這份論文的完成，要感謝的人還有很多，無法全部完善，希望它的內容能不負大家所曾給予的各項幫助。

吳振嘉 2014.6.25

于徐州路台大社科院

中文摘要



改革開放 30 年後，因為經濟的成功，中國逐漸邁入現代化國家的水平，可是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討論仍然方興未艾，威權韌性？中國模式？亦或是民主化？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是，中國延遲民主化的真正因素為何？未來的中國仍然可以維持現政權型式，拒絕民主化過程嗎？不同於政治菁英的分析角度，本文從社會大眾意見出發，強調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對於政治發展的影響。

在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案例上，本文主張中國社會存在著競爭性價值觀（傳統儒家價值觀與現代民主價值觀），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民眾的價值觀結構發生變遷，其特點是「70 後」與「80 後」新世代具有民主價值觀的群體大幅增加，這是從經濟賦權進而價值賦權的過程。

其次，中國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因為價值觀差異而發生分歧，具有較高民主價值以及低儒家價值的民眾，其政治信任與制度正當性都較其他類型的價值觀群體更低。更重要的是，民主價值觀者做為關鍵群體，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明顯低於儒家價值觀與混合價值觀的群體。從這個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從文化賦權到制度賦權的中介條件之一，政治信任的分歧，明顯地正在新世代中發生。

不過，雖然價值觀變遷正在影響中國的政治支持，並使其發生分歧，可是這種價值觀變遷對於政治參與及民主支持都尚未產生直接的關聯。其中，政治參與的增加與社會矛盾的發生較有關聯。而民主支持的問題可能是因為我們尚無法有效地加以測量。針對中國民眾的價值觀如何影響未來政治發展，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重新理解。

關鍵詞：中國民主化、世代差異、價值觀變遷

英文摘要

ABSTRACT



After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conomic success has gradually modernized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theories about how China will develop in the future.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he China Model? Or, democratiz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uncover the factors that have delayed China's democratization. Will China maintain its current regime type and reject democratization in the future? In contrast to the focus of other studies on political elites, this article instead looks at ordinary citizens, and looks at the effect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and value change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a case study on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re competing values in Chinese society (traditional Confucian values and modern democratic value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used the value structure in Chinese society to change. In particular, in the "1970s" and "1980s" generations, there has been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itizens holding democratic values, indicat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economic empowerment to empowerment on the dimension of values.

In addition, political support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varies according

values. Citizens with high levels of democratic values and lower levels of Confucian values have lower levels politic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than citizens with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s. More importantly, citizens with democratic value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of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than those with Confucian values and mixed values. From this result, we argue that cultural empowerment is a mediating value in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trust have clearly emerged in the new generation.

However, although value change influences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 and has produced cleavages within society, these value changes are not directly linked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We found that increase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ncidence of social conflicts are linked. However, perhaps due to a lack of effective ways to measure the concept, we could not find a direct link with support for democracy. With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values among Chinese citizens on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Keywords: China's democratizatio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value change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i
中文摘要.....	v
英文摘要.....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未來政治走向的辯論	5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12
第四節 本文的主要觀點	28
第二章 民主與中國—過渡還是異例	35
第一節 民主化解釋途徑與中國案例.....	35
第二節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主之路.....	44
第三節 特殊論：中國式民主!?!	49
第四節 中國民主進行式.....	57
第三章 新世代的價值觀變遷.....	59
第一節 世代交替與價值觀變遷	59
第二節 中國新世代議題	67
第三節 價值觀的競爭與變遷	78
第四節 趨同性與文化相對性的辯證.....	98
第四章 新世代與威權韌性	101
第一節 中國模式的具體內容	102
第二節 民族主義的世代差異	106
第三節 中國式治理的民眾支持度.....	116

第四節 辯證的中國政治現代化	124
第五章 新世代的政治支持	127
第一節 中國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127
第二節 特殊性支持—政治信任	131
第三節 政治信任的世代差異	139
第四節 制度正當性的世代差異	147
第五節 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分歧	155
第六章 新世代與政治參與	159
第一節 政治參與的基本內容	159
第二節 政治參與的類型與變化	164
第三節 政治參與的世代差異	170
第四節 政治參與的動力	178
第七章 新世代的民主支持	181
第一節 民主支持與民主認知	182
第二節 中國民眾的民主支持	185
第三節 中國民眾的民主認知	200
第四節 民主支持、民主認知與中國式民主	208
第八章 結論—遲到的新中國	211
第一節 主要的數據發現	212
第二節 回應民主化理論	218
第三節 中國發展的十字路口	221
第四節 未來相關議題研究	225
參考文獻	229
附錄：變項處理	247



圖目次



圖 1-1 Welzel and Inglehart 的賦權理論模型	11
圖 1-2 研究架構	15
圖 3-1 全球視野的跨文化定位	61
圖 3-2 價值觀變遷：1981-2007	63
圖 3-3 中國民眾價值觀的世代差異	84
圖 3-4 四類價值觀群體世代分佈	92
圖 4-1 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世代差異比較	110
圖 4-2 認同中國式治理的世代差異	121
圖 5-1 政治信任的世代變化	141
圖 5-2 政權機構信任的世代變化	143
圖 5-3 制度正當性的世代變化	152
圖 6-1 三波調查中國民眾採取政治行動比較	166
圖 7-1 民主支持的世代差異	191
圖 7-2 民主支持指標的世代差異	194
圖 7-3 四類民主概念的百分比分佈	201
圖 7-4 中國民眾對於兩種民主模式的看法	202

表目次



表 3-1 基本社會學變項的世代差異交叉列表	74
表 3-2 各項控制變項的世代差異變異數分析	77
表 3-3 傳統中國與民主的政治原則在三個層次上的對應	80
表 3-4 贊同民主價值觀以及儒家傳統價值觀的百分比	82
表 3-5 價值變動的迴歸模型分析	88
表 3-6 價值觀分類表	90
表 3-7 四類價值觀與世代列聯表	92
表 3-8 新世代中四類價值觀群體的基本特徵(一)	95
表 3-9 新世代中四類價值觀群體的基本特徵(二)	97
表 4-1 民族主義指標的世代差異	112
表 4-2 受訪者的民族主義傾向迴歸模型分析	115
表 4-3 「中國式治理 vs. 西方民主制度」百分比分佈世代差異	119
表 4-4 認同中國式治理指標的世代差異	121
表 4-5 受訪者對中國式治理的認可程度迴歸模型分析	123
表 5-1 各種政治機構的信任百分比分析	136
表 5-2 機構信任的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138
表 5-3 政治信任指標與世代的變異數分析	140

表 5-4 政權機構信任指標的世代差異.....	143
表 5-5 政權機構信任的迴歸模型分析.....	146
表 5-6 制度正當性指標基本分佈	149
表 5-7 制度正當性的世代差異.....	151
表 5-8 制度正當性的迴歸模型分析	154
表 6-1 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百分比分析.....	163
表 6-2 政治參與類型因素分析表	165
表 6-3 是否採取政治行動	166
表 6-4 採取政治行動者的社會學變項分析表	169
表 6-5 請求型政治參與的羅吉斯迴歸.....	175
表 6-6 舉報型政治參與的羅吉斯迴歸.....	176
表 6-7 抗議型政治參與的羅吉斯迴歸.....	177
表 7-1 民主支持基本分佈	188
表 7-2 民主支持指標的因素分析	189
表 7-3 民主支持的變異數分析.....	193
表 7-4 直接民主正當性的迴歸模型分析.....	197
表 7-5 比較民主正當性的迴歸分析	198
表 7-6 威權抵制的迴歸分析.....	199
表 7-7 兩種不同民主概念的變異數分析.....	203



表 7-8 「權利-程序型」民主的迴歸模型分析.....	205
表 7-9 「效率-分配型」民主的迴歸模型分析.....	207
表 8-1 「80 後」新世代的價值觀群體與政治態度.....	217



第一章 緒論



不管人們認為中國今日正在發生著什麼——崩潰、民主化、有韌性活力，亦或是停滯——

人們仍然應該追問：哪些變項會讓這些進程改變軌道。

---- 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2007: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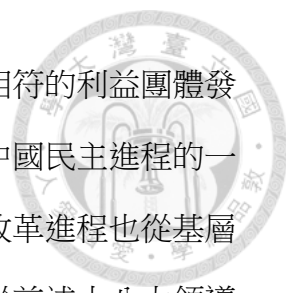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12 年 11 月 14 日，眾所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 18 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於北京閉幕。隔天，緊接著召開第 18 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十八屆一中全會），選出包括習近平、李克強在內的 7 名新任政治局常委。¹ 2013 年 3 月，習近平正式出任國家主席、李克強接任國務院總理，中共進入「習李時代」。十八大前夕，雖有一些個別的政治事件引發關於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猜測。² 但整體而言，十八大順利閉幕與新任領導班子如期產生，顯示中共再次渡過繼承危機，而且仍然有足夠能力維持穩定局面，同時有效掌握政治改革的幅度與進度。

關於中國將可能會進行大規模政治改革的預測不止一種，但目前看來這些預測都尚未具備實現條件。就政治面來看，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超過 30 年，中國政府在經濟上取得舉世注目的成功，但政治上的改變幅度卻相對緩慢。首先，與其他後共產主義國家的發展不同，中國成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例外之一。北京當局用軍事鎮壓扼止了八〇年代末來自社會要求民主化的聲浪，社會集結管道變的十分虛弱，這也使得體制內的政治改革主張缺乏向社會訴求的可能。其次，中國的持續經濟成長與更完善的控制技巧消解了社會不穩定的壓力，同時

¹ 新任 7 名政治局常委的政治職務如下：習近平身兼總書記、軍委主席以及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書記王岐山；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張高麗。

² 包括「重慶薄熙萊案」、「習近平神隱 13 天」、以及「溫家寶海外資產曝光」等。



成功地收編了或弱化了新興的社會群體，期待一個與民主制度相符的利益團體發揮功能似乎不會成功。再次，雖然九〇年代基層選舉的發展是中國民主進程的一個亮點，不過當局最終限制了選舉層級向上擴張的可能性，而改革進程也從基層民主轉換到更能控制的黨內民主，基本上發生了停滯。最後，從前述十八大領導班子的順利產生可以暫時認定，中共的領導人產生與更迭看似逐漸制度化，短期內也無法預期來自統治集團的分裂，中共中央仍然強而有力，可以有序地控制政治改革的進程。各種跡象顯示，中共政權具有很強的韌性（參見 Nathan, 2003; Yang, 2004; 徐斯儉，2010）。

轉到社會面，1989 年的武力鎮壓使得知識分子與高層政治菁英結合社會力量的改革途徑受到阻礙，暴烈的政治變革訴求被拆除了引信。對於多數的知識菁英而言，謹慎的論述與體制內的漸進改革才是相對正確的選擇（參見趙鼎新，2010）。公民社會的動力或許是改革開放後的自然產物，可是目前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去政治性和對體制的高度依賴為主要特徵，已經被中共有效地納入穩定治理的序列中（參見戴東清，2005；鄭永年，2011）。新興的社會階級也很難成為民主改革的代理人，因改革開放而產生的中產階級是現存體制的最主要受惠者，在經濟成長的持續需求下，不太會反對現有的穩定。何況，新興中產階級與中共當局彷彿已經找到一個相互包容的相處方式（參見 Dickson, 2003; Chen and Dickson, 2008）。各種國營、公營企業的下崗工人以及新興外資企業的大量勞工或許會是個麻煩，不過，許多研究指出中國勞工階級由於先天結構不良與當局的有效政策，很難形成一個有意識的政治性集體（參見 Gallagher, 2002；黃德北，2008）。

就傳統的現代化理論而言，中國的民主化應該是整個現代化的一個環節。當其經濟越來越成功，各項民主轉型的條件將會隨著成熟，一項民主化的進程將會被啟動。不過，從改革開放後取得第一筆經濟積累開始，中外學術界對於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方向就一直爭辯不休。爭辯核心在於中國是否為近代政治發展上的一個異例？長此以往，是否可以繼續維持目前的「韌性威權主義」（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發展出與西方模式完全不同的現代化政權？³

中國的發展經驗是否為不同於西方路徑，需要更進一步的觀察。由於田野觀察的經驗，筆者有機會與一些中國的高校研究生建立友誼，在與他們的日常談話中，有時會得到一些不同的中國圖像。研究生 A 來自華中地區，對於至今中國各級學校中仍然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情況十分不滿；同時，研究生 A 是一個網路使用的愛好者，經常注意網路訊息，對於當局對於網路的管制有所反感，也譏嘲維護政治正確的所謂網路「五毛黨」；他表示可以理解社會多元化的意義，也會密切關注網路上被熱烈討論的前十大政治議題。在談話中，研究生 A 多數時間展現的是自由主義與多元主義的接受者，一個進步的與中國現代化知識份子的代表。不過，在某些場合中，研究生 A 就會轉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例如，A 無法認同少數民族對於漢族優越的不滿訴求，認為政府已經給予了許多優惠與照顧，少數民族的不滿只是借題發揮；以及在 2008 年的「抵制家樂福事件」中，A 自發性的參與抗議法商家樂福的示威集會。

研究生 B 則是出身中國的西部省分，是個農家子弟，相當勤學上進；與前者不同，研究生 B 認為維持政治思想教育有其必要，同時也經常表現出仍然相信社會主義理想的態度，積極地參與學校內的黨務與政治事務。⁴ 成為研究生前很少使用網路，但每天都會閱讀人民日報，從談話中可以發覺他是個現有體制的維護者，對於體制的認知內容則是摻合了現行政權與中國傳統文化。不過，也有一些改變發生在研究生 B 的身上，例如，當他接觸到城市與學校生活的多樣性後，對於多元容忍的精神就顯得更有認識，對於中國未來發展方向也就不那麼單一化，有時可以接受除官方提供的其他可能性。有一次，當談到柏拉圖的理想政體在實現上很有可能專制化的問題時，B 表現了「從未想過」的訝異感。

³ 中國未來之謎與民主化可能性？相關的討論可見黎安友 (2007：1-11)，美國學界對於中國未來道路的爭辯，主要有四個可能的結局被提出，包括章家敦 (2002) 所掀起的「中國即將崩潰」的討論；Gilley (2003) 以及 Rowen (2007) 所揭示的中國將朝向民主化的發展；裴敏欣 (Minxin Pei, 1995) 則認為中國將遭遇改革停滯的危機；以及黎安友所主張的具有韌性的威權主義等四種。

⁴ B 的社會主義理想是否是一般所理解的內容有待商榷。在相信「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之餘，B 更常表現的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態度，十分具有「中國特色」。



A、B 兩位研究生的不同想法代表現今中國處於轉型階段的複雜性，許多不同的價值觀正在這個過程中相互競逐，新一代中國人所面對的結構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以往。歷史上代代相傳的傳統文化、國家權力所塑造的政治文化、以及因為社會條件變遷所帶來的現代性，將會形塑新一代中國青年的政治傾向。捕捉這個文化變遷的軌跡，將會有助於處理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問題。

中國案例對於政治學研究是一個未解之謎與重大挑戰。對於未來的中國而言，在經濟改革之外，最主要的論爭就是政治改革將會在何時？以什麼方式進行？其中被討論的最多的，就是改革方向會不會依西方現代化發展的歷程與經驗，進一步走向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體制？另一個關鍵的理論命題就是威權政體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威權政體是否可以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長期共存？因為中國的長期經濟成功與持續有效的威權統治，使這個爭論在近幾年成為主要研究議題之一，從「中國模式」成為中國研究的熱點可以看出這個趨勢。中國模式的主要內涵，是結合了威權政體與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體系，而且具有相當的持續性。對於西方學者來說，這種矛盾以及所透露出的「國家—社會」緊張關係，在過去是缺乏理論說明的，所以這個情況一直是中外學者所注意的焦點，尚未獲得肯定的結論。筆者認為，要理解這種轉型的複雜性，應該要回到政治文化變遷與世代差異的研究脈絡上來探究。

第二節 未來政治走向的辯論



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前景，政治學界的討論方興未艾，基本上可以分為民主化與威權持續兩組論述。⁵ 代表性的看法可以集中在裴敏欣 (Minxin Pei) 與黎安友 (Andrew Nathan) 兩位學者各自所提出的論點。前者認為，在經濟與社會條件的改變下，中國的治理難題將持續加重，當局必須做一些改變才能因應不斷湧現的社會矛盾。而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也已具備了許多基礎條件，未來將會進入「危機—轉型」的民主化模式。後者的看法則是舉證了中共政權治理能力與掌權決心，加上輔以有效的政策工具與主導社會意見的技巧，威權政體將可能制度化並適合現代化的社會。從兩位學者的主張看來，其爭辯的關鍵在於中國政府治理能力的限度，尤其是面向社會結構的變化。

壹、民主化的中國

支持中國終將民主化的學者認為，威權政府無法符合現代化社會的需求，因為越來越多因為經濟社會變遷而產生的矛盾，中共當局將無力解決，唯有做出改變以因應 (黎安友，2007)。其中 Gelley (2004) 的看法最為全面，認為中國一方面已具備了許多現代化理論的先決條件，包括經濟成長、龐大的中產階級、教育普及等等；另一方面也具備菁英轉型理論所需要的「強硬—溫和」以及「保守—改革」的菁英分立的格局。只要時機到來，就有可能快速的民主轉型。這組看法由裴敏欣在 2013 年的文章中加以闡述，建議中國當局應該開始認真思考如何面對政體轉變與如何和平過渡政權的問題 (Pei, 2013)。

⁵ 根據黎安友 (2007) 的整理，關於中國將走向民主化的看法，主要可以參見 Gilley (2003; 2004)、Goldman (2005)、Rowen (2007)、姚洋 (2009) 等人的著作；至於中國將保持目前威權政體的論述，可以參見 Yang (2004)、Lu (2004)、Dickson (2003)、Chen and Dickson (2008)、Zheng (2008)。



裴氏稍早的看法是中國將遭遇改革停滯的危機 (Pei, 1995; 2006; 2009)。在這個基礎上，裴氏以歷史比較與對近來中國發展的觀察進一步指出，後天安門經濟發展模式（即專制政體下的經濟現代化）將會遭遇瓶頸，同時社會力量將會出現，中國政府終將接受民主。就歷史證據而言，首先，非產油國一旦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依購買力調整後達到 6000 美元以上，專制政權就無法維持；其次，歷史上，連續當政最久的政黨（蘇聯共產黨）也只有 74 年（1917-1991）；最後，中國每年約七百萬大學畢業生在政治甄補的過程中將發生分裂，被排斥者會成為政治反對黨的儲備人材庫。由此，裴氏認為中國將進入危機時間，其執政時間可能最多只剩 10-15 年 (Pei, 2012)。同時，現實上裴氏也觀察到中國內部的一些變化。例如他指出中國政治的內容改變具有四個特徵，包括執政菁英對危機的察覺與因應調整、社會逐漸出現的多元道德權威、專制政府權威的誠信問題，以及更重要的一集體行動成本的下降。這些變化的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和現代通訊技術的長足發展，而這是難以逆轉的。所以，中國官員想無限期地保持現狀的機會並不大，同時必須開始思考「如何優雅地下台及和平地轉移權力」。

不過，這個看法在現實上受到很大的挑戰。從目前的中國情勢看來，大的政治變遷或是權力的結構性變動很難被想像，裴氏的看法停留在領導人戲劇性的政治選擇上，充滿歷史預言的風格。我們仍然需要更多對於社會的實證研究做為理解基礎，尤其是民眾政治態度的內容。

貳、韌性的威權主義

正如裴敏欣所指出的，中國研究圈的傳統觀點多半認為中共政權仍有能力存活較長的時間，認為會民主轉型的只是少數 (Pei, 2013)。這是因為過去 30 年間，中國的經濟成功助長了一種樂觀看法，即中國的精英體制可以成為同西式民主相抗衡的一種新的治理方式 (姚洋，2009：102)。這種看法因為黎安友以「韌性的

威權主義」(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加以命名而引發討論。接著，「中國模式」討論熱潮的出現開展了這種看法的另一組論述方式。

黎安友 (2007) 同樣整理了中國仍可持續威權的主要觀點，基本上是建立在中國目前為止所展現的成功改革以及有效的處理所面對的危機上。整理與檢討了各項民主化理論對於中國案例的解釋後，黎氏不同意以現代化理論為主的各種民主化理論對於中國的預測。同時提出論點說明中國在一段時間內將會成為民主化理論的異例。

因為中國異例給予民主化研究的挑戰，黎氏提出兩項論點。第一，關於民主化的理論中，決定論式的看法無法通過檢驗；⁶ 而許可條件論在中國不一定導向民主，反而有利於現代威權政權存活；⁷ 行動者中心論 (或稱交易理論) 在中國目前顯然也行不通，尤其是在與台灣民主化的經驗比較後，可以發現目前的中國具有一群團結的執政菁英，而且也不願受到美國的影響。第二，中國案例使得威權政體的研究必須被再度重視，對照解釋民主化的三類理論，這些研究應該把重點放在威權主義為何及如何開始制度化以適合現代的社會 (對應現代化理論)、威權政體如何取得正當性與其持續 (對應許可條件論)、以及威權政體的精英如何團結為一個群體 (對應行動者中心論)。總而言之，黎安友所觀察的中國將是一個更具有韌性的威權主義政權，同時會持續一段時間 (Nathan, 2003；黎安友，2007)。

繼承問題是傳統上對於威權政體的重要觀察面向，而以往中國研究的主流也是聚焦在高層政治對於政治決定的影響。不過，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社會環境與先前大不相同。經濟情況變遷、教育水準提高、訊息管道解放，許多異議的空間越來越多。新的世代將可能形成新的價值觀，公眾意識不再是過去的威權統治所能掌握，只注重政治菁英研究無法完全理解中國的變化。

⁶ 決定論式的理論包括三種，即現代化功能需求理論、階級理論、以及傳播與認知理論。(黎安友，2007)

⁷ 許可條件論包括中產階級的作用、公民文化的產生、公民社會的建立以及官僚與制度的作用等，但黎氏認為，這些環節上目前都對提昇中共的正當性有正面助益，不足以形成民主轉型的條件。(黎安友，2007)



參、中國模式

另一支贊同中國目前的政治型式具有強固性的看法，不僅停留在黎安友所認為的威權韌性，而是從近代發展的獨特經驗以及重新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出發，認為中國的現代化與發展模式將完全不同於西方，也會發展出根植於自身文化的政治體制。這些說法我們可以統稱為「中國模式」論述。

大多數的中國模式論述都建立在過去 30 年中國成功的發展經驗之上，而且認為這種成功經驗可以由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許多經濟改革的內容包括漸近主義、創新以及國家主導等都應該在政治改革中被使用。進而由於過去 30 年改革開放的過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不同於西方，拒絕以西方思維來處理改革問題而獲致成功。未來中國在政治改革上應該更具有信心，也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途徑。此外，中國模式的支持者也大多重視中國的特殊性，尤其是文化方面。張維為 (2010) 特別強調中國的成功崛起是一種「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與西方的或是其他國家的經驗完全不同，它的巨大成功將會是「中國震撼」。反之，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國家大多得到失敗或不順利的結果。就連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與台灣，雖然發展初期採用東亞模式取得經濟成就，但改採美式民主模式的結果就「令人跌破眼鏡」。

中國模式的說法受到中共領導人與多數官員的歡迎，同時也有許多知識份子加以推崇與宣揚。它的意義可能來自於兩個方面，首先，中國模式的存在可以提供目前威權政府更多的正當性，使其足以維持整體的穩定，有效調控進一步改革的力度與方向。其次，中國模式的確立或許可以擺脫以西方觀點為中心的主流民主論述，實現一種完全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政治安排與民主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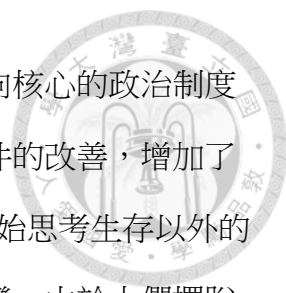
肆、缺少的環節

黎安友的看法顯然較為重視政治面，尤其認為中國的威權政府具有很高的可能性與技巧處理治理難題，最根本關鍵是有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菁英團體（中國共產黨）。另外，支持中國模式的學者則是從中共過去 30 年的成功以及文化面向切入，但普遍也認為目前的政府可以有效控制中國未來的變化。不過，忽視社經變化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可能過於武斷。事實上，在許多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菁英互動過程中，若不援引社會支持，談判也無從進行。政治變革的前提在於一個分裂而且需要重新配置權力結構的社會，分裂政治菁英的能動性依恃的是分裂的社會支持。反過來說，若分裂的社會支持形成，也會給政治菁英更多的誘因進行運作。中國未來的發展有沒有可能出現分裂的政治菁英，應該由是否具有分裂政治支持的可能性加以理解。

相對而言，裴敏欣的觀點比較重視社會面變化，同時認為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有限。政治菁英為了處理治理問題，將會進行相應的變革。也就是說追求有效治理本身會將其導向民主化的道路，理由是信息社會的背景。可是，誠如黎安友對於許可條件論過於偶然性的批評，我們需要對於社會變遷進行更為實質的分析，以聯結社會分化、政治支持以及未來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相對於裴敏欣與黎安友的論證都著重政治菁英的角色，Welzel and Inglehart 的民主賦權理論可以提供我們另一種架構來觀察中國政治發展的過程。與流行的民主化理論不同，Welzel and Inglehart (2008) 的理論更強調普通民眾 (Ordinary People) 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同時，現代化雖然是關鍵性因素，但是其主要作用並不在於它會使政治菁英更容易接受民主，而是它會增加普通百姓為民主體制奮鬥的能力和意願。

Welzel and Inglehart 的論述認為，民主化的真正焦點應該是民眾從威權管制中解放，逐步賦權的過程。圖 1-1 展示了賦權理論的主要概念，就 Welzel and Inglehart



而言，人類社會賦權過程包括三個層次，而且是從外圍逐漸朝向核心的政治制度的過程。第一個，最為廣泛的層次，是經濟賦權。藉由經濟條件的改善，增加了人類進行社會調整的行動資源，使人們「有能力」(be able) 開始思考生存以外的事務，真正能支配自己的生活。第二個層次涉及了價值觀的轉變，由於人們擺脫生存需求問題，開始轉向其他精神需求，最主要的就是開始展現自我表達的價值，這是一個文化賦權的過程，使人們「有動機」(be motivated) 去支配自己的生活。最後，當經濟賦權與文化賦權完成，將會需要用制度來穩定與確保這個成果不致喪失，這就會開始一個體制賦權的程序，藉由民主制度安排來使人們「有權利」(be entitled) 去支配自己的生活。(Welzel, 2006; Welzel and Inglehart, 2008)

藉由這個架構我們可以發現，關於民主化的動態過程，更重要的是必須回到民眾的態度來觀察。在經濟生活改善後，還需要一個價值觀變遷的中介過程，使得人類社會由傳統威權政治邁向民主。最後，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有可能實現人類生活最自由的層次，但這是一步步賦權而逐漸達到的成果。

對於中國這 30 年的重大變遷，我們仍然缺乏一個整體的、面對民眾層次的普遍性觀察。對於一個開始溶入現代化體系的政治體系來說，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會有許多因素在過程中發揮作用，影響發展的方向與內容。就本文所關注的民主化而言，從經濟結構變遷開始，經過文化結構的轉換，最終進入到體制的調整應該是比較合理的程序。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應該是民眾價值觀的變遷軌跡，民眾的文化變遷才是政治變遷的趨動因素，價值觀變遷是制度是否變遷的起點。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這個部分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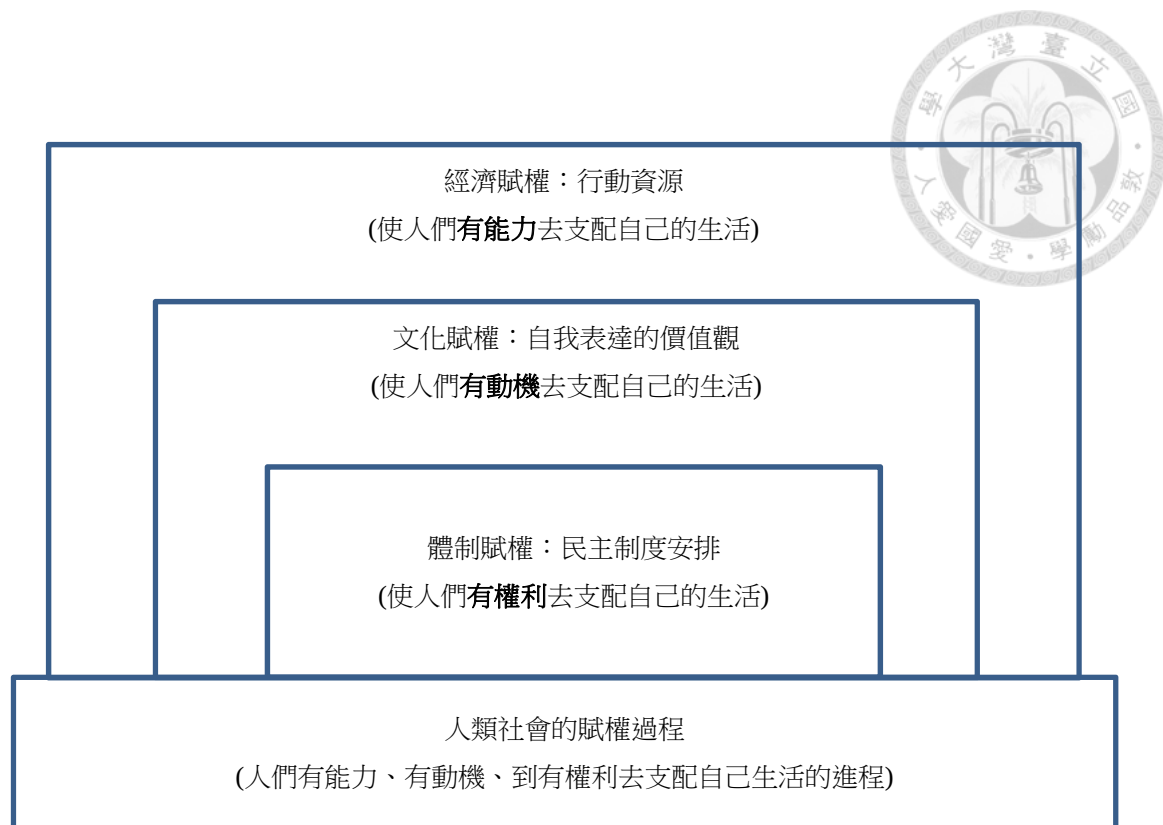


圖 1-1 Welzel and Inglehart 的賦權理論模型

資料來源：Welzel and Inglehart, 2008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文的出發點為公民賦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同時會經歷至少三個階段，從經濟賦權到文化賦權，之後才會進展到體制賦權。中國民眾的價值觀變遷是改革開放後，社經結構變化的結果。雖然目前大多數對於中國的觀察，都是傾向「經濟開放、政治封閉」的「韌性威權主義」，但筆者認為應該對社會面的變化給予更多的關注，尤其是經由抽樣調查所蒐集的民眾態度、信念與評價的內容。根據世代差異對於文化變遷理論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焦點關注新世代—1980 年後出生群體—的價值觀與年長世代的差異，以及這種變遷對於其他政治面向的影響。最核心的價值觀變遷則是民主價值與傳統儒家價值之間的消長情況。

壹、研究架構

本文建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經濟結構變動有助於價值觀的改變。中國當局在 1979 年後改變政策，進行改革開放，這個經濟結構的變動將會對新世代的價值觀形成影響，我們首先將要理解這種變遷的內容。至於文化變遷對於政治改變的影響，在中國案例之下，我們把焦點放在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對於價值觀變遷，本文進一步提出一個假說來理解發生在中國的情況：首先，在一個具有優勢文化的社會中，其現代化的過程，可能會面臨新舊價值觀的競爭，尤其是威權政府努力維持領導地位的情況下；其次，文化的變遷要轉化為政治的變遷，主要的臨界點可能是有沒有出現分化的文化結構，也就是新舊價值觀分庭抗禮的結構；最後，如何辨認文化對政治的影響發生效果，初步應觀察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內容是否改變，並且與價值觀的分化發生聯繫。

研究設計上將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的研究目的在於分析價值觀變



遷，也就是從經濟賦權到文化賦權，自變項為世代。本文以「80 後」(1980 年後出生者) 為目標世代，與之相比的年長世代是指 1970 年以前出生的群體。需要另外加以說明的是，「70 後」(指 1970 年後到 1979 年間出生者) 是一個過渡，這個世代前接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快速右傾時期，而終結於舉世震撼的政治抗議與軍事鎮壓，其世代效應相對複雜不易定性，本研究中我們將其做為向前與向後比較的一個中介時期。第一階段分析的依變項是競爭性價值觀，根據我們的假說，競爭性的價值觀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最主要的兩項價值觀競爭就是近代由西方引入的民主價值觀與傳統的儒家文化價值觀。邏輯上轉型社會中的新世代可以區分為，維持儒家文化者、具有民主價值觀者、兩者兼具的混合價值者以及無明顯價值觀者。本文分析的焦點將會特別關注前兩類民眾的內涵。這一階段的分析重點在於，總體因素的結構變遷 (1979 年改革開放) 是否會造成個體態度的變遷，在資料分析上可以用新舊世代的價值觀差異來證實這一點。

第二階段的分析，本文試著處理價值觀變遷的結果是否與可能的政治變遷發生聯繫，也就是從文化賦權到體制賦權的可能性。首先，政治支持會是最主要的依變項。一場政治變化的啟動，最重要的關鍵必然是政治支持的分化。這種政治分化應該來自價值觀的變遷，新世代的價值觀類型是否與政治支持發生因素聯結是本研究的重點。不過，價值觀的形成受到除了不同文化內容的競爭性影響外，與國家權力相關的影響也要被考慮，國家權力會傾向型塑正當性而與政治支持有所關聯。

許多政治支持的研究者都將其概念追溯到 David Easton (1957; 1965; 1975) 的政治系統論，政治支持是政治系統的主要輸入項之一。Easton 認為政治體系中民眾政治支持的對象有三個不同的層次：政治社群、政體以及權威機關；至於政治支持的內容可以分為普遍性支持以及特殊性支持兩種。在中國，對於政治社群的支持基本上沒有問題，主要的討論集中在對於政體的普遍性支持以及對於權威機關的特殊性支持。本研究將依序處兩個層次的政治支持，也就是機構信任以及體

制正當性兩組支持內容。

其次，價值觀變遷與實際的政治行動是否有所關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非西方國家皆經歷重大的價值體系的轉變，有時更往往形成社會轉型的陣痛。中國在現代化的歷程中，一直深受這種價值體系衝突的困擾，許多倡議革新的方案也都嚐試以價值觀的現代化或西化為其重要訴求。可見意識型態、情感與文化等價值對於社會結構與個人行為的影響。一般傳統文化強調團體價值與服從權威，可以預期的是，在這種價值觀念的影響下，民眾對於採行維權的政治行動應該有所保留；相對的，現代化所帶來的個人主義、自我價值等觀念，則是傾向要求個人權益的實現，鼓勵敢於提出自我訴求的行為，其中，與個人價值密切相關的自由民主觀念對於採取政治行動、爭取相關權益問題應有正面的幫助。

此外，我們還想討論中國民眾的民主支持以及中國式民主的可能性。民主支持的內容可以抱括直接民主正當性、比較民主正當性以及威權抵制，我們可以分別檢視中國世代之間對於民主支持的態度是否有所變化，並看其與價值觀變遷間的關係。最後，中國式民主涉及中國民眾對於民主認知的看法。第三波 ABS 調查的資料，新加了一組對於民主意義的題目，測量民眾對於民主認知的內容。藉由此題組，我們可以進行民主類型的分類，包括「權利-程序式」民主與「效能-分配式民主」兩類。前者更傾向西方的民主標準，後者則與儒家文化的某些價值相合。這兩個民主模式與價值觀之間的因果關聯性，是本文處理中國式民主的主要方式。整體研究架構可見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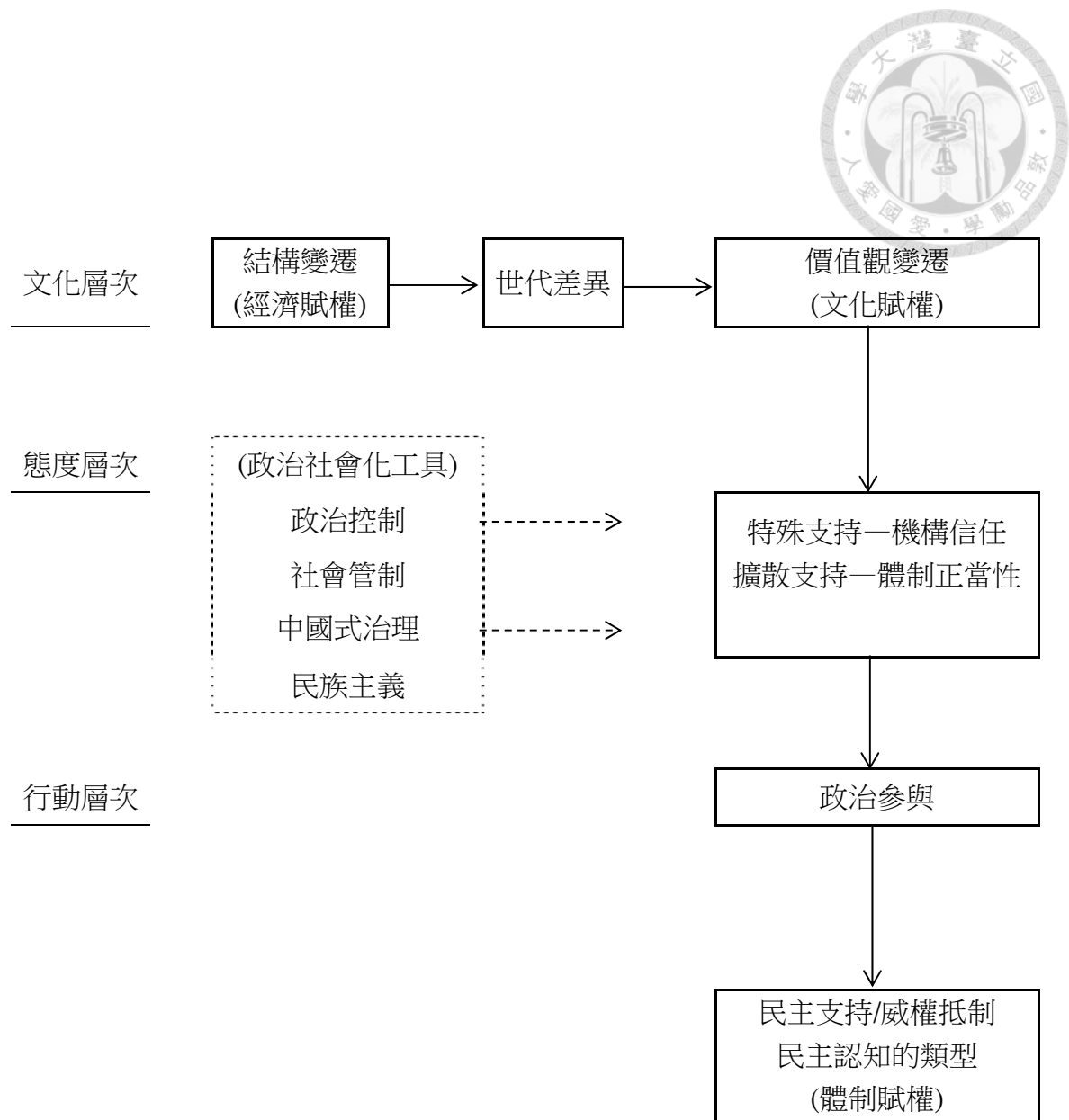


圖 1-2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貳、研究概念的操作化

從研究架構的設計來看，除了世代差異外，本文必須處理幾個重要的概念。包括競爭性的價值觀、國家權力變項、機構信任與體制正當性、政治參與以及民主正當性等。以下簡要說明這些概念的測量方式。此部分將集中討論概念的形成方式與主要變項的使用內容，至於統計上的操作程序與變項處理方式，將以附錄的方式記錄於文末。

一、競爭性的價值觀：儒家文化與民主價值觀

中國在鴉片戰爭爆發以前一直有著獨立發展的優勢文明。歷史上雖然遭逢幾次重大的外族入侵，但做為優勢文化的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各朝代政權的接受或尊重。其正統性獲得相當的持續，並長期影響東亞其他社會。儒家思想對於政治生活有自我完善的邏輯與標準，至今仍在泛東亞地區的官方與民間發揮作用。⁸ 這些社會共同分享了一些價值體系，例如，「孝道」與「三綱五常」標示著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仁政」顯示了對於政府與領導人的治理要求與評價標準；「民本」則是政策內容上更強調提供人民基本福祉與社會照顧的政府責任等等。在政治方面，傳統上藉由知識菁英組成的官僚體系，以及強調天下一統的超穩定社會共識結構，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有效地支持其政治系統的運作。可是西方在 18 世紀進入亞洲之後，這個文化傳統受到了重大的衝擊。其中，與本文密切相關的部分，是民主價值觀與傳統儒家文化之間的競爭關係。

我們將測量兩組價值觀念，首先是民主價值觀。胡佛教授以及朱雲漢教授等所長期主持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對於民主價值觀已經發展出一套非常完整的量表。早期，胡佛教授等人就針對系統層次的民主政治文化，亦即對政治體制運

⁸ 東亞社會一般而言可以包括四個華人社會與四個非華人社會。前者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以及香港。後者則包括日本、南韓、北韓，以及越南。



作的規範原則，發展出五種權力價值取向，包括了「平等權原則」、「主權原則」、「自由權原則」、「社會多元權原則」與「制衡權原則」等（胡佛，1998a；1998b）。依照張佑宗教授（2000：20-22）的整理，這些都涉及在憲政自由主義的原則下，規範體系成員之間權力運作的基本原則或信仰。原先胡佛教授等人一共發展了二十三道測量題目，因歷次題目的增減，二十多年來一直被延續下來而更動不大的約七個題目。張佑宗教授在 2000 年的論文使用了其中五個，其他的相關研究者也會根據研究議題所需選擇必要的題目。本文依據研究上的需求，選定包括政治自由、政治多元性、以及制衡原則等三項主要的民主概念，其中共包括五個題目，我們反向計數受訪者的回應，合併成民主價值指標。⁹

其次，在儒家價值方面。一般來說，大多數學者都同意，歷史上東亞許多社會都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儒家思想是最重要的內容。包括 Inglehart (2003)、Inglehart and Baker (2000)、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Wang (2008)、Huntington (1996) 以及 Shin (2011) 等人的研究，都把儒家文化圈視為一個區域。早期如韋伯 (1978) 與裴魯恂 (2007) 等強調文化研究的學者也都指出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儒家文化的持續性影響至今在東亞各個社會都可以發現其痕跡。所以儒家文化做為一個持續性的價值觀，在中國社會仍然深具意義，尤其是近來中國官方與知識精英開始把儒家文化復興做為一項重要的政治文化工程。

本文將直接運用 Shin 最近的工作成果，他辨認了儒家文化圈共享的五個核心價值，並檢證它們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Shin, 2011; Nathan, 2012)。雖然 Shin 主要是使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的資料，唯該題組具有持續性。筆者也將直接使用這五個問題，分別測量中國民眾的階層主義、道德精英、人際和諧、公共利益以及家庭主義的傾向性。這五道題目都選取正向的回應。以下是民主價值與儒家文化指標時所使用的題組。

⁹ 張佑宗教授 (2000：23) 指出，胡佛教授等人所採取的測量的方式，與其它類似研究的區別，在於不採用抽象的和直接的問法，因為這種測量方式將不會有很好的區辨效果，受訪者容易在題目的引導下作正面的回答。因此，以反面的問法，可以讓受訪者聽到問題後會稍加思索一番。



民主價值題組

政治自由：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政治多元 1：在地方上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會影響地方的安定與和諧。

政治多元 2：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

制衡原則 1：法院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當地政府的意見。（司法獨立）

制衡原則 2：如果政府經常受到立法機構的制約，那麼就很難辦好大事情。（立法制衡）

儒家文化題組

家父長與階層主義：政府的領導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長，他們關於國家事務的決定，人民都應該服從。

道德菁英：只要有一位道德高尚的領導人，我們就可以讓他決定一切。

人際和諧：即使和別人發生了矛盾，也應該避免正面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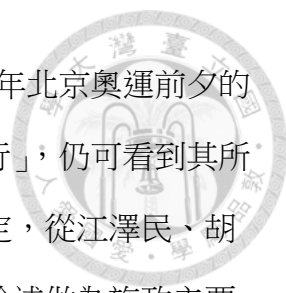
集體利益：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的利益都可以犧牲。

家庭主義：為了家庭的利益，應該把個人的利益擺在其次。

二、國家權力變項

在社會的價值觀變遷過程中，國家—或是指政權本身—為了維持系統的穩定，自然也會傾向藉由政治社會化過程來取得人民對於政治系統的支持。自 1989 年以來，中國政府也有幾個重要的措施來進行系統維持。就筆者觀察，與民眾的政治態度相關並應給予特別關注的，至少包括提倡「新民族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的政治安排」兩方面。

1990 年代中國興起「新民族主義」，其內容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適時運作民族主義，取代放棄共產主義後的意識型態真空，並企圖將西方自由民



主的文化意識形態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這個發展一直到 2008 年北京奧運前夕的「抵制家樂福」事件，以及涉及釣魚台主權爭議時的「反日遊行」，仍可看到其所發揮的影響。此外，為了處理因為社會快速發展所潛藏的不穩定，從江澤民、胡錦濤、一直到習近平，繼任的中國領導人皆主導該時期的國家論述做為施政主要方針，包括「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以及「中國夢」等，這些都表現了政權對於影響政治文化內容的企圖心。這些論述的具體政策作為可以表現在對於中國特色政治安排的訴求上。不過，本文認為這兩個方式有些地方需要區分。雖然民族主義初期也是政府主導，但後來的發展是民間有了自己的生命，有時連政府都難以掌控。而中國特色的政治安排，包括「和諧社會」與「維穩」目前仍是政府的政治目標內容之一。對於民間而言，前者可能是具有內在趨動力的，後者則是完全來自外在環境。

就本研究而言，主張上述兩者在某種程度會與價值觀的變遷有關，應對其相關性加以觀察。本文所使用的測量方式如下：首先測量受訪者是否具有民族主義傾向。民族榮耀感計數正向的表達，土地歸屬感則計數反向回應，合成一個民族主義指標。其次則是希望了解民眾對於不同面向政治制度安排的看法。本文使用 ABS 問卷中詢問受訪者制度偏好的題組進行測量。訪問中給予受訪者兩個競爭性的選項一個指涉西方民主的主要制度，另一個則是非民主政府的其他制度。在不提示任何價值判斷的基礎，給予受訪者自己選擇的空間。這些選項分別關聯了「民意角色」、「人民主權」、「媒體自由或管制」、「政府的照顧責任」、「政治甄補方式」以及「利益代表方式」等內容。

國家權力變項 1：民族主義

民族榮耀感：您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驕傲嗎？

土地歸屬感：如果您有機會，您願意離開中國到另一個國家去生活嗎？



國家權力變項 2：贊同中國的政治制度（對比民主制度）

民意的角色：

- (1) 政府決策應該完全遵循人民的意見
- (2) 政府認為怎麼做對人民最有利就應該怎麼做

人民主權：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 (1) 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應該由人民告訴政府要做什麼
- (2) 政府就像父母一樣，應該替我們做決定

媒體自由或管制：

- (1) 媒體應該有權自由地發佈新聞和表達意見，不受政府的控制
- (2) 政府應該有權阻止媒體發佈可能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新聞與意見

政府的照顧責任：

- (1) 每個人生活的好壞，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主要責任。
- (2) 人民生活的好壞，政府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政治甄補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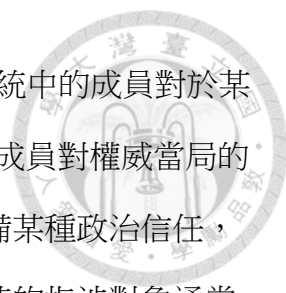
- (1) 政府領導人應該由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選出
- (2) 政府領導人應該根據他們的品格和能力任命，不一定要經過選舉

利益代表方式

- (1) 多個政黨代表各種利益相互競爭
- (2) 由一個政黨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

三、機構信任與體制正當性

民眾的政治支持是否會受到價值觀變遷的影響，是本文的核心論述之一。關於政治支持，本文將研究概念追溯到 David Easton (1957; 1965; 1975) 的政治系統論。政治支持 (supports) 是作為政治系統的重要輸入項之一，另一輸入項則是政治需求 (demands)。就 Easton 來看，政治支持可以分為兩種，普遍支持 (diffuse



support) 與特殊支持 (specific support)，特殊支持指的是政治系統中的成員對於某一特定的權威當局 (political authorities) 所進行的評價，這表示成員對權威當局的政策與舉措在概念上能夠感知，這種評價如果是正面的就是具備某種政治信任，最後會轉化成政治支持，提供系統有效地運作的基礎。普遍支持的指涉對象通常是政治典則 (the regime or constitutional order) 還有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並非由於政治社會中的成員獲得固定的報酬或利益而產生，而是藉著對成員社會化 (socialization) 培養成員的愛國心、對憲法與領導者的信任與忠貞所建立起來的。對於 Easton 的系統論而言，固然政治系統需要擴散支持給予政治系統某種程度的行動彈性，但更為關鍵的是系統的生存尚需仰賴「特殊的支持」，也就是因為「成員察覺其需求已經獲得滿足」而產生的。

系統論的構建與系統持續 (persistence) 概念密切相關，也就是對於政治穩定的要求。但是，反過來說，一旦系統環境發生變化，民眾對於政治系統的支持與要求也發生變化，這將形成系統的調整或變遷。Easton 認為政治支持可以從兩個面向表現出來：政治信任與合法性，即是否信任既有政治體系與是否認為政治體系具有合法性，所以政治信任其實是政治支持的一種展現。而在特定的政治支持方面，Easton 更認為對特定一任政府的政治支持與對其的信任兩者很難區分。

本研究將循著 Easton 的邏輯，但進一步區分並檢測二個層次的政治支持。第一個層次的特殊支持，也就是對於政治體系中某一特定的權威當局的正面評價，最後會轉化成政治支持，提供系統有效地運作的基礎。「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三波中國調查資料，針對特定政治與社會機構的信任進行直接的測量，詢問受訪者對於某一政治機構的信任程度。第二個層次則來自於普遍支持的概念，在本文中將測量民眾對整體政治制度的評價，涉及制度效能感、制度榮耀感、制度支持、制度比較，以及制度變遷等五個面向。具體問題如下所示。

機構信任

請問您對於下面這些機構的信任程度怎麼樣？

(法院、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共產黨、一般政府官員、地方政府、解放軍、公安部門、報紙、廣播電視、各種民間組織)

體制正當性

制度效能感：從長遠來看，我們的政治制度能解決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

制度榮耀感：整體而言，我以我們的政治制度為榮。

制度支持：即使我們的政治制度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民也應當支持。

制度比較：以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相比，我寧願在我國的政治制度下生活。

制度變遷：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需要有所調整？

三、政治參與

近年來，中國社會與政治當局皆以「穩定」為主要的訴求目標。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以來，中國的社會發展就進入另一個不同的階段。改革開放 30 年的經濟成長與社會資本積累，以北京奧運華麗的開場秀展現在世人面前。接著，2009 年中共建政 60 年的國慶大典，更是中國軟硬實力的一次集大成表現，向世人宣示中國的崛起。唯與此同時，政治相對穩定、經濟持續看漲的情勢之下，社會矛盾正猛烈地在中國各處發生。有學者指出，「中國社會出現經濟快速成長與群體性事件頻發相交織的景象」（徐行、王海峰，2010）。更為具體的表現則是，從 2009 年到 2010 年之間正是民間「維權」與政府「維穩」之間相互消長的重要時期。

群體性事件近年來的快速攀升是中國社會相當引人注目的現象，許多研究與報述皆對此做出估計。1993 年中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為 0.87 萬起，2005 年上升為 8.7 萬起，2006 年超過 9 萬起（張傳鶴，2010）。到了 2009 年，全中國共發生 9 萬起各類群體性事件（徐行、王海峰，2010）。另外一個驚人的資料則是勞資矛盾，

從 1991 年到 2008 年，勞資爭議案件從 7,633 件激增到 2008 年的 69 萬 3,465 件，年均遞增 32.55%，涉案總人數從 1 萬 6,767 人增加到 121 萬 4,328 人，年均增長 34.07%，大大超出經濟增長率 (姚先國，2010)。除此之外，上訪、信訪等等公民政治行動都成為中國民眾重要的選項。有論者指出，這是因為經濟成長所帶的社會轉型，也同時使中國社會發生利益分化，不可避免的出現勝者與敗者的差異。

那麼，價值觀的變遷是否也會引導著中國民眾對於政治參與內容的變化呢？在中國大陸的問卷中，放入了一組對於民眾平時可能採取的各項政治行動的問題，以探測這些行動在中國民眾之中的發生頻率。在題組之前提供一段關於採取政治行動的背景說明，用來引導民眾進入情境之中。

政治參與

人們有時會遇到一些個人或家庭問題需要領導幫忙，有時會對某項政策持不同看法；有時會對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有意見；有時還會遇到個別領導以權謀私。這時，他們往往會想辦法尋求解決。在過去三年中，您有沒有採取過以下辦法，提出您的意見或解決您遇到的問題？

「直接向領導反映意見」。

「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

「通過各級人大代表反映意見」。

「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

「寫信給報社」。

「找領導的朋友或熟人說情」。

「團結大夥一起跟他理論」。

「上訪、遊行、示威、靜坐」。



四、民主支持：民主正當性與威權抵制

關於民主正當性的支持，本文將援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在第三波調查中所建構的兩組指標，包括了民主正當性與威權抵制。民主正當性方面，我們一樣可以在兩種層次上加以處理。首先，我們關注民眾對於民主政府與民主體制的直接性的支持，在測量上，我們處理的是民眾對於最好政府的認知、民主體制的優先偏好（相較於威權政府）以及民主的一般性效能（是否能解決我們社會的問題）。其次，對於民主的比較性正當性方面，我們注意的是追求民主與其他價值之間的排擠效應。在東亞的社會中，有一種特別強調發展的傾向，尤其是在成功的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與中國崛起之後，追求經濟崛起與國家競爭力成為可欲的與優先性的選項。在此前提下，可以忍受局部的管制或是放棄政治自由。對此特殊現象，我們測量民眾對於兩種目標或價值競爭下的選擇問題，分別是民主與經濟發展，以及保護政治自由與減少經濟不平等之間的輕重關係。

另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在東亞的一個長期性現象。除了日本之外，此地區的許多國家或社會都在很長一段時間處於各種型式的威權統治下。¹⁰ 台灣與南韓在第三波民主化期間脫離了威權主義，在此之前分別是政黨威權與軍事威權政府；蒙古的前身為蘇聯的附庸國，1990 年才進行了民主轉型；印尼與菲律賓都受到強人政治的統治，民主化後仍受困於不穩定的民主品質；泰國才經歷過一次軍事政變，近來才又重回民主體制；此外，雖然程度有所不同，但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香港由於選舉制度的不公平，被視為是選舉威權體制；柬埔寨的體制仍未明朗，國際上大多認為是以政治領導人洪森為主的獨裁政體；越南與中國則仍然保持後共產主義的威權政府。威權體制對此地區長期影響會如何在民眾意見中呈現，理論上，對於民主支持的另一面應該是排拒其他非民主政府的統治形式。在第三波的調查中，處理了四種型式的威權政府被抵制的程度，包括強人、軍隊、專家以

¹⁰ 即使是日本，做為亞洲最現代化的國家，仍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陷入極右派國家主義的軍人統治。

及政黨威權，但由於中國目前仍是一黨專政的政治環境，對於抵制政黨威權的測量效果不佳，本文只使用前三項測量項目。



直接民主正當性

最好制度：民主也許會有問題，但還是一個最好的制度。

民主偏好：無論怎樣，民主體制總是比其他政府體制來的好。

民主效能：民主能夠解決我們社會中的問題。

比較民主正當性

民主優先 1：民主比經濟發展重要。

民主優先 2：保護政治自由比減少經濟不平等重要。

威權抵制

強人統治：讓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決策，代替人大和選舉。

軍隊統治：由軍隊來統治國家。

專家統治：由專家來決定一切，代替人大和選舉。

五、民主認知類型

過去 ABS 執行中國調查的經驗，發現中國民眾對於中國的民主表現，評價與滿意度的水平都很高，遠遠高於已經是民主鞏固的其他三個亞洲的國家或社會（日本、韓國、台灣）。¹¹ 在前二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資料基礎上，研究團隊對於亞洲民眾在民主價值與政體偏好的議題上，取得許多新的研究推進。同時也遇到一些問題，最主要的就是過去學界比較少注意到，關於民主概念在進行跨國調查

¹¹ 過去 ABS 的調查結果，令人很驚訝的發現，在亞洲對於民主運作的評價與政治自由度的關係是反向的。

時所遇到的文化差異問題。為了處理這一問題，在多次跨國的問卷設計會議之後，研究團隊發展了一組全新的測量指標，將有關民主價值的四個核心觀念：「公民權利」、「民主程序」、「社會正義」以及「治理能力」轉化成四組價值並陳的問項，以測知受訪者心中對於民主一詞的真正理解。

運用此題組可以討論關於儒家主義式民主的可能性，我們將利用民眾對於民主不同認知的內容進行民主類型的分類，包括「權利-程序式民主」與「效能-分配式民主」兩類。「權利-程序式民主」意指民眾更認知民主意義為「公民權利」與「民主程序」，而傾向「效能-分配式民主」的民眾則是認知民主意義為「社會正義」以及「治理能力」者。就語意而言，前者更傾向西方社會的民主標準，後者則可能與儒家文化的某些價值相合。

民主意義題組

題目一：

- (1) 政府能減少貧富差距 (社會正義)
- (2) 人民通過公平的選舉自由選出政府領導人 (民主程序)
- (3) 政府不會浪費公款 (治理能力)
- (4) 人民可以自由地對政治表達看法 (公民權利)

題目二：

- (1) 人大 (立法機構) 可以有效監督政府 (民主程序)
- (2) 每個人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衣食住行都得到保障 (社會正義)
- (3) 人民可以自由組織政治團體 (公民權利)
- (4) 政府為人民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 (治理能力)

題目三：

- (1) 政府能有效執法維護社會秩序 (治理能力)
- (2) 媒體可以自由批評政府 (公民權利)



- (3) 政府能讓老百姓人人有工作 (社會正義)
- (4) 政府由多個政黨通過選舉公平競爭選出 (民主程序)

題目四：

- (1) 人民可自由參與抗議和示威活動 (公民權利)
- (2) 政治清廉而沒有貪污腐敗 (治理能力)
- (3) 如果政府侵害人民的權利，法院可以替人民主持公道 (民主程序)
- (4) 失業人員能從政府得到救濟 (社會正義)

參、資料、方法與限制

要理解中國近年來的變化必須由新世代的政治態度著手。本文的焦點在於探索中國新世代政治態度與相關文化價值的內容，同時認為應該以更廣泛的調查與研究，理解中國新舊世代之間態度與價值是否發生了變遷。基此，應該採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即為社會調查研究法，但由於自行蒐集資料的成本過高，本研究將藉由「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第三波中國調查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這是一項面向全中國的訪問調查，屬於是東亞民主研究計劃的一個子計劃。調查執行的時間為 2011 年 7 月到 10 月，訪問結果共回收 3473 筆受訪者資料。為尋求更高的代表性，資料經過了代表性檢定與加權處理，使用的加權參數包括性別、年齡、城鄉比與原抽樣框架下的各地區人口比例。調查的區域涵蓋中國大陸地區的 25 個省（香港、澳門、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寧夏、以及海南除外），覆蓋了中國 94.87% 的人口（張佑宗，2011a）。由於這是一項由專業學術機構所進行的資料蒐集，本文是在既有資料庫的基礎上進行統計分析，屬二手資料分析。

由於使用二手資料分析法，本研究將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限制。首先是核心概念的測量方式，因為分析的內容主要依據大型資料庫的調查成果，問卷內容有時無法完全契合後設研究設計的需求，在某些概念的使用上無法顧及所有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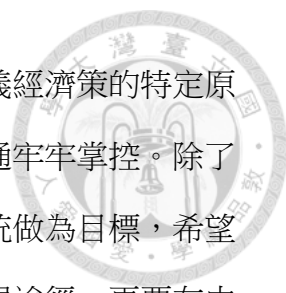
其次，在研究設計上，本文把重點放在量化資料的分析，尋求中國大陸民眾的價值觀與政治支持之間的分佈情況與相關性，藉此描繪新世代的政治文化圖像與因果相關性。就質化研究的角度，必然譏為過於簡略。但因為研究篇幅有限，又此研究為一探索性研究，藉由發現量化資料中的相關性，未來或可做為進一步深度訪談與質化研究的起點。

第四節 本文的主要觀點

壹、政治支持分裂與體制變遷

因為中國社會看起來尚無挑戰政權的群體及能動性，所以多數的研究者都把焦點放在政治菁英之上。但這種傾向將會存在總體－中介層次的誤差，忽視微觀層次的資料將使我們無法看到變動的全貌。本文認為，文化變遷的結果會帶動政治變遷。而文化變遷的方向，不是全然由政治精英的策略互動以及既有制度限制來決定，大眾政治文化變遷會有自我的邏輯，未來可能的變化應該要從群眾價值觀的變化加以辨明（張佑宗，2000）。黎安友的觀察告訴我們中國精英不會分裂，但這個現象或許會因為社會中民眾態度的分裂而有所調整；裴敏欣認為中國當局必須面對治理能力有其限度，下一步必須與民主改革派和談，不過歷史證據顯示，遭遇危機的政權及其社會，如果缺乏一個集體尋求自由的呼聲，改革的方向未必朝向民主憲政。

另一方面，中國當局的确正在努力維持系統的穩定，在國家與社會的聯結方面，為了保持社會穩定而盡其能力控制社會所有可能造成不穩定的來源，中國政府投入很多資源建立一套治理混亂的系統。為了保持社會穩定而盡其能力控制社會所有可能造成不穩定的來源，當局運用大量經費與人力，同時依賴現代高科技



以及大力度的行政管理做為支柱。中國當局一方面擁抱自由主義經濟策的特定原則，另一方面則卻將政府、法院、軍隊、安全機構以及資訊流通牢牢掌控。除了強化管制外，中共也正把建立一個不同西方政治邏輯的價值系統做為目標，希望把政治改革的方向與速度納入軌道。不僅要走出一個獨特的發展途徑，更要在中國式民主的制度上有所創新。這個預設是否符合事實，中國式民主的論述是否有可能得到社會支持。我們必須分析政治支持在改革開放後 30 年後變遷的軌跡，尤其是新興世代內部的支持傾向。

公民面對政治體系時，其對於「正當性」所展現出來的態度傾向，被視為是一國政治秩序維持的關鍵因素，也就是民眾政治支持的內容為何。政治支持的概念對於政治理論最主要的影響，就是與政治穩定的密切關係。一定的政治支持必然有利於現有政治體制的維持，不論是那一種政治體制。不論是那一種政府，當政治權威得到民眾相當程度的支持時，人民會相信政治權威有能力了解其需要、有效回應人的需求並具備一定的廉潔與透明度時，其體制運作的成本會比較小，也可以運作的很好。但相反，當政治支持低落，民眾給予執政者的自由裁量權相對地縮小，且會處處限制執政者，體制的運作很有可能因此失靈甚至解體。

其次，價值觀與民主支持之間的關係，也是政治學者關注的焦點。本來西方學者的研究觀點基本是，民主制度下的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都相對容易形成，反之，獨裁或者權威主政權下的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則比較不容易形成。(Uslaner, 1999；Levi, 1998) 但現在的研究通常發現，相較於有效率的威權政府，新興民主國家的民眾其政治信任程度偏低，更不用說是與成熟民主國家的民眾比較。¹² 對於處於發展中的威權體制中，由於對於政治穩定的要求，在邏輯上對現在政治機構的信任與民主支持應該呈現反向的關係。不過，實際上在過去的研究中，對於威權國家中政治信任與民主支持之間的關係則著墨較少。

¹² 例如 Chu, Diamond, and Shin (2001) 的研究就指出，台灣與南韓人民對民主體制的信任程度呈現偏低的狀態，而且在民主化多年之後發生下降的情況，這將危及新興民主政體的穩定，更有可能發生民主的倒退。



所以，基於公民態度之於民主化過程的重要性，我們認為真正足以趨動民主化的潛在動力並非政治菁英間的分裂，更重要的是公民內部的分歧，為了重新確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規則而進行的公共談判。這種分歧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是以價值觀的變遷來顯現，傳統價值遭遇現代價值，整個社會開始轉變。有些社會容易變，但不見得變的順利，另外有一些社會不容易變，是因為堅固的傳統文化仍然持續發揮影響力。變遷的可能性當然與社會結構是否提供了權力重整的機會有關，社會中形成了相當程度的新興利益團體也是重要條件，不過，其前提是有一組新的價值觀正在成形。

貳、研究假設與問題

根據中國研究文獻的相關成果，以及對於未來中國發展的辯論，主要看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第一種看法是從西方以往的民主化理論出發，但其面對中國案例時都無法有效預測，多數反而解釋了威權的持續，認為中國的改革過渡期可以維持相當長的時間，這種看法的核心都指涉了威權政體控制能力的有效性，可以視為威權韌性的觀點。第二種看法則是中國特殊論，其多數支持者認為，基於傳統文化重新復興的價值與先前經濟發展的經驗，中國將走出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發展途徑，包括「中國式民主」，這種看法可以視為文化相對理論的一種延伸。最後，雖然基於經濟發展的現代化理論失敗了，可是另一支來自 Weber 的現代化理論傳統提示我們，現代化更重要的趨力在於「文化」，也就是價值觀的變遷。Inglehart 進一步提出，現代化的路徑不是直線的，大多數的社會先從傳統社會進展到工業化社會，再從工業化進展到後工業化的社會，並經歷了價值觀變遷的過程。由此，雖然可能非常緩慢，但長期而言人類社會仍然將趨於一致，這種看法可以視為趨同理論。

根據三類理論觀點，我們可以發展出三組理論問題，也就是三種不同的發展



途徑。

「威權韌性」：由於現代威權主義政府擁有更好的技巧與政策工具，政權將有更有韌性，開始制度化並適合現在的社會。在中國，我們要關心的問題是，目前的威權政體取得正當性了嗎？這個局面是怎麼出現的？另外，這樣的正當性的持續力如何？這幾個問題必須從新世代的價值觀內容得到答案。

「文化相對」：其次一個假設是基於中國的特殊性。中國傳統文化的確影響深遠，儒家文化對於政治生活有自我完善的邏輯與標準，至今仍在中國官方與民間發揮作用。那麼，一個基於儒家傳統的政治制度是否可能實現？是否可以在新世代之間得到支持，藉由民眾意見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其可能性。

「趨同理論」：最後，趨同假設認為價值觀變遷將會帶來政治改變。而政治變遷的動力來源，是社會上必須具有一「關鍵群體」，由於生活環境變化，帶來物質/精神需求的改變。一旦這個改變的內容傾向民主價值提昇，就能成為政治動員的基礎。中國的改革開放結果，將造成價值觀的變遷，這種變遷的主要表現可以在新世代的價值觀中發現其軌跡。

中國模式的看法是否就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道路？又現階段下的中國模式的社會基礎為何？基本上來說，在中國模式之下的國家社會特徵基本上是「強國家、弱社會」。然而，持續發展將會對社會情況形成重大的而且深層的改變，為了因應這些轉變，對於中國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將會越來越高，威權政體是否有其極限？要解答這些問題，本文認為要回到文化變遷研究的脈絡中加以理解。

首先，由於世代差異對於文化變遷的重要影響。本文的主要觀點認為，要理解中國近年來的變化以及未來的發展，必須由新世代的政治態度著手。本文的研究焦點在於探索中國新世代政治態度與相關文化價值的內容，同時認為應該以更深入的調查研究，理解中國新舊世代之間態度與價值是否發生了變遷。早期關於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強調世代之間傳遞政治文化有助於政治體系與結構的穩定。可是近來關於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則注意了世代間政治文化傳遞的斷裂，尤其是來

自於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變遷，經常會形成世代之間差異的來源，其動力是價值觀的變遷。



文化如何影響制度的思考提供本文三個關注點。第一是文化有其持續性，尤其是歷史上在社會中佔有長期優勢的文化；第二是文化仍然會發生變遷，當社會經濟發展朝向現代化方向的時候；第三，文化變遷不會只有直線進行，如果權力當局與主流文化與新文化並不一致的時候，對抗可能發生。所以，就文化變遷的過程中，辨認競爭性的價值觀與其如何在民眾之間分佈是有幫助的。借助新一代民主化理論的觀點，稍微轉化後，筆者認為文化認知結構的分化會是整個社會進入制度變遷議題的起點。本文將以政治支持是否發生分化做為檢視的依變項。

總結來看，本文將依序處理以下研究議題：

1. 中國的價值觀是否具有世代差異。
2. 競爭性的價值觀在各世代中的分佈狀況。
3. 價值觀變遷對於政治支持的影響。
4. 民主支持與威權體制的正當性。
5. 中國式民主的可能。

中國未來的改變應該在政治之外進行觀察，最重要的是來自社會內部的變遷。本文主要觀察的對象在於改革開放後中國產生的新世代，由於經濟社會環境的重大變遷，將會在新世代的價值觀變遷中表現出來，對於中國未來道路的掌握也必然落於新世代的價值觀內容之中。

參、章節安排



本文的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研究設計與相關研究效益。以下再分為七章。第二章討論民主化議題在中國這 30 年來的發展，做為歷史回顧與文獻檢閱，主要是要理解在中國民主化的議題上，我們知道了什麼與需要處理那些問題。

第三章開始進行本文的主要論證，我們將分析中國當代價值觀變遷的內涵，以「儒家價值觀」與「民主價值觀」為觀察重點，本文稱之為競爭性價值觀。由調查資料結果來分析中國民眾的不同世代，價值觀是否發生變遷。更重要的，價值觀結構是否因為世代而發生變化。第四章處理中國崛起與韌性威權主義中的意識型態對於中國民眾態度的影響，其中與政治態度息息相關的，本文認為包括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官方所宣傳的中國式治理兩組。第五章處理政治支持的兩個面向，前者討論特殊性政治支持—政治機構信任，後者則聚焦在擴散性政治支持—制度正當性，分析的重點在理解政治支持是否會因為世代與價值觀不同而有所差異，我們將之視為趨動民主化過程的潛在機制。

第六章將焦點轉到行動層次，由於近年來中國社會矛盾的主要外顯現象就是群體性事件的好發，可以認為這也是因為中國結構變遷所帶來的效果，中國新世代的政治參與是否與之前不同，吾人將處理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是否與政治行動發生某種程度的關聯性。第七章討論價值觀分類與民主支持之間的相關性，並涉及中國式民主的問題。第八章則是結論。

第二章 民主與中國—過渡還是異例



知識份子們進行的這種揣測中國政治未來的活動讓有些人著迷，卻讓很多人困惑。

普遍的想法是，積習難改的中共決意要維持其政治壟斷，也有辦法再存活一段時間

(儘管不是永遠)，也有少數人則認為中共來日不多。事實上，中國很有可能在接下

來的 10 到 15 年內進行民主化過渡。

---- Minxin Pei (2013)

本章的目的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關於政治發展過程的討論，主要是圍繞中國民主化議題的討論，看看我們目前知道了那些內容。以下將分為幾個部分進行，第一節回顧西方學界對於民主化的解釋途徑，並處理其與中國案例之間的對話關係；其次是檢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幾次民主化可能時機的討論及其結果；最後，討論近來被熱烈提出關於「中國模式」的內容，以及其對於中國民主化前景的看法，主要是涉及未來政體型式—中國式民主—的特徵。

第一節 民主化解釋途徑與中國案例

環繞中國至今仍然無法民主化的議題，形成對於以往民主化理論的挑戰。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基本上是由國家推動朝向市場經濟的改革，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又拉動了政治制度化、文化世俗化以及社會多元化 (胡偉，2008)。目前的中國實際上是威權主義與市場經濟並存的情況，許多的研究嘗試解釋這個現象與民主化理論的矛盾性。其中最核心的議題是關於趨動民主化的機制問題，與此相關的民主化理論觀點包括，現代化理論所主張的價值變遷機制、從現代化理論發展出來的社會結構變遷機制、以及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精英轉型理論等。另外，

強調不同文明與民主兼容性問題的文化條件論，以及重視國際局勢影響力的外部因素論，近來也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以下的文獻檢閱內容將顯示，肯定中國將會民主化的理論目前都失敗了，留下來的論點主要是解釋目前的政權何以渡過民主化壓力。

壹、經濟發展機制

第一支解釋民主轉型的理論為現代化理論，特別強調社會整體的變遷與功能面向，所以又被稱為是功能需求理論。這個大的研究脈絡對於民主化的「機制」，有兩種不同的理論主張。第一種看法強調現代性趨動民主化，其內涵為現代化是導致民主化的源頭，早期的研究特別看重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的線性關係，近來的研究則更重視中介變項的作用，也就是價值觀變遷機制。這一段落將關注經濟發展導向民主的直線關係，本節的最後我們將回到價值觀變遷機制。第二種主張則是認為社會結構變遷才能帶來民主化，較強調社會結構變遷機制。本段將首先回顧經濟發展變遷機制，下一段的重心則是社會結構變遷機制。

Lipset (1959) 的著名理論指出：社會現代化將會帶來民主，其論證是建立在人均收入和民主之間很強的經驗相關性的基礎之上。現代化將造成城市化水準的不斷提高、工業將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更高的教育水準以及不斷增長的社會分殊化。¹³ 這個過程中，政權不可能保持在原初的狀態，必須在某個程度趨同或現代化。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發展，必然發生民主化。Rostow (1960) 進一步建立了關於經濟發展階段論的邏輯，斷言從經濟現代化到民主是一個線性關係而且是無法避免的。除此之外，在 Przeworski et al. (1997, 2000) 之前，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受到量化研究的支持，正向關係被大多數研究成果所支持 (Wucherpfennig and

¹³ 這個論點其實包括了現代化學者相當強調的兩個相關性，其一為收入越高的國家，民主的可能性更高；其二，國民受到更多教育的國家往往更民主。

Deutsch, 2009)。

當然，現代化理論受到許多挑戰與修正。¹⁴ 當它被使用在預測中國民主發展時也同樣遭到難以解釋的困境。從理論上而言，與現代化理論被質疑的一樣，這個途徑缺乏一種明確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民主會不會出現，何時以及如何出現。同時，其他歷史因素似乎也會對經濟和政治發展道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不只是單一線性關係。

現代化理論的趨同假設使得一些學者對於中國的民主化具有信心，認為中國正走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威權政體將會有所改變。由於經濟複雜性與社會多元化程度逐漸增加，會出現許多複雜的利益，利益表達過程中將需要新的機制來處理衝突問題，這就會帶來中國的改變潛力 (Gilley, 2003, 2004; Goldman, 2005; Rowen, 2007)。可是歷史事實的發展是中國並沒有陷入困難，反而出現了一個大的管制型國家，並保有相當的穩定性 (Yang, 2004, 2007; Lu, 2004)。中國政權為因應需求將經濟部分市場化、解除許多社會生活面向的管制，但保留了對關鍵領域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國家仍然緊緊抓注意見管制的這個重要角色。目前看來，經濟發展促進民主化的論述在中國案例上沒有什麼預測力。

貳、社會結構變遷機制

第二種民主化的解釋是以 Moore 為代表的社會結構理論，側重於政治社會結構和發展的歷史分析，也可以稱為歷史結構論，是一種結合結構與行動者的理論觀點。不同於現代化理論只強調經濟發展與民主間的線性發展邏輯，Moore (2003)

¹⁴ 第一個修正的方向是統計方式的改變，Przeworski et al. (2000) 主張並證明，收入和民主之間的正向關係主要是由富國保持民主的傾向所推動的，而窮國卻有更嚴重的經歷民主分數下滑，「即遭受反民主的政變及其他行動」的傾向。第二個修正方向來自 Huntington (1983, 1993)，認為現代化不一定是與經濟發長程度的單一線性關係，而且會受到階級結構變化、國際因素、歷史遺緒等因素綜合性的影響，而收入與民主化的關係在於「轉型區域」，進入此區域的中等收入國家最可能發生自由化或民主化。

將後來的政治體制和最初的社會條件以及資產階級的力量聯繫起來。¹⁵ 誠如其名言：「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民主」。資產階級作為一個行動群體對於民主轉型有重要影響。Therborn (1977) 與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運用的同樣的分析方式，但得出不同的結論，中產階級為了既得利益將傾向保守，推動民主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窮人與工人，民主化的關鍵在於這些階級團結與強大。另外一個相似的分析則是 Tilly (1992; 2004)，藉由對國家起源進行歷史分析的結果，民主的起源是人民與統治者因為稅收問題而彼此博奕的結果。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 以理性抉擇論的型式將這類看法加以模型化，認為民主制度的出現在於社會存在兩個群體—權貴與平民—對於社會分配問題發生分歧，從專制轉向民主是兩個群體間博奕的結果，關鍵是有一個社會動盪的危機。¹⁶

這些看法都代表特定階級或人民一旦形成利益，就會向政府要求民主參與，但中國案例目前並不提供這樣的可能。Chen and Dickson (2008) 針對中國社會新興的資本家進行訪談，發現這個新興群體多數支持中共政權，贊成選舉但不要過度競爭。另外，越滿意現在生活的越支持中共政權，也就是說在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必然是民主化的主體。中國企業主缺乏形成階級的環境與克服集體行動的成本 (Tsai, 2007)，甚至被中共以企業家入黨的策略收編進入體系中，成為「紅色資本家」 (Dickson, 2000; 2003)。在勞工階級方面，Gallagher (2002) 的研究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方式 FDI (外國直接投資) 分化了勞工階級，並展現了兩個主要特徵。包括緩解了勞工的政治壓力，以及使本土型企業無法成為發展的主流。這些研究表示，中國可能要求民主的階級已經被收編或分化，無法成為民主的代理人。

¹⁵ 最初的社會條件意指階級結構和農業組織。

¹⁶ Acemoglu and Robinson 的做法是目前民主轉型理論最有創意的一項新發展，經由簡潔的分類與賽局模型，聯結了結構、社會分歧與危機的動態計算關係。其著作《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民主與獨裁的經濟起源》，標題明顯是向 Moore 的民主化研究名著《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致敬，以理性模式涵納了 Moore 對階級結構因素的精彩論證。

參、菁英轉型理論



不同於現代化理論的結構功能觀點與決定論式的主張，新一批的民主化研究者將焦點放在政治環境中行動者的角色上。對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研究者提出政治轉型都是專制政府內部政治菁英分裂的結果，和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公民壓力等高層政治以外的因素關係不大，政治菁英之間的互動才是推動民主化轉型的重要關鍵 (Di Palma, 1990; O'Donnell, Schmitter & Whitehead, 1986)。

政治菁英對於民主化過程的重要影響，先前就已見於不同的民主理論研究的著作中。例如，早期 Schumpeter (1942) 的程序性民主定義就把民主限縮在菁英的競爭上。Dahl (1971) 在其 *Polyarchy* 中的論述則認為，競爭性政治與遊戲規則的建立首先發生在菁英之中，之再逐漸擴展到其他社會團體；Rustow (1970) 雖是現代化理論的主要學者，但其對於民主轉型的焦點也包括菁英變數，民主政治建立是由於菁英的抉擇與互動，然後菁英與選民再逐漸適應與習慣此種遊戲規則；Lijphart (1968) 的共識型民主中，菁英之間的容忍與協商精神的建立更是民主必要的條件。菁英轉型論者則是更進一步認為，雖然一個國家成功地由威權體制轉換為民主體制，必須有客觀情勢的配合，包括適當的經濟發展、貧富差距的減少、多元化之社會結構、市場取向的經濟、以及較具容忍和妥協的政治文化等。但最為重要的變數是政治菁英的策略和行動，以及他們之間的衝突和妥協。所有從威權朝向民主的過渡，都是威權政體內部發生分化的直接或間接結果 (O'Donnell, Schmitter and Whitehead, eds, 1986; Przeworski, 1991)。

綜合來看，以行動者為中心的菁英轉型論強調，菁英階層的分化與互動是民主化的動力。在中國案例上，Gilley (2004) 除了在社會面向上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經濟發展與龐大中產階級等先決條件外，也認為從行動中心取向的角度可以發現中國的政治菁英已具備「強硬派—溫和派」或是「保守派—改革派」的分野，一旦機會來臨，領導層的改革派將和社會中的民主支持者結合，推動中國民主化進



程。黎安友 (Nathan, 2003; 2007) 則反對這個看法。就實然面的角度來看，目前中國的政治菁英十分團結。而且在 2003 年後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克服了繼承危機，情況不足以起動一場交易，威權政府產生了韌性。

肆、文化相對論

Tocquevill 很早就提示了文化對於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影響。他在 1830 年代對於美國社會的觀察記錄中，就指出美國政治制度能發揮功效，是因為文化與民主協調一致，而美國文化的特殊性則在於活絡的公民社會 (Tocqueville, 2004)。¹⁷ 相反地，當一個社會的文化與民主有所閼隔，那麼民主或許不是該社會最合適的制度。不同文化傳統的本質差異有可能阻礙或延滯民主轉型，或是減緩現代化對於價值變遷的作用。

在東亞社會中，文化相對論者的看法一直與「亞洲價值」的辯論相互映應。在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爭執不休的年代，亞洲四小龍（台灣、韓國、新加坡與香港）的經濟成功給了發展中國家另一個可能的答案。包括此前成功的日本，在天然資源不足與後進發展的結構限制下，東亞這些國家以國家主導的產業發展策略取

¹⁷ Putman (1993) 對於義大利南北的差異研究，將這個看法進一步發展，認為市民社群 (civic community) 是導致較有效的政府運作與民主的重要因素，而所謂的市民社群是指民眾具有較高程度之政治興趣、社會平等、人際間的信任以及自發性的組織。另外，與 Putman 相同，Fukuyama (1999) 也強調社會資本在促進民主制度所扮演的一定角色。不過，在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中，公民社會或社會資本的概念解釋，一般被視為有助於優質民主的文化因素，與新興民主的鞏固更為相關，而與促動民主轉型則沒有直接關連。唯 1990 年代中國研究者一度把新興公民社會視為中國民主化的動力來源，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在 1980-90 年代間受到重視，被用來解釋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變化，也被視為是走向現代化道路的一個趨動力量 (鄧正來、景躍進，1992)。但根據後來的相關研究，中國大陸的社團均具備官民二元性，很難排除國家對社團活動的干預，不具備有獨立於國家干預之外的活動空間，其自主性就很難確立。在中共列寧式政黨本質未改變的體制下，有可能挑戰執政黨的自主型態與政治活躍團體是不被允許存在的 (Dickson, 2000; 戴東清, 2005)。在實際案例上，中國的各種協會並不具備層級式組織，通常其管轄單位不只一個，這個情況也不符合統合主義的要素 (Kennedy, 2005)。而在社會資本方面，許多研究指出中國仍然受到傳統關係主義的影響，這個聯結可以解釋改革開放後資本流動的基本情況 (胡必亮, 2005)，近來也有一些中國群體性事件的研究者以社會資本做為動員管道的研究標的，不過這些傳統社會網絡與政治議題的聯結性在中國還未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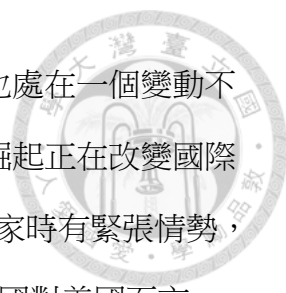
得經濟增長。除了正確的策略外，高度政治穩定與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也被認為是有助經濟發展的原因。前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更公開宣揚「亞洲價值」，勤勞、節儉、重視教育這些傳統觀念是東方的成功基礎，不需要依照西方的價值觀行事 (Zakaria, 1994; Kim, 1994)。

中國近 30 年來的發展情況使得「亞洲價值」的討論再次出現，其根基是因為中國崛起這個重要背景。(Kim, 2010) 中國的經濟發展軌跡以不完全與西方理論相同的方式進行 (摸著石頭過河)，在政治與社會制度上也開始強調中國特色 (早期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現在的流行語彙是「中國模式」)，同時重新開始提倡儒學再興。這個情況是否表示，中國的發展方式與儒家傳統的確為西式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種替代方案，威權政治並非民主政治非此即彼的替代選項。主張文化特殊論的學者或專家普遍認為，民主制度或許不是普世性的價值，並非每一個社會都可以運作民主，就算要運行民主，也必須考慮到該社會的文化獨特性而進行某種調整。

伍、外部因素

另外一個過去比較少受到注意的變項，就是外部因素對於民主化的影響，McFaul (2006) 提示研究者必須要重新檢視國際體系的作用。McFaul 以蘇聯崩潰前後來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民主化內容，前者的民主化的特徵是菁英協商，到了後者則是更多來自政權之外，與群眾運動的結合。這種差異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國際體系結構所造成，冷戰的兩極體系制約了民主化內容的可能性，直到蘇聯 1989 年解體，新的國際體系才允許了比之前更為廣泛的民主化過渡。基此，McFaul 認為國際體系也能對民主化產生重要影響，只是過去通常不被重視，不論是民主化的方式或是內容，都必須同時考慮國際結果的因素才能更為完整。

外部因素對於民主化的影響，至少包括霸權之間以及霸權與盟國之間的權力



關係，還有主導國際結構的主流意識型態問題。中國的民主化也處在一個變動不居、前景未明的國際環境下，使其前途難以斷言。首先，中國崛起正在改變國際結構的內容，尤其是東亞地區的均勢情況，近年來中國與週邊國家時有緊張情勢，就是這種調整的插曲。其次，中美關係 (G2) 既競爭又合作，中國對美國而言，一方面是世界上另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必須建立穩定的關係來處理現今的問題；另一方面又是一個處理東亞地區的潛在霸權挑戰者，加上人權記錄不佳，也必須在國際上加以防範。這種不確定的結構環境使得中國民主化前景無法明朗。最後，中國的成功也使其具有抵抗或是挑戰西方意識型態的本錢，國際觀察家注意到北京當局有可能在國際關係中另闢蹊徑，成為美國的主要對手，「北京共識」未來將可以取代「華盛頓共識」。在這個大局勢之下，中國具有新角色的國際環境並不有利於民主化的啟動。

陸、世代交替趨動的價值觀變遷

現代化理論包括不同機制，價值變遷機制與社會結構變遷機制，另一分支則為行動者中心論，但這些看法在中國案例上都受到挫敗，主要是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近 30 年來幾次民主化的可能性都失去機遇，反而是形成了一個更有韌性的威權主義體制。因為中國崛起的現實，文化相對論以及外部體系論點看來更有未來性，也受到中外觀察家與某些學者的青睞。

不過，除了主流的文化相對論以外，文化論的觀點中有另外一支看法特別重視特定政治文化與民主制度之間的相容關係。就內容來說，這支看法其實是現代化理論的文化版本。早期的研究強調協調的公民文化是民主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 (Almond and Verba, 1963)，這也是 Tocquevill 論點的延伸。Inglehart (1997) 進一步發展出「文化變遷理論」 (the theory of culture shift)，他處理了從物質主義到後物質主義關於價值觀轉移的問題，並呈現了其與民主價值變遷的正向關係。在



Inglehart 的理論中，帶來變遷的重要機制來自世代交替 (generational replace)，因為不同世代之間的物質條件改變，使得新世代所關注的事物不同於以往，進而形成價值觀與制度的變遷。同樣地，早期關於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強調世代之間傳遞政治文化有助於政治體系與結構的穩定。可是近來關於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則注意了世代間政治文化傳遞的斷裂，尤其是來自於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變遷，經常會形成世代之間差異的來源，其動力是價值觀的變遷。¹⁸

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文化的研究中，與年齡差異相關的理論首先是生命週期的說法，其次則是世代差異。在前一個理論下，政治文化被視為由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的關於政治的情感、認知與態度，年輕一代具有的叛逆個性會因現實生活的變化與年齡增長而改變。生命週期理論認為年齡差異的影響力只是暫時的，最終仍然是世代傳遞的文化發揮作用。世代差異理論則是認為政治文化的傳遞並非完全順利，結構變遷以及重大事件的發生會形成一個世代的共同經歷，在正式的政治文化傳遞外發揮隱性政治社會化的功能，構成真實的世代價值觀改變。¹⁹

在中國，「80 後」的青年世代生活在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結構環境下，主要是經濟條件改善與社會的開放性。他們在 21 世紀開始就完全取得公民資格，這意味他們將有能力用公民權去改變自己生活體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現狀，重建一套「新秩序」。就一般的論點來看，政治體所以可能會發生體制變遷，最重要的因素必須是一個世代整體的價值發生了變遷。若把焦點放在本文的核心議題上，就是說我們應該辨認青年世代的政治支持與其他世代是否有所不同，而這種不同對於政治現實會有什麼可能的影響。

¹⁸ Inglehart 修正原本現代化理論的問題而對變遷問題給予新解釋。把 1970 年以來先進工業國家發生的變化稱為後現代化，或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主要觀點認為西方價值取向已從以往重視物質主義的需求，轉變為後物質主義的需求。前者強調物質、安全的基本需求，後者強調生活品質的提高，如環保議題、弱勢團體政治權利議題等。更重要的論點是，一個社會政治體制的變遷其背後的主要基礎是價值觀的變遷。

¹⁹ 美國與歐洲的戰後嬰兒潮研究可以代表這種觀點。戰後高度的生育率形成一波人口增長，這些人口的集體性傾向改變了現實的政治。

第二節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主之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 1979 年到 1989 年為第一個十年，中國剛從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中重建，國際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方興，國家與社會都處在變動不居的環境中，許多原因匯集在一起最終引發了「1989 年政治風波」（周賀，2004）。1990 年代的後天安門時期，在短暫的路線之爭後確立持續經濟開放的政策，政治與社會相對穩定。其中，有一個民主發展的亮點即是基層民主的推展，一時之間使中外學者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態度樂觀。唯其目前的暫定結局是，基層民主發展進入停滯期，改革方向轉往了黨內民主建設，藉由基層民主的健全而全面民主化的途徑顯然走不通。第三個時期是進入 21 世紀以後，這是以中國崛起為特徵的發展期。2008 年的北京奧運與 2009 年的建國六十年國慶閱兵，高度展現這個時期中國重新建立自信的態勢。與此同時，經濟發展所牽動的社會變遷與政治體制之間矛盾也頻繁發生，群體性事件好發與當局的加強管制同時並存是這個時期的焦點。

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例外

1979 年之前的現代中國，大多數的時間是在革命、戰爭以及政治運動中渡過（參見史景遷，2001；Lieberthal, 2004）。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國政府將重心轉向經濟發展，這個會議後來被視為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中國後來經濟成功的基礎（吳敬璉，2005：94）。經過十年的發展，社會整體較過去開放不少，自由民主的思想與聲浪也開始進入中國。

在大致相同的時期，世界上其他地方也興起一股自由化以及民主化的浪潮，包括了許多的共產主義與威權政體的國家，大量地轉向了民主政體，也就是第三

波民主化 (Huntington, 1993)。在改革開放政策確立後，中國的政治氛圍變的比較寬鬆，所以也有一些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與伴隨而來的群眾運動。包括 1976 年毛澤東去世前夕發生的天安門「四五」運動、1978-1979 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七十年代末的「知青返城」運動、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的「文革反思」運動，以及 1986-1989 年間以「八九學運」為終局的學生運動等。可是，這個期間的政治改革訴求的結局是天安門事件與軍事鎮壓。更重要的是，這場事件的結局帶來了 1990 年代的政治穩定 (趙鼎新，2010)。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解釋理論包括兩組，主流的理論認為民主化是統治集團分裂的結果，其次則是這些國家中的公民社會力量崛起。對 1980 年代的中國來說，由於政治氣氛的放鬆，在這兩個方面都有危機出現。可是 1990 年以後，中共在政治面克服了繼承問題，並以持續的經濟改革與經濟成功取得統治正當性；在社會面則是分化了或是收編了因為社會開放而出現的新興利益團體，使其不足以從事挑戰中共政權的行動。不論是政治面或是社會面，中國當局基本上化解了逐漸開放的社會對於民主追求的壓力，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更是中國有效渡過治理危機的最重要支撐。²⁰

貳、基層民主的發展與停滯

中國在 1990 年代的「國家—社會」關係趨於穩定。趙鼎新 (2010) 指出，這時期的國家領導性質和社會與 1980 年代相比，明顯地有助於原有體制的安定。²¹ 不

²⁰ 這組概念的內容乃是源自於台大政治系陶儀芬老師於課堂上針對中國民主化議題的討論。

²¹ 在「國家領導性質」方面，90 年代的領導人在處理政治危機時更老練和圓滑，懂得避免激怒民眾和吸引民眾支持。此外，領導人也更懂得壓制、控制異見份子，讓異見份子的公眾影響力不如 80 年代。再來，90 年代的領導人執政能力良好，維持著良好的經濟狀況，因而有利政局穩定。在社會的變化上，則是討論了知識菁英、普通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改變。對於知識菁英，由於八九學運後的軍事鎮壓和其後的經濟繁榮，知識分子傾向關心經濟方面的事務，而非挑戰政府。再來，90 年代的報章媒體豐富，民眾已習慣社會上存有多元觀念，「新」觀念本身不再具有爆炸性的影響。第三，民族主義在 90 年代的知識分子中興起，促進了中國政權的穩定。在普通知識分子和學生方面，由於經濟蓬勃發展，使得學生將注意力放在能賺錢的活動，而企業的增長也使得白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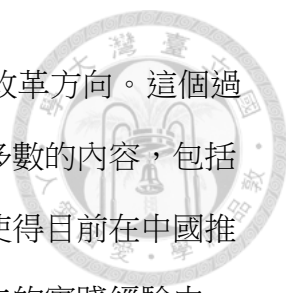
過，1990 年代觀察家與研究者把焦點轉移到另一個改革開放下的顯著亮點——從 1980 年 2 月逐漸發展起來的村委會選舉。²² 中西方學者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就是此制度運作成功與否與未來民主化的關係，也就是中國村委會選舉制度是否向普遍化與向上一層級的進一步發展，最終可以幫助中國完成政治改革，成為中國未來向民主體制轉型的基礎。(米有錄、王愛平主編，1999；李凡，2008；O'Brien and Li, 2000) 但到了 2000 年的初期，此種看法漸漸平息，研究的勢頭趨緩，研究的主題也有所轉變。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實際上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並不如原先預測的樂觀。主要的發展是近年來中國基層民主的運作上，對於黨內民主的創新制度明顯多於村委會選舉；而對於政治參與的研究也轉移到了對「民主懇談會」及「參與式預算」的重視；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在十七大的報告中，把黨內民主的優先性提到了基層民主的擴大之上。

1990 年代初期，村委會選舉在某種程度的確對中國的民主化帶來一線曙光，尤其是其與政治學習理論存有相互映證的關係。²³ 不過，這個發展因為選舉層級進一步提昇的可能性被終止而不可能實現。1998 年，廣東與四川兩地皆開始進行對鄉鎮長直選的試點，尤其四川的步雲鄉鄉長直選更是受到了各界的注意。這場選舉雖然戲劇性的完成，但後來卻招致中央與媒體的反對，最後終止了其全面推

職業增加，吸引學生進入私人企業。因此，學生關心賺錢而更勝於挑戰政府 (趙鼎新，2010)。

²² 中國第一個村民委員會是 1980 年 2 月在廣西宜州市合寨村產生的，當時合寨村的果作等六個生產隊的 85 戶農民，無記名推選產生了中國第一個村民委員會。在 1980 年底，在廣西的一些農村開始出現村民委員會形式的自治組織，之後類似的組織在各地逐漸成立，在 1982 年底，全國人大通過新的憲法時，總結了有關的經驗，在憲法第 111 條將農村的村民委員會和城市的居民委員會規定為最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在 1987 年 11 月以「試行法」的方式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 1989 年 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後，規定在中國農村逐漸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國家權力機關不再直接管理農民事務，村長和其他村幹部完全由村民自由選舉產生。(俞可平，2002)

²³ 政治學習理論的推論指出，在選舉逐漸常態化的選舉威權國家中，其民主化的可能性也比較高。Linz (2000) 以及 Diamond (1999) 提及威權政府下的選舉有可能會造成體制的演變。另外，Levitsky & Way (2002) 則是進一步提供一個重要的暗示，即更多的開放性、更具有競爭性、多元主義的傾向、以及限制威權政體的某些關鍵做法可能出現在選舉以外的場域。在中國，許多學者都指出村委會選舉對於農村的政治生活與農民政治態度改變的影響，這些影響有助於提昇農村居民的公民權意識。首先，不論是從幹部或是民眾的角度，村委會選舉都改變了傳統的政治運作的形式，主要是民眾擴大了政治參與的空間。(相關研究可參見，Manion, 1996；Jennings, 1997；Kennedy, 2002；蔡定劍，2003)



動。²⁴ 基層民主發展的結果是以轉向黨內民主做為中央認可的改革方向。這個過程顯示，目前在中國的民主推行方式，目前仍是政府控制了大多數的內容，包括進程、方向、範圍、力度，都必須在具有順序的規範之中。這使得目前在中國推行的所有民主化「試驗」充滿了訓政的意味。另外，在中國民主的實踐經驗中，把民主區分成不同的部分，包括黨內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李君如，2008；何增科，2004）。在選舉民主中又區分成村居幹部直選與地方人大直選，若只看村民自治的範圍，在中國的經驗中又區分為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決策的四個民主的說法。這種多重範疇推進的做法，將民主的實踐細切成許多繁複的內容，有助於當局以不停的轉換軌道的方法來延遲計劃之外的民主化的可能躍進。

參、韌性威權主義的形成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可以視為中共韌性威權主義的形成期。成功的經濟改革目前看來並未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因，對於持續經濟成長的需求，反而使得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面成為政治發展的主要目標。在此情況下，雖然有政治改革停滯將對未來進一步的經濟成長形成阻礙的相關論點，但主要的政治論述仍然是一個穩定有效率的統治才是現階段有利於經濟成長的背景條件。²⁵ 做為一個後發的發展

²⁴ 江澤民在一次接見的場合說，「如果中國遵循西方世界的議會民主，唯一的結果將是 12 億中國人將無法吃飽，會是一場的混亂。」此外，他也擔心基層選舉擴大後的骨牌效應，當人民最後直選國家領導人時，那共產黨領導將不復存在。基於以上理由，中央在此問題上踩了剎車，雖然一開始是由於江澤民先前的保證擴大基層民主而啟動的試驗（Li, 2002）。最後的關鍵是，江澤民在一個國家會議上警告，新聞媒介不可炒錯誤的事情，這表示中央是反對的。不久之後，中央宣傳部發佈一個緊急的通知，禁止媒體公佈關於步雲鄉選舉的任何內容。而《法制日報》則刊出一條評論，在稱揚步雲鄉民眾高民主意識的同時，也指出這場選舉有違犯憲法和當今法律的致命瑕疵。並警告，「如果追逐民主的同時，忽視或者甚至違犯憲法和法律，結果將是民主和法規被損壞，對於國家和人民是一個嚴重的破壞。」（查慶九，1999）

²⁵ 早期的研究則與此推論相反，胡榮（2002）整理了經濟發展與村委會選舉實施的關係，發現具有分歧的看法，O'Brien (2001) 發現在富裕的村莊以及集體企業表現好的地區，其參與程度較高；但 Lawrence (1994)，Oi (2000) 則得到不同的結果，前者指出農業為主及窮村的民主程度較高，因為村民想藉民主動員來改變經濟體制，後者則指出經發水平與村自治的反比關係。胡榮自己的

中國家，對於國家能力的需求非常高，尤其在對經濟發展的持續要求下，維持政治穩定幾乎是中國政府施政的唯一目標。不僅是政府，包括新興階級、農民、甚至是獨立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都贊同無法想像一個混亂的局勢會對中國的國家社會造成如何的損害。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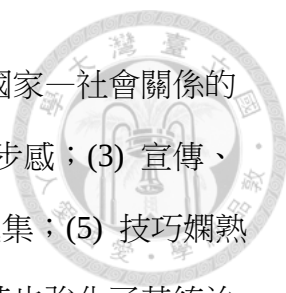
在 2008 年北京奧運將中國的成功展現在世人眼前後，許多關於中國是否走出與西方不一樣的現代化途徑的討論成為焦點。「中國模式」(China Model)²⁷ 成為中國研究領域中最熱門的話題，尤其是 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了世界性的金融海嘯後 (Killion, 2010)。哈爾玻 (Stefan Halper) 在其新書中預測說：「中國式權威主義不會像西方所期待的那樣，朝著自由和開放的方向發展，將與西歐自由民主主義形成競爭格局，成為發展中國家可借鑒的模式。」(哈爾玻，2011) 這場爭論之所以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是因為與所謂的「開發獨裁」(經濟高速發展和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的結合) 正當化有關。過去西歐的主流發展論主張，經濟發展必將誕生民主化或以此為必要條件。與此相反，支持「中國模式」的人普遍認為民主化不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進而主張權威主義對經濟發展更有效率 (全炳根，2011)。

除了中國崛起的政治現實，在理論層面，也有學者針對中國這種新型態的威權主義進行研究。黎安友 (2007：10-13) 就提出，中國政權目前已經發展成為「韌性的威權主義」，其主要的論述為，近年來許多對於中國民主化的限制條件都已改善，但中國仍然沒有改變其政治型態，最重要的原因來自行動者—中共的政治菁

研究則是發現在經濟水平高的地區，其村委會選舉的競爭是相對激烈的，而選民的參與程度也比較高。這些看法不認為中國與西方比較而言具有什麼特殊性，當條件成熟後，就會啟動民主的進程，所謂中國特色只是過渡性的說法。

²⁶ 何增科 (2004) 認為，80 年代末以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知識精英結成了統治聯盟。政治精英為經濟精英發財致富提供了各項便利條件，為知識精英改善了經濟待遇與社會地位，並將經濟和知識精英盡可能吸納到政治結構中。這種結盟奠定了政治穩定的基石。

²⁷ 「中國模式」討論熱潮的開端，首先來自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在 2004 年所提出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在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後，以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反面說法建構論點，其背後邏輯隱含了未來的中國足以挑戰「華盛頓共識」，也就是以美國為獨霸的國際體系與全球市場經濟 (Ramo, 2004)。中國特殊論的說法在中國內部有其淵源，早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已出現，在國際上則有中國威脅論的想像，這些討論可以視為「中國模式」的前身。



英一的掌權意志與團結一致。此外，中共政權還具備許多來自國家—社會關係的有利因素，包括：(1) 經濟面的實際利益；(2) 治理的改進，進步感；(3) 宣傳、民族主義以及外交政策的勝利；(4) 社會安全緩衝與利益表達匯集；(5) 技巧嫻熟的壓制。整體而言，中國的經濟成長確立了其崛起的態勢，同時也強化了其統治的正當性。同時，威權政權本身也得到更多的資源進行政治控制，最為重要的是，統治菁英的共同利益使得民主化難以在體制內發生。

第三節 特殊論：中國式民主!?

由於實際上中國至今沒有發生民主變遷的事實，所以大多數現存的民主化理論在面對中國案例時都失敗了，只能以找出不符理論預設的研究策略進行解釋。但即使如此，這些由西方理論出發的觀點仍然傾向認為中國的現況是個過渡。所以未來的研究議題是中國將如何改變，我們稍後將使用這篇論文的大部分篇幅來處理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因為中國沒有依循西方發展經驗的事實產生另一組論述，也就是中國是否可以走出與西方不同的路徑？發展出一種不同西方的現代化政權？甚至是中國式民主？

早期的這類看法是建築在中國特殊國情論之上，後來因為中國崛起趨勢的日益明確，「中國模式」是否成為另一種發展途徑的說法引發熱議。唯其實質內容大多指涉，由中國目前的威權政府所主導的漸進式政治演變。本節將討論三項議題，中國特殊論、中國模式論述以及中國式民主的可能特徵。

壹、中國特殊論

中國的經濟改革以漸進式的改革模式不同於其他後共產國家體制，也不同於

東亞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經驗。有論者以為，這種漸進式的模式也應該同時擴張到政治改革的論述上。另外，屬於中國獨特政治發展模式的說法也是中國官方與學界追求的一個方向。在這個觀點下，一方面替中國未來民主化的發展設下一道門檻；另一方面，就算民主化要持續進行，也被要求必須以契合在地文化的觀點來進行「特殊的」制度設計。

從經濟改革的邏輯中抽繹出的演化經濟學，許多人認為可以類比在中國政治變遷的過程中，以演化政治學形容中國轉型政治的特徵。在理論上可歸納為五項特點，包括中國模式演化的試錯性質、與傳統的非斷裂性、與經濟轉型一樣的最小打亂原則、充分重視改革的約束條件等。總之，皆呈現出演化與漸進的性質。俞可平 (2006：318-319) 便是這類看法的主要倡議者，其對於中國民主化的核心觀點包括增量政治改革與增量民主。在此邏輯下，民主進程必定是緩慢的。²⁸ 在政治穩定的要求下，任何大規模的改革進展都必須被慎重考慮，尤其是在前蘇聯向民主轉型的「前車之鑑」後，漸進式的政治改革是唯一可行的選擇。²⁹

民主化的道路是否適用於中國也是另一個重要的討論方向，對於未來政治體制的選擇，甚至有主張傾向新加坡式的開明專制、新威權主義的方式。³⁰ 蕭功秦 (2008) 提出一種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說法，他認為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特徵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新權威主義到九十年代的進步的保守主義。進步保守主義的主要內涵，就是在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重新肯定傳統價值系統以及權威的意義與作用的基礎上，緩慢漸進的推進現代化變革。它具有民主與現代化的導

²⁸ 俞可平提出的概念具有五層基本意義，其一是進行改革前必須有足夠「存量」，其二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其三為過程是漸進而緩慢的，其四為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增加政治利益，其五以深化黨內民主及基層民主為突破口。

²⁹ 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人面臨著共產主義停滯不前或學習西方政治制度二擇一的困境，如果民主讓經濟好轉，提供社會和平，他們或許會走上民主之路，但是西方民主制度在該國行不通，只有表面的成效。當民主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之時，人們就會受到誘惑，乞靈於一位允諾復興民族尊嚴的強人。(貝淡寧，2009)

³⁰ 強調高素質、高效率的行政官僚，強調清廉政治和行政效率的提高。政黨輪替的方面，應該還是強調共產黨領導。大陸很多學者都認為，如果中國貿然走向西方式民主，很可能會造成社會失序，甚至是政治的混亂，造成經濟發展很大的阻礙。

向性，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不同。³¹ 並以此過渡性體制為基礎，穩健的向民主化與現代化發展。

中國特殊論也是自鄧小平以來中共中央的主要基調之一。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作為朝向新體制的思想基礎，鄧小平首先宣示了必須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裡，首次鮮明地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並莊嚴地宣告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在這個階段，鄧小平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改革開放，從而實現了從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向現代社會主義模式的轉變，開拓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提出和形成階段。這可以視為早期為中國發展模式的特殊性立下典範的主要說法。中國官方從鄧小平以來一直有對於路線提供正當性的說法，從鄧小平所宣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以及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新三步走」，唯此前的論述基本上都傾向漸進式與穩定改革的思維。這些說法不僅是官方的意識型態塑造，同時也在政策與社會各層面進行實踐，成為後來中國模式說法的一個顯著的根源。

十八大之後，中共中央所依恃的正當性論述似乎正處於轉變期。卸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老路指的是封閉僵化，邪路指的是改旗易幟）以及「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接著，新任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則提出「中國夢」，內容則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與民族主義直接聯結。這些正當性的新提法透露出中共思維的微妙改變，值得持續加以注意。

³¹ 蕭功秦使用「後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型的新權威主義」(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 一詞定義中國的過渡性體制。說明在變革的過程中，舊的遊戲規則瓦解，新的遊戲規則一時無法建立，過渡時期的脫序狀態，會使改革陷入危機，中國在此時期需要一種新的過渡性遊戲規則，一種新的開放性的權威主義，以實現中國的自由與民主為目的。（蕭功秦，2008）



貳、中國模式論述

2008年北京奧運將中國的成功展現在世人眼前之後，許多關於中國是否走出與西方不一樣的現代化途徑的討論成為焦點。「中國模式」(China Model) 成為目前研究中國最熱門的話題，其核心內容大致包括了「一黨統治、在自由市場與國營企業之間共同認定的一個折衷方案」(Naughton, 2010)。不過，學者間對於「中國模式」的真正內涵仍然沒有定論。³² 中國官方的角度則是從一開始迴避這樣的說法，直到最近則轉變成肯定並試著總結「中國模式」可能的內涵(參見潘維、瑪雅主編，2010)。

綜觀「中國模式」的討論，可以區分三種不同內涵的論述方式，包括發展論、政治論以及文化論三種型式。其中發展論式中國模式的主要看法，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主要是源自於其獨特的歷史、發展模式、與巨大規模上(Ramo, 2004)。精神在於「市場式威權主義」，過去三十年間為中國提供了高速的增長、穩定，並向中國人民承諾更美好的生活。結合威權體制與經濟發展，而未來仍可以持續相當的時間，但這一模式卻缺少政治自由。(哈爾玻，2011) 大體來說，支持學者的意見大多肯定中國目前發展的成就，同時也認為中國體系基本上具有一定的穩定性。³³ 其次是政治論的看法，在中國經濟成功而遲遲未展開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情況下，面對世界上主流民主價值的挑戰，必須有一套論述說明體制正當性的基礎，又可彰顯其制度的合理性。總體來看，這層論述的立論原則在於中國的民主化前景，架構方式是建構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理論關懷是一條非西方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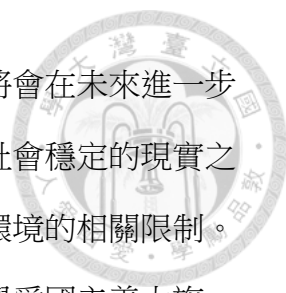
³² 關於是否有「中國模式」，更為表面的爭議是在定義與名稱上仍未達到共識，除了「北京共識」外，尚有比較不那麼明確的「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等。在西方威權主義研究傳統的脈絡下，許多混合概念的組合名詞也曾經被各個學者所使用(丁學良，2011)。

³³ 比較重要的反對意見來自姚洋與陳志武。兩者都認為並沒有所謂北京共識的存在，中國的成長其實是遵行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原則，尤其是在以美國獨霸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其中，姚洋(2010)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亦使某些族群得到特別的利益，其結果將是面臨中收入國家的困境，國家面臨貧富差距的增加與社會動盪。中國若是想要長久的維持經濟成與社會穩定，必須更進一步的民主化。陳志武(2010)在使用金融理論對儒家文化進行精采的評論後，指出中國在現代化上的困境，是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金融制度架構體系。

民主化的途徑為何，其目的在於維持一個可控制的有序政改路線，也就是抵制民主演變理論。³⁴ 奠基於文化差異，潘維提出用「當代中華體制」取代「中國模式」的說法，根本上認為中國發展從根本上不同於西方經驗，不用也不能完全沿襲西方。希望組合或是新創不同於西方的精神與制度，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與制度遺緒中找到根源，建立結合儒家主義的民主體制（潘維、瑪雅主編，2010）。

張維為（2010）的暢銷著作，「中國震撼—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可以說是目前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說法。張文的核心論點是，中國人不應該對於自己國家的崛起抱持疑慮，不用依照西方模式，不必得到他人認可，只要「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與發展」就能持續崛起，對世界造成震撼。這個論點首先是建立在不再誤讀自己的看法上，作者認為多數對於中國的錯誤預測都是建立誤讀中國過去發展的本質上，最主要的錯誤就是用西方標準來看待中國。先擺脫西方中心的論述，才有可能重新認識中國。其次，張文的論點建立在中國的特殊性上，他提出中國有「四超」與「四特」，前者包括超大型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後者則是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以及獨特的經濟。所有內容其實都包括了傳統文明與現代國家的融合，總之，由於中國的特殊性，所以不能用一般近代國家發展的標準來看待。再次，張文特別強調中華「文明」在其中的作用，所謂的與眾不同也立基於此。根據其整理，結合了傳統與獨特發展經驗所凝結的中國理念包括：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併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論述的方式，大多數理念都能聯結到中國傳統思想與歷史的淵源，為中國當代的成功尋求其必然的價值觀根源。最後，作者則是指出在上述基礎上的中國模式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等八點。

³⁴ 2009 年初，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公開談話可以充分表現這種說法的政治目標，他呼籲中國的立法者們，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並記住中國和西方的「本質區別」，中國的體制「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和兩院制」。



許多學者都想要歸納中國的成功經驗，並且預言這種經驗將會在未來進一步開花結果。雖然這也是建立在中國真實的經濟成功與有效維持社會穩定的現實之上，可是其字裡行間總不免透露其民族主義的情懷，以及思想環境的相關限制。大多數的論述皆傾向擁護現任政府、維持現狀與漸進改革、高舉愛國主義大旗，並視外來思想或外國制度的引入是別有居心的洪水猛獸。

參、中國式民主化的特徵

「中國模式」中更具有防禦性質的說法，自然是中國可以具有自己的民主化途徑，也就是「中國式民主」。結合上述關於中國模式的說法，我們可以試著抽繹「中國式民主」的可能特徵。筆者認為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個方面，政治面強調國家主導與家父長式政府、社會面則注意各群體利益之間的調和與平衡。最後，在程序面則是強調政治秩序與漸進式改革途徑。

一、家父長式政府

大概所有的中國研究者都不會反對，改革路程中明顯的國家角色。國家強勢主導各種政策的推行，是中國近三十年發展的第一個特點。在政治改革方面也是一樣，國家的角色在於管制，把市場經濟和傳統的專制或政府應對部分自由化的經濟保持集中控制，人民則要接受一種完全非西方式的政治協定：以在公共領域接受政治高壓為代價，換取相對的經濟自由與生活品質的提高（哈爾玻, 2011：25）。鄭永年（2011：74）認為不管中國的民主化會走一條怎樣的道路，在很長一端時間內，中國各方面的發展實際上會在國家主導下進行。至於家父長式的政府則來自於傳統制度與政治思想的遺留：「民本思想」。也就是說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於承擔照看全體國民福祉的責任。



二、原子式社會與平衡利益

中國的社會面對國家時，傳統上都是相對碎裂的。李強 (2010) 總結了現今中國社會模型的四個特點，包括第一，打碎階級結構的試驗。第二，恢復社會結構的試驗。第三，轉變資源配置方式的試驗。第四，緩解工業社會矛盾與衝突的試驗。李強認為，改革以來的整體社會結構，是階級階層利益的多元化與碎片化。這種社會結構碎裂化是來自更早的根源，也就是中國以小農社會以及較狹窄人際關係來建構的傳統。毛時期的社會大規模政治動員，並沒有真的改變這種深層情況，政治動員反而更加瓦解了除卻運動之外的社會連結。在政治狂熱逐漸遠離後，先前原子化社會就變的更為碎裂。除了八九民運之外，很少存在社會橫向聯結的可能性。潘維 (2010) 認為要從傳統文化中找尋建構社會組成方式的指導原則，也就是立基於物質福祉與倫理精神的社稷體制，國家要有效率的調整各方面因市場化與全球化而產生的利益不平等。

三、強調政治秩序

除了現實層面，在精神與意識型態層面，北京當局也在盡力塑造一種集體的共識——對於穩定的高度要求——這個看法也得到社會與大部分民眾的認同。除了極少數的個人或團體外，普遍社會大眾所具有的認知與北京如出一轍。官方大聲疾呼建立「和諧社會」，人民則普遍認為，「穩定壓倒一切」。黃平說明了這種心理需求的社會層面，目前中國社會的關鍵在於「保持好這個增長勢頭，但是要轉變增長方式，走可持續之路」；同時「解決好社會公正問題，使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和人民大眾都能享受發展之果和改革之實」；最後「樹立起新的意識形態領導地位，使人們對最基本的政治倫理秩序發自內心地認同和在行動上自覺自願地遵從」(黃平，2005)。無論如何，社會政治秩序不可失，因為這是資本和商業活動的基本條件，並將形成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式的協議，這個協議同時建立在中國的經濟奇跡，以及「中國復興」的宏大思路。 (哈爾玻，2011；鄭永年，2011)



中國式民主與儒家民主

上述三項中國式民主的特徵不只停留在學術界的討論，也是中國政府目前做為自我政治改革以及有意識的政治社會化的內容之一。除了以維持政治穩定以利經濟發展的現實性論述外，也可以發現一個由政府所提倡的儒家文化再興的脈動。中國官方、知識界近年來興起儒學熱潮。在世界 100 多個國家建立了大約 350 所孔子學院。中國當局意欲藉由重新訴求傳統文化的優越性來建立新的正當性。

這種看法其實有其根源可尋，朱雲漢教授整理了中國因為傳統政治制度的影響而形成的三個層次的合法性來源。包括在基礎層要求政治菁英的道德性 (the morality of political elite)；其次是對仁政 (benevolent government) 的要求，主要由國家對人民福利的責任所展現；最後則是菁英統治或是用人唯材 (meritocratic rule)，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理想領導必須同時具有德行與才能，政治徵補的關鍵在選任適當的人選。根據中國這幾屆的領導所發佈的談話中，這些看法被當局用不同的型式重覆強調。相關證據顯示，傳統的正當性觀念對於維持民眾對中共政權的支持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取代褪色的革命意識形態。(Chu, 2013)。

接下來的議題便是傳統儒家價值如何與民主結合，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創新來自哲學家貝淡寧。在地方性知識的基礎下，甚至設計了一套以賢人院與平民院結合的兩院制，來突顯儒家式民主的特色。他的主要看法是，中國傳統的確為西式民主政治提供了一種替代方案，威權政治並非民主政治非此即彼的替代選項。關於賢士主治等儒家價值的討論，並不適於採取這種二分法加以看待。在政治實踐中，賢士主治主張建立一個賢士院，其中的代表是由自由公正的競爭性考試遴選而出。賢士院可以代表那些經常被民選政治家忽視與損害的群體的利益，從而對民主院構成平衡與補充。(貝淡寧，2009) 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人民的影響仍然很深，一個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民主型式或許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新創造。

第四節 中國民主進行式



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對民主的追求已逾百年。從清末立憲運動開始，從事憲政民主的反覆試驗和努力迄今為止都未獲成功（張朋園，2007）。中國的歷朝統治一向沒有民主的傳統，清末以來的幾次革新運動，核心議題其實都不是「民主」，而是在於「如何富強」。筆者認為，這或許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就不具備對民主價值的理解，同時自身文化又一個早熟而且可以自給自足的系統，所以也不需要認真的與西方經驗為主的民主價值作接軌。雖然梁啟超的立憲派與孫文的革命運動皆標榜西方制度的引入，唯其目的在於認為這種制度有助於使國家強盛，各種條件所限使得制度引入過程中並未注意民主價值的塑造。何況這兩項改革都沒有取得最後成功，結果是被改革的中國缺乏可使民主生根的土壤。

有論者以為中國民主化的難產與此前艱難的現代化過程有關，中國遲遲無法取得民主社會所需要的條件。不過，這些客觀環境條件的不足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已大不相同，目前新的環境條件已經大幅改善，但中國仍未民主化（黎安友，2007）。所以新一波的研究與論辯由此而起，中外觀察家都在密切注視著中國的未來，希望找出目前中國之所以仍未民主化的主要因素，同時也爭辯中國將來政治發展的形式。

中國民主化之路仍然十分遙遠？我們可以發現環繞中國未來發展最核心的問題在於一中國目前的體制是否可以持續。人民將持續支持一個威權主義政府？還是要求當局進行改變？又或者中國會在傳統文化的引導下，發展出自身的獨特民主體制？多數的民主化理論由於中國實際情況而陷入解釋難題。

事實上，根據本章所進行的理論回顧，我們主要看到的是，多數民主化理論在中國的失利。另一方面，中國顯著的成功則是帶動目前的「中國模式」討論熱潮。在現實層次，過去 30 年的發展，中國取得的經濟改革成果尚未轉移到其他層面，朝向民主化的歷史機遇一再喪失。雖然逐漸增多的社會矛盾仍然是未來發展

的隱憂，但中國當局也更有方法，投入更多資源以維持正當性，更有韌性的威權主義成為中國政治的特徵。也有人主張，中國的條件將會發展出自己的現代化途徑，更有甚者，發展出不同於西方民主的「中國式民主」。

應該如何看待中國政治變遷的可能性，本文認為，應該回到由世代交替趨動的價值觀變遷來重新理解中國這 30 年來的變化。當我們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出發，可以斷言一般民眾的價值觀將會形成其對於政治體制的評價。若我們再加入民主化理論的思考，當一個社會的政治支持發生分歧時，對於現有威權體制的存在問題也就有可能進入議程。另外，政治甄補不會獨立於社會之外，當社會對政治發展的意見有分歧時，這個分歧也可能進入到精英體制之內。若結合政治文化變遷與民主化理論兩者的要項，本文認為一個社會要進入民主化轉型，最重要的變化應該是價值觀的變遷足以造成文化結構的分裂，其最初的傾向會民眾政治支持的意見分歧展露出來。而形成政治文化變遷的主要因素將會來自世代差異。下一章我們將進入這個問題的討論。

第三章 新世代的價值觀變遷



微博上瀰漫著一片悲觀、焦躁、絕望的氣氛，好像明天就能發動起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而過年回到屬於中國最貧困地區之一的老家發現，周圍的親戚和朋友都約而同地感覺到「日子越過越好了」。到底哪一個是最真實的中國，或者，二者不過是當下中國的兩個面向，confusing...。

---- 2013 年舊曆年期間，筆者友人於 facebook 上的留言

中國當局在 1979 年開始施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多數研究者都不否認這是整體結構的重大變化，可是目前看來明顯的變化僅限縮在經濟環境方面，政治生活變化的成分相對較小，那麼介於其間的文化因素又是如何呢？本章將以世代交替的角度觀察這個議題。第一節首先回顧相關政治理論如何處理世代交替、價值觀變遷與政治體制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在中國案例上的意義；其次，本文將檢閱中國新世代議題的內容，包括「80 後」如何成為中國社會的重要語彙，以及在現代中國所呈現的基本世代差異等；第三節則是處理在中國這 30 年來現代化過程中的競爭性價值以及價值觀結構變遷的問題，是為本文的核心主張。

第一節 世代交替與價值觀變遷

壹、文化變遷與政治體制

1940 與 1950 年代，許多研究者認為文化是分析以及解釋不同社會差異來源的重要因素。雖然在 1970 年代這種看法經過一段時間的沈寂，1980 年代末因為許多

學者的倡議，使其重回政治學研究的核心領域，成為主流理論之一。³⁵ 哈瑞森 (Lawrence E. Harrison)、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2003) 集結了許多政治學者思考文化如何影響人類進展的主要成果，結成「為什麼文化很重要」(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論文集。此論文集的主要觀點認為，文化影響經濟與政治發展。民眾之間流傳的文化價值觀與態度，是造成進步或落後的主要因素。與本文密切相關的，包括文化具有持續性以及文化變遷導致民主化這兩部分的概念。

一、文化的持續性

用文化途徑來看政治制度，第一個重要的觀點是文化傳統可以持續很久，並且形塑社會上政治與經濟的行為。哈瑞森 (2003: x-xii) 指出，在實際層面，現代化與經濟發展曾經被認為是無可避免的，形成了二次大戰後的樂觀主義，「馬歇爾計劃」所包含的主要內容就是西方發展經驗可以複製到大多數的非西方國家。可是到了 21 世紀，除了少數的國家，大多數國家與半世紀之前比較，其境遇並沒有什麼改善。同時，在理論層面，哈瑞森認為對於過去學術界曾提出對發展遲滯的幾種解釋，包括殖民政策的影響、依賴理論、以及種族歧視等，如今已經沒有說服力。他認為可能的關鍵因素仍然應該是文化，建議必須重新思考文化對於經濟發展與人權進步的影響，言外之意是指造成人類發展內容重大不同的主要因素為文化差異。Huntington (1996: 12-13) 的「文明衝突論」應該是這個看法的代表性意見，它是立基於文化對於人類行為與分歧會有重大影響的基礎上。根據宗教傳統，Huntington 將世界分成八或九個文明，並認為這些文化差異將會持續下去，成為冷戰結束後國際衝突的主要模式。

³⁵ 1970 年代時，許多學者將政治文化視為殘餘變項(residual variable)，把無法解釋的變項統統歸因於文化；另外，文化內容包容廣泛，研究上十分不易界定，研究者也容易選擇自己需要的文化內容；再者，文化因素要直接解釋政治行為有其困難性。與此同時，政治學界受到理性抉擇論興起與新制度主義的出現，文化途徑受到很大的批評。1980 年代，在 Aaron Wildavsky、Ronald Inglehart、以及 Harry Eckstein 等人的研究與帶動，政治文化途徑又再次回到比較政治的領域。(黃秀端，1997；張佑宗，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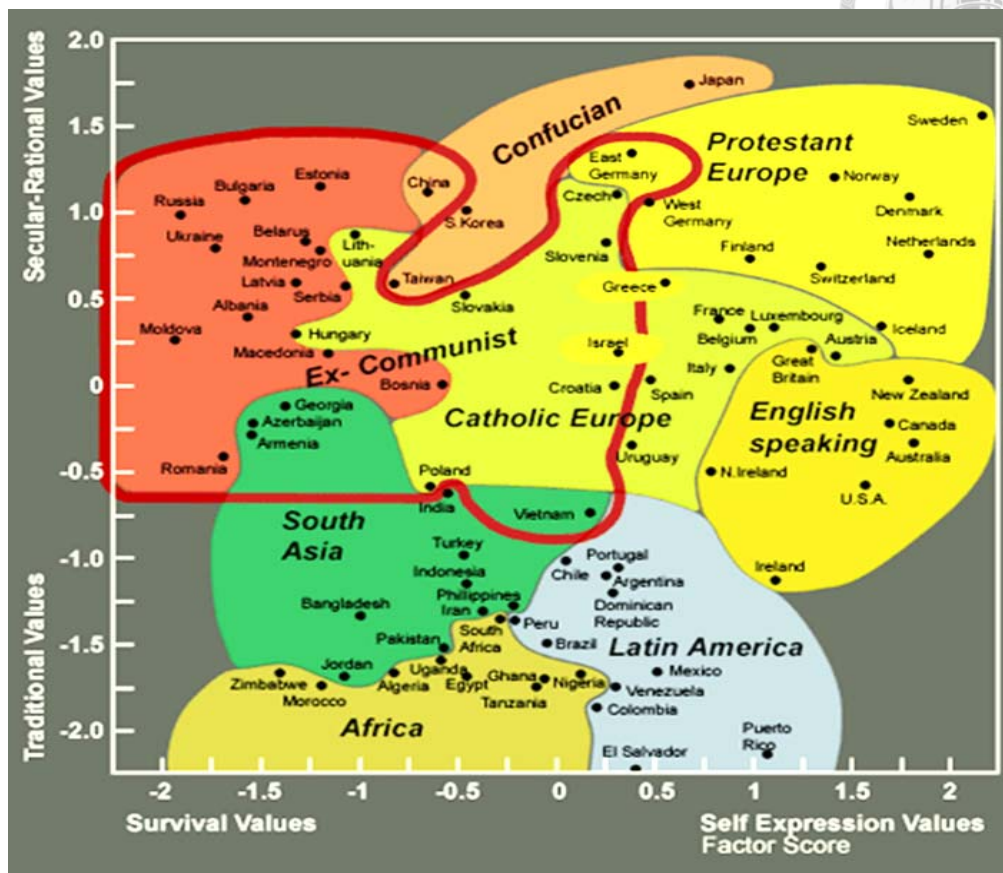


圖 3-1 全球視野的跨文化定位

資料來源：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 63)

此外，Inglehart and Welzel 參考 Huntington 的文化區域重新繪製其後現代化理論下的全球價值觀分佈（詳見圖 3-1），顯示了具有共同文化傳統的地區，其基本價值也會相近。Inglehart 提出重要的結論：「一個社會的文化反映出完整的歷史傳統」。若是依照「傳統—世俗理性價值」以及從「生存—自我表達價值」的兩組標準，可以看出二維空間中各國分佈的位置因其歷史與文化傳統具有群集效應。³⁶ 其

³⁶ Inglehart (1977, 1990, 1997) 指出跨文化變數包括兩大向度。第一個向度是從傳統價值轉變到理性法治價值，極端傳統的社會強調的是宗教、絕對標準與傳統家庭價值觀，喜歡大家庭，拒絕離婚，尊重生命反對墮胎、安樂死、自殺。他們強調社會的一致性，而不是個人的成就；喜歡達成共識，不願意公開的政治衝突，尊重權威。重視國家尊嚴，抱持國家主義的觀點。世俗理性價值觀的社會，在這些方面剛好相反。第二個向度則是指涉從生存價值轉變到自我表達的價值，強調生存價值觀的社會，比較不注重個人幸福，通常健康方面也比較差，人際間的信任較低，對於不是同夥的人比較不寬容，兩性平等的支持度較低，強調唯物主義的價值觀，對於科技比較有信心，

次，這種分佈也會反映出這些社會，在許多其他因素影響下的相對距離，像是宗教、殖民影響、共黨統治影響、社會結構與經濟程度等。因此，Inglehart 論證指出，有共同文化遺產的社會在「文化區域」的分佈中通常還是在一起。這些不同的向度顯現出一個社會的文化，是由整體經濟與歷史遺產所形成的，然後文化再形成這個社會，而且文化影響會長期支配這個社會。

二、文化變遷導致民主化

不過，近來主張文化途徑的研究者大多同意，文化的價值觀還是會改變的，只是在多數情況下文化的改變很慢。那接著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文化變遷？

Inglehart 發展出的「文化變遷理論」可以提供我們合適的觀察視野。對於文化變遷的解釋，Inglehart 混合了 Maslow 的需求層級理論 (Maslowian need hierarchy theory) 以及社會化理論。根據前者建立「匱乏的假設」(scarcity hypothesis)，認為個人會對稀少的事物給予最大的主觀價值，而這是反映其所處的社經環境條件下；根據後者，個人的態度與價值會在社會化早期形成，難以更改，唯世代差異將趨動改變。Inglehart 同時指出，西方世界近幾十年來已經經歷了一段由物質主義轉換成為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變遷，這個文化的變遷較過去更有可能推動民主的進展。

所以，前面所提到「文化區域」的概念其實並不是全部的內容。對 Inglehart 而言，文化具有持續性以及工業化的結果會對文化變遷發生影響，兩個論述都是正確的 (Inglehart, 2000: 80)。這是源自韋伯 (Max Weber) 以來的現代化理論傳統，認為現代化的潛在動力是文化。這個世界會不斷改變，傳統價值觀逐漸消失，經濟發展將會促進宗教、地域與文化上各種差異的消弭。動力就是以需求轉變為基礎的價值觀變遷。³⁷

環保運動比較不活躍，也比較支持專制極權的政府。強調自我表達價值觀的社會，正好相反。

³⁷ Inglehart 把文化視為是一個社會中普遍分享的態度價值和知識體系，並且將此一代傳給一代。他用人際關係的信任感、對生活的滿意度和是否贊成革命的變遷作為測量文化之變數。人際關係的信任是組織團體的先決條件，而團體的形成又是民主遊戲規則能否被遵守與運作的要件；對生活的滿意度能穩定反映出國與國之間不同之文化規範，而與該國所使用之語言及短期客觀之經濟情



對於民主化，Inglehart 論證的重點在於，文化是形成民主的重要因素。經濟發展將會帶來兩類有助於朝向民主化進展的變化，分別為改變社會結構與促進文化改變。對於自我表達價值與民主之間正向關係，Inglehart 提供的解釋也傾向於兩方面。首先，的確有些社會與文化比起其他更有可能落實民主；³⁸ 其次，但長期而言，經濟發展會逐漸引導社會與文化的變遷，使得民主制度逐漸落地生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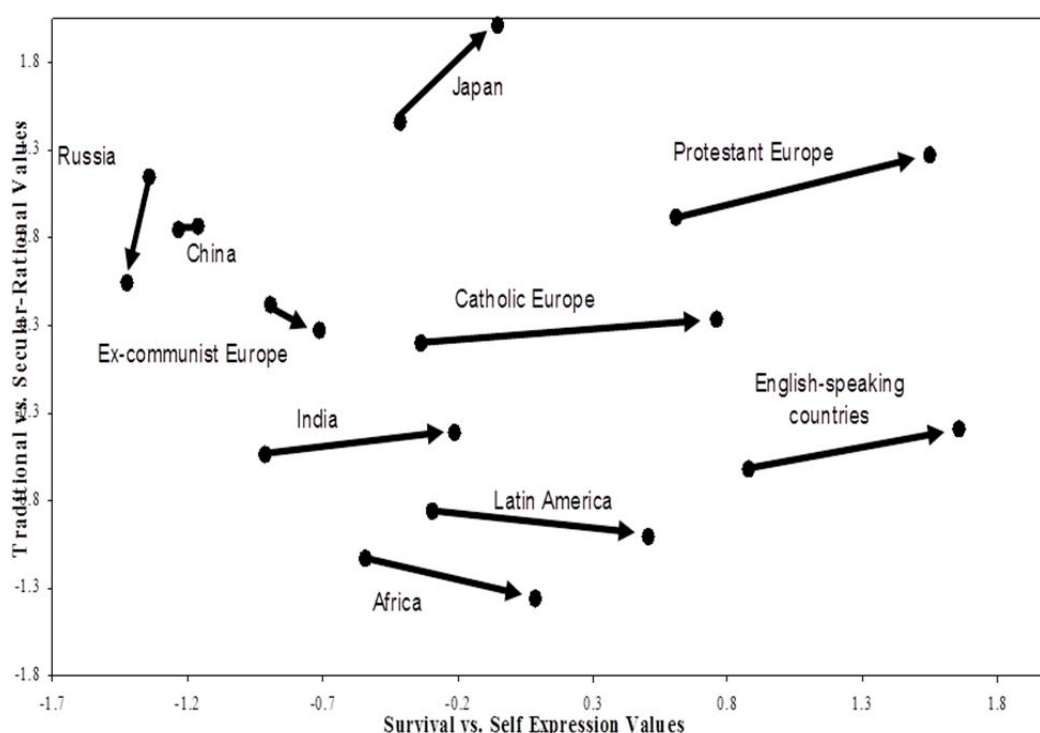


圖 3-2 價值觀變遷：1981-2007

資料來源：Inglehart，2012 年 11 月台北演講提供資料。

從圖 3-2 中可以看出 Inglehart 的論點在長期觀察下的印證，大多數的國家或地區都發生了價值觀的變遷。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基本上經濟發展使得社會向同一個方向前進，無論其本來的文化傳統為何。另外，Inglehart (2000: 87-95) 則是論

況無關；是否贊成用革命方式來改造社會或以漸進緩慢之方式進行改革，則牽涉到民眾是否願意以討論妥協或投票等方式來達成目標。(轉引自黃秀端，1997)

³⁸ 這個說法的言外之意，當然包括了有些地區的文化會阻礙民主的發生。

證，若從大多數學者都重視的人際信任變數來看，可以發現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準以及宗教傳統同時都會對此變數發生影響，同時也關聯了該社會的國際貪污印象指數，這是因為國家所經歷的共同經驗。最後，Inglehart 強調，一個社會在生存對自我表達的位置，跟民主程度有很大的關係。在「生存—自我表達價值」較高的所有社會，實際上都是穩定的民主國家，較低的都是專制國家。

貳、世代交替與政治文化變遷

價值觀實際上如何發生變遷並影響政治文化，最主要的解釋因素可以引入世代差異理論 (cohort effect or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theory)，這是政治社會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而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關注個人的人格特質、政治傾向或政治態度的學習過程，並分析其演變。

討論世代對於政治的影響，可以從 Mannheim 的出生科夥 (birth cohort) 概念開始。³⁹ 出生科夥意指出生在同一時期的人將會面對共同社會文化，經歷共同經驗，分享特定的社會世代位置，進而成為實存世代。而實存世代的成員，可能共同創造其獨特的意識形態或政治態度，成為世代單位 (generation unit)。這個定義開展了「政治世代」以及「世代交替」 (cohort replacement) 的研究途徑，影響包括 1960 年代新政治 (New Politics) 興起、政黨認同、政治參與及投票等政治行為、以及此前所說個人價值觀 (如後物質主義) 變遷問題等的相關研究。世代論者的看法主要包括兩項，第一，人們傾向持續其年輕時期所發展的詮釋原則 (interpretive principles)，個人過去的重要經歷不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改變其效果。第二，因為具有共同的經歷，同屬一個世代的成員在政治認知、信念以及行動上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Mannheim, 1952；楊婉瑩，2011；張佑宗，2011b)

另外，價值觀內容會發生變遷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社會化過程中某些環境因

³⁹ 「出生科夥」的中文翻譯乃是沿用楊婉瑩教授(2011)。

素改變的結果。Mannheim 並提出社會化形成期 (formative years) 的概念，意指個人社會化最重要的改變時期。在形成期之中所接收的訊息會形塑個人的價值觀，若有一個重大的社經環境的變遷發生，就可能產生價值觀集體改變的世代成員。⁴⁰ Inglehart 的後現代化理論也認為，從生存價值轉變到自我表達價值涉及後工業化社會的特性。主要的內容牽涉到兩極化的價值觀—唯物主義者與後唯物主義者。觀察先進工業化社會的發展，文化變遷發生在從上一代重視經濟與物質的安全感，到下一代重視自我表達、個人幸福與生活品質。新生代逐漸重視環保、女性運動、要求參與經濟與政治的決策。(Inglehart 1977, 1990, 1997；張佑宗，2011b)

就本文的問題意識與中國實際的情況，之後的分析將把世代單位的焦點放在 1980 年後出生的群體，也就是「80 後」。⁴¹ 由於中國在 1980 年代完全擺脫此前不斷進行社會動員的政治運動時期，同時開始進行經濟轉軌，發生結構的重大改變。這個改變是否會使新世代發生某種價值觀變遷，並足以形成文化結構的分化與競爭性，是本文研究的焦點。同時，「80 後」也是目前中國社會上一般習慣使用的世代分類，多數研究都開始分析「70 後」、「80 後」等世代的總體行為與態度內容，主要原因也是因為這些時間點正好伴隨著中國政治社會的重要改變。(Rosen, 2009)

⁴⁰ 關於形成期究竟為何，學界標準不一。有的認為社會化的形成期主要是 10-17 歲 (Sears and Valantino)，有的認為是大學時期 (Jennings)，多數則認為是 18-25 歲 (Mannheim；Schuman and Rieger；Schuman, Rieger and Guidys；Schuman and Scott 等)。(轉引自楊婉瑩，2011) 為了分析方便，本文直接使用「70 後」、「80 後」的世代單元概念，而不緊密跟隨形成期的區分方式。不過，因為中國的政治週期與「70 後」、「80 後」的世代分期相嵌，前者的主要政治社會化時期為 1980-89，後者的社會化時期則可以視為 1990-99，正好可以符合本文的分析需求。

⁴¹ 如前所述，世代觀點主張在相同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下成長的世代，所具有的價值體系，將會與其他世代不同。這種社會化的過程與結果，主要發生在青少年階段以前。而且，信仰或價值體系一旦形成之後就不易改變。相反的，生命週期理論 (Life-cycle theory) 主張個人的價值體系，會隨著人生不同的階段而有所改變。年輕時比較會對現狀不滿與提出批評，具有批判性的傾向。但當他們年紀漸長時，對同一政治事物的看法就會出現轉變，慢慢轉為較保守的政治傾向。新一代的政治社會化研究不再限於上述兩者的論辯，而是開始注重脈絡因素或制度變遷對政治社會化過程的影響。依照張佑宗 (2011b) 的整理，相對完整的政治社會化理論來自 Mishler 與 Rose 的分析架構，依據「世代是否出現差異？」與「政治態度是否隨時間而改變？」等兩個面向，將政治學習分為四種基本類型。其中，固定人格類型是政治態度沒有世代差異，也不會有系統性的變遷；文化社會化類型是政治態度有世代差異但變動有限；制度學習類型是政治態度沒有世代的差異，但會因時間因素或年紀的增長而轉變；終身學習是政治態度有代間的變遷，同時也有年齡與時間的變遷。本文不需處理複雜的社會化類型，只把焦點放在世代差異是否發生。



參、看待中國的文化變遷

對於中國政治變遷問題，本文並不企圖提出一個新的界定來解釋，而是立基於 Inglehart 的「文化變遷理論」來檢視中國這 30 年來的變化。不過，Inglehart 的價值觀變遷模型使用在全球性比較時十分有用，可是在解釋個別案例時有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問題。Inglehart 自己也建議，對於文化變遷要進行長期的觀察，同時要在該國之政治文化或政治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之情況下，才有機會找出文化與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當我們檢視圖 3-2 中關於價值觀變遷的情況時，可以發現中國的位移相當小，另一個類似的短線則是前共產主義歐洲，可是中國的經濟成就遠超過後者的表現，這樣的差異不容易解釋。此外，在圖 3-1 中，東亞的其他三個民主政體（包括日本、南韓與台灣，傳統上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除日本外，台灣與南韓的價值觀位置與中國距離非常近，而台灣的理性價值與自我表達價值的表現，分數甚至低於中國。但為何南韓與台灣都成功的民主化而中國還沒發生？中國為何沒有民主化變遷？一個可能性的假說是，中國社會尚未從物質主義轉變為後物質主義，它的歷史進程目前仍然在邁向現代化的道路上，還沒進入後現代化。Inglehart 給予中國案例的解釋是，雖然中國在後現代化的向度遠遠落後，不過目前經濟快速成長，似乎有向自我表達價值觀改變的趨勢。雖然中共領導人努力維持一黨專政，但人民卻有民主的傾向，並與自由之家的低分評估有所矛盾。長期而言，Inglehart 對於現代化有助於民主制度擴散深具信心，認為某些支持「亞洲價值觀」不適合發展民主的說法無法成立。⁴²

Inglehart 的結論來自其對於現代化引發結構變遷力量的信心，這顯然出自對進

⁴² 長期來看的說法，實在令人不甚滿意。就像歐博文 (Kevin J. O'Brien) 對於中國研究的反省所說，「我現在開始擔心，在我整個職業生涯，從 1979 年我進入研究生院的第一天開始，我們都會一直在說：『中國正處於轉型中』。」(歐博文，2011) 我們應該對於轉型的內容提出更有效的分析方式，有助於明白可能的發展前景，而不是用「轉型中」此一模糊概念一筆帶過。



步價值的信念。雖然從全球化比較的觀點來看問題不大，可是就筆者來看，這個一般性理論要解釋中國的情況，以及想要有效掌握文化因素對於制度變遷的影響，仍然是力有未逮。本文在文化變遷理論的基礎上，嘗試建立另一個假說來補充對於中國案例的解釋：在一個具有優勢文化影響的社會中，其現代化的過程，可能會面臨不同價值觀的競爭，尤其是原有政權努力維持領導地位的情況下；此外，文化的變遷要轉化為政治的變遷，主要的臨界點可能是有沒有出現分化的文化結構，也就是新舊價值觀分庭抗禮的結構。根據社會化理論的假設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要檢證上述假說，應該要借助「世代差異」的概念，觀察中國新時代的政治價值觀是否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到政治支持的變化。

第二節 中國新世代議題

中國的體制是否能夠持續，關鍵在於民眾政治支持的內容是否發生了變化。從中國近代的發展看來，最主要的變化應該會出現在 1980 年代後出生的新世代。對於這個世代而言，大多數的激烈政治運動都已經成為歷史，並且其成長階段經歷了中國經濟成長的熱期，其價值觀在社會結構的變遷下應該也伴隨著發生了某些變遷。這種變遷的主要內容為何？新世代如何看待國家角色？又會如何影響未來中國的發展？

1980 後出生的中國新世代在 21 世紀開始就完全取得公民資格，意味他們將有能力用公民權去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現狀，重建一套「80 後」新秩序。就本文的論點來看，中國的未來之所以可能發生體制變遷，最重要的因素必須是整體的價值觀發生了變遷，前提是新世代處於與此前不同的社經結構下。在這一節中，筆者將討論中國新世代具有的特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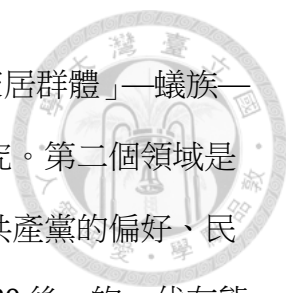
壹、「80 後」成為中國的重要議題之一



年輕人的政治意識一向是政治學上的重要議題，因為年輕人的政治能量與未來性，將會主導國家與社會的政治走向。許多的體制變遷都來自於年輕族群的政治要求與集體行動。這個問題在中國異常敏感，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十年之際就遭遇舉世矚目的學生抗議運動，一度動搖了中共的統治基礎。在這個運動之後，當局與社會對於新世代，態度皆趨於謹慎，甚至有去政治化的傾向。新一輪對於新世代的關注來自於「80 後」的討論，這個討論早期具有文學與報導的性質，進而引發社會學研究的關注，並在 2008 年北京奧運前後成為潛在的政治議題之一，吸引了部分研究者的注意。

「80 後」之所以成為一個被關注的現象，是因為「作為中國社會改革與轉型之產物的一代人，他們的生活遭遇與生存境況，無形中體現了改革和轉型的特殊代價」（周志強，2010）。Rosen (2009) 的相關研究指出新世代對於中國研究的重要性。首先，改革所帶來的社會多元化，使得中國青年的態度與行為與過去有很大不同，使得中外觀察家無法完全理解，自然也形成中國研究的困難。其次，目前的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群體性事件高峰期，一個單一的局部範圍的事件，一旦處理不善，可能會影響中國社會整體的穩定。新世代的政治傾向十分令人在意，因為上個世紀舉世震撼的抗議事件正是由年輕的大學生所發動的。第三，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與經濟衰退，使得失業率與社會保障問題成為各國政府的主要的挑戰。觀察近幾年的中國社會發展，剛從校園畢業的年輕人也成為此問題的焦點。

做為一個新興議題，「80 後」的相關研究分別與兩個領域有所關聯。其一是社會性的研究。首先是來自文學創作與媒體報導，一開始經常與「自我」、「不靠譜」、「物質主義」等等負面詞彙相聯結。進一步的看法則是與「80 後」的集體影響相關，例如龐大的消費能力、網路上的個別和群體使用習慣、更為物質化與世俗化的傾向，這些現象都使得各界不得不給予關注。更為深刻的社會觀察，來自於廉



思 (2009; 2010) 的研究成果，針對所謂的「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蟻族——進行調查研究。主要的關懷是對於一個社會潛在危機因素的研究。第二個領域是政治性調查或研究。它關注幾個重要問題，包括政治參與、對共產黨的偏好、民族主義傾向與東西方文化差異等。Rosen (2009) 的研究指出，「80 後」的一代在態度上表現的更為務實，並以成功為導向。他們的公共生活服務目的在於達成自己的私人野心。政治參與實際上是一個私部門活動，通常只是通過朋友、家人、和匿名的互聯網來進行。而加入共產黨已經淪為必要的投資，以增加他們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機會。

這些研究成果專注於「80 後」世代集體表現出來的價值觀與態度，較少注意與其他世代在態度上的差距，政治態度的著墨也比較少。本文的研究以世代差異的觀點切入，使用以全中國為範圍的抽樣調查資料，運用統計上的分類技術，辨認出新舊世代之間差異的主要部分。可以補充過去研究的不足，並作為進一步設計研究議題的探索性嘗試。

貳、中國新世代的特殊性

要處理中國新世代的問題，我們先要辨認這個世代是否具有特殊性。依照世代差異的理論，首先要看在「80 後」世代的形成關鍵期 (Critical Period) 是否有面對重要的結構性變革；其次是看「80 後」世代是否具有集體性的傾向。

「80 後」新世代的第一個特殊性在社會結構方面。1978 年年底是改革開放政策的開始，中國的經濟制度與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遷。主要的內容是放棄全面性計劃經濟，進行市場經濟的放鬆，同時原本對外封閉的社會也逐漸開放。1980 年後出生的世代與前一個世代成長的環境完全不同。其中，最能展現世代差異內容的，是教育制度與教育內容的變化。教育制度改變的第一項內容是擴大義務教育的範圍，大規模的 9 年義務教育在 80 年代完成，目前正在進行 12 年義務教育



的試點。基礎教育的普及化使這一代的觀點必然不同於以往。其次，由於社會風氣的改變，學校教育的內容也有了微妙的變化。政治思想教育雖然仍舊被保留在正式社會化的過程中，可是重要性大大的下降，某些新世代對政治思想教育也開始帶著某種嘲諷的態度。另外，官方的制式教育內容也有所轉變，愛國教育的內容較之前明顯減少，老師的教學內容也有所開放。

「80 後」的第二個特殊性在人口結構方面，1981 年至 1990 的十年時間中，是所謂的第三次生育高峰期。⁴³ 這段期間中國人口的出生水準相對高於 7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以來，幾乎每年的出生率都在 20% 以上，這段時期中的最高值是 1987 年的 23.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9)，這使他們具有某種集體傾向。結合了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與社會變化，這段時期出生的民眾對未來中國的影響正在進行中。首先出現的政策轉變就是 1999 年的大學擴招，在政策安排下，高校擴招的第一年，招生增幅達到 42%，這是 1990 年代以來政府主動安排增加招生人數最多的一次。2007 年，高校入學考試的報名則達到了高點。這些現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相應而來的則是大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困境，一方面，畢業學生數增多必然會激化競爭性；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發展，需要招募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越來越多，而低教育水準的人工作也會越來越難找；同時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也傾向找更為高階的工作，造成高階工作的強力競爭與延長高等教育人材的待業期。2009 年底 BBC 以「中國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作為對於中國報導的標題之一。另外，中國教育部長袁貴仁 (新華網，2014) 指出，2014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規模將達 727 萬人，加上過去未能就業的，需要就業的畢業生數量很大，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⁴⁴

⁴³ 這一次的生育高峰主要原因並非是生育率的提高，而是由於前一個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 (1962-1970) 陸續進入生育年齡 20 世紀 60 年代初「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加之 20 世紀 80 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造成許多不到晚婚年齡的人口提前進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現回升。

⁴⁴ 大學生群體還有一個特殊性來自過去政治歷史的影響。雖然早期周期性的政治運動時代與他們相距十分遙遠，可是改革開放初期不穩定環境下形成的「八九民運」則並非完全沒有影響。有論者以為，天安門之後中國在言論與思想控制上有一結構性的安排，也影響了輿論的走向。包括了



「80 後」世代與其他世代不同的第三個特殊性是網絡社會的興起，這與訊息結構的開放性直接相關 (Yang, 2003; Zheng, 2008; 王福祥，2011)。大多數的新聞報導與社會分析都指出，網路是「80 後」價值觀的主要來源之一。1994 年，中國的互聯網出現，很快就成為新世代生活中無法擺脫的重要部分。根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的統計顯示，中國網民從 1990 年代開始，每年以 3 倍速度增長，成為互聯網大國。中國網民主要是年輕的、未婚的並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 (王巧玲，2006)。另外，由於網路的開放性與便利性，許多個人知識分子或社會名人可以藉由網路發佈特定訊息，並引發諸多正反兩面的評價。而因為網路另一個匿名性的特性，就算對於特別敏感的訊息，仍然可以引發匿名網友正反面的大量討論。近來，雖然中國當局強化對了網絡訊息的管制，不過博客與微博上快速流傳的轉貼使得訊息有一定程度的曝光度，而對於當局的管制以及網管的刪文舉動，新世代通常也會產生戲謔嘲諷或是憤怒不滿等各種不同的情緒。總之，網絡社會的興起使中國出現了許多網絡邊界的空間，而這些空間正是新世代在正式社會化之外，隱性社會化與再社會化的來源。⁴⁵

參、基本變項的世代差異

在 2011 年的中國調查資料中，可以初步辨認出「80 後」新世代與先前世代的
不同。在這個段落，將針對社會學變項以及基本的態度問題進行世代差異的分析。

民運人士流亡海外或是被嚴格政治監管、自由派知識份子走向溫和化的體制內改革、一般社會民眾的言論自我審查以及官方與民間穩定壓倒一切的共識。不過，對於大學生而言，雖然官方並非提供完全的事件資料與相關評價，僅在修訂後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簡要提到。這表示在正式的教育中，「80 後」的年輕人並不知道有此事的發生。可是香港所拍攝的「八九民運」的紀錄片光碟卻廣泛地在學生宿舍間流傳，部分受訪學生也表示很容易在網路上接觸到有關內容。正式教育與真實認知之間的落差也是目前大學生面對黨國教育時的普遍現象。除了事涉敏感的重大事件外，其他的層面也存在相同的情況，這個結構是否對於這個新世代的政治認知發生影響，也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不過，這個特殊性涉及的範圍並不是普及化的，而且在調查上與資料蒐集上會有其困難之處。由於種種限制，本文暫不處理這個特殊性問題。

⁴⁵ 整體而言，「80 後」對於中國所造成的社會與政治意義包括，更為大量的人口、更高的教育程度以及較過去更為開放的資訊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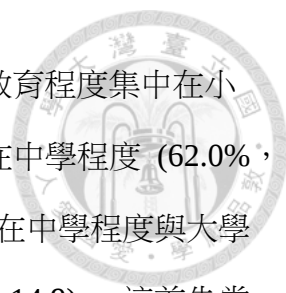


因為資料性質的不同，以下的分析分為兩個部分。首先，表 3-1 的交叉列表分析是處理以類別資料型式被歸類的變項內容，包括城鄉差異、地區別、教育程度、社會階層以及政治面貌等。前三項可以看出因為改革開放後，社經條件變遷對於中國世代差異的影響；後二項則是世代間對於社會階層的主觀認定以及受訪者政治面貌的大致情況。其次，表 3-2 則是涉及與政治態度形成相關的一些影響變項，包括對經濟現況評估、訊息管道、政治涉入以及社會資本等內容。

表 3-1 中用來判定是否具有差異的統計量包括兩項，其一是卡方值與顯著性訊號，這個統計量的目的在於檢定該變項與世代別之間是否具有顯著差異。第二項是每個細格下方的調整後殘差 (Adjusted Standardized Residual, 表格中的縮寫為 a. r.)，這可以用來顯示那一個單一細格是差異的主要來源，使用臨界值正負 1.96 來判斷，正負向表示偏高或偏低。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的最重要成果在於經濟發展的成功，表 3-1 中的分佈可以看出經濟發展對於世代差異的明顯影響。不論是城鄉差異、地區別、以及教育程度與世代的交叉列表分析都呈現顯著差異。主要的趨勢包括，比較新的世代較他們前面的世代更集中在城市、集結在東部省分以及教育程度的全面性提昇。

經濟成長與現代化的第一個表徵就是都市化的程度。相較於年長世代與「70 後」，「80 後」世代集中在城市的程度顯然較高（城市細格的百分比為 51.5%，a. r. 為 2.5）；相反地，年長世代的農村居民偏高（農村細格的百分比為 54.4%，a. r. 為 2.9）；而「70 後」世代的城鄉居民差異性則沒有十分明顯。更年輕的世代選擇在城市中生活的比例更高，而且依世代差異而次第提昇。

其次，由於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以東部沿海省分的試點與首先發展起來為特色，這也反應在新世代有更多的比例集中在東部省份的樣本分佈上。「80 後」世代在東部省分的比例較其他世代偏高（a. r. 為 3.8），西部省份的比例偏低（a. r. 為 -2.3）；與此相對，年長世代在中部省分的比例偏高（a. r. 為 2.7），「70 後」則在西部省分比例較高（a. r. 為 2.2）。



教育程度與世代差異之間的關係則非常明顯，年長世代的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學以下 (46.6%，a. r. 為 19.2)，「70 後」世代的教育程度比較集中在中學程度 (62.0%，a. r. 為 3.4)，「80 後」世代的教育程度明顯於前兩個世代，集中在中學程度與大學以上兩個類別之中 (前者 66.8%，a. r. 為 7.3；後者 25.0%，a. r. 為 14.9)。這首先當然與基本教育政策有直接關係，此外，由於經濟情況的好轉，中國家庭對於下一代教育的重視也是原因之一。不論如何，基本社會分佈的世代差異展現了經濟現代化的成果，相較於過去，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了很大的改變。

表 3-1 的下半部分，我們接著觀察與政治與社會地位相關的議題，包括受訪者的社會階層主觀認定與政治面貌。在社會階層的主觀認定方面，可看出受訪者中沒有明顯的世代差異，可是政治面貌就十分明顯。中國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成為黨員是個人未來發展是否更具有優勢的條件之一。相對地，當局對於黨員的吸納與收編也是十分慎重，以有效涵納社會菁英。在 2011 年的資料中，可以看出受訪者因為世代別在政治面貌上的差異。年長世代的正式黨員數量較多 (61.2%)，而曾經申請者較少 (46.4%)，群眾身份的受訪者百分比與整體差不多 (52.5%)。「80 後」的正式黨員與其他世代相比偏少 (a. r. 為 -3.4)，最特別的是「80 後」新世代回答曾經申請黨員身份者佔了 36.2%，明顯的高於其他世代 (a. r. 為 4.9)。相較於其他世代，新世代顯然更傾向有機會就申請入黨，這自然與整體社經條件的改變有關，更好的家庭情況改善以及更高的教育程度，讓有資格申請的年輕世代比例增高。更重要的是，新世代也受到父母要求與社會風氣的影響，把黨員申請視為增加社會競爭力的基礎條件之一。筆者曾經訪問過的研究生與本科生，幾乎都有申請黨員的經驗或正準備爭取入黨的資格，其大多數對此議題也都表達了一致性的看法。這個情況首先使得中國共產黨的黨員身份對於新世代而言，變的更不具備意識型態、更為理性計算與實用主義。其次，較過去更為多數的申請者也形成多數的申請失利者，這些新世代或許會發現自己真的在競爭上失去了先機，需要在社會環境中找尋更多成功的機會種子。最後，由於黨員身份與否的限制，

也有可能在結構上形成年輕菁英的分裂。



表 3-1 基本社會學變項的世代差異交叉列表

			年長世代	70 後	80 後	全體	Chi ² /Sig.
性別	女性	%	46.3%	56.0%	56.9%	51.1%	36.075***
		a.r.	-6.0	3.0	4.1		
	男性	%	53.7%	44.0%	43.1%	48.9%	
		a.r.	6.0	-3.0	-4.1		
	總計	N	1838	731	903	3472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	46.6%	25.5%	8.2%	32.2%	552.288***
		a.r.	19.2	-4.3	-17.8		
	中學程度	%	49.1%	62.0%	66.8%	56.4%	
		a.r.	-9.2	3.4	7.3		
	大學以上	%	4.3%	12.5%	25.0%	11.4%	
		a.r.	-13.9	1.1	14.9		
	總計	N	1834	728	892	3454	
城鄉差異	農村	%	54.4%	50.6%	48.5%	52.1%	9.153*
		a.r.	2.9	-.9	-2.5		
	城市	%	45.6%	49.4%	51.5%	47.9%	
		a.r.	-2.9	.9	2.5		
	總計	N	1837	731	903	3471	
地區別	東部	%	25.9%	27.9%	33.0%	28.2%	20.767***
		a.r.	-3.2	-.2	3.8		
	中部	%	50.8%	45.8%	46.6%	48.7%	
		a.r.	2.7	-1.7	-1.4		
	西部	%	23.3%	26.3%	20.4%	23.2%	
		a.r.	.2	2.2	-2.3		
	總計	N	1839	731	903	3473	
政治面貌	黨員	%	17.0%	13.4%	11.3%	14.8%	37.403***
		a.r.	4.0	-1.2	-3.4		
	申請過	%	9.9%	9.4%	15.8%	11.3%	
		a.r.	-2.8	-1.8	4.9		
	群眾	%	73.1%	77.3%	73.0%	74.0%	
		a.r.	-1.2	2.3	-.8		
	總計	N	1835	726	895	3456	
主觀社會地位	基層	%	53.6%	52.4%	51.5%	52.8%	3.216
		a.r.	1.0	-.3	-.9		
	中層	%	33.2%	35.4%	36.5%	34.5%	
		a.r.	-1.7	.5	1.4		
	上層	%	13.1%	12.2%	12.0%	12.7%	
		a.r.	.9	-.4	-.7		
	總計	N	1713	678	857	3248	

說明：表中的數字(%)為直欄百分比；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 (201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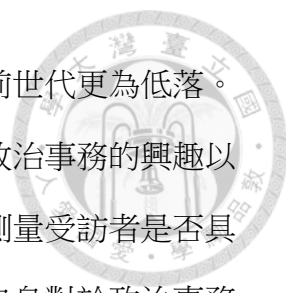


另一組需要注意的世代差異包括下列幾個變項，訊息管道的變化，以及三項與態度有關的變項：受訪者的經濟評估、政治涉入以及人際關係。後三者分別涉及經濟發展、政治態度以及社會關係三個方面。

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一個重要的環境變化，應該是訊息管道的擴張。本文所測量的訊息管道包括四個部分，網路使用率、政治閱聽率、管道數目以及是否談論小道消息。從表 3-2 的第一大列中，可以發現四組與訊息管道相關的變項都具有顯著的世代差異。其中，除了政治閱聽率外，其他三項都以新世代的頻率或數目高於前兩個世代為特徵。首先，網路使用率的差別最為明顯，新世代平均使用率為 4.01，高於「70 後」世代的 2.60 以及年長世代的 1.63；其次為管道數目，新世代的管道數目平均為 2.54，高於「70 後」世代的 2.26 以及年長世代的 1.80；是否談論小道消息部分，也是新世代的 0.90 高於「70 後」世代的 0.77 以及年長世代的 0.69。

經濟評估與受訪者對現況的評估相關，潛在地也可以聯結到對自身發展與政府治理能力的評價。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題目中，分別就國家經濟環境與家庭經濟情況，請受訪者就現在、與過去相比以及未來發展進行評估。經過分組的變異數分析後，在國家情況方面，三組問項都得到顯著差異。年長世代對國家整體經濟環境評價更好，新世代則評價較低，差距最大的是對國家經濟現況的評價。在家庭經濟情況方面，只有對未來的發展有世代差異，但新世代對家庭經濟的未來評估高於更早的世代。整體資料顯示新世代面臨更大的經濟挑戰壓力，因為他們比上兩個世代給予國家整體現況較為不好的評估，這應該是反映出新世代目前初出社會所面對的整體經濟發展瓶頸與求職競爭困境。而對於家庭經濟發展的良好評估應該來自於這個世代的生長經驗，新世代相較於過去，是生長在家庭經濟逐漸好轉的環境之中。對於未來，他們仍然覺得會有好轉的可能性。

政策放鬆與社經條件變化使新世代具有較前兩個世代更為開放的訊息管道，可能會使新世代在價值觀的養成上與他們的長輩不同。但這不見得會直接影響其



政治態度的形成。例如，新世代在訊息管道中的政治閱聽率較前世代更為低落。這也顯示在新世代的政治涉入中。政治涉入是測量受訪者對於政治事務的興趣以及其政治效能感。這些態度可以視為民眾的政治資本，前者是測量受訪者是否具有更多的閒暇與能力去關心政治事務，後者則是測量受訪者對自身對於政治事務影響力的評估。表 3-2 顯示，新世代的政治興趣較年長世代為低，但最低的 70 後世代。不過，新世代的政治效能感則明顯高於前兩個世代，為-0.28，70 後世代以及年長世代分別為-0.39 及-0.46。在政治涉入方面，雖然新世代對於政治興趣不大，但對於自身具有改變政治事務的能力則比先前世代更有信心。

最後一項是人際關係，包括了整體人際信任、特定人際信任以及人際關係緊密度。整體而言，這些變項在原問卷的脈絡中是屬於社會資本的面向之一，在 Putnam (1993) 認為，社會資本與民主治理具有正向關係。⁴⁶ 但在中國情境下，社會資本的運作被「關係社會」所容納，有一套屬於該文化的理解方式。我們的初步理解，這個脈絡正在被現代性消滅中。中國新世代在人際信任感方面，比前兩個世代都來的低一些，不論是整體性的人際信任（指對整體社會的信賴感）或是特定的人際信任（對身邊的人、親友間的信任）。而人際關係的緊密度也遜於前兩個世代，緊密度最高的是「70 後」世代，其次為年長世代。在中國，社會資本的概念與運作方式不同於西方，其產出結果跟西方可能也不太相同，這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補足。就 2011 年的中國調查結果而言，我們發現新世代的人際關係理解方式正在改變，與前面的世代相比，信任感與緊密度都在減低，這可能與社會變遷、人際關係互動規則的改變密切相關。

⁴⁶ 對於政治學中的社會資本研究，大多數文獻肯定其對於增進民主品質的政治效果。主要的推論是認為社會網絡以及社會信任對於鞏固民主政體具有正面的貢獻，這是 Putnam 以來所引領的一個研究傳統。相關研究成果包括：社會資本的累積可以培養人們對民主政體的支援 (Booth and Richard, 1998; Cohen and Rogers, 1992; Dowley and Silver, 2002)、提昇政治效能感 (Erickson and Nosanchuk, 1990; Olsen, 1972; Verba et al., 1995)、增進政治知識 (Ikeda et al., 2003)，以及鼓勵更多的政治參與 (Ikeda et al., 2003; 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 Verba and Nie, 1972) 等。所以，如果一個社會缺乏社會資本或是存量不足，就會導致參與低落，危及民主的素質。

表 3-2 各項控制變項的世代差異變異數分析

			年長世代	70 後	80 後	合計	統計訊息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率	平均數	1.63	2.60	4.01	2.45	F=518.281
		標準差	1.49	2.12	2.13	2.07	***
		個數	1834	729	901	3463	
	政治閱聽率	平均數	4.15	4.02	3.83	4.04	F=13.545
		標準差	1.57	1.46	1.53	1.55	***
		個數	1834	730	903	3467	
	管道數目	平均數	1.80	2.26	2.54	2.09	F=108.322
		標準差	1.16	1.38	1.43	1.33	***
		個數	1838	731	903	3472	
	小道消息	平均數	0.69	0.77	0.90	0.76	F=16.128
		標準差	0.87	0.87	0.87	0.87	***
		個數	1816	728	891	3435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平均數	4.02	3.77	3.66	3.87	F=59.293
		標準差	0.80	0.85	0.91	0.86	***
		個數	1743	707	881	3331	
	國家經濟跟過去比	平均數	4.35	4.26	4.25	4.30	F=5.860
		標準差	0.75	0.85	0.85	0.80	**
		個數	1778	716	880	3374	
	國家經濟未來發展	平均數	4.35	4.27	4.28	4.31	F=3.737
		標準差	0.70	0.72	0.70	0.80	*
		個數	1504	619	787	3374	
	家庭經濟未來發展	平均數	4.00	4.07	4.16	4.06	F=11.652
		標準差	0.76	0.70	0.76	0.75	***
		個數	1482	620	779	2881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平均數	-0.10	-0.20	-0.15	-0.13	F=1.689
		標準差	1.33	1.25	1.22	1.28	
		個數	1826	725	897	3448	
	政治效能感	平均數	-0.46	-0.39	-0.28	-0.40	F=22.600
		標準差	0.65	0.69	0.70	0.67	***
		個數	1797	723	900	3420	
人際關係	整體人群信任	平均數	1.26	1.23	1.19	1.24	F=3.050
		標準差	0.76	0.74	0.77	0.76	*
		個數	1772	720	878	3369	
	親近人群信任	平均數	6.66	6.13	5.86	6.33	F=9.798
		標準差	4.43	4.47	4.31	4.42	***
		個數	1609	673	833	3115	
	緊密程度	平均數	7.46	7.86	7.75	7.62	F=8.165
		標準差	2.47	2.37	2.24	2.40	***
		個數	1674	678	817	3168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 (2011a)。



綜合來看，可以使用三個角度來說明新世代與過去世代之間具有的差異性。首先，新世代的社會學基本變項受到經濟現代化主導而有所改變。此外，新世代的政治面貌與訊息管道都發生了變化，前者更具實用主義，後者則是以開放為特徵。最後，新世代與舊世代的差異性，也普遍地存在於關於經濟現況、政治涉入與社會關係等態度上。

第三節 價值觀的競爭與變遷

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從 19 世紀就開始。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以來，中西文化的衝突與適應事實上一直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許多政治改革、知識運動、社會改造的目標都是為了處理此一困境。可是從歷史結果來看，我們可以斷言多數努力並沒有取得成功，反而陷入混亂、分歧、戰爭或是狂亂的政治運動之中。中國現代化如此困難的因素之一，應該與其存在競爭性價值觀有很大的關係。

中國新世代在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下成長，正是一個世代交替的重要場合，藉由上文的分析，我們也初步辨認了新世代與他們長輩之間具備了基本的差異性。那麼，本文所關注的價值觀內容是否因為世代差異而發生了變遷？我們將在本節中提出兩項論點，第一，在中國至少有兩種競爭性價值觀的存在，包括傳統的「儒家價值觀」，以及受到現代化而拉動的「民主價值觀」；第二，主要的競爭性價值觀因為社會結構變化所引導的消長下，價值觀結構已經出現世代差異，這個改變是從 1970 年代開始的，對於「80 後」的影響最為明顯。年長世代主要集中在認同「儒家價值觀」，新的世代中則是浮現了「儒家價值觀」與「民主價值觀」的群體分庭抗禮的現象。

壹、競爭性價值觀



中國在近代西方強勢入侵之前，一直具有自給自足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系統，內容以儒家文化為核心，並影響著週邊地區的民族與國家。中國人與其傳統史觀相當強調這個面向，並且十分自豪。不過，西方文明歷經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兩項重要的歷史進程後，以現代化的姿態重新打開中國的大門，讓傳統中國不得不加以面對。雖然所謂的西方並不是單一的個體，但我們普遍以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市場經濟以及政治上的憲政民主三組建構來指涉西方現代文明的核心部分。這也是許多中國的改革者以及保守派所共同認知的西方文化內容。依韋伯 (1993) 所言，中國是一個早熟的中央官僚帝國；西方則是以進步之姿，進行全球性擴張的高度物質文明。兩者間的相互競爭形成中國現代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特徵。

我們可以在兩種文化的每一個交接領域，都發現它們相互競逐或是調適替代的痕跡。本文關注是與民主價值相關的政治文化內容，為了測量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我們將依循胡佛教授 (1998a；1998b) 與 Doh C. Shin (2011) 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在概念上定義與區分中國傳統概念與西方民主制度所依循的兩組價值觀念。依其內容可以歸類成如表 3-3 的三個層次的組成情況。

一般而言，當一個社會在架構其政治生活時會涵括幾項基礎概念做為互動的原則，筆者以為至少要包括政治安排、社會互動以及信仰基礎三項基本原則。其中第一個層次的政治安排，乃是指涉人們如何認知政治生活的組成方式。在西方的近代政治傳統中，最重要的政治原則就是憲政主義，防止政府對於民眾權利的過度侵害，實際的政治安排就是分權與制衡。在這個層次，我們對民主的政治文化是測量民眾對於司法獨立與立法制衡的同意程度（反向測量）。相對地，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於政治的想像與期待則是更傾向政府以及道德菁英的領導。

在第二個層次，我們關注的是民眾在看法社會單元之間互動的方式，由於政治的主要內容必然包括公共領域，所以與公共性如何形成的社會互動也是政治價

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價值觀中對於社會組成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多元主義，包括個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自由組成團體兩部分，在本文中，我們測量的是民眾對於多元意志以及多元團體的同意程度（反向測量）。傳統的儒家社會中對於人際關係的原則就像西方民主如此強調多元自主，在社會互動上，更被提倡的價值是人際和諧以及集體利益的重要性，這就成為我們測量中國社會中儒家價值觀對於社會互動的內容。

最後是基本的信仰基礎。許多人類文化學家都提示我們文化核心的作用，意指一種文化中所含有的一組基本特徵。其組成成份是與人類的生存活動和經濟行為關係最為密切的那部分文化，也包括與之有著密切關係的社會、政治和宗教的模式，有利於我們用來辨別不同文化間的同質性或是異質性。本文也認為西方民主價值觀與傳統儒家價值觀間有強調重心的不同，西方近代在人權意識逐漸取得優先地位的過程中，自由與平等兩個價值被視為重要核心，在本文中我們測量了民眾的對政治自由的同意程度（反向測量）⁴⁷；相對地，儒家社會則是以孝道文化與重視家庭為特徵，我們則是以受訪者的家庭主義傾向來做為測量內容。

表 3-3 傳統中國與民主的政治原則在三個層次上的對應

	中國傳統的政治原則 (儒家價值觀)	民主的政治原則 (民主價值觀)
政治安排	家父長及階層集體主義 道德菁英	司法獨立 立法制衡
社會互動	人際和諧 集體利益	多元團體 多元意志
信仰基礎	家庭主義	政治自由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⁴⁷ 在指標建構的過程中，平等價值的測量在中國民眾的反應中與其他變項相關性較低，所以在民主價值指標的建構中將其去除。本文的民主價值觀由五個變項構成，包括司法獨立、立法制衡、多元團體、多元意志以及政治自由。



除了兩個主要的競爭性價值觀，我們還加入了兩組做為參考的價值觀或是態度測量做為對照。首先是「前現代傳統主義」，其中包括了命定主義、男性繼承與男性政治中心的觀點。黎安友 (2007) 在處理第一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資料時，對於東亞政治文化的分析，就曾經處理過類似的問題。藉由於傳統主義題組的測量，他發現有一些傳統價值衰退的比其他一些還要快一些，另一些傳統主義的價值在東亞社會則依然受到多數民眾的贊同。本文也認為，有一些「政治不正確」的價值觀的確有可能衰退快速，但有一些核心概念衰退就會慢些。那些衰退快的，筆者認為可以稱之為「前現代價值觀」。此外，中國的現代化歷程與其他未開發國家的經歷相似，也有國家建立的問題。不論是 1911 年的孫文革命或是後來國民黨政府的統治，甚至包括共產黨在 1949 年後建立的新中國，都走上了重建國族認同與強化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政府道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也測量與「國家主義」相關的政治態度，這些題目中都包括了「國家」的詞句，希望測量國家角色在個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問題，包括國家整體性、對國家的忠誠、國家優先以及國家權威性，統稱為「國家主義」題組。

對本文的研究設計而言，最為核心的價值觀測量即為「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前者代表架構現代民主社會與政治制度的主要原則，當然是現代以來由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價值觀體系；後者則是立基於傳統文化，來自過去歷史經驗與社會化過程代代相傳的價值體系，其中多數內容與儒家文化密切相關。需要再加以說明包括以下兩點，首先，本文不準備陷入如何定義儒家文化為何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涉及到文化認知的範圍（官方文化、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有所差異），也涉及文化內涵的歧義（今古文經之爭、先秦儒家與宋明理學以及新儒家興起等爭議）。大多數人都承認東亞社會仍然深受傳統的影響，其中儒家文化的影子處處可見，本文選擇與政治文化直接相關的價值觀態度加以測量，並且在三個對應的層次上測量傳統儒家價值與民主價值，目的在處理兩者之間的相異性。其次，對於價值觀如何測量，使用那些變項才更合理？本文因為使用二手資料分析，對

於題目本身能夠變動的可能有限，僅能在概念化過程中使其儘量符合分析所需，更好的測量方式或許要等到未來的其他研究再加以精煉。



貳、價值觀的世代變遷

首先，我們先大致掌握一下本文所定義的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各項組成元表的基本分佈。表 3-4 是沿著表 3-3 的架構來呈現世代之間對於各項元素的贊同百分比，細格中的百分比是計數「同意」與「非常同意」的相加（民主價值觀是反向測量）。結果顯示，儒家傳統價值觀所重視的概念，相較於民主價值觀，整體而言還是受到民眾較高的認同，這種高度認同尤其表現在家庭主義（90%）、人際和諧（89%）以及集體利益（77%）等概念上。不過，整體儒家傳統價值觀正在衰退中，最重要的變化表現在對於政治安排上的兩項概念的認同。相對的，民主價值觀的認同正在逐步提昇，最令人注目的是關於表達自由認同的提昇，從年長世代的 32% 上昇到「80 後」世代的 63%，顯然與目前中國言論管制的環境相悖。

表 3-4 贊同民主價值觀以及儒家傳統價值觀的百分比

		全體	年長世代 (1)	70後 (2)	80後 (3)	(3)-(2)	(3)-(1)
民主價值觀							
政治安排	司法獨立	45%	41%	49%	48%	-1	7
	立法制衡	42%	37%	46%	47%	1	10
社會互動	團體多元主義	30%	30%	28%	30%	2	0
	個人多元主義	43%	37%	44%	52%	8	15
基本原則	表達自由	45%	32%	53%	63%	9	31
儒家傳統價值觀							
政治安排	家父長與階層主義	66%	75%	59%	52%	-8	-24
	道德菁英	44%	56%	36%	26%	-10	-30
社會互動	人際和諧	89%	91%	89%	87%	-3	-4
	集體利益	77%	82%	76%	66%	-10	-16
基本原則	家庭主義	90%	93%	91%	86%	-5	-7

說明：表中的數字(%)為「同意」與「非常同意」的相加；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資料來源：張佑宗 (2011a)。



接著，根據本節第一個段落的討論，我們就兩組競爭性價值觀與用來對照參與兩組價值觀進行指標建構。⁴⁸ 這四組題目的回答項皆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以及「非常不同意」，初步的計算方式是重新編碼為「2」、「1」、「-1」以及「-2」(民主價值觀題組為反向測量)，然後藉由 SPSS 統計軟體直接計算單一受訪者對於某一價值觀指標的平均數。從 2~-2 進行編碼處理的好處是可以同時兼顧受訪者的態度與方向性，正負向可以直接顯示受訪者對於某一價值觀指持正面或負面態度，而藉由同一世代的受訪者加總，可以直接得出該世代的價值觀內容。另外，「不知道」、「無法選擇」、「不回答」等無反應者，全部以缺失值處理，直接計算平均數的指標建構法可以相當程度減少最終會喪失的有效意見。

圖 3-3 是四項價值觀在中國當代的世代差異與變遷情況。我們將受訪者依出生年代，以每 10 年歸為同一世代群體。橫軸代表世代差別，縱軸則是每一世代四組價值觀的平均分數。圖中的兩條實線顯示民主價值與儒家價值的世代變化，兩條虛線則是顯示傳統主義與國家主義價值觀的世代變化。首先，可以發現中國價值觀變遷最主要的趨勢是儒家價值觀沿著世代線的逐級下降，以及民主價值觀沿世代級逐步上昇的過程。其次，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變化在圖 3-3 的後半段有一個斷裂點，儒家價值觀的變化在 60 世代以前變化比較緩和，70 世代以後則是呈現一個更為明顯的下坡。民主價值觀也有一樣的變化，70 世代以後的斜率比之前的年代更為陡峭，方向則是與儒家價值觀相反。更重要的是，民主價值觀在 60 世代過渡到 70 世代之間是第一次跨越 0 分界限成為正向得分。這些情況顯示，中國民眾的價值觀變遷正在出現，研究者應該更注意最近 30 年以來的價值觀變化。

⁴⁸ 在本研究中，我們所使用的指標建構方式大多數為多變項綜合計算過的潛在變項模式(Latent variable modeling)，對本文而言，各項指標都是一個變項以上的概念組合，其測量也應該是綜合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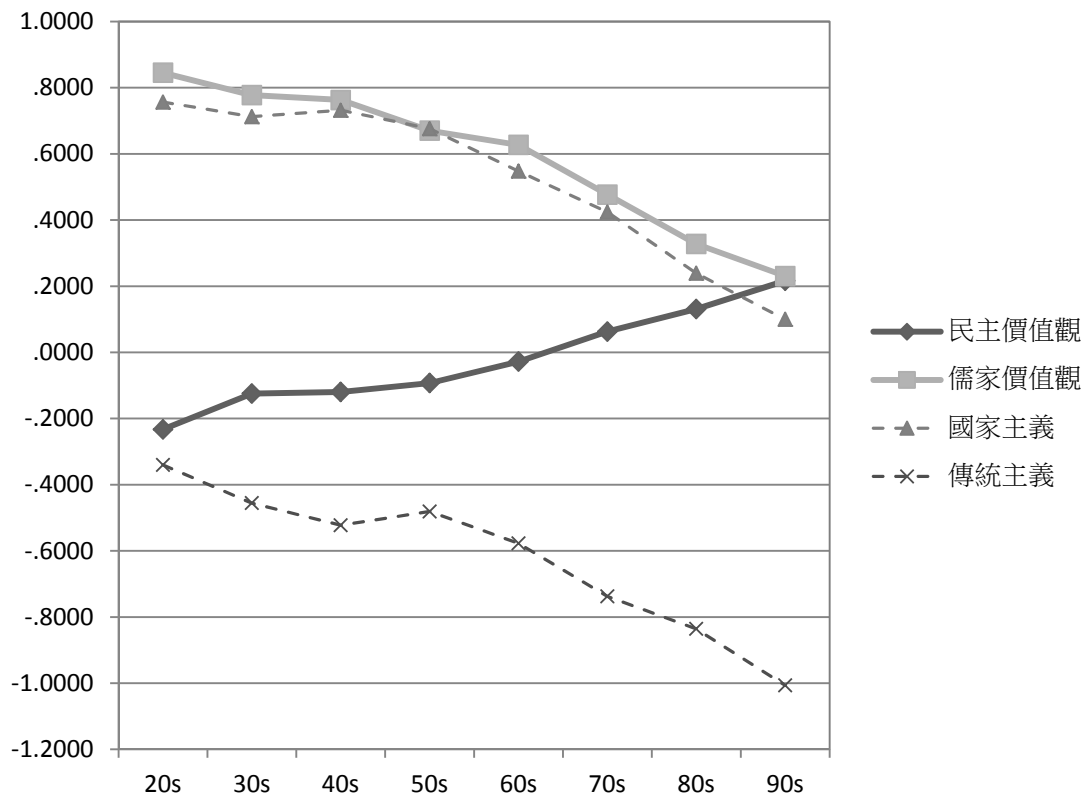


圖 3-3 中國民眾價值觀的世代差異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圖 3-3 還有兩個附加訊息可以加以注意，下方的傳統主義曲線與其他三組價值觀顯然歧義甚大，比較來看處在更低的水平，雖然中間有過震盪，但整體還在繼續下降。⁴⁹ 這個結果顯示，在現代化過程中，物質條件的改善的確可以快速改變某一部分的傳統價值，促使其快速消失。不過，有一些更為核心的文化內容將與外來文化持續競爭，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如同我們所觀察的民主價值與儒家價值之間的消長關係。圖 3-3 上方的另一條虛線是國家主義價值觀的世代變化，我們可以發現它與儒家價值觀的曲線幾乎重疊。在中國，近代國家建立過程所建構的

⁴⁹ 傳統主義的具體問法如下：是否贊成「一個人富貴貧賤，成功失敗都是命中註定的。」指涉命定主義；「如果只要一個孩子，生兒子比生女兒好。」指涉男性繼承；「婦女不應該享有和男性一樣的參與政治的權利。」指涉男性政治中心。

國家主義的態度與傳統的儒家價值觀，給予民眾的影響可能十分相近。⁵⁰



參、價值觀變遷的迴歸分析

下一步的分析工作是理解在中國的這種價值觀變遷是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為了後續統計處理的方便，我們進一步使用因素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技術將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轉化為標準化迴歸分數。表 3-5-1 與表 3-5-2 是分別以受訪者的儒家文化分數與民主價值分數為依變項所進行的迴歸分析結果。兩個表中的第 1 欄是在沒有進行變項控制的情形下，儒家文化分數與民主價值分數分別與世代進行迴歸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其基本的關係是，與年長的世代相比，年輕世代的儒家文化更為低落，民主價值觀的更為提昇。

表格的第 2 欄是放入基本控制變項後的結果，由於世代差異有可能也會受到受訪者基本變項的影響。藉由基本變項的投入，我們想要知道的是世代差異是否具有持續性的影響。從表 3-5-1 中，可以發現中國民眾的儒家價值在控制其他基本變項後仍然具有解釋力，更新的世代其儒家價值分數將會更低，「70 後」世代的估計係數為-.263，「80 後」世代為-.452。其他具有解釋力的變項，包括居住於西部省分、曾經提出入黨申請以及主觀認為是社會上層的受訪者，將有更高的儒家價值，而更高的教育程度、城市居民以及居住於東部省分的儒家價值會減低。相對地，在表 3-5-1 中，我們則是看到投入基本變項控制後，世代差異對於民主價值變化的影響力也是顯著，方向是新世代會有更高的民主價值，「70 後」世代的估計係數為.234，「80 後」世代為.190。其他變項的影響與儒家價值大多相反，對民主價值具有提高效果的變項包括男性、高教育程度、城市居民、居住在東部省分；居住

⁵⁰ 國家主義的具體問法如下：是否贊成「國家像一部完整的大機器，個人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螺絲釘，談不上有獨立地位。」指涉國家整體性；「不管一個國家是如何不好或者做錯了什麼，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保持對國家的忠誠。」指涉對國家的忠誠；「為了國家，個人的利益都可以犧牲。」指涉國家優先性；「當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為了處理這個困難的情況可以不必要理會法律。」指涉國家權威性。

在西部省分以及主觀認為是社會基層的受訪者，其民主價值較低。

兩組表格的第 3 欄都是除了基本變項之外，再投入訊息管道，以及經濟、政治與社會關係等受訪者相關評價、態度或情況的結果。大體上而言，控制變項的放入提高了整體模型的解釋力，世代差異也仍然存在，唯在表 3-5-2 第 3 欄中的「80 後」世代顯著性消失了。根據逐項測試，這是在網路使用率放入模型後的結果，網路使用率對於世代差異的影響有明顯的共變性。另外，每個變項對於儒家文化與民主價值的分數變動影響，基本上呈現相反的關係。以下逐項說明控制變項的影響內容。

表 3-5-1 的第 3 欄為儒家價值分數在投入控制變項後的模型，世代仍有具有明顯的差異，越新的世代，儒家價值分數就越低。第 1 橫列為基本社會學變項，包括性別、教育程度、城鄉差異以及地區別。結果發現儒家文化分數的變動與教育程度呈現顯著性，教育程度提高，其儒家文化分數將降低；而西部省分的受訪者較中部省分具有更高的儒家文化分數。第 3 橫列為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地位變項，我們可以發現曾申請過黨員但不是黨員的受訪者的儒家文化分數較群眾更高；自認為社會上層的受訪者具有更高的儒家文化。第 4 橫列為經濟評估，對於國家經濟情況評價越高者，儒家文化分數更高。第 5 橫列為訊息管道，包括網路使用率、閱讀政治訊息頻率、管道數量以及是否接觸小道消息，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網路使用程度的重要影響，網路使用率與儒家文化呈負向關係，也就是說網路使用率將會降低受訪者儒家文化的分數。第 6 橫列與第 7 橫分別為政治涉入與人際關係指標，我們可以發現政治效能感越高，其儒家文化分數也就越低；而特定人際信任以及關係緊密度在中國的表現與是與儒家文化具有契合性，充分顯示了關係社會的特性。

表 3-5-2 第 3 欄的迴歸模型是以民主價值為依變項，並投入了相關控制變項。可以發現，世代方面只有「70 後」世代仍然具有顯著性。除此之外，當模型控制了世代差異後，我們可以看看是那些個別變項對民主價值發生影響。與現代化相



關的變項都與民主價值分數的變動呈正向關係，包括教育程度、居住地區以及訊息管道。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於民主價值的提昇，其影響十分顯著，係數為.083。居住地區的顯著性也很明顯，與居住在中部省份的民眾相比，東部省份的民主價值分數更高，係數為.214，西部省份的民主價值分數則是較低，係數為-.216。訊息管道中的網路使用率也具有正向顯著性，係數為.057，顯示網路使用的頻率將有助於民主價值分數的提昇。比較有趣的是，訊息管道中若是經常與他人交換小道消息者，對於其民主價值分數帶來負面的影響。受訪者的主觀社會地位對於民主價值分數影響不大，政治面貌中只有申請過黨員者比群眾身份的分數更低是具有顯著性的。

另一方面，新世代的民主價值分數的變動，與對經濟更為批判、更高的政治效能感以及更不傳統的人際關係有關。我們發現，跟經濟評估有關的兩項指標，評價國家經濟現況以及家庭未來經濟情況評估，都具有統計顯著性，且係數為負向，顯示對經濟評估越負面的民眾的民主價值分數越高。在政治心理涉入方面，民主價值分數越高，也有會比較高的政治效能感。人際關係方面，僅在親近人際信任的指標有顯著性，方向為負。整體來看，民主價值分數的變動與現代化環境具有很高的相關性，與儒家價值分數正好相對。

表 3-5 價值變動的迴歸模型分析

(表 3-5-1) 儒家價值分數

依變項：	1	2	3
儒家文化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常量)	.263 (.025) ***	.463 (.052) ***	-.877 (.175) ***
世代(年長者)			
70 後	-.378 (.045) ***	-.263 (.046) ***	-.163 (.053) **
80 後	-.692 (.042) ***	-.452 (.046) ***	-.244 (.057) ***
性別(女性)			
男性		.002 (.036)	.028 (.042)
教育程度		-.106 (.010) ***	-.072 (.013) ***
城鄉(農村)			
城市		-.081 (.037) *	.002 (.043)
地區(中部)			
東部		-.130 (.042) **	-.035 (.048)
西部		.098 (.045) *	.163 (.053) **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102 (.052)	.052 (.058)
申請過		.149 (.056) **	.133 (.062) *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058 (.039)	.028 (.045)
上層		.282 (.056) ***	.201 (.062) **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62 (.012) ***
閱讀政治訊息			.023 (.016)
管道數量			-.030 (.017)
小道消息			.016 (.024)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177 (.026) ***
家庭未來經濟			.022 (.029)
政治態度			
政治興趣			.004 (.018)
政治效能感			-.161 (.031) ***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049 (.028)
親近人際信任			.031 (.005) ***
關係緊密度			.017 (.009) *
模型訊息			
R ²	.087	.150	.230
Adj. R ²	.087	.147	.221
F/Sig.	142.784***	45.366***	27.458***
N	2985	2844	2050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表 3-5-2) 民主價值分數

依變項：	1	2	3
民主價值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常量)	-.131 (.029) ***	-.620 (.059) ***	.273 (.192)
世代(年長者)			
70 後	.296 (.051) ***	.234 (.050) ***	.198 (.057) **
80 後	.391 (.047) ***	.190 (.051) ***	.062 (.062)
性別(女性)			
男性		.165 (.040) ***	.142 (.045) **
教育程度		.115 (.011) ***	.083 (.014) ***
城鄉(農村)			
城市		.130 (.041) **	.052 (.047)
地區(中部)			
東部		.242 (.046) ***	.214 (.052) ***
西部		-.149 (.050) **	-.216 (.059) ***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099 (.057)	.090 (.063)
申請過		-.063 (.060)	-.139 (.066) *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006 (.043)	.059 (.049)
上層		-.130 (.061) *	-.085 (.067)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57 (.013) ***
閱讀政治訊息			.028 (.017)
管道數量			.019 (.019)
小道消息			-.058 (.026) *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089 (.028) **
家庭未來經濟			-.072 (.031) *
政治態度			
政治興趣			.016 (.019)
政治效能感			.210 (.034) ***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049 (.031)
親近人際信任			-.033 (.005) ***
關係緊密度			-.012 (.010)
模型訊息			
R ²	.032	.133	.209
Adj. R ²	.031	.129	.200
F/Sig.	40.201***	32.546***	21.337***
N	2453	2347	1796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 (2011a)。



肆、變遷中的價值觀結構

因為中國 1979 年後社經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價值觀變遷，其中還包括了原有價值觀對於新興價值觀的競爭關係，所以價值觀變遷不完全是直線的，本文認為應該注意的是價值觀結構的變動情況，所謂價值觀結構是指一個社會中擁抱不同價值觀群體之間的數量分佈情況。

為了更有效的捕捉這個動態，本文在資料處理上加入價值觀群體分類的概念。先前的主成分分析結果將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的指標轉化為民主價值分數與儒家文化分數，後兩者是一組標準化後的綜合性分數，若同時取平均數來切分，共可以區分成四種不同的價值觀群體，如表 3-6。

表 3-6 價值觀分類表

		儒家文化價值觀	
		低	高
民主價值觀	高	民主價值者 (627)	混合價值者 (375)
	低	低價值觀者 (385)	儒家價值者 (944)

N=2331，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表 3-6 左上角是指具有較高的民主價值分數，但儒家文化分數屬於較低者，為傾向民主價值者；右下角是它相反的群體，保有較高的儒家文化分數，但其民主價值分數較低，為傾向儒家價值者；右上角的混合價值，是指民主價值分數與儒家價值分數皆高的群體，在這個群體中，同時擁抱了兩組價值觀。左下角則是兩組價值觀分數皆低於平均值者，我們將其定位為低度價值觀者，也就是沒有明顯

的價值觀傾向的民眾。無反應者設為缺失值後，進入到價值觀類型分析的受訪者個數為 2331 個，其中民主價值者為 627 個，儒家價值者為 944 個，混合價值者 375 個，以及低價值者為 385 個。藉由四類價值觀群體的世代分佈變化，有助於觀察中國的價值觀結構是否發生了變遷。

首先，我們要檢視一下四類價值觀群體分佈是否有世代差異，表 3-7 將四類價值觀與世代進行交叉列表分析。表中顯示，價值觀與世代間的卡方值達到 143.627，顯著性檢定為.000，各類價值觀的分佈會因為世代差異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用調整後殘差進行判定，我們可以發現「70 後」與「80 後」世代的民主價值觀群體與年長世代相比成長很多。相較於年長世代僅佔 17.7%，民主價值觀者在「70 後」世代佔了 30.5%，調整後殘差為 2.1；「80 後」的差異更明顯，傾向民主價值觀者佔了 38.7%，調整後殘差高達 8.4，成長的非常明顯。相對的，儒家價值觀者在年長世代是絕對多數，佔了 49.7%，將近一半。隨著世代推新而逐步下降，到了「80 後」仍然有 28.3%的儒家價值贊同者。另外一項值得注意的是，「80 後」世代的低度價值觀者較過去世代成長不少，為 20.7%，調整後殘差為 3.6。這與一般對於新世代調查顯示，新世代更缺乏政治主張、對政治沒有興趣的結果部分相符。如果我們把重點放在最後一列的合計上，我們可以發現，整體的中國價值觀分佈仍然是以儒家價值觀為多數，佔 40.5%；傾向民主價值觀者為 26.9%，與多數意見仍有一定差距。

為了更明確地看出中國價值觀結構的變化，我們使用直方圖進行比較。將世代的分類稍加割切，把年長世代進一步分為 1949 年以前出生、1950 年代出生、1960 年代出生，加上「70 後」世代以及「80 後」世代，共比較五個世代的價值觀結構。圖 3-4 中的直方圖分佈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型態，1960s 向左的三組價值觀結構是以儒家價值觀特別突出做為特徵，而 1970s 與 1980s 兩個世代則是以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的均勢為特徵。另外，就儒家價值觀的群體來看，具有隨世代逐步下降的趨勢；民主價值觀的增加則是有一個斷裂，出現在 1970s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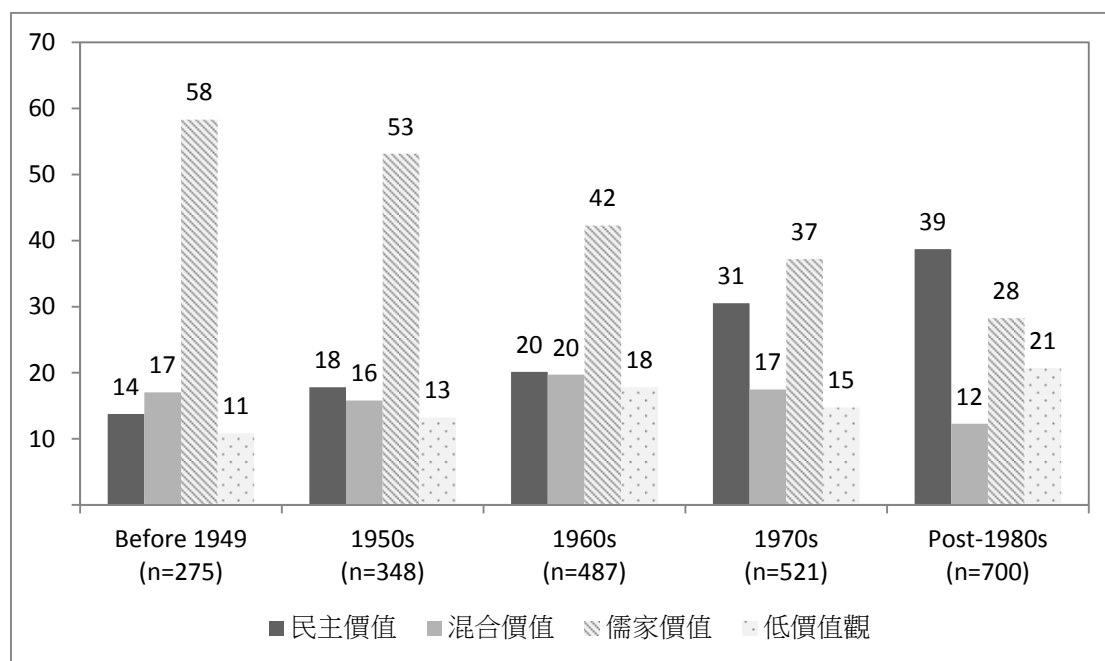


表 3-7 四類價值觀與世代列聯表

		民主 價值觀	混合 價值觀	儒家 價值觀	低度 價值觀	合計	N	Chi ² /Sig.
年長世代	%	17.7	17.8	49.7	14.7	100.0	1110	143.627 ***
	a. r.	-9.5	2.2	8.7	-2.3			
70 後	%	30.5	17.5	37.2	14.8	100.0	521	
	a. r.	2.1	1.0	-1.7	-1.2			
80 後	%	38.7	12.3	28.3	20.7	100.0	700	
	a. r.	8.4	-3.3	-7.9	3.6			
合計	%	26.9	16.1	40.5	16.5	100.0	2331	

說明：***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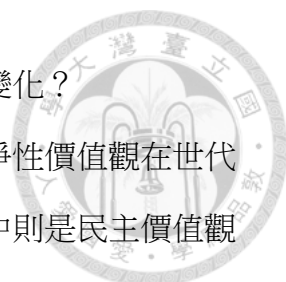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張佑宗 (2011a)。



N=2331

資料來源：張佑宗 (2011a)。

圖 3-4 四類價值觀群體世代分佈



如何評價存在於當代中國的競爭性價值觀與價值觀結構的變化？

整體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就價值觀變遷的角度而言，競爭性價值觀在世代間有明顯差異。儒家價值觀在舊世代中具有獨佔性，但新世代中則是民主價值觀的擁有者越來越多。就價值觀結構的內容而言，我們確認了兩種模式。早期的模式是多數民眾具有儒家價值，具有其他類型價值觀的民眾為少數；更為當代模式是儒家價值觀與民主價值觀擁有者數量相當的分佈型式。模式的改變具有斷層性，新的模式出現在 1970 年後出生的世代。上述兩點說明了中國過去 30 年的經濟與社會結構改變的確改了新世代的價值觀，新世代中的民主價值觀擁有者正在成長中，而且將與儒家價值觀分庭抗禮。

雖然民主價值正在新世代群體中出現，但是中國當代價值觀變遷的另一個特點是，儒家價值觀仍然具有相當的強固性。這可以從以下幾點加以理解。首先是舊世代中大量儒家價值觀者顯示過去中國深受其影響，即使 30 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仍然具有眾多贊同者；其次，雖然具有儒家價值觀的民眾正在減少，但其下降的速度相對和緩，表示與民主價值觀相比仍有一定的競爭性；最後，改革開放促進了民主價值者的大幅增加，但到目前為止，新世代中仍有一定數量的儒家文化的贊同者，還未形成全面性的變遷。筆者以為這應該是中國民主化道路比較困難的根本因素，唯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掌握新世代中價值觀的變化，尤其是認同民主價值者與儒家價值者在政治態度上的不同，藉此觀察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

伍、不同價值觀的基本特徵

上述的討論已經說明價值觀結構在中國具有世代差異，這明顯是因為 1979 年後中國結構性變遷的結果。不過，不同價值觀之間是否具有不同的背景條件，是否有特定的社會背景造成價值觀的不同，我們進一步將視點集中在「80 後」新世代。藉由交叉列表與變異數分析來檢視四類價值觀的基本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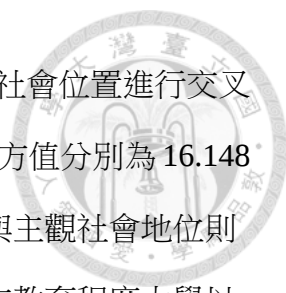


表 3-8，是針對受訪者的社會學基本變項，以及兩項政治與社會位置進行交叉列表分析。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地區別、教育程度具有顯著差異，卡方值分別為 16.148 以及 16.111，檢定值的顯著性皆達到 90%；受訪者的政治面貌與主觀社會地位則是沒有顯著差異。具有民主價值觀者東部多於西部、十分集中在教育程度大學以上；相對地，儒家價值觀的擁有者在西部省分偏高，教育程度則是中學程度者偏高。另外，城鄉差異的卡方值檢定雖然未達顯著，可是其調整後殘差都超過了臨界值，民主價值觀者在城市中偏高，佔 42.2%，調整後殘差為 2.0；農村中則是儒家價值觀者較多，佔 31.9，調整後殘差為 2.1。同時，我們也發現混合價值觀與低價值觀者的社會特徵沒有什麼明顯傾向性。從這些結果可以明顯看出，民主價值觀的出現與現代化程度有相當高的相關性，城市、東部省分、以及高教育程度都是屬於現代化的特徵，生活在更為現代化環境下的人們更容易具有民主價值觀。與此相對，儒家價值觀則是固守在農村、與西部地區，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與儒家價值並非線性關係，更具有儒家價值的是受過中學教育的群體，正是國家提供正式政治社會化最主要的一部分。

表 3-8 新世代中四類價值觀群體的基本特徵(一)

	N		民主價值觀	混合價值觀	儒家價值觀	低價值觀	Chi ² /Sig.	
政治面貌								
黨員	87	%	36.8	14.9	24.1	24.1	5.163	
		a. r.	-0.4	0.8	-0.9	0.8		
曾申請	125	%	40.8	15.2	23.2	20.8		
		a. r.	0.5	1.1	-1.4	0.0		
群眾	488	%	38.5	11.1	30.3	20.1		
		a. r.	-0.2	-1.5	1.8	-0.6		
合計	700	%	38.7	12.3	28.3	20.7		
性別								
女性	374	%	38.2	11.5	29.9	20.3	1.297	
		a. r.	-0.3	-0.7	1.0	-0.3		
男性	326	%	39.3	13.2	26.4	21.2		
		a. r.	0.3	0.7	-1.0	0.3		
合計	700	%	38.7	12.3	28.3	20.7		
城鄉別								
農村	335	%	34.9	11.3	31.9	21.8	6.240	
		a. r.	-2.0	-0.7	2.1	0.7		
城市	365	%	42.2	13.2	24.9	19.7		
		a. r.	2.0	0.7	-2.1	-0.7		
合計	700	%	38.7	12.3	28.3	20.7		
地區別								
東部省份	213	%	44.1	11.7	20.2	23.9	16.148*	
		a. r.	2.0	-0.4	-3.1	1.4		
中部省份	354	%	39.0	13.0	29.7	18.4		
		a. r.	0.2	0.5	0.8	-1.5		
西部省份	134	%	29.1	11.9	37.3	21.6		
		a. r.	-2.5	-0.2	2.6	0.3		
合計	701	%	38.7	12.4	28.2	20.7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37	%	32.4	16.2	27.0	24.3	16.111*	
		a. r.	-0.8	0.7	-0.1	0.5		
中學程度	455	%	34.3	12.7	31.2	21.8		
		a. r.	-3.3	0.4	2.6	0.7		
大學以上	201	%	49.8	10.9	20.9	18.4		
		a. r.	3.8	-0.7	-2.7	-1.0		
合計	693	%	38.7	12.4	28.0	20.9		
主觀社會地位								
基層	322	%	37.6	12.7	28.9	20.8	5.983	
		a. r.	-0.7	0.2	0.5	0.2		
中層	263	%	42.2	11.8	24.3	21.7		
		a. r.	1.4	-0.4	-1.7	0.6		
上層	89	%	34.8	13.5	36.0	15.7		
		a. r.	-0.9	0.3	1.8	-1.2		
合計	674	%	39.0	12.5	28.0	20.5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表 3-9 從另外一些角度來觀察價值觀與受訪者特質的關係，主要是態度的形成與內容，使用變異數分析來比較各群體的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焦點在於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贊同者的比較。首先，民主價值觀者對於經濟的評估普遍較低，不論是國家整體經濟或是對於家庭經濟，對於國家經濟現況以及與過去相比都是四組價值觀中比較低的；而儒家價值觀者則評價偏高，對於國家經濟與過去相比，給予了四組中最高的評價，其他兩類評估也都是次高；對經濟情況評價最高的來自混合價值觀者。其次，民主價值觀者的訊息管道普遍比較多，不論是網路使用率或是管道數目都佔到第一位，政治閱聽率與小道消息交往則是居於次高；儒家價值觀者的訊息管道就相對較窄，四項測量中三項居於末位，包括網路使用、管道數目與小道消息，而政治閱聽率則只居第三位。第三，從政治態度的角度來看，民主價值觀持有者顯得較為積極，包括最高的政治興趣以及次高的政治效能感；儒家價值觀者在這兩項政治心理涉入都是四組中最低，符合我們一般的社會經驗。最後，民主價值者的人際關係比較疏離，包括對特定人群信任居於最低，以及次低的人際關係緊密度；相對地，儒家價值觀以及混合價值觀持有者的三項人際關係指標都居於第一或第二位；這個差異再次說明在傳統社會脈絡下的人際關係具有獨特的邏輯，被儒家價值觀者所持續擁抱，而新興的具有民主價值觀的群眾已經開始偏離這個脈絡。

受到現代化更多的影響、更多的訊息管道、對於經濟現況更強的批判性、對於政治更多的心理涉入以及較過去疏離的社會人際關係，可以說是新世代中民主價值觀擁有者的特徵。我們可以發現，就社會條件與基本態度來看，民主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觀者並不相同。而最近 30 年出生的新世代在這個價值觀取得相當的增長，不能不說是與中國結構性因素的改變有關。

表 3-9 新世代中四類價值觀群體的基本特徵(二)

		民主 價值觀	混合 價值觀	儒家 價值觀	低價值觀	合計	F 值/Sig.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 現況	mean	3.47	3.82	3.75	3.68	3.63	5.244**
	s. e.	0.97	0.88	0.93	0.83	0.93	
	n	270	86	190	143	689	
國家經濟 與過去比	mean	4.17	4.32	4.39	4.20	4.26	2.958*
	s. e.	0.93	0.85	0.79	0.78	0.86	
	n	270	86	191	145	692	
家庭經濟 與過去比	mean	3.84	4.08	4.00	3.79	3.90	3.515*
	s. e.	0.89	0.78	0.78	0.86	0.84	
	n	270	86	196	144	696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率	mean	4.62	3.92	3.45	4.49	4.18	14.185***
	s. e.	1.92	2.18	2.20	1.93	2.09	
	n	271	86	197	145	699	
政治閱聽率	mean	4.16	4.18	3.74	3.67	3.94	5.888**
	s. e.	1.38	1.38	1.51	1.52	1.46	
	n	271	86	198	145	701	
管道數目	mean	2.92	2.92	2.40	2.64	2.72	6.096***
	s. e.	1.45	1.33	1.37	1.34	1.41	
	n	271	86	198	145	701	
小道消息	mean	0.97	0.89	0.74	0.98	0.90	3.103*
	s. e.	0.86	0.91	0.81	0.86	0.86	
	n	270	86	196	144	696	
政治態度							
政治興趣	mean	0.12	-0.17	-0.31	-0.03	-0.07	5.062**
	s. e.	1.19	1.20	1.21	1.23	1.22	
	n	271	86	197	145	700	
政治效能感	mean	-0.15	-0.14	-0.36	-0.20	-0.22	4.382**
	s. e.	0.68	0.75	0.70	0.64	0.69	
	n	271	86	198	145	701	
人際關係							
一般 人群信任	mean	1.18	1.42	1.18	1.07	1.19	4.162**
	s. e.	0.75	0.70	0.75	0.74	0.75	
	n	270	86	193	144	693	
特定 人群信任	mean	5.05	6.84	7.12	5.11	5.86	11.825***
	s. e.	4.58	3.43	4.09	3.93	4.29	
	n	261	80	187	138	666	
關係緊密度	mean	7.71	8.48	7.84	7.65	7.83	2.777*
	s. e.	2.26	2.12	2.31	2.19	2.25	
	n	257	80	180	133	649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第四節 趨同性與文化相對性的辯證



根據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發展經驗，基本上就是一個追尋現代性的過程，體制內改革的努力、追求共和的革命運動、軍閥割據與內外戰爭，以及共產主義革命與激進改造。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這些改變離全面的現代化還有一段距離。歷史學家指出，中國謀求改造的困難在於「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黃仁宇用大歷史的觀點分析，認為中國因為缺乏數字管理的能力，所以無法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近代以來，蔣介石及國民黨因抗戰而替中國建立了新的高層機構，毛澤東與中共則是藉土地改革而建立了低層機構，目前則需要在這兩個層次間建立法制性聯絡管道。到目前為止，也才初步具有數字管理的能力。(黃仁宇，1990)

現代性在中國立足為何如此困難，本文認為應該回到文化變遷的觀點上來思考，有一個貫穿社會與歷史的強固傳統文化存在，仍然在各個層面塑造民眾的價值觀內容，面對外來的現代化價值，發生了很強的競爭性。對於現代性，有意義的結構性變遷發生在 1979 年之後的中國，鄧小平路線或理論實際上真正使中國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雖然經歷了「天安門事件」以及稍後的「姓社姓資」路線爭議，唯鄧小平以高度的政治能力解決了改革前期的內外矛盾，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使得中國真正具有了現代性。這可以從本文的數據分析來取得證實。

首先是競爭性價值觀。藉由政治安排、社會互動以及信仰原則的對比，我們辨認了儒家價值觀與民主價值觀在世代之間的變動情況。基本上，中國價值觀變遷的趨勢是儒家價值觀沿著世代線的逐級下降，以及民主價值觀沿世代推新而逐步上昇的過程。其中，民主價值觀由負轉正的關鍵世代是「70 後」世代。另外，我們也發現國家主義與儒家價值觀的變動情況相當一致，這或許是因為中國近代所建構的國家主義與傳統儒家價值觀有契合之處，給予了民眾相近的影響。此外，除了世代以外，我們也發現了現代化指標對於民主價值分數提昇的正向影響。其中，訊息管道中的網路使用情況的影響十分關鍵，正面地影響了民主價值的提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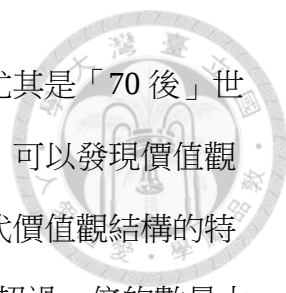


甚至可以涵納世代差異。儒家價值分數的變動則大致與影響民主價值分數變動的因素一樣，只是提供的是負向關係，我們注意到傳統含量越高，其儒家價值分數也就越高，例如更相信親近的人以及更緊密的人際關係。

第二個主要發現是價值觀結構的變動。藉由世代間不同價值觀群體的分佈情況，我們確認了有兩種價值觀結構存在於不同世代之中。早期的模式是絕大多數民眾贊同或擁抱儒家價值觀，具有其他三類價值觀的民眾相比而言都是少數；更為當代的模式是儒家價值觀與民主價值觀擁有者數量相當的分佈型式。另外，模式的改變具有斷層性，1960 年代之前與 1970 年代之後存在兩種不同的模式。上述兩點說明，過去 30 年的經濟與社會結構改變的確改變了中國新世代的價值觀，其中的特點是，民主價值觀擁有者數量正在成長中，而且很有可能在未來與贊同儒家價值觀者分庭抗禮。

最後，我們分析新世代中各類型價值觀群眾的特徵發現，就社會條件與基本態度來看，民主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觀者並不相同。民主價值觀者受到現代化更多的影響、更多的訊息管道、對於經濟現況更強的批判性、對於政治更多的心理涉入以及較過去疏離的社會人際關係。儒家價值觀者則基本上相反，較多居住在農村、西部省份、訊息管道較少，以及受過中學教育的民眾；他們的基本態度更傾向給予經濟情況較高評價、較少的政治心理涉入以及較好的傳統人際關係。

讓我們回到趨同假設與文化相對假設的討論，那一個說法在中國案例中更可以得到支持？從資料的整體結果來看，文化相對論的說法在中國是有其影響力的，這可以表現在儒家傳統價值觀的元素在中國民眾之中仍然具有很高的認同，包括家庭主義、人際和諧以及集體利益等。雖然各個世代之間具有差異而且呈現下滑趨勢，可是整體而言仍然得到民眾正向的反應。更重要的是，從價值觀結構的角度來看，1970 年代以前出生的儒家傳統主義的價值觀大軍，在數量上仍然具有絕對優勢，這是中國目前局勢仍然十分穩定的主要支撐力量。可是，當我們進入到新世代中的價值觀體系，可以發現另外一些現象正在發生，只是可能被整體的傾



向暫時掩蓋。第一個重要變化自然是民主價值觀認同的提昇，尤其是「70 後」世代開始進入正向的認同。當我們使用價值觀群體的角度來檢視，可以發現價值觀群體的世代差異可以用民主價值觀認同者的大量增加做為新世代價值觀結構的特徵。在 1960 年代以前出生者，中國民眾中的儒家價值觀者都以超過一倍的數量大於民主價值觀群體，「70 後」世代開始拉近，「80 後」世代中的民主價值者數量開始超越儒家價值觀者。進一步分析，這些變化與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有關，它們都或多或少都與現代化因素相關。也就是說，趨同假設正在發揮作用，儘管面對強大的傳統文化影響使其變動幅度不如理論預期，但仍然在相對開放的部分改變民眾的觀念，包括更高的教育程度、更都市化的生活、更開放的訊息管道等。具有新價值觀的民眾也展現與傳統價值觀擁護者的差異，例如更具有政治效能感、以及偏離傳統關係社會下的人際關係等。

1979 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這些變化的真正根源，中國過去 30 年的結構變遷的確形成了世代差異，尤其要注意的是「80 後」世代與年長世代之間的差異。從本章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現代性所帶來的差異可以在兩種不同價值觀的變動與結構消長中看出來，這種變化是否會與政治支持進一步聯繫起來是下文分析的重點。不過，在此之前，也要注意國家加上社會環境所建構的意識型態對於世代與不同價值觀群體的影響。

第四章 新世代與威權韌性



何為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的中國夢。因為這個夢想，它凝聚和寄託了幾代中國人的一種夙願，它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它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 2012 年 11 月 29 日，習近平參觀「復興之路」展覽後講話

對於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如同雞與蛋的問題一樣，難以得到完美的解答 (Inglehart, 1988)。更重要的問題是，權威當局會為了某種政治目標對政治文化進行詮釋，甚至是納入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雖然不一定會發生效用。不過，有一種「文化透鏡」(cultural lens) 的說法提醒研究者要注意權力在文化過程中的作用，即使民眾被授予相同的接近權限，不論是人力資本或是物質資本，還是有可能在根本上受到限制。即使他們不會受到歧視，但也可能受制於超出他們所能意識到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因素，這個背景條件將會限制了他們的追求能力 (Rao and Walton, 2004)。這意指文化變遷的可能性，是要同時考慮傳統主流文化的持續力 (如果具有一個強勢文化)，以及威權政府有意識的推動「對抗性」政治文化的影響程度。中國模式的潛在內涵，有一部分內容就是希望保持政府對於主流政治文化的影響能力。本章想要理解這種影響能力的普及性與持續力，以及不同世代間受到該因素影響的情況。

本章首先將針對中國模式在實際運行的基本政策特徵做一闡述，接著對於將會影響政治態度的意識型態部分進行統計分析，第二節針對的是民族主義部分，第三節則是中國式治理的贊同程度，結論部分將會評估這兩項可能干擾民眾社會化過程的意識型態對於中國新世代民眾的影響力與其限度。

第一節 中國模式的具體內容



中國模式的實際運作具有政策上與意識型態上兩方面的特徵，目的都是指向當局所以能夠有效管控的變遷路徑。在政策上的特徵包括「緊抓政治改革」以及大力度的「維穩與網路管制」。我們認為，更為重要的是在意識型態方面，當局對於主流政治文化的塑造。在中國，這方面具有意義的兩項發展是「中國新民族主義」的建構以及營造「中國式治理」的正當性。以下的第一節內容將優先闡釋與實際政策相關的特徵內涵。

壹、從經濟改革經驗到政治改革

許多的政治觀察家認為，目前中國當局對於改革的整體態度是「經濟開放、政治緊抓」，不過，實際上對於政治改革的漸進性主張，其基礎是對於經濟改革經驗的總結。

與其他後共產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失敗相比，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其特殊性。⁵¹ 總體而言，中國經濟改革模式的特徵包括，把餅做大、增量改革、試驗推廣、以及非激進改革等（林毅夫、蔡昉、李周，2000）。這些特色使中國的經濟改革經驗為國家發展模式帶來一些新的啟示，包括了漸進式的改革是可行的（Naughton，1995），這種改革方式最接近「帕累托改進」或「卡爾多改進」，在此情況下沒有什麼人或是群體會在改革過程受到太大的傷害，而且其本身具有內在邏輯的有序性與不可逆性。最重要的是，有利於保持改革過程中速度和穩定兩種要求之間的

⁵¹ 根據吳玉山教授的分析，中國經濟改革與後共產國家相比，包括改革速度、指導原則、財產權形式、以及國家角色等方面都不相同。在速度方面採取漸進主義，透過漸進式政策慢慢尋找達到目標的可能性，避免社會動盪，並降低社會成本；指導原則特別強調經驗主義與務實主義，以「摸著石頭過河」為其要點；在財產權上，中國是採用市場化社會主義，市場化但不私有化，產權保持某種模糊性；最後，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國家機器角色強，采干涉主義，經濟官僚具有較自由的權力決定經濟政策（Wu, 2002/2003）。

平衡。

相對於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的政治改革十分滯後。可是，有學者指出，從經濟改革的經濟中抽繹出的演化經濟學，可以類比在中國政治變遷的過程。以演化政治學形容中國轉型政治的特徵，在理論上可歸納為五項特點，包括中國模式演化的試錯性質、與傳統的非斷裂性、與經濟轉型一樣的最小打亂原則、充分重視改革的約束條件。總之，皆呈現出演化與漸進的性質。(俞可平，2006) 上述經濟上的漸進式改革模式被擴張於政治改革上，這個觀點在某種程度對於中國的政治改革設下一道門檻，成為中國官方與學界追求的一個方向。

另一項影響中國政治改革內容與速度的，是經常在官方文書中出現的對西方勢力的疑慮。雖然前總理溫家寶過去幾年曾經在幾次公開場合呼籲，中國下一步應該進行政治改革或民主改革，但最近的官方定調則是依然傾向保守與穩定。例如，在政治改革部分，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的報告中所說，「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展現中共中央控制政治改革的決心。另外，對於民主改革，前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公開談話可以充分表現中共官方的態度，2009 年初，他呼籲中國的立法者們，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並記住中國和西方的「本質區別」，中國的體制「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和兩院制」。整體來看，中國當局目前的主要戰略就是，對內維持一個可控制的有序政改路線，對外則是抵制國際上流行的民主演變理論。

貳、加大社會管制的力度

經濟改革成功除了帶來經濟積累外，也帶了新的社會矛盾。21 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的社會發展進入了另一個不同的階段。雖然政治相對穩定、經濟持續看漲，可是群體性事件正猛烈地在中國各處發生。有學者指出，「中國社會出現經濟快速成長與群體性事件頻發相交織的景象」(徐行、王海峰，2010)。更為具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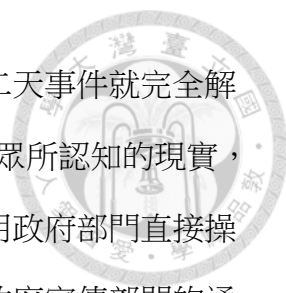


表現則是，從 2009 年到 2010 年之間正是民間「維權」與政府「維穩」之間相互消長的重要時期。為了緊抓政治改革，對於社會的有效管制也是不得不同時強調的政策工作。

中國共產黨在防止社會動亂上，花費的經費與人力十分龐大。有新聞報導「維穩辦」一年的工作預算甚至已經超過軍事經費。另根據學者描述，現存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系統」至少包括五個大方面，第一部分是國家機器系統，所有的政府機構都被賦予維持穩定的任務；第二部分為黨機器，包括共產黨和共青團，仍然有效地吸納了中國多數的社會菁英；第三部分是單位，無論黨政機構、學校、工廠等，只要是中國的一個正式單位，就被賦予社會控制的任務；第四部分是居住點，以居民的居住點為控制單位；第五部分則是高科技的監控，現代化的監控系統，包括電子監控鏡頭、互聯網和手機的監控組織等。（丁學良，2011：80-87）

除了監控網的完備外，在實際的行政管理方式，也同樣維持大力度，用相對嚴密完整的行政規定進行管理。前節提到對民間組織的管轄方式，可以表現這樣的內容，政府為了鞏固政權，會設下種種限制，以防止社會力量的出現。同樣的作法通常複製到每一個需要被管理的領域。

另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網路控管方面的技術進步日新月異，更顯示其威權政府的靈活程度。網路上的言論控制時有所聞，依據加拿大智庫「資訊戰爭監測者」（Information Warfare Monitor, IWM）的報告，他們發現中國為了進行對西藏的網路監視，由分佈在一百零三個國家相互連接的一千二百九十五台電腦網路構成監視網，在全球範圍內壓制西藏活動份子（哈爾玻，2011：38）。另根據近來十分流行的網路小說「二號首長」所描述的一個場景，當故事主人翁遇上網路上的政治不利事件，他找到了一個在北京政府部門負責網路工作的朋友，那個政府部門對網路媒體有直接控制權。簡單地做了兩件事，首先是設一個關鍵詞屏蔽，讓任何搜尋引擎搜不到，其次是跟各大門戶網站打招呼，撤掉置頂文章。



結果是兩個小時之內，網上基本就找不到相關事件的文章，第二天事件就完全解決了（黃曉陽，2011）。這不僅是一個虛構的情節，而是大多數民眾所認知的現實，根據筆者從大陸朋友圈的理解，網管檢查與屏蔽工作現下已不用政府部門直接操作，中國的各重要網站都有自己的網管系統，而且除了會配合政府宣傳部門的通知進行管制外，也會進行自我審查以符合政府規定。

參、塑造主流意識型態

除了對於政治與社會的政策措施外，正當性的來源尚需意識型態的支持，需要有一個做為主流政治文化的正當性論述。在中國，這三十年來出現兩支重要的發展，首先是中國新民族主義，其次是中國式治理的優越性。

中國模式的具體型式是市場經濟與威權政治的混合體。統治當局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多元社會，對於一元統治與多元社會的不協調之處，加大政治控制與監控可能的危機是第一層重要的政策安排。但此措施乃其一面，要維持統治的正當性，提供有效的意識型態支持是另一面的重要必須措施。過去 30 年的發展，初期由於中國崛起與否尚未明朗，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同時，適時運作民族主義，企圖將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意識形態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到了 21 世紀的第一個 10 年，由於中國經濟崛起的現實已經舉世皆明，論述也開始轉向更有信心的中國模式，一組不同於西方，可能在中國運作的更合理的中國式治理也就成為新的正當性論述內容。

接下來的兩個部分，我們將根據 2011 年中國民眾的調查結果，就其民族主義與對於中國式治理論述的贊同程度進行統計分析，焦點依然緊扣本文所關心的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的影響，以理解這種主流意識型態塑造對於一般民眾的影響與其限度。

第二節 民族主義的世代差異



Pye (1968) 對於中國文化的經典研究就曾指出，「中國政治文化的主要基礎在於他們的民族自信心」。同時，他也指出中國現代化過程與其他地區第一個不同點就是，中國人「沒有經歷過大多數國家曾經面臨過的認同危機」。中國民眾很少為了自己是什麼人或什麼國家而徬徨，卻經常將近代的苦難與國家恥辱歸究於外來侵略，民族主義在中國是十分有用的訴求。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有其源流，可是 90 年代的新民族主義與先前的民族主義並不完全相同，新的民族主義是立足在中共改革開放政策與經濟成長的基礎上，並進一步處於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對面與世界強權互動的結果。

壹、中國新民族主義的崛起

「新民族主義」的比較對象是民國初年「五四運動」時期興起的民族主義。⁵² 在內政問題上，和「五四運動」時期那一波民族主義相比，「新民族主義」顯現出保守主義性質。「五四運動」時期的民族主義是對現存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激進批判，而「新民族主義」則是對現存體制的認同，並且這種認同在許多民眾心中已經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其次，在國際政治上，「新民族主義」的主要目的在於改變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盲目排外，具有相當的進取性，以建立有利於中國發展的新秩序。

這種「新民族主義」的形成，必須向前追溯到鄧小平主政的改革開放時期。承接毛澤東時期，到鄧小平執政的年代，雖然經濟政策決定了走「具有中國特色

⁵² 1999 年 11 月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召開了一次討論中國大陸與臺灣兩岸民族主義的學術會議，出席會議的學者認為和五四運動時期的民族主義相比，新一波的民族主義面臨全然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應視為與之前的近代民族主義有根本性的不同，該次會議後，一般學界比把 90 年代以後崛起的民族主義稱為「新民族主義」。

的社會主義」路線，唯其具體內容為資本市場化，但在政治方面越仍比較保守，甚至進行過三次的「反自由化運動」，最後還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此時期整個中國的民族主義幾乎都是由上層統治階層，也就是由中共政府、黨領導人在推動的，民眾則是處在一種被動的地位，只是隨著政府的口號與政策起舞，甚至被政府所創造的「新文化」或「新傳統」所制約。接受政府為改革或是為民族主義運動的動員對象。

後鄧時代，江澤民接任國家主席，由於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在其掌權的幾年內，中國經濟發展更加快速，但也因此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觸更多，也使得江澤民與中共更需要民族主義的保護，以降低西方世界所帶來的衝擊。很有趣的是，這個時期中的民族主義，雖然仍舊多以政府發動為主，但人民已不再只是消極的配合，而是積極的參與；更有甚者，晚近的情況甚至顛倒過來，民族主義變成一種民間潮流，上層政府反而只是一個配合的角色。江澤民透過「三個代表」論述的發表，使得這種民族主義的策略更加的成功。江澤民的主要做法是將中國及中國共產黨完全整合起來，順利的將中國幾乎等同於中共，使得中共的作為都成為中國的作為，中共也代表了中國，民眾服膺中共的統治，也就是順應中國與服膺中國，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一份子。

胡錦濤上台之後，中國官方的民族主義又發展出新的情勢，胡錦濤陸續提出「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乃至於「和諧世界」等概念，進一步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的概念舊瓶裝新酒，且發送至國際社會之中，營造出一種和諧的意境，降低「中國威脅論」所帶來的影響。此外，在江澤民統治至胡錦濤上台這段期間內，中共內部發展出一套愛國主義，一套有效對抗西方影響的辦法。這樣一套「愛國主義」的論述建構，是一種長期以來中共為防止西方「和平演變」的抵禦模式，特別是歷經了八零年代末期蘇聯與東歐的政局巨變，中共更加強防守的力道，以維持自身的主體性。當今的情況是中國民族主義重新崛起，進入到 21 世紀以來，中國的「新民族主義」達到了一個高潮。而美國和日本成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的主訴國家。⁵³

18 大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的說法，中國「新民族主義」進入到新一個階段，目前看來當局正要將其提昇為國家層次的思想運動。2012 年 11 月 29 日，習近平率領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行程結束時習近平提出了「中國夢」的說法，直指「中國夢」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時蔚為風潮，成為各界重點學習的內容。接著 3 月 17 日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習近平又做了一次闡述，其核心大致包括三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主義、以及這是屬於中國人民團結、民族的夢（托起中國夢編寫組，2013）。顯然，這是再一次由當局所發起的民族主義路線，並希望藉此取得社會更廣泛的支持。有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強固性是當前政權的正當性來源之一。這種訴求是否奏效，我們可以藉由調查資料來加以驗證。

貳、民族主義在中國

關於民族主義，我們測量的是民眾對於「身為一個中國人是否感到驕傲」（正向測量）以及「有機會是否願意離開中國到另一個國家去生活」（反向測量），兩者平均的綜合性指標。一般對於民族主義首先可以指涉對於某一群體的情感，這是前一個題目所要測量的。其次，也可以指涉對於某一土地或家鄉的情感，我們用後一個題目來測量。

民族主義涉及許多層次，至少可以區分成心理性的、社會性的、以及政治性的等不同涵義，⁵⁴ 含有理性的成分也有許多感情與激情的成分，十分複雜。我們

⁵³ 「銀河號事件」、「中國大使館被炸事件」、「中美撞機事件」、「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教科書事件」等等都刺激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此外「保釣運動」、「西北大學事件」、「亞洲杯球迷事件」、「反對京滬高速鐵路採用日本新幹線技術的網路簽名活動」、「反日遊行」等都顯示了當前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鄭文翔，2007）

⁵⁴ 在心理性涵義方面，是作為強烈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即對本民族歷史和文化表現出來的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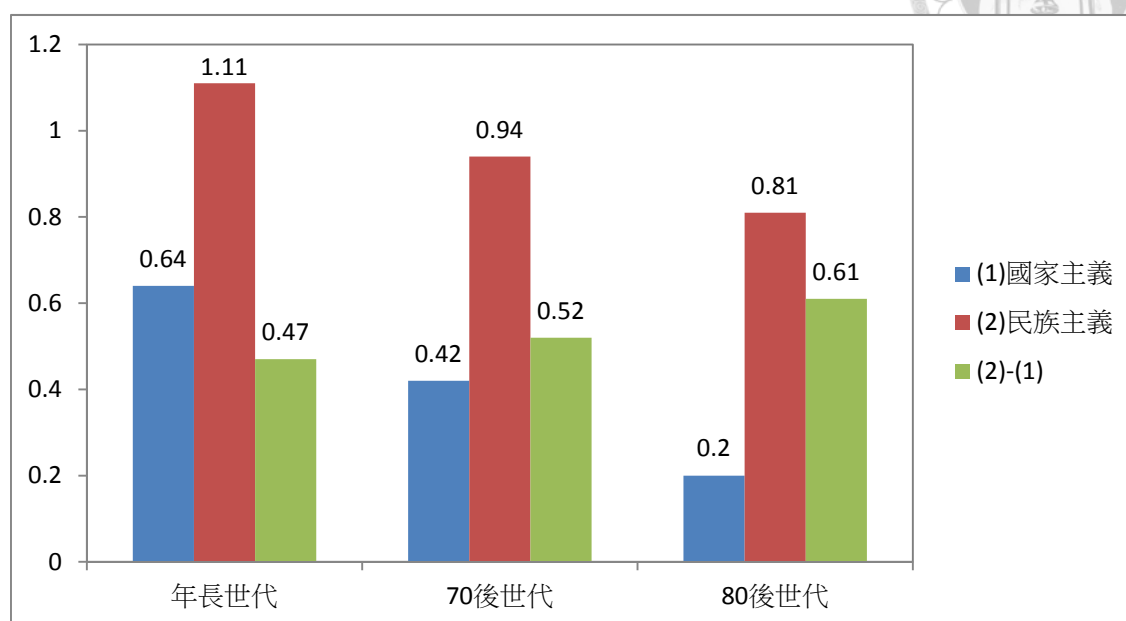
用兩個較為單純，不涉價值判斷的題目來對測量民眾對於中國人與土地的情感連結，基本上希望消除激情與不理性的反應，測量到相對簡約的情感判斷。事實上，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理應更為複雜。有學者研究中國的民族主義指出，中國民眾事實上有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兩種情緒，在其定義中，民族主義意指會將自己對於國家的情感建立在與他國的對比上，愛國主義則否，而是一種純粹的與祖國的情感連結（此與本文的民族主義測量不同，本文的民族主義更傾向於後者）。而這會影響到民眾對於外交政策的看法，前者更具爭霸的傾向性，後者則是較有合作精神。⁵⁵ 可見，民族主義不是單一內容的事物。

我們可以比較在本文稍早曾經提起的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差異。前面提及的國家主義題組，其特徵是緊扣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現代國家的概念出現在十五和十六世紀歐洲，意指不論是在精神層次或是在世俗層面上，以中央集權的方式成功地支配所有其他制度與團體的組織。其形成過程事實上伴隨著混同的過程，將原先認同次級團體的人民，整合到同一個國家的認同，也就是建立「民族國家」。現代的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也大約是這個時候由中央政府混同到一般民眾理念中的。我們可以說，國家觀念是一個後起的或是建構性的產物。中國現代國家建立的歷程與其他國家不太一樣，多數國家都經歷過認同危機，中國卻幾乎沒有這個過程。這導因於中國一直有一個正統的觀念，不論是那一個朝代，包括分裂時期，都會以中原正統政權自居，同時宣稱自己是華夏歷史的一部分。一般民眾也都認同自己是炎黃子孫，共同承擔著輝煌地或是衰敗的朝代，中國人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概念甚至早於「國家」。畢竟，「國家」的概念與運作形式是

歸屬等強烈情感和持久意識；二是社會性的涵義，作為社會的民族主義，即在特定歷史時期出于維護本民族利益的需要而表現出來的一種強烈的政治訴求和社會潮流，會隨著不同時期針對不同的議題與對象做集結；三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更強調其政治性功能，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在國際社會與他國互動，即為謀求民族權益而在處理民族問題和對外關係上形成的一套行動準則和價值觀念，它往往成為一個民族對待民族問題和國際問題的重要戰略和策略思想。這三個面向的作用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皆扮演不同的角色，民族主義一向被看成是維護民族國家存在和發展的精神黏合劑和社會力量。

⁵⁵ 原論文將刊於 *The China Quarterly*，題目為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這裡是轉引自陶郁 (2013)。

在 18 世紀西風東漸才逐漸建立起來的。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圖 4-1 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世代差異比較

圖 4-1 可以初步展現中國民眾對於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世代差異，以及兩者之間的差異。圖中包括了三組不同世代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平均分數（分數間距為 2~-2），每一世代組的第一根直方柱為國家主義，第二根直方柱為民族主義，第三根直方柱則是兩者間的差異。首先，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普遍高於國家主義。這反應了中國民眾普遍感到身為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對於這塊土地也有很高的情感；相對地，政府力量所塑造的國家主義（包括集體性、忠誠、國家優先以及權威性）就比較低一些。其次，不論是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都隨著世代推新而下降中。民族主義的平均數從年長世代的 1.11 下降到 70 後世代的 0.94，再下降到 80 後世代的 0.81；國家主義部分，則是從年長世代的 0.64 下降到 70 後世代的 0.42，再下降到 80 後世代的 0.20。最後，國家主義的這種下滑趨勢較民族主義更為明顯，這可以從第三根直方柱的變化看出來，年長世代兩者的差距為 0.47，

到了 70 後世代差距增加到 0.52，80 後世代進一步擴大到 0.61。顯然，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較後來由國家力量來形塑的國家主義更為抗跌，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特殊性其來有自。



參、民族主義傾向的世代差異

可是，在圖 4-1 中仍然可以注意到，新世代具有較低的民族主義分數。我們想要進一步知道這種世代差異是否具有顯著意義，表 4-1 是以世代與價值觀分類為因子，對民族主義進行變異數分析的結果。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目的在於檢驗不同分組間的平均數是否具有顯著差異。除此之外，我們還進行了多重比較檢定 (multiple comparison test，或稱 Post Hoc 檢定)，以確定差異的分組來源。這裡所使用的檢定法是最常見的 LSD (Least Studentized Difference) (林震岩，2007)。

首先，我們把焦點放在全體受訪者的民族主義傾向，表 4-1 的第一欄是全體受訪者在三個不同世代的民族主義分數平均數比較，可以發現民族主義傾向沿著世代推新而逐步下滑，經過變異數分析，F 值為 42.635，顯著性小於 .001，世代間具有顯著差異，進一步進行兩兩比較，結果發現三個世代間彼此的差異都具有顯著性。整體而言，中國民眾在民族主義這個指標的傾向上，是明顯隨著世代而減弱的。其次，我們就每一個價值觀群體的世代差異來檢視民族主義的變化，結果呈現在表 4-1 的最後一列，可以發現，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的群體，民族主義都具有世代差異，而且差異的主要內容是出現在 80 後世代與年長世代之間。低價值觀者雖然整體 F 值沒有通過檢定，但在多重比較中也呈現了 80 後世代與年長世代的差異。再次，我們也關注價值觀群體之間民族主義傾向是否具有差異，表 4-1 的最後一欄是針對每個世代內部，不同價值觀群體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除了 F 值檢定與顯著性訊號，也進行了多重比較。以價值觀群體為因子的全體變異數分

析中 (表 4-1 的第一列) , F 值為 30.117, 顯著性小於.001, 也呈現顯著差異。兩兩比較的結果, 可以發現民主價值觀者與其他三組價值觀者具有差異, 而低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者、混合價值者具有差異, 後兩者彼此間則差異不大。

表 4-1 民族主義指標的世代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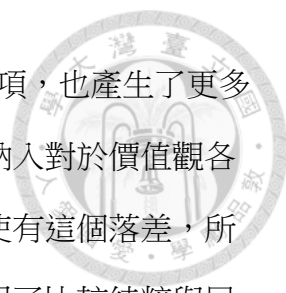
	全體 ^a	民主價值	混合價值	儒家價值	低價值觀	均值	F 值/Sig.
全體 平均值		.75	1.11	1.12	.92	.99	30.117***
價值觀者 標準差		.98	.82	.72	.77	.84	1-2 1-3 1-4
個數		625	374	943	383	2325	2-4 3-4
年長世代 平均值	1.11	.90	1.16	1.18	1.03	1.10	7.381***
標準差	.77	.90	.83	.69	.74	.77	1-2 1-3 3-4
個數	1829	197	198	552	163	1109	
70 後世代 平均值	.94	.73	1.12	1.08	.86	.95	6.426***
標準差	.86	1.04	.79	.75	.73	.87	1-2 1-3 2-4
個數	721	158	90	194	75	517	
80 後世代 平均值	.81	.64	.98	1.01	.85	.83	7.799***
標準差	.89	.98	.82	.75	.81	.88	1-2 1-3 1-4
個數	896	270	86	197	145	699	
F 值/Sig.	42.635***	4.017*	1.426	4.753**	2.547		
多重比較: LSD	3-2-1	3-1		3-1	3-1		

^a 全體受訪者包括無法判別其價值觀者, 總數為 3446 筆。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顯著性訊號: *** p< .001; ** p< .01; * p< .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 張佑宗, 2011a。

基本上來說, 民主價值觀群體最不同於其他群體, 具有最低的民族主義傾向; 儒家價值觀與混合價值觀相當接近, 具有更高的民族主義傾向; 低價值觀者則介於兩者之間。若從世代分類的角度, 年長世代與 70 後世代中的民主價值觀群體與儒家價值觀、混合價值觀者差異明顯, 與低價值觀者差異不顯著, 到了 80 後世代, 民主價值觀者的民族主義則是明顯比其他價值觀群體更低, 其他三組間的差異則不顯著。另外一件值得注意說明的資料情況, 當我們針對民族主義的全體受訪者進行分析時, 有效個案為 3446 筆, 而只針對價值觀群體的整體分析時, 有效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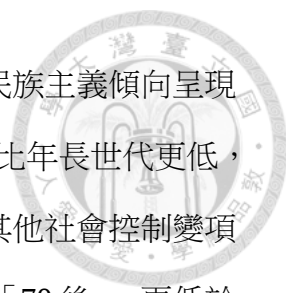


僅有 2325 筆。這是因為在進行價值觀分類時，使用了更多的變項，也產生了更多的無反應者，為了清楚掌握受訪者真實的價值觀內容，我們只納入對於價值觀各項元素有明確反應者，結果出現了有效個案的落差。不過，即使有這個落差，所計算出來的各世代民族主義平均值卻相當接近，這與本題組使用了比較純粹與民族及土地的情感連結有關，不會受到其他的價值判斷影響，這結果也可以說明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基本還是比較均勻的。

綜合來說，根據變異數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新世代的民族主義傾向整體正在下降中，不論他們是屬於民主價值觀或是儒家價值觀的認同者。而這個傾向當引入價值觀群體概念時，可以進一步發現，民主價值觀者明顯地不同於其他價值觀，不僅在每一世代內都是最低的，也都持續地的與其他組別具有差異性。也就是說，越是新的世代，同時具有民主價值觀的民眾，其中國民族主義傾向將更低，與其他價值觀持有者差異顯著。

肆、價值觀變遷與中國民族主義者

本文提出的分析角度是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希望藉由這個角度來看待中國民族主義的變遷與其影響。我們將使用迴歸模型來處理主要變項間的因果關係，並藉以理解影響中國民族主義傾向較高或較低的背景因素。表 4-2 是以受訪者的民族主義傾向為依變項的迴歸模型結果，共分為四組模型，第 1 欄只看世代差異對於民族主義的影響，我們使用的是以年長世代為對照組的虛擬變項；第 2 欄模型則是加入社會背景變項的控制變項，我們想要檢視世代差異在控制基本變項後的持續性影響；第 3 欄是在控制變項之外，同時加入世代差異、價值觀變項以及其他相關態度變項，這裡的價值觀是使用以主成分法形成的民主價值分數以儒家價值分數；第 4 欄的模型則是將價值觀變項置換為以儒家價值觀群體為對照組的虛擬變項。



首先，如同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單純的世代差異同樣會與民族主義傾向呈現反向的因果相關性，「80 後」世代與「70 後」世代的民族主義皆比年長世代更低，而「80 後」更低於「70 後」，皆達到顯著性效果。當我們放入其他社會控制變項時，世代差異的顯著性仍然持續，方向性也是「80 後」更低於「70 後」，再低於年長世代。若我們同時投入世代與價值觀變項，再加上所有的控制變項，如第 3 欄的結果，可以發現價值觀中的儒家價值分數具有正向的顯著性，顯示認同儒家價值更高的民眾，其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分也越高，民主價值則影響不顯著。當我們將價值觀變項由分數置換為價值觀分類，可以發現民主價值者相對於儒家價值者，其民族主義更低，具有相當顯著性。低價值觀者也具有顯著性，唯其系數絕對值較民主價值者低。可見中國民族主義雖然在控制其他變項後，世代差異變的不顯著，但價值觀的影響仍然保持作用，其內容指向與儒家價值的正向關係，以及相較持有儒家價值觀群體，民主價值觀群體具有更低的民族主義情懷。

此外，在投入的變項方面，可以讓我們對於中國民族主義者來源進行評估。基本變項大多沒有差異，僅在性別與東部地區呈現顯著性，其中女性較男性高，居住在東部的民眾具有更高的民族主義。經濟評估較高的民眾也會具有更高的民族主義，顯而易見，感到經濟情況好的民眾對於國家更容易有正向的情感。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應該是訊息管道，我們可以發現越常使用網路者以及接觸小道消息者，其民族主義將會降低，而經常閱讀政治訊息的民眾，其民族主義則會提高。可以理解，前者多半是來自更為自由、非官方完全控管的訊息，後者則經常是比較公開的、屬於官方所宣揚的政治正確，自然會對民眾帶來不同的影響。在中國，更為正式的社會傳播帶來更高的民族主義情懷，非正式的傳播則傾向削弱它。最後，政治效能感越低的民眾傾向更高的民族主義，人際關係內容則影響不大。

表 4-2 受訪者的民族主義傾向迴歸模型分析

依變項:	1		2		3		4	
民族主義指標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常量)	1.107 (.019)	***	1.220 (.042)	***	-.218 (.168)		-.167 (.171)	
世代(年長者)								
70 後世代	-.169 (.036)	***	-.158 (.038)	***	-.043 (.050)		-.047 (.050)	
80 後世代	-.301 (.033)	***	-.260 (.039)	***	.000 (.053)		-.008 (.054)	
民主價值分數					-.039 (.022)			
儒家價值分數					.115 (.023)	***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260 (.052)	***
低價值觀							-.116 (.058)	*
混合價值							-.020 (.057)	
性別(女性)								
男性			-.100 (.030)	**	-.132 (.040)	**	-.132 (.040)	**
教育程度			-.029 (.008)	***	.013 (.012)		.008 (.012)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058 (.031)		-.068 (.041)		-.066 (.041)	
地區別(中部)								
東部			.035 (.035)		.240 (.045)	***	.236 (.046)	***
西部			-.013 (.037)		.026 (.051)		.038 (.052)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150 (.043)	**	.078 (.055)		.074 (.055)	
曾申請			.028 (.047)		-.052 (.057)		-.039 (.057)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009 (.032)		.029 (.042)		.027 (.043)	
上層			.100 (.047)	*	.055 (.059)		.065 (.059)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39 (.012)	**	-.043 (.012)	***
閱讀政治訊息					.066 (.015)	***	.065 (.015)	***
管道數量					-.014 (.016)		-.016 (.016)	
小道消息					-.119 (.023)	***	-.116 (.023)	***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142 (.025)	***	.154 (.025)	***
家庭未來經濟					.097 (.027)	***	.097 (.028)	***
政治態度								
政治興趣					-.017 (.017)		-.011 (.017)	
政治效能感					-.062 (.030)	*	-.074 (.030)	*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049 (.027)		.048 (.027)	
親近人際信任					.005 (.005)		.006 (.005)	
關係緊密度					.013 (.008)		.014 (.008)	
模型訊息								
R ²	.024		.040		.167		.160	
Adj. R ²	.024		.037		.155		.147	
F/Sig.	42.649***		12.278***		14.263***		12.967***	
N	3446		3217		1736		1734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第三節 中國式治理的民眾支持度



另一項中國當局所強調的意識型態，來自於中國具有與眾不同的治理方式。由於中國人口與地域過於龐大的規模，使其存在著無比的獨特性與無複雜性，並且由於其特殊的發展經驗與發展歷程，讓民主化在中國的發展面臨到一定的阻礙。同時，中國的文化背景與長期的政治制度使得政治社會具有一定的邏輯，所以照搬西方制度與西方理論在中國將不會得到成功。

壹、中國式治理 vs. 西方民主制度

西方與中國本身對於「中國模式」的討論方興未艾，而且立場紛歧。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短短數日期間的報導就有完全不同的論述，李澤厚的專訪認為談模式還為時過早，但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CCG)主任王輝耀則撰文支持。中國官方的立場從有所保留到肯定「中國模式」的存在。最重要的肯定訊號來自於，中央編譯出版社在去年出版了由北京大學教授潘維主編的《中國模式》一書，有論者以為，這表示了一個「標誌著具有獨立性、敢於向西方爭取『話語權』的『中國學派』初步形成」（香港中評社，2010）。

西方的標準民主不一定適用於中國，由於中國獨特的傳統與環境，許多學者認為追求一種開明有效率的新威權體制或許是更合適中國的選項。蕭功秦 (2008) 認為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特徵是，從 1980 年代的「新權威主義」發展到 1990 年代形成了進步的保守主義，其主要內涵就是「在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重新肯定傳統價值系統以及權威的意義與作用的基礎上，緩慢漸進的推進現代化變革，具有民主與現代化的導向性，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不同。」⁵⁶ 並以此過渡性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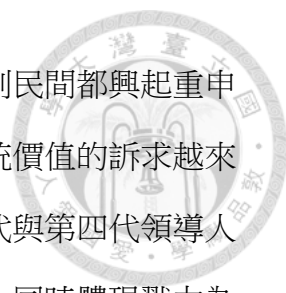
⁵⁶ 蕭功秦使用「後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型的新權威主義」(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w



制為基礎，穩健的向民主化與現代化的中國發展。而潘維 (2010) 更是借鑑於新加坡的成功治理經驗，發展了未來中國政治改革方向的幾項具體建議。他認為在實踐方式上，應包括「中立的文官體系」、「司法獨立」、「多元協商制度」、「獨立於司法之外的反貪腐機制」、「財政上的獨立審查」、以及「言論、抗議、集會、結社自由等基本權利」等。具體的做法則是將法治制度加諸于現今的政治運作體制中，通過法治將共產黨轉換為名義上的領導，實行動員輿論影響法治、宣佈發展重心由經濟轉移到法治、初步實現黨政分離、在司法獨立與反貪腐機制上建立分權機制、以及建立人民四項基本權利等方式來逐步推動。潘維還強調了此方案現實上的優點，包括可有效治理貪腐、保持政治與社會穩定、不會威脅一黨統治、現代化的政體、中國人民接受度高、可以學習新加坡與香港等華人社會的治理典範等等。

除了學者對於中國式治理所提出的說法外，中國官方在塑造中國式治理的內涵也不遺餘力。第一組概念來自共產中國的遺緒，早期的說法是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 12 大開幕詞裡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延伸到與民主相關的概念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內容事實上包羅很廣。核心原則應該是來自蘇聯經驗的「民主集中制」，以及毛澤東所提倡的「為人民服務」；實踐上則可以包括人民民主、協商民主、選舉民主以及黨內民主等。第二個被強調的中國式治理重要元素是務實與經驗主義，這主要是沿襲經濟的成功發展經驗而來，但更為重要的是連結了重視穩定的社會共識。在精神與意識型態層面，北京當局盡力塑造一種集體的共識——對於穩定的高度要求——這個看法也得到社會與大部分民間的認同。除了極少數的個人或團體外，普遍社會大眾所具有的認知與北京如出一轍。官方大聲疾呼建立「和諧社會」，人民則普遍認為：穩定壓倒一切。所以，所有改變都必須建立在務實的基礎上，還有必須重視保存中國過去發展的成果。第三個概

authoritarian regime)一詞定義中國的過渡性體制。說明在變革的過程中，舊的遊戲規則瓦解，新的遊戲規則一時無法建立，過渡時期的脫序狀態，會使改革陷入危機，中國在此時期需要一種新的過渡性遊戲規則，一種新的開放性的權威主義，以實現中國的自由與民主為目的。(蕭功秦，2008)



念是比較晚近才被提出，但近來益發受到重視，主要是從官方到民間都興起重申傳統文化價值的作法。一方面，當黨的意識型態褪色，對於傳統價值的訴求越來越被中共做為重新強化其正當性來源的主要方向。中國的第三代與第四代領導人都要求高層幹部的良好素質應包括能幹、富有同情心與親和力，同時體現戮力為公、廉潔無私的美德，這是傳統儒家對於政治菁英的道德要求 (Chu, 2013)。另外一方面，中國也在世界上推廣其傳統文化以重塑影響力。最受注目的即是越來越在世界上普及的孔子學院，原先是為了推廣漢語而成立，進一步則是向海外推銷中華文化，唯近年來因為被指為傳播特定意識型態而引發爭議。這一波儒學再興的活動巧妙的與中國當代論述進行結合，展現中國當局想要形塑主流政治文化的企圖心。

貳、中國式治理支持的基本情況

基於中國式治理方式與由西方主導、世界上的主流民主政治運作型態有根本上的差異，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加上了一個新題組，想要理解東亞民眾對於心目中理想政府的看法。訪問中給予受訪者兩個競爭性的選項，一個指涉西方民主的主要制度，另一個則是非民主政府的其他制度。在不提示任何價值判斷的基礎，給予受訪者自己選擇的空間。結果如表 4-3，共有六組相互對立的制度內容，依序關聯了「民意的角色」、「人民主權」、「政府的照顧責任」、「政治甄補方式」、「媒體自由或管制」以及「利益代表方式」等。

在表 4-3 中，所有的 2 選項代表中國式治理的元素，1 選項則是更接近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表 4-3 中主要的訊息包括了世代差異與針對各題的百分比分析，有兩項統計訊息提供參考，包括卡方值檢定以及調整後殘差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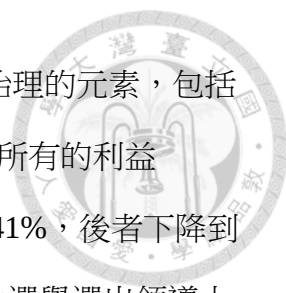
表 4-3 「中國式治理 vs. 西方民主制度」百分比分佈世代差異

		全體	年長世代	70後	80後	卡方值	顯著性
1 政府決策應該完全遵循人民的意見	%	52%	52%	52%	51%	.436	.804
	a.r.		.6	-.1	-.6		
2 政府認為怎麼做對人民最有利就應該怎麼做	%	48%	48%	48%	49%		
	a.r.		-.6	.1	.6		
	N	3091	1607	671	813		
1 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應該由人民告訴政府要做什麼	%	53%	48%	55%	59%	27.147	.000
	a.r.		-5.0	1.5	4.3		
2 政府就像父母一樣，應該替我們做決定	%	47%	52%	45%	41%		
	a.r.		5.0	-1.5	-4.3		
	N	2989	1560	645	784		
1 媒體應該有權自由地發佈新聞和表達意見，不受政府的控制	%	47%	45%	49%	48%	3.690	.158
	a.r.		-1.8	1.4	.7		
2 政府應該有權阻止媒體發佈可能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新聞與意見	%	53%	55%	51%	52%		
	a.r.		1.8	-1.4	-.7		
	N	2891	1444	644	803		
1 每個人生活得好壞，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主要責任	%	68%	67%	70%	67%	3.077	.215
	a.r.		-1.1	1.8	-.4		
2 人民生活得好壞，政府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	32%	33%	30%	33%		
	a.r.		1.1	-1.8	.4		
	N	3129	1639	674	816		
1 政府領導人應該由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選出	%	73%	73%	77%	70%	8.582	.014
	a.r.		-.4	2.6	-2.0		
2 政府領導人應該根據他們的品格和能力任命，不一定要經過選舉	%	27%	27%	23%	30%		
	a.r.		.4	-2.6	2.0		
	N	2997	1535	658	804		
1 多個政黨代表各種利益相互競爭	%	25%	21%	27%	32%	36.517	.000
	a.r.		-5.5	.9	5.4		
2 由一個政黨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	%	75%	79%	73%	68%		
	a.r.		5.5	-.9	-5.4		
	N	2910	1506	629	775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陰影部分為非西方式民主的選項。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卡方值檢定方面，可以發現「人民主權」、「政治甄補方式」、以及「利益代表方式」三個指標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他三項則否。再進一步依據調整後殘差進行各世代間細格差異的判定，臨界值為 1.96。對於全體的比例而言，具有顯著性差異的細格，以粗體數字表示。落在陰影區塊中的粗體字，調整後殘差為正值時，表示更傾向中國式治理。相反調整後殘差為負值，則為傾向民主制度。針對「人民主權」與「利益代表方式」兩項指標，可以發現年長世代與 80 後世代呈現相反



的百分比分佈趨勢，年長世代擁有較多的百分比更支持中國式治理的元素，包括由家父長政府來替人民做決定 (52%)，以及由一個政黨來整合所有的利益 (79%)，而新世代則是支持百分比下降幅度頗大，前者下降成 41%，後者下降到 68%。不過，特別的是，雖然整體來說中國民眾已經接受競爭性選舉選出領導人 (73%)，超過由品格與能力來任命 (27%)，但新世代在這個指標的回答比例卻是最高，最低的支持出現在 70 後世代。中國式治理的概念大約是目前正式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內容，在政治正確的影響下可能會左右民眾的看法，接下來我們將藉由變異數分析來判斷中國式治理的贊同在世代以及價值觀群體間是否有所差異。

參、贊同中國式治理的世代差異

表 4-3 是以世代與價值觀分類為因子，對民眾贊同中國式治理的程度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結果。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的民眾在認同中國式治理的指標方面幾乎沒有世代差異，不論他們屬於那一個價值觀的群體。只有混合價值觀的群體發生了差異，在這個群體中，新世代對於 70 後世代與年長世代，認同中國式治理的程度都在更高的水平。中國式治理的綜合指標並沒有在世代間發生差異，會有兩個可能性。其一為中國式治理的宣傳只對混合價值觀群體中的新世代有所助益，只有這個群體表現了較其他群體更高的認同，而其他群體則是對此議題無感。另一個說法則可能是，中國當局大力度的宣傳下，使得世代間的可能差異被縮小了，整個國家在這個議題被均一化，無法顯出差異性。

當我們從本文的第二個觀點——價值觀差異——進行變異數分析，其差異性就十分顯著。在全體價值觀群體中，民主價值觀者在兩兩對比中，對於中國式治理的認同都低於其他三組價值觀者，而這種差異在三個世代中也持續具有顯著性。可見就算是中國當局給予中國式治理極大的宣傳力度，可是民主價值觀擁有者仍然具有與比其他價值觀更低的接受程度，這個群體是在新世代中成長到與儒家價

值觀數量上齊鼓相當的一群人。中國式治理的擴大認同可能有其限度。圖 4-2 是用圖形將上述變動形象化，我們可以看到混合價值觀者受到影響而明顯提昇，其他價值觀者變動不大，而民主價值觀者明顯比其他價值觀者偏低。



表 4-4 認同中國式治理指標的世代差異

	全體 ^a	民主價值	混合價值	儒家價值	低價值觀	均值	F 值/Sig.
全體 平均值		2.22	2.78	2.88	2.86	2.68	28.531***
價值觀者 標準差		1.48	1.43	1.50	1.45	1.50	1-2 1-3 1-4
個數		627	375	944	385	2331	
年長世代 平均值	2.46	2.33	2.65	2.91	2.98	2.77	8.931***
標準差	1.59	1.47	1.44	1.53	1.44	1.51	1-2 1-3 1-4
個數	1838	197	198	552	163	1109	2-3 2-4
70 後世代 平均值	2.40	2.23	2.67	2.87	2.77	2.62	6.188***
標準差	1.51	1.51	1.31	1.43	1.44	1.46	1-2 1-3 1-4
個數	731	159	91	194	77	521	
80 後世代 平均值	2.41	2.13	3.18	2.80	2.78	2.58	15.300***
標準差	1.57	1.48	1.46	1.51	1.47	1.53	1-2 1-3 1-4
個數	903	271	86	198	145	701	2-3 2-4
F 值/Sig.	0.627	1.001	4.660* 3-1 3-2	0.388	0.955		

說明：^a 全體受訪者包括無法判別其價值觀者，總數為 3472 筆。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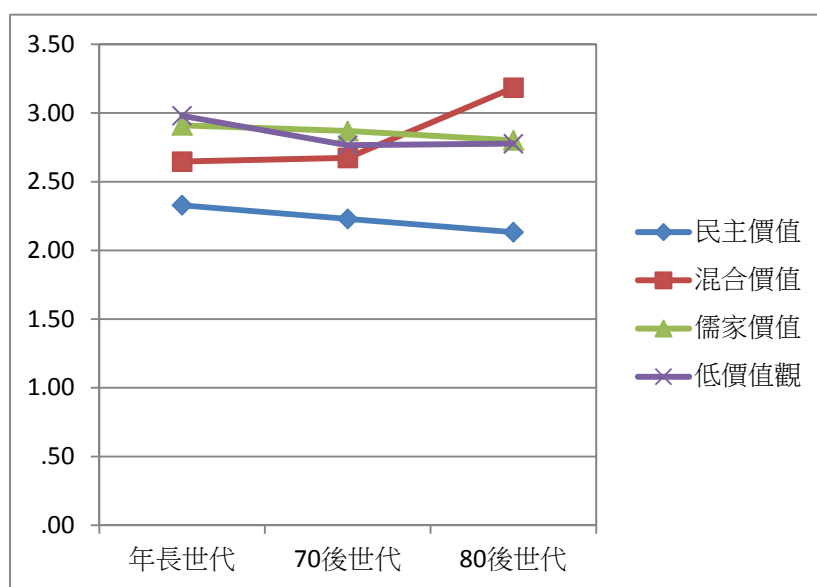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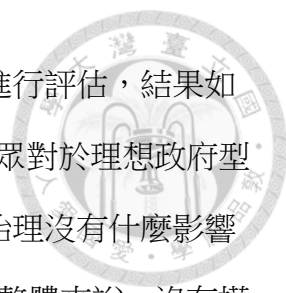


圖 4-2 認同中國式治理的世代差異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我們進一步用迴歸模型來對影響中國式治理認同度的因素進行評估，結果如表 4-4。嚴格來說，本文所納入之分析因素大多無法解釋中國民眾對於理想政府型的回應內容。第 1 欄與第 2 欄顯示世代差異對於認同中國式治理沒有什麼影響力，只有在控制基本變項後，「80 後」世代具有較低的支持。但整體來說，沒有模型顯著性， R^2 以及調整後 R^2 兩者的值都很低，所有變項中只有性別與教育與依變項的關係達到了顯著性，男性以及教育程度高的受訪者將更認同中國式的民主治理。

雖然 R^2 以及調整後 R^2 的值依然不高，但是第 3 欄與第 4 欄的模型中投入價值觀變數時，迴歸模型的 F 值分別為 3.495、3.529，達到了顯著性，表示此模型成立並具有統計意義。其中，我們可以發現價值觀分數對於認同中國式治理的解釋有顯著性，民主價值分數越高，越不認同中國式治理，而儒家價值分析則與中國式治理具有正向關係，也就是說民眾的儒家價值分數越高，越傾向認同中國式治理。如果我們投入的是價值觀群體類型的虛擬變數，只有民主價值觀者這一組與儒家價值觀者相比，對於中國式治理具有更負面的評價。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城鄉差異變數持續地具有顯著性，城市居民相較於農村居民更不認同中國式治理。

利用迴歸模型來解讀，中國式治理的高低與多數影響中國民眾態度差異的變項沒有什麼顯著因果關係，具有持續性影響的基本社會學變項為城市化。除此之外，價值觀的差異對於是否認同中國式治理具有影響力。其中，儒家傳統價值為正向，民主價值則是負向。從價值觀群體的角度來看，民主價值觀者與其他群體不同，對於中國式治理具有更低的認同，而這是新世代中最主要的群體。

表 4-5 受訪者對中國式治理的認可程度迴歸模型分析

依變項：受訪者對中國式治理的認可程度	1		2		3		4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常量)	2.462 (.037)	***	2.384 (.080)	***	2.723 (.317)	***	2.915 (.322)	***
世代(年長世代)								
70 後	-.064 (.069)		-.093 (.071)		-.068 (.094)		-.071 (.094)	
80 後	-.055 (.064)		-.147 (.073)	*	.057 (.101)		.055 (.100)	
民主價值分數					-.190 (.042)	***		
儒家價值分數					.126 (.043)	**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624 (.098)	***
低價值觀							.000 (.108)	
混合價值							-.062 (.106)	
性別(女性)								
男性			.183 (.056)	**	-.047 (.075)		-.066 (.074)	
教育程度			.040 (.016)	*	.038 (.023)		.030 (.023)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118 (.058)	*	-.207 (.077)	**	-.208 (.077)	**
地區別(中部)								
東部			-.045 (.066)		-.051 (.086)		-.077 (.086)	
西部			-.036 (.069)		-.033 (.097)		-.022 (.097)	
政治面貌(群眾)								
正式黨員			.011 (.082)		-.098 (.103)		-.117 (.103)	
曾申請			.148 (.089)		-.057 (.107)		-.034 (.107)	
主觀社會地位								
社會底層			-.006 (.061)		.136 (.080)		.127 (.080)	
社會上層			.158 (.089)		.141 (.111)		.149 (.110)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19 (.022)		-.023 (.022)	
閱讀政治訊息					.042 (.028)		.035 (.028)	
管道數量					-.009 (.030)		-.006 (.030)	
小道消息					-.041 (.043)		-.035 (.043)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028 (.047)		-.016 (.047)	
家庭未來經濟					-.011 (.051)		-.017 (.052)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012 (.032)		.000 (.032)	
政治效能感					-.033 (.056)		-.056 (.056)	
社會資本								
整體人際信任					.008 (.050)		.004 (.050)	
親近人際信任					-.011 (.009)		-.008 (.009)	
關係緊密度					.015 (.016)		.016 (.016)	
模型訊息								
R ²	.000		.012		.047		.049	
Adj. R ²	.000		.008		.033		.035	
F/Sig.	.621		3.424		3.495***		3.529***	
N	3472		3231		1737		1735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第四節 辯證的中國政治現代化



本章所要處理的問題在於許多因為中國崛起而出現的中國模式論述，在意識型態的支撐上能有多大的強度，我們選擇了「民族主義傾向」以及「認同中國式治理」做為主要的依變項內容，這是由於改革開放、共產主義意識型態衰退後，中國「新民族主義」以及結合中共改革經驗與中國傳統文化（儒家價值）的「中國式治理」成為可能的預備選項。緊跟這兩組觀念，我們也可以檢視「威權韌性」假設與「文化相對」假設在價值觀變遷下，能有多大的發展空間。

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一直是辯證的。西風東漸的初期，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完全可以突顯這個重大矛盾，就連當時最有國際觀的魏源也僅能「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伴隨著清帝國的衰敗，「立憲派」與「革命派」之爭展現這種辯證的另一種形式（漸進或激進）。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激烈的奪取政治權的鬥爭。這場政治現代化的辯證至今仍未完成，當代中國仍在找尋適合的發展途徑中掙扎，不過，由於經濟的成功，中國在意識型態的爭奪上較過去取得更多的發言權。

改革開放政策取得成功之後，1990 年代開始，中國也以大國的姿態積極參與國際政治。這顯然是由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成長，成為中國下一波能夠強盛的基礎，強化了其自信心。一般對於中國的觀察，對於其共產獨裁政權之所以能夠持續，並維持一定的穩定，大致可以歸於兩個主要因素，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正當性，以及追求民族強盛的民族主義思想。兩個因素都與現代化直接相關，並引發各種可能的爭議，尤其兩者都與另一個普世性的價值—民主—形成某種辯證關係，同時，這種辯證關係有著分別來自外部與內部的雙重壓力。民族主義、治理正當性與自由民主在未來的中國會以何種形式互動？發生何種影響？

朱雲漢教授在 2013 年的研究中，已經使用經驗證據說明，經濟績效、提供社會穩定以及民族主義情感並不如西方觀察家所預期，對中國政權的正當性提供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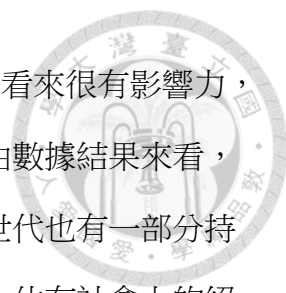
大的助益。對於正當性的強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傳統價值觀念的作用，⁵⁷ 這些價值觀比任何政策績效或治理能力可以對政權正當性提供更大的解釋變量 (Chu, 2013)。朱文使用的是「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地區的第二波調查數據，本文則是使用 2011 年的第三波數據，在相當程度也支持了朱教授的研究成果。對於本文而言，民族主義與中國式治理的認同事實上受到世代交替與價值觀變遷的影響，並不持續維持在高點。

在民族主義的統計分析方面，我們可以認為新世代的民族主義傾向整體正在下降中，不論他們是屬於民主價值觀或是儒家價值觀的認同者。同時，民主價值觀者明顯地不同於其他價值觀，不僅在每一世代內都是最低的，也都持續地的與其他組別具有差異性。也就是說，越是新的世代，同時具有民主價值觀的民眾，其中國民族主義傾向將更低，與其他價值觀持有者差異顯著。除了世代與價值觀外，在個人背景方面，高經濟評估、經常閱讀政治訊息者民族主義情感會高，但使用網路者以及接觸小道消息者則較低。在中國，更為正式的社會傳播帶來更高的民族主義情懷，非正式的傳播則傾向削弱它。

另外，中國式治理的高低與多數影響中國民眾態度差異的變項沒有什麼顯著因果關係，具有持續性影響的基本社會學變項為城市化。唯一具有解釋力的變項仍然是價值觀的差異，儒家傳統價值高者會認同中國式治理，民主價值高則傾向削弱認同。從價值觀群體的角度來看，民主價值觀者與其他群體不同，對於中國式治理具有更低的認同，而這是新世代中最主要的群體。

整體來看，中國官方想要藉由訴求民族主義與中國式治理來維持正當性有其限度，最主要是因為價值觀變遷會使這種努力作用減弱。新世代的民族主義不再像他們的前輩一樣居高不下，反而在下滑中。中國式治理的說法能否奏效也要看民眾的儒家價值信仰的強度，民主價值觀持續增長將動搖中國式治理的說法。

⁵⁷ 這些價值觀內容包括對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家父長制的傾向，對於仁政的信仰（偏愛要求政府善盡所有的治理責任），以及對於國家利益優先於個人權利的信念（做為民族集體利益的代表）。



從本文的研究假設來看。首先，「文化相對」假設雖然目前看來很有影響力，但那是因為價值觀的變遷仍在半途，世代交替正在進行之中。由數據結果來看，龐大的年長世代仍然受到儒家傳統價值極深刻的影響，就連新世代也有一部分持續抱持傳統價值，這些人更傾向民族主義與中國式治理的訴求，佔有社會上的絕對多數，這是文化相對主義具有解釋力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具備民主價值觀的新世代更不受到兩組政府主導的意識型態影響，相較於儒家價值觀者更具有批判力與自主能力，這將是未來中國進一步政治發展的關鍵。其次，「威權韌性」假設事實上是依附於「文化相對」假設之上，正因為有巨大的傳統主義陣營，威權政府的正當性才得以持續，藉由管制技巧、宣傳能力以及強化治理的威權政府，因為其有無法徹底克服的如何處理異議問題的存在，在民智大開的社會中想要持續終會遭遇難題。尤其在社會中新一代的民主價值者在逐漸增長，成為社會中另一支主力的情況下。

第五章 新世代的政治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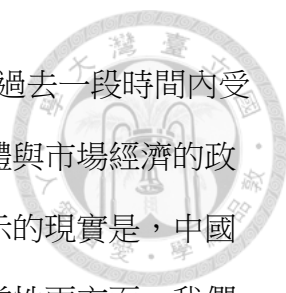
本文的核心觀點認為，具有民主觀價值者的群體，將在政治支持上低於其他價值觀者，尤其是與儒家價值觀群體具有明顯的差異。因為社會整體結構變遷所帶來價值觀變遷，藉由世代交替成為社會中的一股不同主張，成功的經濟賦權將進一步帶來文化賦權。唯從文化賦權要再推進到體制賦權需要一個中介，我們認為那是對於政治支持的開始分化，當人們發現自我實現的困境來自政治體制的限制，終會嚐試發出改善體制的呼聲。

新世代如何看待國家角色？又會如何影響未來中國的發展？他們的政治支持是值得注意的切入點。我們將區分政治信任與制度正當性兩個層次來處理這個問題。本章首先討論中國政治正當性的問題；第二節將先處理民眾對於政治機構信任的問題，這是特定政治支持的層次，就政治機構信任進行統計處理，區分政權機構、治理機構、以及社會機構三種制度信任指標，測量 80 後世代與其他世代的制度信任程度是否具有差異；第三節討論這些差異是否也受到價值觀變遷的影響，以及是否對於中國未來政治的發展，成為具有脈絡式的影響因素，分析焦點針對政權機構信任；第四節接續處理制度正當性的世代與價值觀差異，也就是普遍政治支持的層次，主要使用第三波調查的一個關於民眾認同自身政治制度的程度做為分析對象；最後將對中國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做一綜合性評估。

第一節 中國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壹、高度的政治支持

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取得了大量的經濟積累，但同時政治上的



改革卻相對緩慢。不過，更為重要的新發展是，「中國模式」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受到很大程度的注目。大多數中國模式的內涵，是結合了威權政體與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體系，而且目前看來具有相當的持續性。這個現象所表示的現實是，中國民眾對於當局展現了高度的政治支持，包括政治信任與體制正當性兩方面，我們統稱為「合法性」。

中國的統治合法性問題涉及中國案例對於比較政治學界的重大課題，依朱雲漢教授的歸納，這個討論包括三個方面。首先，中共政權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民眾的支持，基礎是否牢固？還是它的政治穩定只是表面，事實上極度缺乏政權合法性？唯這個問題已經由許多的實證調查資料表明（包括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以及世界價值觀調查），當前體制受到多數民意的支持，這個領域的學者也大多同意目前的中共政權具有相當高的政權合法性。（Chu, 2013）

第二個問題是為何中國政權可以享有這樣的政治支持？第三個問題是上個問題的延伸，這樣的政治支持可以持續多久？或是中國當局實際上已經找到另一組獨特的制度來創造合法性，而不用依循現代化理論所描述的朝向西方民主體制發展的方向？朱雲漢教授（Chu, 2013）也歸納了目前中國研究學界的兩組回應，分別是制度論與文化論的觀點。制度論者的提法包括黎安友（Nathan, 2003）以及 Gunter Schubert (2008)，前者認為中共已經將政治繼承問題制度化，因此增加了其韌性，包括用人唯才、專職分工以及擴大參與等措施都使得中共的公共合法性更為強化；後者則建議應從微觀過程或是區級的治理來理解中共的合法性來源，因為在地方治理方面，中國越來越強調「創新」的政治改革，以及必須時時注意公共回應性。文化主義者則從「文化相對」的觀點從更根本的途徑來挑戰流行的西方中心主義論述，他們認為大多數對於中國合法性的研究都忽視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對於在地合法性概念的影響。如 Tong (2011) 和 Bell (2008) 都指出，中國當前體制的合法性維持，是基於中國民眾對於國家和社會關係認知的歷史根源，以及整個社會對於國家應負起提供人民福祉責任的期待感。杜維明 (Tu,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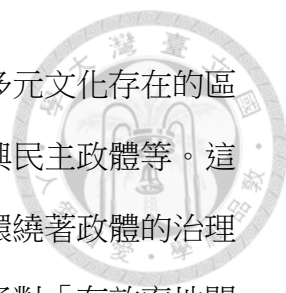
與 Shin (2011) 也認為這種文化影響事實上遍及儒家文化圈的其他社會。這些來自傳統觀念的政治支持與現在對於中共的支持合而為一，是中國目前政治穩定與政治支持的意識型態基礎。

朱雲漢教授 (Chu, 2013) 以 2008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中國調查資料證實 (執行時間為 2006 年 10 月到 2008 年 4 月)，中共政權目前的合法性嵌入在民眾所廣泛持有的傳統價值觀，包括家父長制、仁政以及國家優先等，更符合文化論者的看法。另外，當局在治理問題上，目前有效地納入基層選舉與協商民主，以及保持了中央信任度大於地方的緩衝筏，加上領導人也時常表示關注民眾的反應以取得公民的認可，是有助於保持高度政治支持的政策工具。最後，中國共產黨有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因為經濟成功所帶來的崛起，使其不用太過理會來自美國的民主化壓力；而社會主義民主做為一個新型態的民主與西方民主劃線，使當局不用像其他威權國家必須承諾一場西化與現代化的改革工程；而在意識型態衰退之下，中共當局好像找到了一個替代方案，結合民族復興與傳統文化回潮的「中國模式」論述。

本文嘗試在朱雲漢教授的論證上進一步擴展對文化影響的理解，我們也認為傳統文化的影響很大，尤其在當局有意識地與其結合並植入政治正確的宣傳下，的確是具有一個強勢的傳統文化仍然影響現今中國社會，並支持其合法性。唯本文也認為，現代化是否發生影響應該納入世代交替與價值觀變遷的角度來觀察，才能更清楚掌握。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要證實的是，與舊世代相比，新世代中的政治支持確已發生了分化，而這種分化的來源，主要是因為價值觀變遷。

貳、來自文化傳統的政治支持

以往政治支持的研究脈絡多是根植於歐美—尤其是美國—的民主體系之中，探討政治支持的來源、變動與政治結果。對於歐美以外地區的政治支持研究則是



稍晚才發展起來的。以亞洲各國為例，亞洲是一個多元體制與多元文化存在的區域，包括儒家文化、後共產主義國家、威權體制以及第三波新興民主政體等。這些不同型態甚至帶有競爭性的政體，在中國近來的崛起之後，環繞著政體的治理能力與經濟成就議題，使得在此地區的民眾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對「有效率地開明威權政府」的好感。在此背景下，過去對於政治支持的研究脈絡勢必面臨挑戰。

許多政治信任的研究者都將其概念追溯到 David Easton (1957; 1965; 1975) 的政治系統論。就 Easton 來看，政治支持可以分為兩種，普遍性支持 (diffuse support) 與特殊性支持 (specific support)，特殊性支持指的是政治系統中的成員對於某一特定的權威當局 (political authorities) 所進行的評價，這表示成員對權威當局的政策與舉措在概念上能夠感知，這種評價如果是正面的就是具備某種政治信任，最後會轉化成政治支持，提供系統有效地運作的基礎。普遍性支持的指涉對象通常是政治典則 (the regime or constitutional order) 還有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並非由於政治社會中的成員獲得固定的報酬或利益而產生，而是藉著對成員社會化 (socialization) 培養成員的愛國心、對憲法與領導者的信任與忠貞所建立起來的。對於 Easton 的系統論而言，固然政治系統需要普遍性支持給予政治系統某種程度的行動彈性，但更為關鍵的是系統的生存尚需仰賴「特殊性支持」，也就是因為「成員察覺其需求已經獲得滿足」而產生。

可是，中國的政治支持受到歷史經驗與文化傳統的重要影響，至少包括三個重疊層。基礎層是道德菁英的統治，也就是說善的政治應由具有道德的「君子」來治理國家。政府必須是富有同情心的人，理想的情況是，政府在道義上有義務照顧很多人就像是家長照顧子女。同時政府的統治應該主動關懷人民、具有回應其需求的敏感度，而不是由民眾的情緒引導。落實到第二個層次是制度，也就是「仁政」。中國人普遍認為人民福祉是國家的責任，希望有一個萬能的政府負擔人民的福祉，而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第三組理念是用人唯材、選賢與能。一個理想的社會，需要由上級美德和政治人才領導管轄。一個合法的政治制度的一個關鍵



功能是選擇，招聘和培養這些有才華和熱心公益的人，也就是學者型官員，採取了治理在不同層次的責任，同時提供用於教育和向上流動的人人平等的機會。總結起來就是「民本思想」，簡單來說，就是要求執政精英照顧人民的福利，充分關懷人民的利益和傾聽人民的呼聲和關切。(Chu, 2013)

這些想法將左右中國民眾對於政治支持的基本看法，我們可以發現上述的政治原則基本上與西方自由民主傳統的要求有所出入。例如在基礎層次，西方式民主更強調的是民意而非菁英主導；在制度層次，西方更重視有限政府與分權制衡，而非家父長全能政府；在徵補層次，西方民主觀念認為定期選舉才能保持政治家的清廉與能力，而非來自上層有智慧的遴選。

第二節 特殊性支持—政治信任

壹、政治信任、政治穩定與民主支持

政治信任在政治學中是長期被關注的重要變項之一。主要被當作政治系統中的一個主要輸入項，具有維持政治系統穩定運作的功能。對於政治信任，西方政治學者特別關心的研究焦點是，政治信任的起伏是否危及民主政治的持續存在，或是有助於民主政治的鞏固。一般而言，政治信任基本上反映的是政府的行為或是體制本身如何受到民眾的認同，因此而展現其存在的合法性，有此合法性基礎，政府的施政與治理才不會不斷地受到干擾。

政治學者所關注的信任議題有兩方面，包括了社會信任以及政治信任。前者的核心概念來自 Putnam (1993) 所提出的社會資本理論，透過義大利地方政府的研究成果，Putnam 指出社會信任、市民組織以及社會網絡的建全將會有助於政府績效的提昇。而政治信任則是與政治穩定具有密切的相關，低水準的政治信任表示

該政治體系與政府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其政策制訂與政策執行將會十分困難，甚至陷入混亂或是政治體系崩潰。

在政治信任方面，一向是作為政治系統的輸入項——政治支持——的一個面向。系統論的構建與系統持續 (persistence) 概念密切相關，也就是對於政治穩定的要求。所以，第一組與政治信任相關的討論在於，它於政治穩定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在 Easton 的開創性研究之後，許多學者投入了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可以包括三個範疇，包括政治信任的來源、政治信任的變動以及政治信任帶來的政治後果。⁵⁸

第二組重要的論辯來自於政治信任的高低對於民主政體的影響。某些學者認為政治信任感的持續低檔，顯示民眾對於國家政策制定的方向不滿意，對權威的不信任終會上升到對於體制與社群的不滿意，而有選擇更好體制的可能，這將傷害民主社會的健全發展 (Miller, 1974)。不過，這個看法並不完全為研究者所接受，由於政治信任也會對現任政府帶來方便，當人民對執政者有較高的信任，會給執政者未經人民同意即可先行自由地運用有限資源的空間，使其更有效治理。也有學者認為，民眾對政府的高度信任事實上引發人民放棄監督政府的權力的結果，並且無條件的支持政府的作為，反而會帶來不良的政治後果 (Batto, 2004; Hardin 1998, 1999)。這在威權政府方面，將會有助於其對於某些公民政治權利的限制，目的是為了獲取更有效率的治理。

⁵⁸ 根據陳陸輝教授的整理(2002, 2003)，政治學界對於政治信任的研究成果可以分成三個方面，包括政治信任的來源、變動情況以及其政治後果。政治信任的來源通常受到民眾不同社會背景的影響，也會受到特殊與重大的國際政治與外交事件，以及民眾對於特定政治人物與政府效能、經濟表現評價的影響 (Abramson, 1983; Hetherington, 1998)。而政治信任的變動則是來自於對美國民眾政治信任衰退的研究，多數學者區分了對於現任者與政治體制的信任，認為美國民眾的政治信任低落多半針對個別的部門，而非整體的民主憲政體制 (Craig, Niemi, & Silver, 1990; Citrin, 1974; Feldman, 1983; Williams, 1985; Hetherington, 1998)。最後，政治信任所產生的政治後果主要有兩個方面，包括影響民眾的政治行為以及政府治理的空間等 (Hetherington, 1999; Chanley, 2002; Scholz & Lubell, 1998; Gamson, 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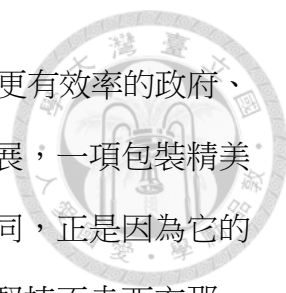
貳、威權政府的政治信任

總體來看，政治信任的概念對於政治理論主要在於兩個方面的影響。首先，由於政治信任與政治穩定的密切關係，所以一定的政治信任感必然有利於現有政治體制的維持，不論是那一種政治體制。就算是民主體制，如果像某些新興民主政體，其民主運作尚未成熟，民眾很容易把對於個別政治人物或政黨的信任轉移到政治制度的信任上，這時候低迷的政治信任很可能造成民主的倒退。相反地，一個有效率的開明專制政府，可能因為其經濟成功而取得民眾的政治信任感。不論是那一種政府，當政治權威得到民眾相當程度的信任時，人民會相信政治權威有能力了解其需要、有效回應人的需求並具備一定的廉潔與透明度時，其體制運作的成本會比較小，也可以運作的很好。但相反，當政治權威的信任度低，民眾給予執政者的自由裁量權相對地縮小，且會處處限制執政者，體制的運作很有可能因此失靈甚至解體。

第二個方面就是政治信任與民主支持之間的關係。一直以來政治學者關注的焦點在於人民對政府以及民主體制的信任程度，兩者是否具有正向關係，尤其是在新興的民主體制中。本來西方學者的研究觀點基本是，民主制度下的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都相對容易形成，反之，獨裁或者權威政權下的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則比較不容易形成。(Uslaner, 2002; Levi, 1998) 但現在的研究通常發現，相較於有效率的威權政府，新興民主國家的民眾其政治信任程度偏低，更不用說是與成熟民主國家的民眾比較。⁵⁹ 對於處於發展中的威權體制中，由於對於政治穩定的要求，在邏輯上對現在政治機構的信任與民主支持應該呈現反向的關係。在過去的研究中，對於威權國家中政治信任與民主支持之間的關係則著墨較少。

中國案例正是在這兩個意義上對於政治信任的研究帶來挑戰。其一，中國的

⁵⁹ 例如 Chu, Diamond, and Shin (2001) 的研究就指出，台灣與南韓人民對民主體制的信任程度呈現偏低的狀態，而且在民主化多年之後發生下降的情況，這將危及新興民主政體的穩定，更有可能發生民主的倒退。



巨大經濟成就使其較過去多數的威權政府更得到其人民的信任，更有效率的政府、更有秩序的政治環境、更穩定的社會，並將可以使經濟持續發展，一項包裝精美的中國模式選項正被上架販售。其二，中國的發展經驗與眾不同，正是因為它的成功顯示其價值，因為長久的歷史傳承、深厚的文化底蘊，又堅持不走西方那一套邏輯，所以，中國不需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可以有自己的發展模式，甚至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那麼，政治信任的內容也將與西方邏輯不同。

參、中國政治信任基本訊息

從過去政治學者的相關研究看來，政治信任對於政治穩定具有重大的影響，所以對於政治信任的測量就是掌握該國政治體系穩定的主要關鍵。不過，過去的研究中經常將政治信任與政治支持混在一起處理。就算少數學者清楚指兩者實際上具有不同之處，但在操作上要分開還是十分困難。**Easton** 在此概念上雖然區分了兩種政治支持（普遍的與特殊的）以及三種不同層次的政治支持對象（社群、體制以及權威），但並沒有明確區分政治支持與政治信任。**Easton** 認為普遍的政治支持會從兩個面向表現出來：政治信任與合法性，即是否信任既有政治體系與是否認為政治體系具有合法性，所以政治信任其實是政治支持的一種展現。而在特殊的政治支持方面，**Easton** 更認為對特定一任政府的政治支持與政治信任兩者很難區分。**Norris (1999)** 以及 **Dalton (2004)** 則延續這個脈絡討論多層次的政治支持，在詞彙上也是交替使用政治支持與政治信任這兩個概念。這個結果就是使得研究者在處理政治信任問題時，其實經常使用了政治支持的指標。**Hetherington (2005)** 指出，美國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NES)** 長期使用的測量政治信任的題目，同時包括了普遍的與特定的政治支持。

為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將政治信任的對象鎖定在政治機構，在層次上比較接近特定的政治支持，詢問受訪者對政治生活中具體可感知的機構信任程度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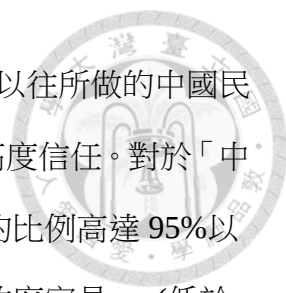


表 5-1 提供了中國的受訪者對於政治機構信任的基本訊息。如同以往所做的中國民眾的機構信任相關研究一樣，一般民眾展現了對於政治機構的高度信任。對於「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共產黨」、「解放軍」等部門回答可信的比例高達 95% 以上，可信比例比較低的機構包括「各種民間組織」以及「一般政府官員」（低於 70%），介於中間則是「法院」、「公安部門」、「地方政府」、「廣播電視」以及「報紙」（介於 75%~85% 間）。在這些部門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趨勢。首先，同類型的政府部門中，對於中央的信任度高於地方（例如中央政府高於地方政府）；距離民眾比較遠的信任度高於距離民眾比較近的（例如解放軍高於公安部門）；對於具有政府性質的機構，信任度高於政府性質比較弱的（例如廣播電視與報紙高於各種民間組織）。其次，我們進行了 80 後世代與舊世代的區分（70 後世代做為一個過渡）。從數據中可以發現，除了對於法院的信任度外，80 後世代在每一個機構的信任度都低於舊世代。表 5-1 的數值同時經過了卡方檢定，差異具有顯著性。

不過，只計數正面（「有點可信」、「相當可信」、「完全可信」）與負面（「有點不可信」、「相當不可信」、「完全不可信」）的二元尺度測量，在檢視中國的資料上會有變異度過低的問題。尤其在與「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其他國家進行比較研究時，經常會形成測量上的落差。當我們審視表 5-1 中的細格時，可以發現新世代與舊世代的差異多展現在「完全可信」的大幅滑落，並轉移到「有點可信」的選項中。僅使用正面與負面表述的計數方式無法捕捉到這樣的變動。

表 5-1 各種政治機構的信任百分比分析

		N	完全 不可信	相當 不可信	有點 不可信	有點 可信	相當 可信	完全 可信	卡方值 檢定
法院	年長世代	1629	2%	4%	11%	25%	34%	25%	42.584 ***
	70 後世代	664	2%	2%	13%	29%	31%	24%	
	80 後世代	858	1%	3%	8%	33%	36%	19%	
	合計	3151	2%	3%	10%	28%	34%	23%	
中央政府	年長世代	1761	0%	0%	1%	7%	33%	58%	139.230 ***
	70 後世代	697	1%	1%	4%	13%	32%	50%	
	80 後世代	874	1%	0%	4%	19%	37%	39%	
	合計	3332	1%	0%	2%	12%	34%	51%	
共產黨	年長世代	1771	1%	0%	2%	7%	28%	62%	126.379 ***
	70 後世代	695	1%	1%	4%	13%	29%	52%	
	80 後世代	871	2%	1%	5%	16%	33%	43%	
	合計	3337	1%	1%	3%	11%	30%	55%	
全國人大	年長世代	1700	0%	0%	2%	10%	32%	55%	102.501 ***
	70 後世代	666	1%	1%	4%	16%	30%	49%	
	80 後世代	858	1%	1%	5%	18%	36%	38%	
	合計	3224	1%	1%	3%	13%	33%	49%	
一般 政府官員	年長世代	1737	2%	7%	20%	33%	23%	14%	69.984 ***
	70 後世代	697	3%	7%	22%	39%	17%	12%	
	80 後世代	876	3%	8%	25%	38%	18%	7%	
	合計	3310	3%	7%	22%	36%	20%	12%	
解放軍	年長世代	1754	0%	0%	2%	9%	32%	57%	138.501 ***
	70 後世代	695	0%	1%	3%	15%	34%	47%	
	80 後世代	866	1%	2%	3%	20%	37%	37%	
	合計	3315	1%	1%	3%	13%	33%	49%	
公安部門	年長世代	1750	1%	3%	10%	22%	32%	32%	76.159 ***
	70 後世代	693	2%	4%	12%	26%	29%	27%	
	80 後世代	867	2%	5%	13%	30%	32%	18%	
	合計	3310	2%	4%	11%	25%	31%	28%	
地方政府	年長世代	1725	2%	5%	12%	28%	30%	23%	89.489 ***
	70 後世代	687	3%	5%	14%	34%	23%	21%	
	80 後世代	864	2%	6%	17%	40%	23%	12%	
	合計	3276	2%	5%	14%	33%	27%	19%	
報紙	年長世代	1566	1%	3%	19%	37%	26%	15%	48.708 ***
	70 後世代	658	2%	3%	23%	40%	20%	11%	
	80 後世代	849	2%	3%	23%	44%	20%	8%	
	合計	3073	2%	3%	21%	40%	23%	12%	
廣播電視	年長世代	1714	1%	3%	15%	34%	29%	18%	33.261 ***
	70 後世代	689	1%	2%	19%	39%	25%	14%	
	80 後世代	864	1%	3%	18%	41%	25%	12%	
	合計	3267	1%	3%	17%	37%	27%	16%	
民間組織	年長世代	1366	6%	7%	23%	36%	17%	11%	58.107 ***
	70 後世代	602	8%	8%	29%	36%	13%	7%	
	80 後世代	770	6%	9%	27%	42%	12%	4%	
	合計	2738	6%	8%	25%	37%	15%	8%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肆、政治信任指標因素分析

為了對於中國民眾的政治機構信任的模式進行理解，筆者對於政治信任題組進行了以降低維度為目的的因素分析，因為執行時並未帶有某種理論視角，也可以稱為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結果如表 5-2 所示，針對信任題組的 11 個題目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因子萃取法使用主成份法 (principal components)，以及轉軸法利用最大變異法 (Varimax) 的正交法。在表格下方模型適合度訊息中，KMO value 為.899，大於.5 而且相當接近 1，表示這些變項相當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另外，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的值為 16297.982，顯著性為.000，也表示這些題目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林震岩，2007)。

就因素分析的內容來看，中國的機構信任題組可以抽取出三個主要的因子。第一個因子包括了「共產黨」、「中央政府」、「全國人大」以及「解放軍」，其因素負荷量皆高於.710。第二個因子包括「一般政府官員」、「公安部門」、「地方政府」以及「法院」，除「法院」的因素負荷量稍低外，其他都有超過.710 的優良表現。第三個因子則包括「報紙」、「廣播電視」以及「各種民間組織」，因素負荷量的表現皆十分優異，皆超過.710。筆者同時進行了信度分析，如表 5-2 所示，三組因子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皆十分高，顯示非常適合組成一共同的指標。依指標內容的特性，本文將三個因子分別命名為「政權機構信任」、「治理機構信任」以及「社會機構信任」。

筆者也曾針對東亞 12 個國家的同一信任題組進行因素分析，⁶⁰ 結果歸類為三個不同內容的因子。第一類制度指涉決策機構，包括「總統或總理」⁶¹、「國會」、「法院」以及「政黨」；第二類制度則是執行機構，政治性稍弱，但都是維持國家正常運作必須具備的常態建制，包括「地方政府」、「一般公務員」、「軍隊」以及

⁶⁰ 這 12 個國家包括日本、南韓、台灣、蒙古、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柬埔寨、越南以及中國大陸。皆為「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三波調查的資料。

⁶¹ 在中國的調查中沒有詢問國家領導人的信任度，我們以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取代此一指標。

「警察」；第三類制度的政治性最低，但是負擔了政治溝通的重要系統功能，包括「報紙」以及「電視」。(Wu, Chang and Weatherall, 2012) 比較來看，中國的機構信任指標分類展現了其政治內容中具有特色的一面。由於共產體制的制度遺緒以及長期的統治習慣，中國的核心政權機構依重要性順序包括了「共產黨」、「中央政府」、「全國人大」以及「解放軍」，除了解放軍的順序外，其他皆符合研究者對中國政治的觀察。而其治理機構中包含了一個有趣的單位，法院。不同於其他國家，法院的重要性在中國顯然比較低，這可以從它的信任度基本上也比較低表現出來。社會機構的信任則顯然具有一致性，明顯與其他兩組機構信任不同。

表 5-2 機構信任的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命名	政治機構信任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信度分析
政權機構 的信任	共產黨	.874	.237	.109	.907
	中央政府	.867	.250	.103	
	全國人大	.851	.274	.132	
	解放軍	.766	.270	.128	
治理機構 的信任	一般政府官員	.176	.795	.273	.848
	公安部門	.336	.767	.229	
	地方政府	.313	.747	.244	
	法院	.323	.677	.182	
社會機構 的信任	報紙	.199	.209	.864	.802
	廣播電視	.242	.187	.850	
	各種民間組織	-.054	.290	.717	
模型訊息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899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 Chi-Square= 16297.982; df= 55; Sig.= .000				

說明：1. 因素分析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2. 轉軸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第三節 政治信任的世代差異



承接上一節的統計分析，以下的分析我們將全數使用因素分析結果所歸納的三個因子進行分析。首先將關注三項不同內容的信任指標世代差異的情況，我們發現，世代間對於政權機關信任的差異最為特出，執行機關的信任差異較不顯著。政權機關信任的世代差異緊扣本文的主旨，我們想進一步知道這種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是否同樣具有關聯性。這種因為價值觀群體不同而形成的政治信任差異，將初步展現中國新世代中從價值觀的分裂轉換到對政治信任的分裂過程。

壹、三項信任指標的世代差異

以三組信任指標為基礎，我們可以重新就其世代變遷進行觀察。表 5-3 顯示了各個世代信任指標平均數以及以世代為因子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在政權機構方面，世代之間的變異數分析，F 值為 46.011，顯著性小於.001，表示世代間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有顯著的差異，兩兩比較的結果，每個世代間的差異都很顯著，年長世代最高，為.13，到了 70 後世代，下降到-.08，關鍵世代 80 後的政權信任，則低到-.34。其次是執行機構的信任，雖然還是依世代推新而下降的趨勢，其變動幅度就比較小，F 值為 3.976，顯著性介於.05 到.01 之間，只有 80 後世代與年長世代的差異具有顯著性。最後是社會機構的信任，F 值為 8.109，顯著性小於.001，這是以 70 後世代與 80 後世代分別與年長世代不同做為特徵，70 後與 80 後之間的社會機構信任則十分相近，沒有顯著差異，最低的社會機構信任是 70 後世代的-.10。



表 5-3 政治信任指標與世代的變異數分析

信任指標		年長世代	70 後世代	80 後世代	全體	F/Sig.
政權機構	平均數	.13	-.08	-.34	-.06	46.011*** 3-2-1
	標準差	.90	1.06	1.16	1.04	
	個數	1139	538	729	2406	
執行機構	平均數	.07	.00	-.06	.01	3.976* 3-1
	標準差	.98	1.08	.91	.98	
	個數	1139	538	729	2406	
社會機構	平均數	.07	-.10	-.08	-.01	8.109*** 3-1 2-1
	標準差	1.01	1.01	.94	.99	
	個數	1139	538	729	2406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圖 5-1 是進一步以圖像的方式展現世代間政治信任的變遷情況。可以發現，三組信任指標整體上依世代變遷而下降的趨勢，社會機構的信任度變化比較特殊，分數最低出現在 70 世代，而到 80 後世代則微幅上升。其次，政權機構信任的下滑趨勢顯然大於其他兩項信任指標，這是以其更為陡削的斜率展現出來。社會機構信任稍緩，並且新世代有所回升。對於執行機構的信任度則最為平緩，各世代差異不大，這或許是中國政治社會普遍穩定的主要基礎。最後，令人注意的一點是，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新世代表現了一個明顯的下降，這個信任下滑是否會成為主要的世代差異來源，值得進一步探究。這個結果跟先前我們利用各分項指標所做的整體百分比分析不太一樣，中國研究者對於民眾多半比較信任中央而比較不信任地方的情況只停留在年長世代，70 後世代信任兩者的距離已經拉近，新世代中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則遠低於執行機構。這是一個起點，我們將會沿用先前的分析框架，以政權機構信任為依變項，進行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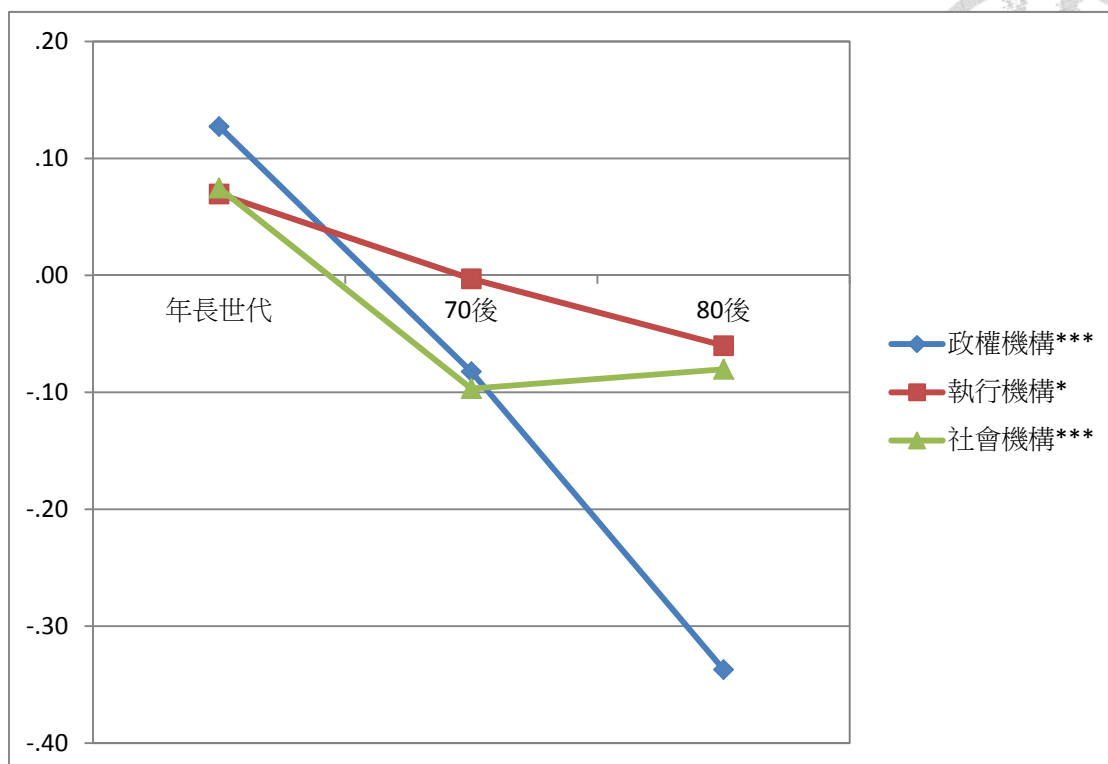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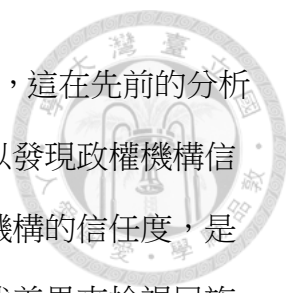


圖 5-1 政治信任的世代變化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貳、政權機構信任的世代差異

表 5-4 是變異數分析的結果。比照此前的世代與價值觀兩組因子的變異數分析，受訪者依出生時期被區分為「年長世代」、「70 後」世代以及「80 後」世代三組，另價值觀群體分類則是分為「民主價值觀」、「混合價值觀」、「儒家價值觀」以及「低價值觀」。最主要的比較關係在世代方面，是以「80 後」世代為核心，比較其與「年長世代」間是否具有差異。價值觀群體的關注焦點是「民主價值觀」者，我們預期會與「儒家價值觀」者在政治信任上具有明顯差異。整體來看，更早的世代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度更高，而且比較接近。相反地，新世代則是具有較低的信任度，以及比之舊世代更為分歧的看法。顯然，這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空間較過去放寬，民眾更願意表達其看法有部分關聯。



首先，表 5-4 的第 1 欄是全體受訪者的政權機構信任度傾向，這在先前的分析已經看過，在三個不同世代的民族主義分數平均數比較中，可以發現政權機構信任度沿著世代推新而逐步下滑。整體而言，中國民眾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度，是明顯隨著世代而減弱的。其次，我們就每一個價值觀群體的世代差異來檢視民族主義的變化，結果呈現在表 5-4 的最後 1 列，民主價值觀、儒家價值觀以及低價值觀三組群體，政權機構信任度具有世代差異，差異的主要內容是出現在「80 後」世代與年長世代之間，以及「80 後」世代與「70 後」世代之間。

更重要的差異是出現在不同的價值觀群體之間，表 5-4 的第一列納入了全體可以辨視其價值觀所屬的受訪者的政權機構信任，以價值觀群體分類為其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F 值為 57.102，顯著性小於.001，組別之間差異明顯。主要的差異是民主價值觀者與其他三組的顯著差異，此外，低價值觀者則分別與混合價值觀以及儒家價值觀都具有顯著差異。表 5-4 的最後一欄的其他內容是針對每個世代內部，不同價值觀群體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差異最大的世代是「80 後」的新世代，不同價值觀群體間的政權機構信任差異，變異數分析的 F 值為 21.210，顯著性小於.001，組間差異出現在民主價值觀者與混合價值觀、儒家價值觀者，後兩者彼此之間以及與低價值觀者間也有差異，低價值觀與民主價值觀間的差異則不明顯。相較而言，「70 後」世代與年長世代中，關於不同價值觀群體間的政權機構信任差異，雖然也達到顯著性，但分歧性並不像新世代中那麼大。

圖 5-2 可以將中國民眾的政權機構差異如何因為世代差異與價值觀內容不同而發生的變化，以圖像的形式展現出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印象，「70 後」世代以前，對於政權機構信任度的價值觀類別之間已具有差異，但這種差異在「80 後」世代更被加大，趨勢是民主價值觀者信任度更明顯的下降，與低價值觀者同樣位於政治信任的低檔。儒家價值觀者雖然政治信任也在下降，但趨勢很和緩，這就拉大了與民主價值觀者之間的差距。混合價值觀者最為特殊，其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是 4 組價值觀群體唯一提高的，並達到了所有類別的最高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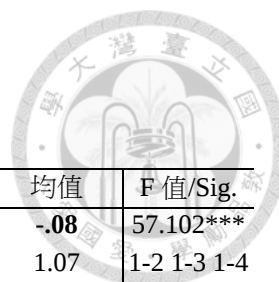


表 5-4 政權機構信任指標的世代差異

	全體 ^a	民主價值	混合價值	儒家價值	低價值觀	均值	F 值/Sig.
全體 平均值		-.48	.23	.19	-.28	-.08	57.102***
價值觀者 標準差		1.31	.93	.79	1.02	1.07	1-2 1-3 1-4
個數		542	307	711	312	1872	2-4 3-4
年長世代 平均值	.13	-.32	.24	.28	-.06	.11	18.443***
標準差	.90	1.28	.92	.69	.92	.93	1-2 1-3 1-4
個數	1139	155	151	398	117	821	2-4 3-4
70 後世代 平均值	-.08	-.33	.12	.17	-.09	-.04	6.752***
標準差	1.06	1.19	.91	.85	1.08	1.04	1-2 1-3
個數	538	145	80	155	62	442	
80 後世代 平均值	-.34	-.68	.32	-.02	-.57	-.36	21.210***
標準差	1.16	1.36	.98	.93	1.01	1.19	1-2 1-3
個數	729	241	76	158	133	608	2-3 2-4 3-4
F 值/Sig.	46.011***	5.509**	.888	8.554***	9.735***		
多重比較: LSD	3-2-1	3-1		3-1 3-2	3-1 3-2		

說明：^a 全體受訪者包括無法判別其價值觀者，總數為 2406 筆。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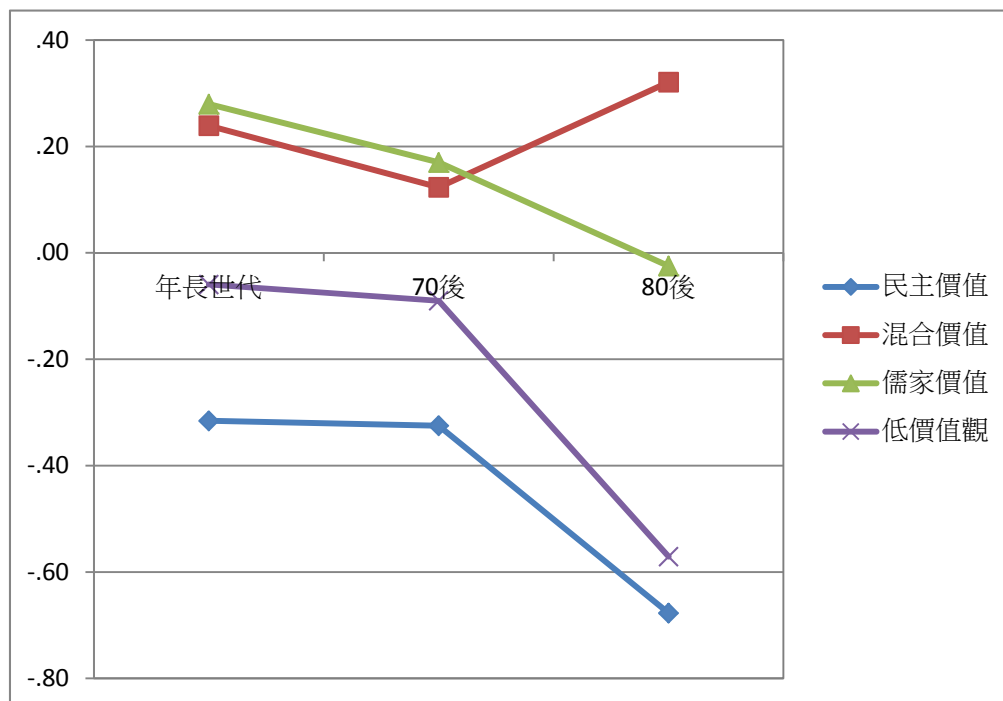


圖 5-2 政權機構信任的世代變化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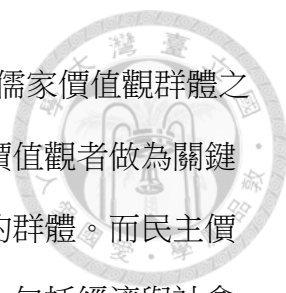
參、政權機構信任的迴歸分析

當我們使用世代差異與價值觀分組的概念對中國民眾的政權機構信任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中國民眾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呈現舊世代較為接近，而「80 後」新世代出現更大分歧的情況。其內容是民主價值觀者與低價值觀者的信任偏低，儒家價值觀者與混合價值觀者則是屬於政權機構信任較高的一群。

接著，我們將使用迴歸模型來處理主要變項間的因果關係，並藉以理解影響政權機構信任偏高或偏低的背景因素。表 5-5 為模型分析結果，第 1 欄只看世代差異對於政治機構的影響，當使用年長世代為對照組時，我們可以發現世代對於政權機構信任的影響具有顯著性，「80 後」世代的 B 系數為-.464，比「70 後」世代的-.210 低了一倍，表示新世代的政治信任快速下降。當我們放入其他社會學變項時進行控制，如第 2 欄的數據，我們發現世代差異的影響持續顯著，其他影響政權機構信任的社會學變項包括性別、城市以及主觀社會地位，女性、居住於城市以及自我認定為社會中層的民眾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更低。

第 3 欄與第 4 欄以兩種型式納入了價值觀變數。首先是以民主價值與儒家價值的分數型式，結果民主價值分數對於政治信任的影響不顯著，儒家價值分數則會強化政權機構信任，這與朱雲漢教授的研究結論相近 (Chu, 2013)。在其他相似的分析中，我們也發現儒家價值分數會強化對於執行機構的信任（民主價值分數影響不顯著），而民主價值分數則會弱化對社會機構的信任（儒家價值分數影響不顯著）。大體上而言，模型分析證實民眾對於儒家價值的信仰將會增加其政治信任，但民主價值變化的影響則不明顯。

如果進一步從價值觀群體分類的角度來分析，結果則十分符合理論預期。納入了價值觀分組以及所有的控制變項後，在表 5-5 的第四欄中，可以發現不同價值觀群體之間的差異具有顯著性。以儒家價值觀群體做為對照組，民主價值觀群組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最低，B 係數為-.353，顯著性小於.001；低價值觀群組次之，



B 係數為-.246，顯著性介於.01 到.001 之間；混合價值觀群體與儒家價值觀群體之間的差異不顯著。模型分析的結果符合趨同理論的假設，民主價值觀者做為關鍵群體，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明顯低於儒家價值觀與混合價值觀的群體。而民主價值觀群體的出現，如前幾章的分析是建立在現代化的環境之下，包括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世代交替、以及擺脫了先前的狂暴性政治運動潮。在價值觀做為主要自變數的模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影響中國民眾政權機構信任的其他變數。在社會變項方面，城市居民的信任更低，但居住在東部的民眾則擁有較高的信任，自我認定為社會上層的民眾對政權機構的信任更高。好的經濟評估以及更好的人際關係依然有助於民眾信任政權機構，可以強化民眾的政治支持。訊息管道的影響也符合預期，更多的網路使用以及交換小道消息將會削弱政權機構信任，正式的政治訊息管道強化對政權機構的信任。另外，政治效能感越高的民眾，其政權機構信任顯的更低。

經濟評估傾向正面，以及人際關係更為密切的民眾，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也越高，前者是因為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人們更相信政府的作為與能力，信任感也會提升，後者主要是因為在中國人際關係的緊密與傳統社會要求價值觀更為契合，更好的人際關係多半與支持現況與穩定漸變的看法關係密切。訊息管道與政治涉入在部分與政權機構信任呈反向關係，當民眾網路使用更頻繁、越容易接觸到小道消息時，其政治信任就會更低，訊息的開放程度將會決定受信者的政治態度本來就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不過，其中有一個轉折，訊息的內容也會左右受信者的看法，在我們的分析中，經常閱讀政治訊息的變項也具有顯著性，但它是正向的強化民眾的政治信任，這是由於公開的政治訊息帶有許多官方所同意的內容，受信者將更傾向官方的論點。尤其在政府仍然牢牢控制正式傳播管道的中國，這種正式與非正式傳播管道間受信者的差異更為明顯。

表 5-5 政權機構信任的迴歸模型分析

依變項: 政權機構信任度	1		2		3		4	
(常量)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世代(年長世代)	.127 (.030)	***	.195 (.064)	**	-2.007 (.219)	***	-2.005 (.225)	***
70 後	-.210 (.053)	***	-.168 (.055)	**	.031 (.064)		.027 (.065)	
80 後	-.464 (.048)	***	-.363 (.055)	***	-.045 (.069)		-.072 (.069)	
民主價值分數					.031 (.029)			
儒家價值分數					.254 (.029)	***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353 (.067)	***
低價值觀							-.246 (.076)	**
混合價值							.077 (.074)	
性別(女性)								
男性			.078 (.043)		.053 (.051)		.066 (.051)	
教育程度			-.039 (.012)	**	.002 (.016)		-.005 (.016)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173 (.045)	***	-.130 (.053)	*	-.118 (.053)	*
地區別(中部)								
東部			-.038 (.049)		.120 (.058)	*	.121 (.059)	*
西部			.086 (.058)		.042 (.069)		.061 (.069)	
政治面貌(群眾)								
正式黨員			.161 (.061)	**	.063 (.070)		.060 (.071)	
曾申請			.093 (.066)		.025 (.072)		.044 (.073)	
主觀社會地位								
社會底層			.045 (.047)		.091 (.055)		.092 (.055)	
社會上層			.167 (.066)	*	.144 (.075)		.168 (.076)	*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35 (.015)	*	-.041 (.015)	**
閱讀政治訊息					.073 (.020)	***	.076 (.020)	***
管道數量					-.015 (.020)		-.022 (.021)	
小道消息					-.122 (.030)	***	-.116 (.030)	***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220 (.032)	***	.246 (.032)	***
家庭未來經濟					.135 (.036)	***	.138 (.036)	***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013 (.022)	*	.023 (.022)	
政治效能感					-.106 (.038)	**	-.118 (.038)	**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092 (.035)	**	.096 (.035)	**
親近人際信任					.019 (.006)	**	.020 (.006)	**
關係緊密度					.023 (.011)	*	.025 (.011)	*
模型訊息								
R ²	.037		.063		.245		.228	
Adj. R ²	.036		.059		.233		.215	
F/Sig.	46.029	***	13.931	***	19.870	***	17.320	***
N	2406		2282		1493		1492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第四節 制度正當性的世代差異



王正旭 (Wang, 2010) 整理了政治學界關於政治正當性概念測量的兩種方式，第一種是來自政治系統層次 (a system-level view)，主要是建立在自由民主被視為是唯一合法政府形式的立場上，所以其測量着重在政府的包容性、公平性、回應性以及與其他政治體系相符的程度。另一種視角是從基層的意見出發 (view from the grass roots)，試圖藉由理解民眾如何去關聯與參與政治的角度來測量一個政體的正當性，當民眾對於現存體制有更高的評價時，其正當性也就確立，不論它是什麼形式的政府。由於中國目前並未實現真正的民主，所以我們把焦點置於民眾對於現有制度的評價上。

壹、中國制度正當性基本訊息

在行為與經驗的意義上，普遍性支持經常被等同於政治正當性 (political legitimacy)。依循 Easton 的概念，普遍性支持的內容通常是指公民對於政治典則以及政治社群的認同程度，由於中國的社群認同基本上比較沒有問題，許多對於中國正當性的討論集中在公民對於現有體制的認同程度。本文聚焦於制度正當性題組，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第三波調查中，它被使用五個潛在概念所測量，分別包括制度效能感、制度榮耀感、制度支持、制度比較以及制度變遷評估等五方面，詳細的問法與選項結果可見表 5-6。

表 5-6 以世代為單位展現了中國民眾在制度正當性各項指標中的百分比分佈情況。首先，我們可以發現與多數調查資料的結果相同，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具有很高的正當性。與制度正當性相關的題組，基本上是緊扣著「政治制度」的概念，測量民眾對當前制度的認同程度。結果發現中國民眾的認同程度都在 7 成以



上，比較低的是對於制度變遷的態度，71%的民眾認為與其他國家比較，中國的政治制度不需要調整或是只需要小幅度的調整。其次是制度支持，當提示受訪者政治制度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仍然有 77% 民眾認為人民應當支持目前的制度。其他三項，包括制度效能、制度榮耀以及制度比較的評估，在第三波調查中民眾的正向認同都接近了九成。包括有 88% 的受訪民眾同意中國的政治制度能解決面臨的主要問題；88% 的民眾表示同意以自己的政治制度為榮；以及與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相比，有 88% 的受訪者寧願生活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之下。整體來看，與制度正當性相關的指標目前仍然受到極高的認可，尤其是在關於制度的效能評估、榮耀感以及與他國政治制度的比較方面，而在提示了政治制度的問題以及是否需要調整時，其認可的百分比就下降了一些。

當我們使用世代差異的角度來理解，可以發現上述的對於政治制度的高度認可正在因為世代差異而逐步下滑中。王正旭 (Wang, 2010) 在 2010 年的研究中也提供了類似的證據，根據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中國調查資料，該文發現中國民眾對於中央政府和黨具有很高的信任，以及在普遍性支持上也保持了高水平，一個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立即危機比較不可能發生。不過，王文也發現了關於世代差異的變化正在發生，1980 年代後出生的中國公民，中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已變得不那麼理所當然，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在一個顯著較低的水平。不過，該文在正當性題目的使用上受限於第二波調查內容，多是使用受訪者對於現任政府民主現況的評價。這在第三波的正當性題組中已經加以改善，直接詢問受訪者對於國家政治制度的看法。在表 5-6 中，我們可以發現每一個題組的卡方值檢定都呈現了顯著性，單一個別變項中都可以發現差異主要是因為更新的世代的同意程度下降，不同意程度相對上升的結果。跟年長世代相比，對制度效能的評價從 91% 同意下降到 80 後世代的 83%；制度榮耀感則從年長世代的 92%，下降到 80 後世代的 82%；制度比較由年長世代的 92%，下降到 80 後世代的 80%；制度支持也是由年長世代的 82%，下降到 80 後世代的 69%。制度變遷方面的變動比較小，認為制度不需要



改變比較低的出現在 70 後世代，為 67%，年長世代為 73%，80 後世代則是稍低於總體的 70%。

表 5-6 制度正當性指標基本分佈

指標	選項	全體	年長世代	70 後世代	80 後世代	卡方值
制度效能感：從長遠來看，我們的政治制度能解決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						
	非常同意	11%	14%	11%	7%	55.462
	同意	77%	78%	77%	75%	***
	不同意	11%	8%	12%	17%	
	非常不同意	1%	0%	0%	1%	
	N	2958	1510	634	814	
制度榮耀感：整體而言，我以我們的政治制度為榮。						
	非常同意	10%	13%	9%	6%	82.773
	同意	78%	79%	77%	76%	***
	不同意	11%	7%	14%	17%	
	非常不同意	1%	0%	0%	1%	
	N	3019	1566	641	812	
制度支持：即使我們的政治制度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民也應當支持。						
	非常同意	8%	11%	8%	5%	70.822
	同意	69%	71%	69%	64%	***
	不同意	22%	18%	22%	30%	
	非常不同意	1%	1%	1%	1%	
	N	3071	1596	646	829	
制度比較：與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相比，我寧願在我國的政治制度下生活。						
	非常同意	11%	14%	11%	8%	84.033
	同意	76%	78%	76%	72%	***
	不同意	11%	7%	13%	18%	
	非常不同意	1%	1%	1%	2%	
	N	3023	1566	643	814	
制度變遷評估：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需要有所調整？						
	運作很好，沒有必要調整	16%	19%	15%	11%	30.722
	需要小幅度的調整	55%	54%	52%	58%	***
	需要大幅度的調整	21%	20%	24%	22%	
	根本性的調整	8%	7%	9%	9%	
	N	2835	1421	612	802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貳、制度正當性的世代差異

我們將五題制度正當性的測量合成為一個指標，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來進行世代差異的檢定。表 5-7 中的縱欄與橫列是分別使用世代與價值觀群體做為因子的分析結果，第一欄是針對全體受訪者進行的世代差異變異數分析，可以發現年長世代的制度正當性平均值為.84，70 後世代降到.70，80 後世代再降到.57，F 值為 50.492，顯著性小於.001，三個世代都具有明顯差異，方向是新世代的制度正當性顯的更低。如果我們控制了不同的價值觀群組，則民主價值觀與混合價值觀這兩個群組沒有世代的差異，但民主價值觀者的制度正當性一直處於四組價值觀的低點，在.43 到.30 之間；而混合價值觀則是次高群組，制度正當性指數為.87 到.75 間，與儒家價值觀群體較為接近。而儒家價值觀與低價值觀者的這兩組群體則仍然具有世代間差異，方向都是下降的，儒家價值觀者從年長世代的.98 下降到 80 後世代的.80，低價值觀者則是從年長世代的.74 下降到 80 後世代的.55，世代組別間的差異內容都是新世代與年長世代間的差別。

另一方面，當我們控制了世代後，可以發展價值觀群體間的差異是十分顯著的。具有可辨視價值觀傾向的 2287 個受訪者中，我們發現民主價值觀者具有最低的制度正當性水平，為.36；居於中間的是低價值觀者，為.65；呈現高度制度正當性的群體為混合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觀者，分別為.81 與.92，四組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結果，F 值為 101.889，顯著性小於.001，多重比較的結果發現四組之間的差異都是顯著的。這種差異在每個世代分群中都十分顯著，在年長世代中，差異也是出現在四組之間，70 後世代與 80 後世代則是民主價值觀群體顯著地與其他世代不同，具有更低的制度正當性分數。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價值觀群體間的差異如果加上世代變遷後，群體間數量消長之間的考量，可以發現中國的新世代的變化首先是民主價值觀群體的增加，而這群新興群體帶著與他們的前世代更為低下的制

度正當性態度，世代變遷同樣會對制度正當性的維持帶來挑戰。

圖 5-3 則是將中國民眾對於政治制度正當性的態度，依世代與價值觀群體將的差異在二維的圖象中展現出來。除了混合價值觀者外，其他價值觀群體因為受到結構性因素變遷的影響，新世代的制度正當性都下降了，而儒家價值觀者與低價值觀者中的這種差異具有顯著性。對本文所關心的新世代中各項價值觀之間的差異，我們可以發現，圖上出現了三組制度正當性的分群，儒家價值觀與混合價值觀者為一個群集，居於制度正當性更高的位置；低價值觀者居於中間；民主價值觀者具有最低的制度正當性評價。回到價值觀結構的概念來看待，新世代中兩組數目相當的價值觀群體對於制度正當性給出了不同的評價，雖然不像政治信任那樣出現重大的分歧，但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之間的差異則仍然可以被辨認出來。符合價值觀變遷理論的趨同性假設。

表 5-7 制度正當性的世代差異

		全體 ^a	民主價值	混合價值	儒家價值	低價值觀	均值	F 值/Sig.
全體 價值觀者	平均值		.36	.81	.92	.65	.57	101.889***
	標準差		.80	.64	.52	.71	.67	1-2-3-4
	N		616	371	923	377	2287	
年長世代	平均值	.84	.43	.87	.98	.74	.82	39.933***
	標準差	.62	.78	.67	.50	.57	.63	1-2-3-4
	N	1669	195	196	536	159	1086	
70 後世代	平均值	.70	.37	.75	.90	.61	.67	20.028***
	標準差	.65	.78	.63	.52	.62	.68	1-2 1-3 1-4
	N	677	155	89	191	74	509	3-4
80 後世代	平均值	.57	.30	.75	.80	.55	.55	24.247***
	標準差	.70	.82	.57	.53	.53	.69	1-2 1-3 1-4
	N	857	266	86	196	144	692	2-4 3-4
F 值/Sig. 多重比較：LSD		50.492*** 3-2-1	1.569	1.629	9.139*** 3-1 3-2	4.447* 3-1		

^a 全體受訪者包括無法判別其價值觀者，總數為 3204 筆。

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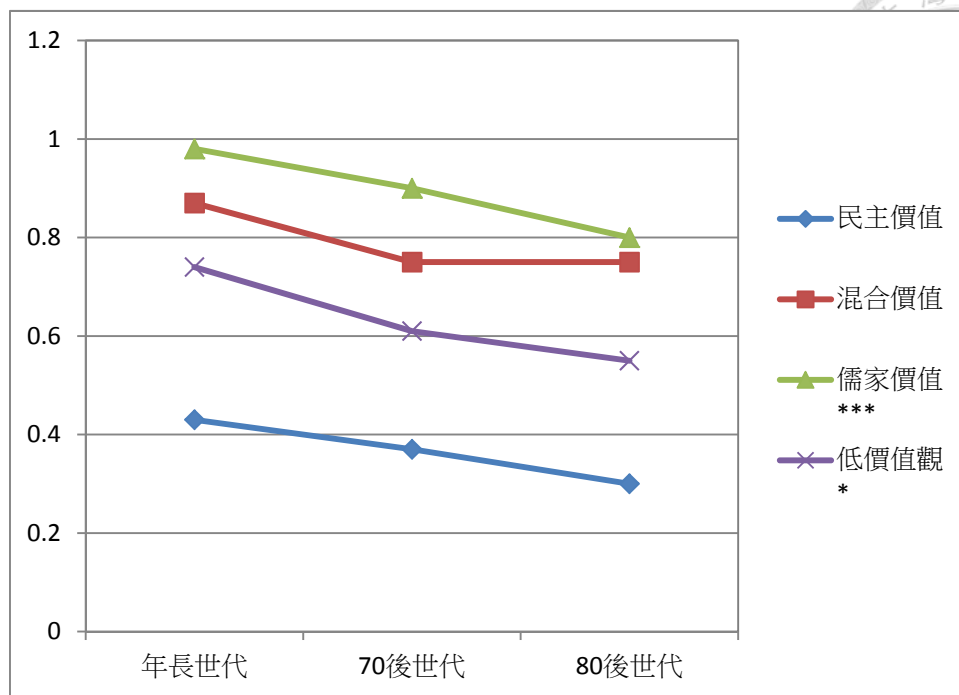


圖 5-3 制度正當性的世代變化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參、制度正當性的迴歸分析

在制度正當性方面，中國的青年世代與年長世代具有顯著性的差異，同時民主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者也具有明顯的差異性，新世代與民主價值觀群體相較於年長世代與儒家價值觀者，其制度正當性指數顯的更低。接著我們使用本文設定的迴歸模型來判定這種差異的形成與受訪者的基本社會條件以及其他相關背景間的關係。

表 6-3 展示了 4 組模型，其變異數分析的 F 值皆通過顯著性檢定，表示模型可以成立。個別來看，第 1 欄為世代差異對於制度正當性的影響，使用年長世代為對照組，80 後世代的 B 系數為-.270，70 後世代則是-.145，相較於年長世代的制度正當性都顯的更低，而且具有顯著性，可以說制度正當性隨著世代而下降中。第 2 欄放入其他社會學變項進行控制，可以發現世代差異的影響持續顯著。另外，



基本變項中的教育程度、城市居民對於制度正當性帶來負面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現代化程度給予了中國民眾更強的批判性，這與前方的分析保持一致的邏輯。其次，對制度正當性產生正面影響的變數包括居住在西部、正式黨員、曾提出入黨申請以及自我認定為社會上層者。制度正當性的影響因素多了正式黨員與曾提出入黨申請的身份，共產黨員的身份明顯有助於受訪者對於現有制度的正當性認可，事實上符合了黎安友對於中國政治菁英的高度團結的說法，中國目前唯一有意義的利益團體也是以共產黨員為主。

第3欄與第4欄以兩種型式納入了價值觀變數。我們發現價值觀的變動對於制度正當性具有十分明顯的影響，包括了民主價值分數會弱化制度正當性以及儒家價值分數將強化制度正當性。接著，以價值觀群體的角度來看，也可以發現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者之間明顯的差異；而低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觀者的差異也具有顯著性，但較民主價值觀稍弱；混合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觀者在制度正當性方面則沒有差異。不論是從個人的價值觀分數變動或是從價值觀群體分組的角度，在加入控制變項後的分析，結果都符合了趨同假設的理論預期。價值觀的世代變遷正在改變中國民眾的制度正當性內容。

當我們進一步檢視其他影響變項時，可以發現持續對制度正當性具有正向影響的包括居於在東部、正式黨員的身份、對於國家經濟現況以及未來家庭經濟情況的更好評估、更多的政治閱聽以及親近人群的人際信任。這些變數展現了受訪者更居於目前制度受惠者的角色。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更會展現其對於制度正當性的認可。

表 5-8 制度正當性的迴歸模型分析

依變項:	1	2	3	4
制度正當性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常量)	.842 (.016) ***	.926 (.035) ***	-.112 (.123)	-.060 (.128)
世代(年長者)				
70 後世代	-.145 (.030) ***	-.104 (.030) **	-.004 (.037)	-.012 (.037)
80 後世代	-.270 (.027) ***	-.172 (.031) ***	-.010 (.039)	-.021 (.040)
民主價值分數			-.088 (.016) ***	
儒家價值分數			.149 (.017) ***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375 (.039) ***
低價值觀				-.137 (.043) **
混合價值				-.065 (.042)
性別(女性)				
男性		-.039 (.024)	-.017 (.029)	-.021 (.030)
教育程度		-.042 (.007) ***	-.004 (.009)	-.012 (.009)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092 (.025) ***	-.055 (.030)	-.053 (.031)
地區別(中部)				
東部		.010 (.028)	.122 (.033) ***	.114 (.034) **
西部		.067 (.029) *	.055 (.037)	.073 (.038)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165 (.034) ***	.107 (.040) **	.101 (.041) *
曾申請		.088 (.037) *	.050 (.041)	.071 (.042)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003 (.026)	-.036 (.031)	-.035 (.032)
上層		.153 (.037) ***	.060 (.043)	.078 (.044)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08 (.008)	-.014 (.009)
閱讀政治訊息			.032 (.011) **	.031 (.011) **
管道數量			-.021 (.012)	-.022 (.012)
小道消息			-.072 (.017) ***	-.067 (.017) ***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133 (.018) ***	.150 (.019) ***
家庭未來經濟			.039 (.020)	.044 (.021) *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010 (.012)	.017 (.013)
政治效能感			-.037 (.022)	-.056 (.022) *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031 (.020)	.029 (.020)
親近人際信任			.018 (.003) ***	.021 (.003) ***
關係緊密度			.001 (.006)	.002 (.006)
模型訊息				
R ²	.031	.066	.279	.249
Adj. R ²	.030	.062	.269	.238
F/Sig.	50.503***	19.215***	27.421***	22.443***
N	3204	3026	1724	1722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第五節 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分歧



改革開放使得 1980 年代出生的世代與他們年長的世代不同，世代交替基本上已經發生，「80 後」世代在 2010 年已經邁入 30 歲，正要成為社會的中堅。到了 2020 年，中國絕大多數的人口將由 1980 年以後出生者所構成。他們在一個更加富裕的社會經濟、以及更多元化和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中成長，可以預料他們將更傾向民主以及對政府更為批判 (Wang, 2010)。這一章開始進入關於中國民眾政治支持的分析，在我們的研究架構中，政治支持居於關鍵性的角色，觀察中國民主化的動力，主要是在新世代是否具有政治支持上的不同意見。以往的中國研究在關注中共政權正當性時，多半得到民眾高度支持的經驗證據，這形成對於政治學的挑戰之一。本文認為應由世代差異與價值觀群體的概念重新檢視，才能更深入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內容。

本章首先處理了中國民眾的特定政治支持層次，也就是對於政治機構信任的問題。過去對於中國的政治信任問題，多數研究指出民眾對於政治機構信任，有一個中央與地方的信任落差，在我們的整體百分比分析中也可看出這樣的傾向。民眾對於同類型的政府部門，中央機構的信任度高於地方機構（例如中央政府高於地方政府），距離民眾遠的機構信任高於距離民眾近的（例如解放軍高於公安部門），具有政府性質的機構信任高於政府性質較弱的（例如廣播電視與報紙高於各種民間組織）。可是，當考慮了尺度的細分以及重新簡化信任指標後，將指標整合成「政權機構信任」、「執行機構信任」以及「社會機構信任」的三組指標後，我們發現比較信任中央而比較不信任地方的情況只停留在年長世代，「70 後」世代信任兩者的距離已經拉近，「80 後」新世代中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明顯低於執行機構。世代間對於政治信任的內容已經發生了變化。

其次，整體上三組信任指標都有隨著世代變遷而下降的趨勢。其中，世代之間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有顯著的差異，新世代對於政權機關信任遠低於其他兩個世

代。相對而言，執行機構信任與社會機構信任的變動幅度就比較小。

我們把焦點放在政權機構的信任上，政權機構包括了「共產黨」、「中央政府」、「全國人大」以及「解放軍」，在相當程度上這指涉中國民眾對於最核心政治制度的信任。根據變異數分析與迴歸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確定世代差異以及價值觀群體不同對政治信任分歧的影響很大。首先，大多數的價值觀群體的政權機構信任在下降中，新世代中的民主價值觀者與低價值觀者信任度大幅滑落；儒家價值觀者的信任也在下降，但幅度較小；新世代混合價值觀者的政權機構信任甚至還提高。新世代的不同價值觀者相較於他們更早的世代，政治信任產生明顯的分歧，民主價值觀者與低價值觀對政權機構的信任偏低，儒家價值觀者與混合價值觀者的信任度則比較高，差異性具有顯著性。從迴歸模型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影響政權機構信任的主要因素，民眾對於儒家價值的信仰將會增加其政治信任，但民主價值變化的影響則不明顯。若從價值觀分類來看，民主價值觀群體對比儒家價值觀群體，其政權機構信任大幅降低。

當我們轉向制度正當性的分析時，使用世代差異的角度來理解，可以發現中國民眾對於政治制度的高度認可正在因為世代差異而逐步下滑中。除了混合價值觀者外，其他價值觀群體因為受到結構性因素變遷的影響，新世代的制度正當性都下降了，而儒家價值觀者與低價值觀者中的這種差異具有顯著性。回到價值觀結構的概念來看待，新世代中兩組數目相當的價值觀群體對於制度正當性給出了不同的評價，雖然不像政治信任那樣出現重大的分歧，但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之間的差異則仍然可以被辨認出來。符合價值觀變遷理論的趨同性假設。當我們進一步檢視其他影響變項時，可以發現持續對制度正當性具有正向影響的包括居於在東部、正式黨員的身份、對於國家經濟現況以及未來家庭經濟情況的更好評估、更多的政治閱聽以及親近人群的人際信任。這些變數展現了受訪者更居於目前制度受惠者的角色。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更會展現其對於制度正當性的認可。



整體來看，世代差異與價值觀群體的不同確會造成政治支持的變遷，雖然有兩種層次上的差異，政治信任變遷的內容是新世代中因為價值觀差異而更為分歧，而制度正當性則是以具有較低正當性認可的民主價值觀群體的增加展現其差異。民主價值觀者做為關鍵群體，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明顯低於儒家價值觀與混合價值觀的群體，符合趨同理論的假設，也可以看出在中國競爭性價值觀在新世代之中仍然在對抗的情況。更重要的是，民主價值觀群體的出現是建立在現代化的環境之下，包括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世代交替、以及擺脫了先前的狂暴政治運動潮。這一章分析證實了中國的價值觀變遷正在發生中，從經濟賦權到文化賦權有了初步的成果，而從文化賦權到制度賦權的中介條件之一，政治信任的分歧，明顯地正在新世代中發生。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處理價值觀變遷是否影響了民眾政治參與的問題。

第六章 新世代與政治參與



中國近 30 年的發展，因為經濟政策的放鬆形成整個經濟結構的變遷，也拉動了社會變化，1970 年代後出生的民眾開始生活在一個比較不同的結構環境中，到了 1980 年代出生的新世代，更是完全擺脫了此前的政治文化結構的限制。新的價值觀正在成形，並開始與政治支持的分歧有所關聯。如果要進一步落實到體制賦權，從群眾面的民主化理論出發，還需要一個與集體行動的聯結性。這一章將進行近年來中國民眾政治參與相關內容的探索。

對於本文而言，我們所關心的是由於改革開放所形成的社會矛盾，是否使得新世代在政治參與方面與年長世代不同，而這種變化是否因為世代交替與價值觀變遷而出現。同樣使用 2011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針對全中國的訪問資料，藉由代表性抽樣過程，希望可以推論中國大陸民眾態度的集體性傾向。以下將首先就中國民眾政治參與的基本內容進行分析，第二節使用因素分析法對政治參與進行分類以及檢視中國民眾政治參與內容的變化，第三節則是處理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對於各類政治參與類型的影響。

第一節 政治參與的基本內容

壹、改革開放與社會矛盾

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以來，中國的社會發展就進入另一個不同的階段。從 2009 年到 2010 年之間正是民間維權與政府維穩之間相互消長的重要時期。首先是「維權」，從網路到實體社會，各地都有眾多的維權事件發生。除了個人的維權行為外，在社會發展浪潮的擴張下，在農村由於土地徵收、農民抗稅，在城市則是

房屋遷建、工人下崗等社會矛盾引發許多群體性事件，基本上這些也是社會維權的一部分。在民間社會的另一面，中國政府方面則是為了因應這個現象從中央到地方紛紛成立「維穩辦」，並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維穩」工作。據官方資料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 2009 年增加 16%，2010 年的增幅又將近一成，實際金額高達 5140 億元人民幣，與國防開支差不多（張鐵志，2010）。在維權與維穩之間，貫穿兩者的則是中國各地日益增長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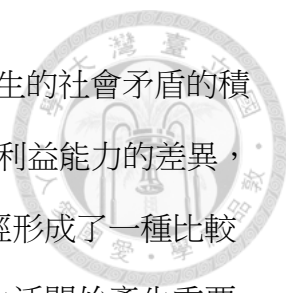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以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佈了《二〇一〇年社會藍皮書》，同時對中國社會情勢進行說明。報告會中指出，中國各地加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累積過多歷史矛盾與問題，因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造成民怨太深，導致今年群體性事件不斷爆發。⁶² 其實不只是今年，自 2000 以來中國社會上群體性事件數量就不斷攀升，到了 2008、2009 年更是發生許多社會注目的事件，⁶³ 甚至有媒體把 2008 年稱為「群體性事件爆發年」。這些群體性事件正是顯示中國社會目前處在一個緊張的臨界點，各級政府對於維持社會穩定一事具有莫大的需要。

李偉南、陳玉梅（2010）提出臨界點的概念說明中國社會矛盾的現況，⁶⁴ 當利益矛盾積累到一定的程度，突破了臨界點，必然會爆發群體性社會衝突。徐行、王海峰（2010）則歸納了群體性事件三種不同的成因，首先是「不同階層間的利益冷漠與相近階層間的共同社會心理，構成了易於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基礎」。從近年來參與群體性的人員身分來看，內容十分複雜，包括有國有企業的下崗失業職工、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權益受損職工、失地農民、農民工、房屋拆遷戶、庫區移民、軍轉幹部、計程車司機、環境污染受害者、教師、中小學生和其他非特定身分的各種主體等（張傳鶴，2010）。這些成員反映了中國社會新的階層分化正在形成，階層間正在發生利益競合的關係。

⁶² 中國時報，2009 年 12 月 22 日，A15 版。

⁶³ 包括貴州甕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川渝教師罷課事件等等。

⁶⁴ 臨界點由三個因素組成，一是民眾所能承受的生存壓力的底線，二是整個社會對利益矛盾的包容度和彈性空間的邊界，三是政府化解利益矛盾的能力和利益協調機制的有效性。



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社會資源配置不公，利益格局變化產生的社會矛盾的積累」，進而成為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這也是由群體間競爭利益能力的差異，強勢群體有能力進行組織來爭取資源，近來的發展，其不僅已經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定的結盟關係，而且具有了相當大的社會能量，對整個社會生活開始產生重要的影響（姚勝南，2010）。

第三個因素與政府能力有關，「政府治理的缺失是群體性事件產生的機制根源」。這個因素尤其與地方政府的措施相關，一方面為了發展，地方政府無視經濟和社會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以發展為藉口，漠視弱勢群體權利，甚至犧牲一個階層利益滿足另一個階層利益，同時又有腐敗問題（姚勝南，2010）。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對社會穩定的高度重視，對地方形成治理的壓力，為了政績好看，地方政府對於民眾的維權問題多採取盡力壓下，不要擴大事端的心態面對，結果民眾不滿無法緩和，就形成更大的事件，這就會成為一種惡性循環。

貳、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

如前所述，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成功，也帶來了新的社會矛盾。雖然目前的中共政權有足夠能力維持穩定局面，同時有效掌握政治改革的幅度與進度。但與此同時，社會面好發群體性事件的現象也仍然持續。除了群體性事件數量的快速攀升外，傳統的上訪、信訪等等公民政治行動都成為中國民眾政治參與重要的選項。

在 2011 年的問卷中，放入了一組對於民眾平時可能採取的各項政治參與的問題，以探測這些行動在中國民眾之中的發生頻率，這組題目是沿襲前二波調查中的設計，問題內容相當程度考慮了在中國社會中的特殊語境。在第三波的調查中，題組之前提供一段關於採取政治參與的背景說明，用來引導民眾進入情境之中。

其題幹如後：「人們有時會遇到一些個人或家庭問題需要領導幫忙，有時會對某項政策持不同看法；有時會對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有意見；有時還會遇到個別領導以權謀私。這時，他們往往會想辦法尋求解決。在過去三年中，您有沒有採取過以下辦法，提出您的意見或解決您遇到的問題？」

表 6-1 是可能的政治參與行為在 2011 年調查中的百分比分析。受訪者答項的安排包括四項，「0」為過去三年中沒做過，「1」為偶而做，「2」為有時做，「3」為經常做（遺漏值「7」為不適用，「9」為不回答），我們將「1」、「2」、「3」選項的百分比加總起來成為「做過」選項，置於「沒做過」的欄位旁以利比較。表 6-1 的分析中，也根據原始問項與世代差異所進行的交叉分析，進行了卡方值的檢定，結果置於最後一欄。

有幾項政治參與行動具有明顯的世代差異。「直接向領導反映意見」的卡方值為 17.073，顯著性介於.001 到.01 之間，最主要的差異是因為 70 後世代回答做過的受訪者達到 43%。「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的卡方值為 15.600，顯著性檢定介於.01 到.05 之間，回答做到的受訪者從年長世代的 25%，成長到 80 後世代的 31%。回答做到「寫信給報社」的人數較少，但卡方值為 40.279，顯著性檢定小於.001，也具有顯著差異，年長世代只有 2%回答做過此項，80 後世代則有 6%回答做過。「找領導的朋友或熟人說情」在世代之間也具有顯著差異，其卡方值為 55.016，顯著性檢定小於.001，百分比從年長世代的 14%回答做過，到了 80 後世代則有 25%的受訪者回答做過。另一項具有世代間顯著差異的為團結大夥一起去理論，在性質方面這是符合我們在前文所關心的群體性事件，結果發現 70 後世代與 80 後世代在這個問題的回答做過的分別為 15%與 16%，明顯高於年長世代 11%，卡方值為 21.809，顯著性檢定介於.001 到.01 之間。此外，「通過各級人大代表反映意見」、「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以及「上訪、遊行、示威、靜坐」三項政治參與行為在百分比分析中，用世代分類所進行的交叉列表分析沒有通過卡方值的顯著性檢定。

在百分比分析中具有顯著性的政治參與行為，第一組明顯的是與向上級請求

的行動比較有關，包括「直接向領導反映意見」、「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以及「找領導的朋友或熟人說情」，這三項都與面向領導有關，其回答做過的百分比也明顯高於其他的政治參與，在中國政治文化的脈絡中，向領導疏通進行政治請求仍然是比較安全與相對溫和的。而「通過各級人大代表反映意見」、「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以及「寫信給報社」三項屬於間接舉報的政治參與，僅有最後一項具有世代的顯著差異，而整體來說，其回答做過的比較都較低，皆為 10% 以下。

表 6-1 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百分比分析

政治參與項目	世代	N	沒做過	做過 ^a	偶爾做	有時做	經常做	Chi ² /Sig.
直接向領導反映意見	年長世代	1811	62%	38%	21%	14%	4%	17.073
	70 後	718	57%	43%	26%	13%	4%	**
	80 後	880	63%	37%	24%	10%	3%	
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	年長世代	1808	75%	25%	16%	8%	1%	15.600
	70 後	716	72%	28%	19%	7%	1%	*
	80 後	876	69%	31%	17%	11%	2%	
通過各級人大代表反映意見	年長世代	1806	91%	9%	5%	3%	1%	3.125
	70 後	715	90%	10%	6%	3%	1%	
	80 後	873	92%	8%	5%	2%	1%	
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	年長世代	1814	96%	4%	3%	1%	0%	12.085
	70 後	715	94%	6%	4%	1%	1%	
	80 後	882	94%	6%	4%	2%	0%	
寫信給報社	年長世代	1813	98%	2%	1%	0%	0%	40.279
	70 後	717	96%	4%	3%	0%	0%	***
	80 後	883	94%	6%	4%	1%	0%	
找領導的朋友或熟人說情	年長世代	1813	86%	14%	9%	4%	0%	55.016
	70 後	715	83%	17%	13%	3%	1%	***
	80 後	880	75%	25%	18%	6%	1%	
團結大夥一起去理論	年長世代	1813	89%	11%	7%	3%	1%	21.809
	70 後	718	85%	15%	11%	3%	1%	**
	80 後	882	84%	16%	11%	4%	1%	
上訪、遊行、示威、靜坐	年長世代	1813	97%	3%	2%	1%	0%	9.029
	70 後	714	98%	2%	1%	0%	0%	
	80 後	876	96%	4%	2%	1%	0%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a「做過」選項是「偶而做」、「有時做」以及「經常做」三項合計的結果。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第二節 政治參與的類型與變化



參、建構政治參與類型

為了進一步有效地分析不同政治參與的差異，本文接著對 2011 年中國民眾政治參與的調查結果執行了因素分析的程序 (factor analysis)，並得出此量表具有三個因素結構的結果。筆者針對政治參與的 8 個選擇重新編碼，將「1」到「3」編為有做過政治行動，「0」則是沒做過，其他設為缺失值。投入 SPSS 軟體並使用主成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s) 進行因素分析，轉軸法則是利用最大方差法 (varimax) 的正交法進行因素抽取。結果如表 6-2，表格下半部的統計訊息顯示因素分析模型的適合度檢定，KMO value 為.723，大於.5 而且相當接近 1，表示這些變項相當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另外，Bartlett 球形度檢驗的值為 4124.218，顯著性為.000，也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⁶⁵

表 6-2 上半部顯示了這 8 道政治參與題目中的 7 道題可抽出三個因子，第一個因子包括「直接向領導反映意見」、「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以及「找領導的朋友或熟人說情」等三題，轉軸後的因素負荷量分別為.692、.853 以及.720，因其共同特性都是找尋可以接近領導的關係，可以命名為「請求型」的政治參與；第二個因素包括「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以及「寫信給報社」，轉軸後的因素負荷量分別為.805 以及.873，其共同特性都是使用遞送文件的形成進行政治參與，可以命名為「舉報型」的政治參與；第三個因素則包括「團結大夥一起跟他理論」以及「上訪、遊行、示威、靜坐」兩道題，轉軸後的因素負荷量為.683 以及.849，強度最強，依其形態有可能發展成前文所提及的群體性事件，我們依這樣的共同特性將之命名為「抗議型」的政治參與。原題組中的「通過各級人大代表反映意見」，

⁶⁵ 相同的做法之前筆者也曾使用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第二波中國大陸資料中，得到的因子也是三類，具有相當的穩固性。(張佑宗、吳振嘉，2011)

由於無法與其他題組構成相關的連結，在本文的分析中將其去除。



表 6-2 政治參與類型因素分析表

	旋轉後矩陣		
	因數 1	因數 2	因數 3
直接向領導反映意見	.692	.030	.222
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	.853	.073	.059
找領導的朋友或熟人說情	.720	.207	.026
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	.146	.805	.226
寫信給報社	.099	.873	.100
團結大夥一起去理論	.302	.163	.683
上訪、遊行、示威、靜坐	-.013	.153	.849
統計模型訊息：			
取樣足夠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723	
Bartlett 的球形度檢驗	近似卡方	4124.218	
	自由度	21	
	顯著性	.000	

說明：1. 因素分析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2. 轉軸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肆、政治參與的變化：2001-2011

為了初步理解中國民眾政治參與的變化，除了 2011 年的第三波調查外，我們也使用了先前的兩波相同調查，分別為 2001 年與 2008 年。本文所使用的政治參與內容在前兩波中也都被用來對受訪者進行測量，所以我們可以用同樣的統計程式對前兩波的調查資料進行製作。同時使用三個指標來進行整合，在表 6-3 中，我們計數這三次調查中至少都有回答「偶而做」以上的民眾，包括「有時做」以及「經常做」作為採取一次以上政治行動者，回答「從沒做」則計數為未採取行動者，未回答者設為缺失值。大體上來說，採取「請求型」政治參與的民眾較多，這可能是因為這與過去中國講關係靠人情的社會條件比較相符，也被民眾認為比

較有效。回答採取過「舉報型」政治參與的比例很少，三次調查皆在個位數以下。最為特殊的則是「抗議型」政治參與的增加，與一般認為中國群體性事件增量的印象相符。



表 6-3 是否採取政治行動

(%)	2001 年調查			2009 年調查			2011 年調查		
政治行動 類型	請求	舉報	抗議	請求	舉報	抗議	請求	舉報	抗議
未採取行動	61.4	96.0	97.1	64.1	95.8	91.1	52.2	94.0	85.9
採取一次 以上	38.6	4.0	2.9	35.9	4.2	8.9	47.8	6.0	14.1
有效的 N	3076	3077	3076	3086	3028	3061	3378	3412	3401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2001、2009、2011 中國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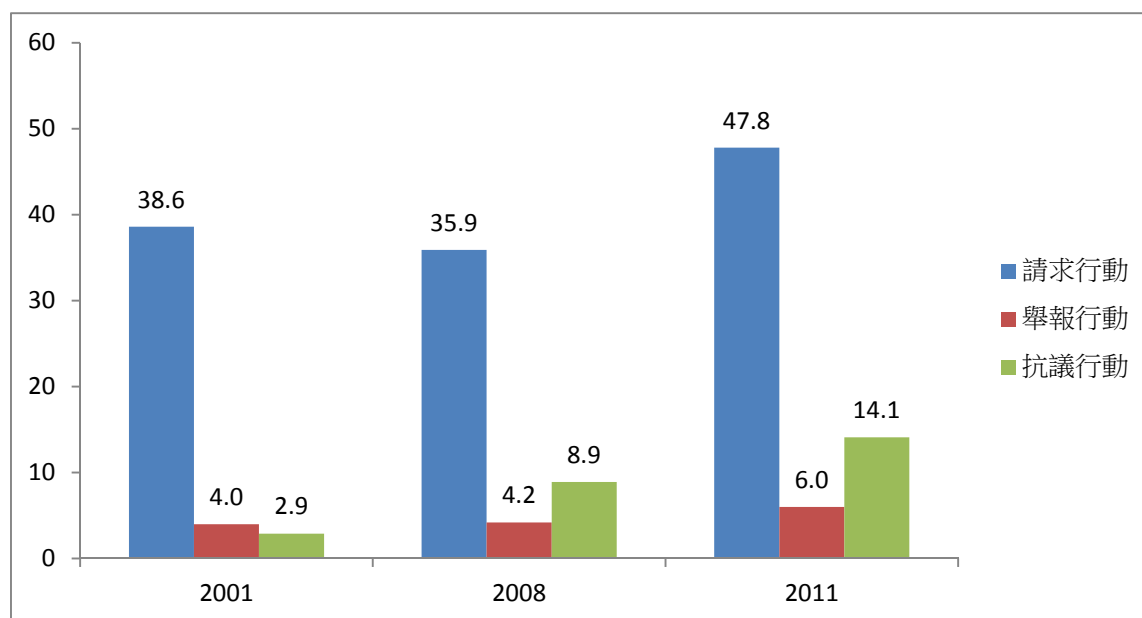


圖 6-1 三波調查中國民眾採取政治行動比較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2001、2009、2011 中國調查



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從 2001 到 2011 年之間的變化，可以用各種政治參與類型在這十年之間回答曾採取過的百分比整體性提高，同時以「抗議型」政治參與的快速提高做為顯著的特點。圖 6-1 可以展現這樣的圖象。2011 年的調查相較前兩波的結果，整體都提高了。「請求型」政治參與在 2001 年時的調查為 38.6%，2008 年調查稍降到 35.9%，2011 年調查則提高到 48.1%；「舉報型」政治參與整體而言雖然百分比不高，但也從 2001 年的 4.0% 微幅提高到 2011 年的 6.1%；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國民眾的「抗議型」政治參與在 2001 年只有 2.9% 的民眾回答有做過，2008 年調查的受訪者，8.9% 回答曾採取此種政治參與，到了 2011 年的調查，採取這類政治參與的人數已經達到 14.3%。其增長速度十分驚人。

中國民眾近年來的確有更高比例選擇了各種類型的政治參與行動。那麼，這些選擇進行政治參與的民眾是否具有某些特徵，是我們下一階段需要瞭解的問題。利用 2011 年的調查資料，我們比較三種不同的政治參與行動中，過去 3 年至少有從事一項的民眾與從未做過民眾之間的差異。

運用社會學的人口分類資訊進行交叉列表分析，希望可以辨認出這些民眾的特性。本文所使的社會學變項包括出生世代、價值觀群體、性別、城鄉別、地區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以及受訪者的主觀社會地位。表 6-4 為統計結果，表中只展現了某一社會學類別變項中，回答採取過該型政治參與的百分比，括號中的數值則是調整後殘差，顯著臨界值為正負 1.96，顯示該細格較期望值偏高或是偏低，每個變項也都進行了卡方值的顯著性檢定。

對於「請求型」政治參與而言，具顯著性的變項包括性別、城鄉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與主觀社會地位。就性別來看，男性選擇「請求型」政治參與的比例高於女性 (54%：42%)，調整後殘差達 7.3。城市的民眾也明顯地高於農村的民眾 (50%：40%)，調整後殘差為 2.6。教育程度方面，高教育程度者，包括各種大學以上學歷者，比中低教育程度的其他兩分類都更會選擇採取「請求型」政治參與 (66%：49%：41%)，調整後殘差為 7.3。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的政治



面貌在「請求型」政治參與中十分重要，身為正式黨員的受訪者有 60% 回答曾採取過此類政治參與，調整後殘差為 5.9；曾經申請過入黨的受訪者則有 62% 曾採取，調整後殘差為 5.6。兩者皆明顯高於一般群眾的 43%。受訪者的政治面貌提供了他們更多的管道與政治能力，做出向領導請求的政治參與行動。而自認為中等社會階層的民眾則是三類社會地位分層中最傾向選擇請求行動的。整體而言，除了性別外，城鄉差異與教育程度都表現了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結果，但這結果更可能與政治能力有關，因為具有黨員身份與曾申請入黨的積極分子與一般群眾相比，更會進行「請求型」的政治參與。

就「舉報型」政治參與而言，本來就是三項政治參與行動最少人參與的（平均僅 6%）。加上寫信給政府部門與報社需要相當的知識門檻與時間成本，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此項行動的民眾特性與所具有社會資源有些關係。從表 6-4 中來看，具有顯著性包括世代中的 80 後世代、價值觀群體中的低價值觀者、男性、居住於城市的居民、教育程度達中學以上者、正式黨員以及主觀社會地位在中層以上的受訪民眾。

我們最為注意的是選擇「抗議型」政治參與的民眾特質，從表 6-4 的第三欄中看來，這群人更傾向集中於 80 後世代、男性、中西部地區、以及教育程度大學以上的民眾。最值得注意的是，這群人之中有依世代差異逐漸增加的趨勢，最高的百分比出現在 70 後 (16%) 與 80 後 (17% 為 3.4)，80 後世代的調整後殘差也突破了臨界值 (為 3.4)，明顯高於其他世代。其他的變項中，選擇抗議行動的民眾中，男性的百分比明顯高於女性 (18%：11%)，調整後殘差達 5.7。地區則是中部與西部地區都偏高，前者百分比為 15%，調整後殘差為 2.0，後者則以 16% 以及調整後殘差達 2.0 展現其顯著性。教育程度中則是以高教育程度明顯高於其他兩個類別為其特徵，百分比達 20%，調整後殘差為 3.5。在最令人注目的「抗議型」政治參與，新世代的參與是一個顯著特徵。但與現代化程度相關的變數只有教育程度有關，在地區變項中，反而是現代化程度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的民眾採取此行

動比例更高。在下個部分，我們將使用對數成敗比迴歸模型來分析各變項與是否採取各類型政治參與之間的因果關係。



表 6-4 採取政治行動者的社會學變項分析表

		請求型		舉報型		抗議型	
		%(a.r.)	Chi ² /Sig.	%(a.r.)	Chi ² /Sig.	%(a.r.)	Chi ² /Sig.
出生世代	年長世代	46 (-2.2)		5 (-2.6)		12 (-4.1)	
	70後世代	51 (1.9)	5.443	7 (.6)	7.612 *	16 (1.3)	17.596 ***
	80後世代	49 (.5)		8 (2.4)		18 (3.4)	
價值觀 群體	民主價值	55 (1.0)		10 (2.9)		20 (1.8)	
	混合價值	52 (-.3)	5.092	7 (-.6)	18.908 ***	15 (-1.3)	6.514
	儒家價值	51 (-1.9)		5 (-3.8)		16 (-1.6)	
	低價值觀	57 (1.6)		10 (2.2)		20 (1.2)	
性別	男性	54 (7.2)	52.057 ***	8 (3.8)	14.066 ***	18 (5.6)	30.962 ***
	女性	42 (-7.2)		5 (-3.8)		11 (-5.6)	
城鄉別	城市	50 (2.8)	7.776 **	7 (2.5)	6.186 *	15 (1.3)	1.800
	農村	46 (-2.8)		5 (-2.5)		13 (-1.3)	
地區別	東部地區	46 (-1.1)		6 (-.8)		10 (-4.2)	
	中部地區	48 (-.1)	1.966	7 (1.8)	3.273	15 (2.0)	17.871 ***
	西部地區	50 (1.2)		5 (-1.2)		16 (2.0)	
教育 程度	小學以下	41 (-5.9)	71.332 ***	3 (-4.5)	24.644 ***	12 (-2.6)	15.090 **
	中學程度	49 (.9)		7 (2.2)		14 (.2)	
	大學以上	65 (7.3)		10 (3.2)		20 (3.5)	
政治面貌	黨員	60 (5.9)	77.911 ***	9 (3.4)	15.465 ***	15 (.3)	2.953
	申請過	62 (5.6)		8 (1.4)		17 (1.6)	
	群眾	43 (-8.8)		5 (-3.8)		14 (-1.4)	
主觀社會 地位	基層	44 (-4.4)	19.863 ***	5 (-3.4)	12.802 **	13 (-1.9)	4.112
	中層	53 (3.6)		7 (2.0)		15 (1.0)	
	高層	52 (1.5)		8 (2.3)		16 (1.4)	

說明：1. 細格中的資料為相較於未採取行動者之百分比，括弧內則顯示該細格之調整後殘差值，在統計分析上，其顯著臨界值為正負 1.96。

2.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若從變項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各項政治參與行動最具有解釋力的是性別與教育程度，而且都是男性高於女性，高教育程度高於較低教育程度者。城鄉差異、政治面貌與主觀社會地位則解釋了「請求型」政治參與以及「舉報型」政治參與，對「抗議型」政治參與則沒有差異。最重要的是，出生世代對於「舉

報型」政治參與以及「抗議型」政治參與的顯著表現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結合 80 後新世代、西部地區與大學以上的中國民眾，隨著其數量與社會影響力的逐漸提升，是否會成為中國政府完善治理的重要對象。在初步的交叉列表分析中，我們並沒有看出價值觀群體的差異明顯地與民眾的政治參與有關，僅在「舉報型」政治參與中，民主價值觀者與低價值觀者表現的更為突出一些，在「抗議型」政治參與則沒有顯著差異。

第三節 政治參與的世代差異

本章政治參與變項的處理，首先是經過因素分析歸類出三種不同型態的政治參與類型，在計數有效數量的方式是採取受訪者是否曾採取過為標準，只要在某一類型的政治參與行動回答曾經採取，我們就計數為「1」，沒有參與者計數為「0」，是一組 2 分類的變項。為了區分有採取以及沒有採取這兩類人的特質，我們採取了二元對數成敗比迴歸模型進行分析，以下分別以是否採取過「請求型」、「舉報型」以及「抗議型」政治參與為依變項，主要看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是對政治參與的增加有正向的影響。

壹、請求型政治參與

「請求型」政治參與的內容包括三項，「直接向領導反映意見」、「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以及「找領導的朋友或熟人說情」等，這組題目的政治參與內容，其特徵主要是在原有的管理體系之中尋求救濟與改善的方式，相對比較溫和。在中國的社會中，傳統上也有「找門道」、「攀關係」等在人際網絡之中用力，以取得在關係網絡中具有方便性的說法。可以預期，這個政治參與可以得到中國民

眾更多的回應。

表 6-5 展現了「請求型」政治參與的四組羅吉斯迴歸模型。在第一個只針對世代差異進行檢驗的模型中，可以發現 70 後世代是三個世代中最多回答曾採取過「請求型」政治參與的群體，可以理解 70 後世代目前正是社會的中堅群體，也具有更多的需要與社會資源進行「請求型」政治參與。不過，在第二個模型中，當我們加入其他的控制變項後，世代差異對於採取「請求型」政治參與的影響發生了變化，80 後世代對於「請求型」政治參與的影響成為負向，較其他世代更不會採取此種參與。其他對於此項政治參與的影響，包括男性高於女性、西部居民相較於其他地區居民更高，曾申請入黨的積極分子較黨員與群眾來的高等。

第三個與第四個模型是為了檢驗價值觀變遷對於「請求型」政治參與的影響，同樣對於相關變項進行了控制。結果發現，民主價值觀分數會減少民眾的「請求型」政治參與，但在價值觀群體中則沒有明顯的差異。雖然影響不是那麼徹底，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請求型」政治參與並不與逐漸提高的民主價值觀契合，這個發展目前雖不明顯，但當新世代的民主價值觀持續升高，未來中國民眾的民主價值觀群體就比較有可能傾向不採取傳統的「請求型」政治參與。如果我們把變項轉移到訊息管道、經濟評估、政治涉入與人際關係等因素中，首先可以發現經濟評估對於「請求型」政治參與沒有影響；訊息管道中的管道數量與談論小道消息則會提高採取「請求型」政治參與的比例；更高的政治興趣以及具有較緊密人際關係者也會更容易採取「請求型」政治參與；對於親近人際信任更為信任則會減少「請求型」政治參與的比例。

整體而言，價值觀變遷對於「請求型」政治參與的影響，目前看來只有民主價值觀分數的變動會降低採取此行動的比例。其他會影響此項政治參與的特徵包括居住於西部、曾申請入黨、更多的政府與政治訊息管道以及接觸小道消息、更高的政治興趣以及更緊密的人際關係。



貳、舉報型政治參與

當焦點轉移到「舉報型」政治參與，內容包括「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以及「寫信給報社」，這兩項政治參與的特色是在現有行政層級之外，甚至是尋求其他特別制度（信訪）的救濟行動。

在表 6-6 的第一個迴歸模型中，可以發現 80 後世代在「舉報型」政治參與中回答曾採取的比例較其他世代更為明顯，這與他們具有更多的能力有所關聯。由於回答的比例很少，大多數的變項與「舉報型」政治參與之間的顯著性不明顯。在第二個模型中，控制了其他社會學變項後的世代差異就喪失了顯著性，而男性、接觸政治與政府訊息管道較多以及具有政治效能感者，會有更高的比例採取「舉報型」政治參與，這些變項也關聯了受訪者的政治能力。

當把焦點轉向本文所關注的價值觀變遷，可以發現雖然民主價值分數與儒家價值分數與此項政治參與具有顯著性，但其方向性都是負的。也就是說，具有特定價值觀的民眾採取「舉報型」政治參與的比例將會更低。換句話說，當受訪者不具有特定價值觀，相較其他價值觀群體，採取「舉報型」政治參與的比例會更高，這與模型四所提供的訊息一致。

整體而言，價值觀變遷對於是否採取「舉報型」政治參與，其影響是負向的，會採取「舉報型」政治參與的民眾，不論是民主價值或是儒家價值，其價值觀分數都偏低。其他重要特徵則包括，男性、更多的政治訊息接收管道、更高的政治興趣以及政治效能感。

參、抗議型政治參與

第三組與政治參與有關的題目包括較為激烈的行動，內容是「團結大夥一起



跟他理論」以及「上訪、遊行、示威、靜坐」等，這些行動型態與中國目前逐漸增加的群體性事件有所關聯。我們具有興趣的是，「抗議型」政治參與與世代差異以及價值觀變遷是否具有關係。

表 6-7 包括了四組羅吉斯迴歸的檢驗。首先，在第一欄的世代差異與是否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的因果關係具有顯著性，內容是 70 後世代較年長世代更會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而 80 後世代的比例更高，顯著地高於年長世代，同時其系數也高於 70 後世代。在納入其他控制變項後，世代差異的影響被其他變項吸收，具有顯著性的變項包括性別、居住地區、政治面貌、訊息管道等。男性會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的比例明顯高於女性；在居住地區方面，以中部省份的民眾為對照組，東部的受訪者採取此項行動的比例較低，西部的受訪者明顯較高；具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受訪者相較於曾申請入黨以及群眾更不會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符合其更居於政治正當性位置的情況。

當我們納入價值觀變遷的考慮後，從第三欄的模型結果可以發現僅有儒家價值觀分數對於「抗議型」政治參與帶有弱化的影響，這與此項政治參與的性質有關，儒家價值觀與更為保守的傾向相關聯，也更不會選擇較為激烈的政治參與，但這種影響與民主價值觀分數對於「請求型」政治參與的影響一樣，都是處於在發展中的情況，並非完全符合理論預期，因為在第四欄以價值觀群體為變項的模型中，民主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觀者就沒有顯著的比例上差異。

在其他的變項方面，基本社會學變項對於受訪者是否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的解釋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性別差異上，男性的比例高於女性。其次，地區差異與是否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的影響十分顯著，其中東部地區較中部地區的受訪者更不會採取此行動，相對地西部地區則是有更高的比例會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訊息管道的影響只有管道數量一項具有顯著性，有著更多接觸政治與政府訊息的受訪者比較容易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這在「請求型」與「舉報型」的政治參與中同樣保持顯著。對未來家庭經濟具有更好的評估、更高的政治

興趣以及具有較緊密的人際關係，這類受訪者較會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可能是因為這有助於他們進行集體行動的動員。此外，具有整體人際信任的受訪者其加入「抗議型」政治參與的比例會比較低。

整體來看，價值觀變遷目前看來對於「抗議型」政治參與的影響並不全面，我們只能發現受訪者具有更高的儒家價值分數，參與此類政治行動的比例更低。在社會特徵方面，受到經濟發展正向影響的中國民眾採取行動的比例會比較低，包括東部居民、正式黨員以及對家庭未來經濟情況給予更高評估的。民眾的政治訊息管道數量、個人的政治興趣以及人際關係的緊密度將有正面的影響，這些結果相當符合政治行動者的特質。

表 6-5 請求型政治參與的羅吉斯迴歸

依變項: 請求型政治參與	1	2	3	4
(常量)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世代(年長者)				
70 後世代	.197 (.089) *	-.047 (.123)	-.098 (.140)	-.105 (.140)
80 後世代	.113 (.083)	-.301 (.137) *	-.278 (.150)	-.261 (.150)
民主價值分數			-.154 (.063) *	
儒家價值分數			-.043 (.064)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257 (.146)
低價值觀				-.155 (.157)
混合價值				-.018 (.161)
性別(女性)				
男性		.303 (.097) **	.350 (.110) **	.335 (.110) **
教育程度		.076 (.030) *	.062 (.034)	.059 (.034)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017 (.101)	-.016 (.115)	-.014 (.115)
地區別(中部)				
東部		-.064 (.113)	-.077 (.127)	-.082 (.127)
西部		.395 (.125) **	.399 (.146) **	.412 (.146) **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111 (.139)	.182 (.155)	.165 (.155)
曾申請		.364 (.147) *	.448 (.162) **	.451 (.162) **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069 (.104)	-.039 (.118)	-.044 (.118)
上層		.001 (.148)	-.075 (.167)	-.078 (.167)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24 (.029)	.028 (.032)	.026 (.032)
閱讀政治訊息		-.016 (.036)	-.060 (.042)	-.062 (.042)
管道數量		.194 (.041) ****	.219 (.046) ****	.222 (.046) ****
小道消息		.225 (.056) ****	.214 (.064) **	.213 (.064) **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018 (.061)	-.010 (.070)	-.011 (.069)
家庭未來經濟		.113 (.066)	.136 (.076)	.143 (.077)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126 (.041) **	.161 (.047) **	.162 (.047) **
政治效能感		.092 (.072)	.072 (.084)	.072 (.084)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095 (.065)	-.052 (.075)	-.061 (.075)
親近人際信任		-.027 (.011) *	-.032 (.013) *	-.032 (.013) *
關係緊密度		.145 (.020) ****	.153 (.023) ****	.152 (.023) ****
模型訊息				
Cox & Snell R ²	.002	.127	.132	.131
Nagelkerke R ²	.002	.169	.177	.175
-2LL	4670.428	2702.681	2108.321	2107.353
N	3381	2176	1706	1703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表 6-6 舉報型政治參與的羅吉斯迴歸

依變項: 舉報型政治參與	1	2	3	4
(常量)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世代(年長者)	-2.931 (.107) ***	-3.560 (.785) ***	-3.799 (.850) ***	-3.883 (.869) ***
70 後世代	.269 (.186)	.089 (.235)	.135 (.249)	.123 (.248)
80 後世代	.440 (.166) **	.107 (.244)	.048 (.257)	.040 (.257)
民主價值分數			-.250 (.111) *	
儒家價值分數			-.236 (.108) *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171 (.262)
混合價值				-.049 (.299)
低價值觀				.714 (.270) **
性別(女性)				
男性		.462 (.190) *	.427 (.201) *	.398 (.201) *
教育程度		.061 (.057)	.075 (.062)	.064 (.062)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160 (.191)	.113 (.204)	.112 (.204)
地區別(中部)				
東部		-.094 (.214)	-.010 (.226)	-.040 (.225)
西部		.096 (.229)	.084 (.249)	.086 (.249)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103 (.228)	.129 (.245)	.113 (.246)
曾申請		-.139 (.267)	-.243 (.283)	-.226 (.284)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049 (.201)	-.032 (.213)	-.037 (.214)
上層		.118 (.252)	-.077 (.273)	-.091 (.274)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03 (.052)	.014 (.056)	.010 (.055)
閱讀政治訊息		-.038 (.074)	-.060 (.079)	-.061 (.079)
管道數量		.242 (.069) ***	.264 (.073) ***	.272 (.074) ***
小道消息		-.018 (.104)	-.114 (.111)	-.126 (.111)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111 (.112)	-.010 (.123)	-.017 (.122)
家庭未來經濟		.006 (.123)	.046 (.132)	.039 (.133)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230 (.084)	.225 (.089) *	.212 (.089) *
政治效能感		.507 (.125) ***	.508 (.137) ***	.493 (.137) ***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141 (.125)	.132 (.135)	.132 (.135)
親近人際信任		-.032 (.022)	-.035 (.024)	-.030 (.025)
緊密度		.034 (.039)	.025 (.042)	.028 (.042)
模型訊息				
Cox & Snell R ²	.002	.047	.051	.052
Nagelkerke R ²	.006	.117	.119	.121
-2LL	1548.609	1010.782	876.726	874.992
N	3415	2189	1716	1713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表 6-7 抗議型政治參與的羅吉斯迴歸

依變項:	1	2	3	4
抗議型政治參與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常量)	-2.004 (.073) ***	-2.974 (.541) ***	-2.753 (.587) ***	-2.668 (.595) ***
世代(年長者)				
70 後世代	.327 (.126) **	.228 (.155)	.235 (.166)	.242 (.166)
80 後世代	.457 (.115) ***	.065 (.174)	-.001 (.183)	.012 (.183)
民主價值分數			-.064 (.077)	
儒家價值分數			-.150 (.076) *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008 (.177)
混合價值				-.280 (.202)
低價值觀				.100 (.192)
性別(女性)				
男性		.411 (.128) **	.274 (.137) *	.272 (.137) *
教育程度		-.027 (.039)	-.073 (.043)	-.068 (.042)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128 (.131)	.098 (.141)	.101 (.141)
地區別(中部)				
東部		-.399 (.157) *	-.343 (.166) *	-.328 (.166) *
西部		.377 (.148) *	.468 (.162) **	.454 (.161) **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405 (.180) *	-.424 (.196) *	-.443 (.196) *
曾申請		-.141 (.184)	-.245 (.198)	-.262 (.198)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238 (.136)	.260 (.146)	.264 (.146)
上層		.175 (.186)	.001 (.206)	-.008 (.206)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17 (.037)	.014 (.040)	.020 (.039)
閱讀政治訊息		-.011 (.049)	-.021 (.052)	-.019 (.052)
管道數量		.198 (.050) ***	.214 (.053) ***	.220 (.053) ***
小道消息		.181 (.072) *	.122 (.078)	.116 (.078)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160 (.077) *	-.115 (.083)	-.125 (.083)
家庭未來經濟		.219 (.088) *	.230 (.095) *	.220 (.096) *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190 (.055) **	.181 (.060) **	.176 (.059) **
政治效能感		.092 (.091)	.104 (.100)	.121 (.100)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155 (.082)	-.203 (.090) *	-.200 (.090) *
親近人際信任		-.015 (.015)	-.014 (.016)	-.018 (.016)
關係緊密度		.049 (.026)	.057 (.029) *	.057 (.029) *
模型訊息				
Cox & Snell R2	.005	.062	.064	.064
Nagelkerke R2	.009	.103	.104	.103
-2LL	2754.415	1831.843	1552.944	1552.936
N	3404	2184	1711	1708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第四節 政治參與的動力



從政治參與的角度來觀察中國最近以來的變化，多數的研究都發現社會矛盾的擴大與群體性事件快速增加是主要特徵。本文依照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2011 年中國調查的結果進行分析，將政治參與的類型分為三項，分別為「請求型」、「舉報型」，以及「抗議型」的政治參與行動。可以發現，從 2001 年到 2011 年之間整體的變化，可以用各種類型的政治參與行動同步提高，同時以抗議行動的快速提高做為顯著的特點，此點與大多數中國社會觀察的結果相符。

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國民眾曾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的民眾，在 2001 年調查時僅有 2.9%，到了 2011 年，回答曾採取這類行動的人數已經達到 14.3%，增長速度十分驚人。這個初步結果顯示，近來對中國群體性事件的逐步增加的官方統計與研究資料，在大規模的抽樣調查中同樣也得到確證。

這些群眾的特徵為何呢？以社會學變數進行交叉列表的結果來看。採取請求行動的民眾主要是男性、居住於城市、教育程度高、正式黨員或曾經申請入黨者，以及自認為家庭社會地位為中層的受訪者，整體而言，除了性別外，城鄉差異與教育程度都表現了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結果，但這結果更可能與政治能力有關，因為具有黨員身份與曾申請入黨的積極分子與一般群眾相比，更會進行「請求型」的政治參與。會採取舉報行動的民眾背景大致是 80 後世代、價值觀群體中的低價值觀者、男性、居住於城市的居民、教育程度達中學以上者、正式黨員以及主觀社會地位在中層以上的受訪民眾。在本文比較關注的「抗議型」政治參與，新世代的參與是一個顯著特徵。但與現代化程度相關的變數只有教育程度有關，在地區變項中，反而是現代化程度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的民眾採取此行動比例更高。可是，本文所關心的重要變數價值觀變遷對於政治參與，尤其是「抗議型」政治參與，還沒有展現出其影響力，只有儒家價值會削弱民眾的「抗議型」政治參與。

整體而言，我們要持續注意的是，從世代差異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的政治

參與的數量、型態與內容都在轉變當中。雖然目前尚未與價值觀變遷有直接的關係，而是與居住於中、西部省分、更多的管道數量、對未來家庭經濟的改善評估、更高的政治興趣以及更緊密的人際關係等。這將成為未來民主化參與的潛在動力，一旦它與價值觀變遷有所關聯，一項體制的賦權過程就有可能被啟動。

第七章 新世代的民主支持



中國一邊探討應當實現怎麼樣的民主，一邊探索如何實現民主。中國的民主不僅僅對西方是個不確定數，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也是。

---- 鄭永年，聯合早報，2008 年 1 月 22 日，第 18 版

關於中國民眾意見調查中的民主支持，經常令研究者感到困惑。雖然生活在屬於西方所定義的威權政體中，可是大多數人民對於民主的支持度卻很高，對於所處環境的民主滿意度也相當高。這個問題也同樣存在於其他開發中國家之中 (Dalton, Shin and Jou, 2007)。在更廣泛的歷史脈絡之下，民主對於東亞地區而言是一個外來的事物。東亞在 18 世紀受到現代化的強勢西方文明入侵以前，一直擁有自己的政治與社會運作邏輯。其中，至少包括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與回教文化等社會型態。擁有長期支持社會運作的傳統文化，使這個區域在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持續存在著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拔河的過程。此外，因為各國歷史條件的不同，又產生了不同的現代化道路選擇，以及各種不同的政體。在這個背景下，一個令人關心的議題在於，民主在亞洲所代表的意義與其鞏固性。

中國案例具有特殊性，因為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它不僅是東亞，也是世界上經濟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許多觀察家與學者都評估中國已成為新的區域霸權，或是其他後進國家新的學習典範。在中國近來的崛起之後，環繞著政治制度的治理能力與經濟成就議題，使得在儒家文化圈的民眾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對於有效率的開明威權政府的好感。甚至，中國政府本身也正試圖主導關於治理正當性的論述，提出中國模式或是中國式民主的說法。這些情況使得之前因為亞洲四小龍崛起與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公開倡議而引起的「亞洲價值」討論重回舞台。那麼，中國民眾目前的民主支持情況如何呢？是否會受到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的影響？本章將從不同面向的民主支持以及民主認知內容來對其進行理解。



第一節 民主支持與民主認知

對於非西方地區民眾的民主支持測量是民主化研究者的一大難題，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三波調查中也是如此。⁶⁶ 根據最近一波的調查結果，民主支持指標做了一些新的修正，同時也加入一組關於民主認知的題組，本節擬先說明這兩組測量的內容，第二節使用新的民主支持題組來理解中國民眾的現況，第三節則是針對民主認知，第四節為小結。

壹、民主支持的三種不同元素

民主支持的測量在西方政治學研究中仍然具有爭議，尤其是將其套用在不同文化脈絡的社會中。早期的民主支持測量受到 David Easton 的影響，將系統穩定與預設民主體制做為理論背景，用間接的方式來測量民主國家中民主正當性的基礎。

⁶⁷ 但在第三波民主化興起後，許多學者建議應該使用更為直接的方式來測量民主正當性，Chu and Chang (2001) 認為必須從過去著重對政治過程或民主穩定的測量，轉移到系統文化層次 (system culture) 或是體制危機 (regime crisis) 的測量。

在測量工具方面，許多學者都主張應該區分民主支持的不同面向。例如 Morlino and Montero (1995) 認為民主正當性包括三個面向：普遍的正當性 (diffuse

⁶⁶ 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超過 30 年後，自由民主體制仍然無法完全取得 Fukuyama 所預期的歷史勝利。其中，就像 Huntington 所指出的，一個具有競爭性文明的區域就是東亞。其理由可能包括了本地區先前所具備的高度文明、多元的地區文化以及分歧的政治體制。在 ABSIII 所涵蓋的研究範圍中，至少就包括了以下幾種型態的政體：自由民主（包括老牌民主國家日本以及第三波民主化後鞏固下來的新興民主政體的南韓與台灣）、選舉民主（蒙古、印尼、菲律賓以及泰國）、選舉威權（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以及柬埔寨）以及一黨威權主義政府（越南以及中國）。

⁶⁷ 包括測量民眾的政治疏離感 (alienation)、政治信任 (political trust)、政治功效感 (political efficacy) 等政治過程的面向 (Almond, 1990)。但這種測量方法不但不適合用在民主穩定的國家，更不適合針對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民主正當性的研究。

legitimacy)、缺席下的正當性 (legitimacy by default) 與效能 (efficacy)。⁶⁸ Rose et al. (1998) 則是認為民主正當性可以包括絕對的民主正當性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與相對的民主正當性 (contingent to democracy) 兩種類型。⁶⁹ Diamond (1999) 也認為民主正當性應該包含本質性的正當性 (intrinsic legitimacy) 與工具性的正當性 (instrumental legitimacy) 兩個面向。⁷⁰

可見，想要有效地測量群眾的民主支持，單一指標顯然是不足夠的。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第三波調查中，對於民主支持的測量使用了三組不同面向的題目。首先，是直接測量民眾對於民主制度的認可程度，意指民眾對於民主政府與民主體制的普遍性支持。包括是否認為民主是「最好制度」、與其他制度相比的「民主偏好」以及民主制度能夠解決問題的「民主效能」。

其次，是民主與其他價值之間的排擠效應。在東亞的社會中，有一種特別強調經濟發展的傾向，尤其是在成功的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與中國崛起之後，追求經濟崛起與國家競爭力成為可欲的與優先性的選項。在此前提下，可以忍受局部的管制或是放棄政治自由。對此特殊現象，我們測量民眾對於兩種目標或價值競爭下的選擇問題，分別是民主與經濟發展、保護政治自由與減少經濟不平等之間，那個對受訪者而言比較重要。

另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在東亞的一個長期性的現象。除了日本之外，此地區的許多國家或社會都在很長一段時間處於各種型式的威權統治下，威權體制對此

⁶⁸ 「普遍的正當性」是指體系成員相信民主體制絕對是最好的選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改變對民主體制的支持。「缺席下的正當性」，係指體系成員對過去威權體制強烈的否定，希望藉由目前的民主體制以改善現狀。至於「效能」，是指體系成員滿意當前民主體制各種表現的程度，認為民主體制可以有效解決各種疑難雜症。

⁶⁹ 「絕對的民主正當性」，就是深信在所有可能實現的政治體制中，民主體制是最好的、最優越的。「相對的民主正當性」，是指不一定相信民主政體永遠是最好，但至少相信民主(相對於非民主體制)更適合自己的國情，或更適合目前的發展階段需要。

⁷⁰ 「本質性的正當性」就是對於民主體制的支持是原則性的，是與個人的信念、體系相結合的，不會輕易受到民主政體的實際運作情形好壞的影響，也不會輕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劇烈變動而動搖。「工具性的正當性」就是對於民主體制的支持與否，與民主政體的運作品質與政策效能密切關連的，也就是說對於民主政體的支持，會因為民主運作品質的低落或政策效能不彰，而產生動搖，讓非民主政體有取而代之的機會。

地區的人民的長期影響會如何在民眾的意見中呈現。⁷¹ 理論上，對於民主支持的另一面應該是排拒其他非民主政府的統治形式，這在 Morlino and Montero 的定義中被視為「缺席下的正當性」。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第三波研究中，同時處理了四種型式的威權政府被抵制的程度，包括強人、軍隊、專家以及政黨威權。不過，由於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現況，本文在處理時排除政黨威權的型態。

民主支持這三個面向，我們可以視之為「直接民主正當性」、「比較民主正當性」以及「威權抵制」。在第二節中，我們將檢視這三組指標在中國民眾意見中的變化，並以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的角度加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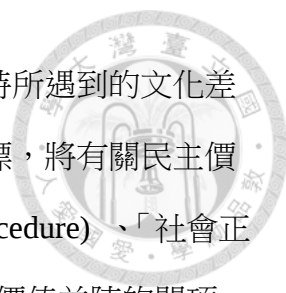
貳、兩組民主認知

測量民眾的民主支持在第三波民主化後成為重要的議題。但是，研究新興民主國家的學者也提出質疑，包括東歐、非洲、東亞等地區的民主化，在這些研究地區裡居住的人民，是否真的了解什麼是民主，尤其是在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一些區域，在當地人們的心中，雖然民主與一些正向的價值觀有所連結，但是對民主本身的概念卻是支離破碎且模糊不清的。Dalton, Shin and Jou (2007) 以不同的民主界定方式整理了包括東歐、亞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民眾在調查研究中對於民主的認知，並與先進的民主國家做比較。其定義民主的方式包括三個面向，包括「公民權利」、「民主的政治過程」以及「社會福利」。另外，因為使用開放式問題，在他們研究還包括了相當數量（約 20%）的「無法歸類」的回答。

經過前二波調查的經驗，⁷²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在第三波調查中，進一步深化

⁷¹ 台灣與南韓在第三波民主化期間脫離了威權主義，在此之前分別是政黨威權與軍事威權政府；蒙古的前身為蘇聯的附庸國，1990 年才進行了民主革命；印尼與菲律賓都受到強人政治的統治，民主化後仍受困於不穩定的民主品質；泰國才經歷過一次軍事政變，近來才又重回民主體制；此外，雖然程度有所不同，但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香港由於選舉制度的不公平，被視為是選舉威權體制；柬埔寨的體制仍未明朗，國際上大多認為是以政治領導人洪森為主的獨裁政體；越南與中國則仍然保持後共產主義的威權政府。

⁷² 東亞民主研究計劃關於「民主」概念的測量有長期的經驗，我們發現有關「民主」此一概念，



對於民主概念的測量。為了處理關於民主概念在進行跨國調查時所遇到的文化差異問題，第三波的調查在第二波題目的基礎上發展了一組新指標，將有關民主價值的 4 種可能認知：「公民權利」(Freedom)、「民主程序」(Procedure)、「社會正義」(Equality) 以及「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 轉化成 4 組價值並陳的問項，以測知受訪者心中對於民主一詞的真正理解。

在概念的處理上，筆者認為可以將上述 4 組民主意義歸納為兩組不同的民主認知方式。第一組包括了強調公民權利以及民主程序等相關概念，這組認知與一般所認知的自由民主核心原則有直接的關係，也受到許多民主理論研究者的支持。第二組概念可以包括社會正義與良好治理，在東亞的脈絡下，對於公平與治理的民主意義可能更受重視，其中隱含儒家文化的影響。我們可以利用民眾對於民主不同認知的內容進行民主類型的分類，包括「權利-程序式民主」與「效能-分配式民主」兩類。前者更傾向西方的民主標準，後者則與儒家文化的某些價值相合。在第三節中，我們將針對中國民眾的民主認知內容進行分析。

第二節 中國民眾的民主支持

壹、基本分佈

我們以三個角度來理解中國民眾的民主支持，表 7-1 羅列了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釐清。在第一波的調查資料中，我們與 Dalton, Shin and Jou (2007) 的努力相同，使用開放式的問題。當設計出一套分類方式時，我們遇到了一些問題：太多不同的答案。許多人民主視為是一個「可欲」之物，或是一相當抽象的概念，即便有部份共通的理解，但仍舊無統整出一個令人信服有關何謂民主的觀點。在第二波的調查中，我們採取了封閉的制式問卷，給予受訪者四個政治體制的特點，並且詢問受訪者辨別哪一個選項為民主必要的內涵。然而，此種方式依然產生了一個令人困惑的圖像。例如南韓的調查結果，過半的民眾選擇了實質性、物質取向的答案，如「縮短貧富差距」；另外一個問題則在於，我們無法得知人民是否將民主一詞，聯想成一個理想的、符合他們的期望的，或是聯想成他們目前正經驗著的體制。在第二波調查中的單一封閉式問題包括了 4 個面向，包括 Dalton, Shin and Jou 的三面向之外，還加上了良好治理的面向，這個面向的理解在東亞國家的民眾中，似乎佔有重要的位子。



所使用的 8 個題目，並呈現了 2011 年中國調查中的百分比分佈。前三個題目目標在測量直接民主正當性，在整體的層次，我們發現中國民眾的直接民主正當性都很高。包括認為民主是「最好制度」的民眾，佔了全體的 88%。其次，其他政體相比，民主體制都比較好的「民主偏好」，認可的民眾佔了 68%，另外，認為專制政府在某些情況下比民主政府好的民眾，佔 13%，認為都一樣的民眾則佔了 21%。而對於民主是否能夠解決我們社會中的問題的「民主效能」方面，認可的民眾佔了 82%。整體而言，中國民眾具有很高的直接民主正當性。

在控制世代差異後，可以發現只有前兩題的卡方值檢定是直接民主正當性題組中具有差異的部分，但在「民主效能」變項中差異並不顯著。進一步分析，其中差異內容的變化令我們感到困惑。在民主是「最好制度」方面，「80 後」新世代與年長世相比，同意的百分比少了 5%，尤其是回答「非常同意」者；同時，回答「不同意」者則是成長了 5%，是主要差異的來源（表 7-1 中的細格皆經過調查整後殘差的檢定，以數字後方的+、-標示結果）。在「民主偏好」方面，「80 後」新世代與年長世代相比，認為民主政體比其他任何政體好的民眾，下降了 11%；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專制政府比民主體制來的好，其百分比則是上升 8%。這些結果顯示，新世代的直接民主正性比前一個世代更低。這種世代間態度變化相當出乎一般的預期。

當我們檢視中國民眾的比較民主正當性時，其中的變化也同樣令人難以理解。比較民主正當性的測量，是讓受訪者在「民主」與「經濟發展」、或是「保護政治自由」與「減少經濟不平等」兩種發展目標中選擇。從表 7-1 中，我們首先可以發現，中 60% 的中國民眾認為「經濟發展」比「民主」來的重要，而有 52% 的民眾則是認為「減少經濟不平等」比「保護政治自由」來的重要。由此來看，經濟議題目前在中國大陸仍然比政治議題來的更重要。當加入了世代差異的控制，則只有「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比較具有差異，主要的差異內容是新世代在回答「民主比較重要一些」的民眾增加了，上升 8%；可是，認為「經濟發展比較重

要一些」的新世代民眾也上升了 5%。減少的來源則是因為回答「經濟發展絕對重要」以及「兩個同樣重要」選項的下降。

與直接的或是比較的民主正當性不同，民主支持的第三個面向，威權抵制，則是呈現與理論預期較為一致的方向，顯著性也更為情晰。整體而言，有 69% 的中國民眾反對由一個「強人統治」來代替人大和選舉，也有 78% 的民眾反對由軍隊來統治國家的「軍人政府」，也有 80% 的民眾不同意由「專家政治」來取代人大和選舉。控制世代後，也可以明顯地發現，越年輕的世代對於各項威權統治的選項的認可度也越低。跟年長世代相比，「80 後」新世代不同意「強人統治」的比例增加了 9%，不同意「軍人政府」的比例增加了 15%，不同意「專家政治」的比例增加了 9%。這些數據顯示了新世代威權抵制的程度高於年長世代。

就民主支持指標在中國的測量而言，僅有對於威權抵制的測量符合了我們的理論預期，新世代展現了更傾向民主的態度。可是，在直接民主正當性以及比較民主正當性方面的測量結果則是令人費解。不僅是顯著性沒有普遍存在於各項指標中，年輕世代更是不符預期地展現了比年長世代更不支持民主的傾向。在下一部分，我們將使用因素分析法來處理這些指標。

表 7-1 民主支持基本分佈

直接民主正當性	全體	年長世代	70 後世代	80 後世代	Chi ²	Sig.		
雖然民主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仍然是最好的制度								
非常同意	16%	18%+	16%	13%-	25.851	***		
同意	72%	73%	71%	73%				
不同意	10%	8%-	12%	13%+				
非常不同意	1%	1%	1%	1%				
N	2934	1501	640	793				
民主政體總比任何政體好								
一個專制的政府比民主體制好	13%	11%-	12%	19%+	39.923	***		
民主體制和專制體制都是一樣的	22%	21%	23%	24%				
N	2813	1418	614	781				
民主能夠解決社會中問題								
民主不能解決社會中的問題	18%	18%	21%	18%	3.118			
N	2796	1427	612	757				
比較民主正當性								
民主絕對重要	6%	6%	6%	4%			45.095	***
民主比較重要一些	21%	18%-	19%	26%+				
經濟發展比較重要一些	37%	35%-	39%	40%+				
經濟發展絕對重要	23%	25%+	22%	19%-				
兩個同樣重要	14%	16%+	13%	10%-	14.793			
N	3081	1584	667	830				
保護政治自由絕對重要	7%	8%	7%	7%				
保護政治自由比較重要一些	28%	28%	27%	28%				
減少經濟不平等比較重要	35%	33%-	35%	39%+				
減少經濟不平等絕對重要	19%	19%	20%	17%				
兩個同樣重要	11%	12%+	11%	9%-				
N	2862	1440	633	789				
威權抵制								
讓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決策，代替人大和選舉								
非常同意	4%	4%	3%	3%	32.461	***		
同意	27%	31%+	22%-	23%-				
不同意	61%	57%-	66%+	65%+				
非常不同意	8%	8%	9%	9%				
N	3013	1548	638	827				
由軍隊來統治國家								
非常同意	3%	4%+	2%-	2%-	88.996	***		
同意	19%	24%+	17%	11%-				
不同意	65%	61%-	66%	72%+				
非常不同意	13%	11%-	15%+	15%+				
N	2973	1509	637	827				
由專家來決定一切，代替人大和選舉								
非常同意	2%	2%	2%	2%	34.254	***		
同意	18%	21%+	16%	13%-				
不同意	69%	67%-	70%	72%+				
非常不同意	11%	9%-	12%	13%+				
N	2985	1525	636	824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貳、三種民主支持概念的分佈

前文提到在進行民主支持測量時，可以使用三種不同的元素來理解民眾的態度，包括直接民主支持、比較民主支持以及威權抵制等三個面向。如果我們使用因素分析法，可以發現在中國 2011 年的調查資料中，經由統計軟體 SPSS 程序所形成的 3 組因子，基本上符合上述指標建構的設定。表 7-2 呈現了因素分析的結果，在過程中，我們使用主成份法 (principal components) 來進行因子萃取，以及利用最大變異法 (Varimax) 的正交法來進行轉軸。其結果顯示，其 KMO value 為.638，已經大於.5，符合了模型適合度檢定的標準。另外，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的值為 2342.041，顯著性為.000。這些指標都顯示，這些變項相當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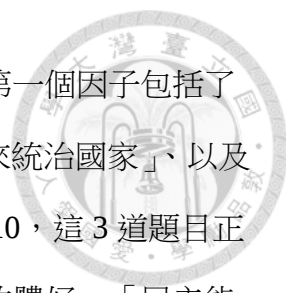
表 7-2 民主支持指標的因素分析

	旋轉後矩陣		
	因數 1	因數 2	因數 3
民主政體總比任何政體好	.157	.692	-.016
民主能夠解決社會中問題	-.017	.685	.109
雖然民主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仍然是最好的制度	-.078	.695	-.008
民主比經濟發展重要	.081	.081	.812
保護政治自由比減少經濟不平等重要	-.112	-.005	.813
讓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決策，代替人大和選舉	.788	.036	.018
由軍隊來統治國家	.768	-.009	-.032
由專家來決定一切，代替人大和選舉	.837	.028	-.025
統計模型訊息：			
取樣足夠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638	
Bartlett 的球形度檢驗	近似卡方	2342.041	
	自由度	28	
	顯著性	.0	

說明：1. 因素分析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2. 轉軸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從轉軸後的負荷量來看，這 8 道題目可以形成三個因子，第一個因子包括了「讓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決策，代替人大和選舉」、「由軍隊來統治國家」、以及「由專家決定一切，代表人大和選舉」，其因素負荷量皆高於.710，這 3 道題目正好符合威權抵制的內容。第二個因子包括「民主政體總比任何政體好」、「民主能夠解決社會中的問題」、以及「雖然民主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仍然是最好的制度」，這一組的負荷量較低，但最低的負荷量也達到.685，這 3 道題目則是符合了直接民主正當性的原始設定。第三個因子則包括「民主與經濟發展比較」以及「保護政治自由與減少經濟不平等比較」，這兩題的因素負荷量表現都超過.710，十分優異，這組題目則是符合比較民主正當性的設計。

透過 SPSS 程式的因素分析程序，我們在民主支持的相關題組中，可以得到三個因子，這三個因子的題目歸屬正好符合了先前對於民主支持指標的討論，包括直接民主正當性、比較民主正當性以及威權抵制。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把 2011 年中國調查資料的民主支持進行簡化，將受訪者的回答製作成三個因素來進行比較。

圖 7-1 比較了三個經由主成分法進行因子萃取的民主支持指標，看它們在世代差異間的變化。首先，直接民主正當性的變化是因世代推新而呈現下滑趨勢，從年長世代的.12，下降到「70 後」世代的-.02，再下降到「80 後」世代的-.11。其次，在比較民主正當性方面則是在原點上下浮動，年長世代為.00，「70 後」世代下降到-.03，「80 後」世代則又上升到.04。最後，威權抵制的世代差異符合預期又十分顯著，年長世代為-.12，「70 後」世代上升到.12，「80 後」世代再上升到.20，增加的十分明顯。從圖中可以初步發現，比較民主正當性的世代差異不顯著，具有顯著性的直接民主正當性以及威權抵制則方向完全不同，呈現矛盾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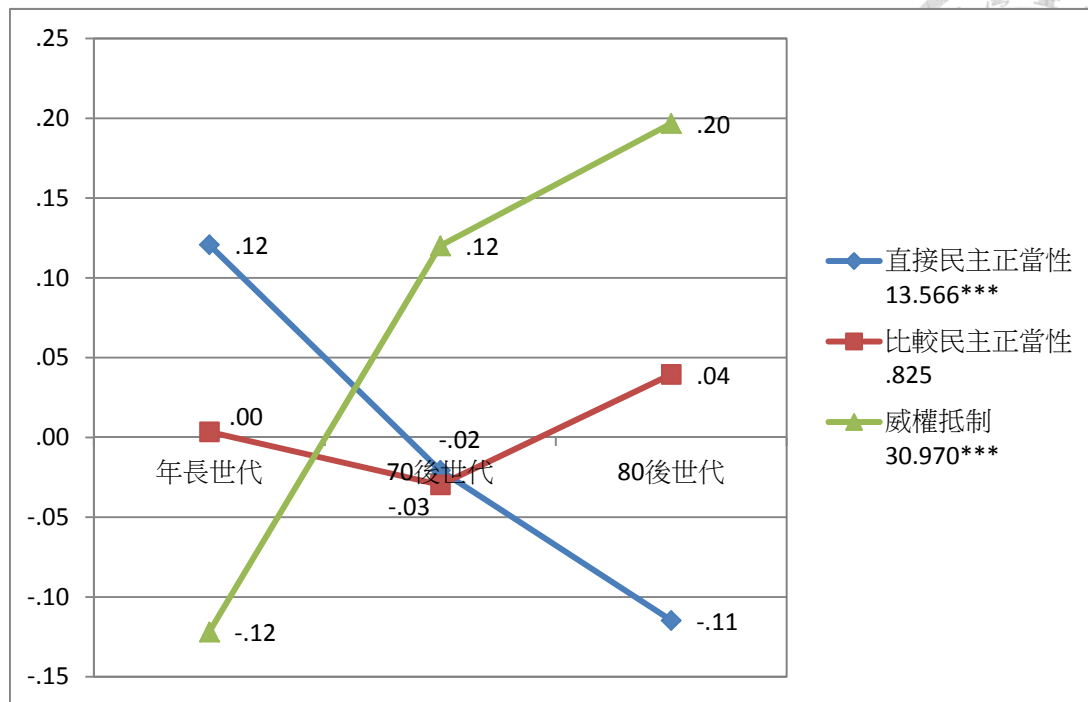


圖 7-1 民主支持的世代差異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參、世代與價值觀群體的變異數分析

在這個部分，我們進一步根據世代差異與價值觀群體來進行變異數分析，表 7-3 包括了 3 組不同民主支持指標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在 a 表中，依變項為直接民主正當性，首先我們確定了整體的世代差異，其 F 值為 13.566，顯著性為小於 .001，多重比較的結果是「80 後」世代及「70 後」世代都明顯與年長世代不同，其方向是更為下滑。我們進一步控制價值觀群體，結果發現只有儒家價值觀者的民主支持明顯下滑，而低價值觀者雖然不顯著，但也具有下滑趨勢，而民主價值觀的持有者的直接民主支持則是十分穩定，維持在-.17。如果控制了世代差異，我們可以發現，年長世代與「70 後」世代中的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者具有明顯差異，但「80 後」世代對於直接民主正當性的差異就不顯著。

表 7-3 中的 b 表，乃是以比較民主正當性為依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基

本上，比較民主正當性在中國民眾中的支持由世代與價值觀的角度來看十分紛亂，沒有因為世代差異或是價值觀群體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控制價值觀後，我們可以在儒家價值觀與低價值觀發現一些較弱的顯著性；另外，在控制世代差異後，也只有年長世代在比較民主正當性上具有差異性。

在威權抵制指標方面，不論是世代差異或是價值觀群體不同，都可以對其產生差異影響。首先，整體的世代差異十分明顯，其變異分析的 F 值為 30.970，顯著性為小於.001，多重比較的結果顯示「80 後」世代、「70 後」世代分別都與年長世代具有差異，朝向對威體政體選項更為抵制的方向。不過在控制價值觀群體後，只有在儒家價值觀群體中，「70 後」與「80 後」世代的威權抵制得到了增加，其他價值觀群體內的世代差異並不明顯。當控制了世代差異，我們可以發現價值觀群體之間在每個世代內的差異都很明顯，本文所關注的民主價值觀群體，相較於其他價值觀者，其威權抵制的分數都是最高的。也就是說，在民主支持的威權抵制指標方面，民主價值觀者明顯高於儒家價值觀者與其他價值觀群體。

我們大體上可以得出一個印象。在民主支持的三組指標中，比較有效與符合理論預期的是威權抵制的指標。它清楚的因為世代差異而所變化，新世代的抵制程度更甚以往。而且，價值觀群體的差異也可以解釋受訪者對於威權抵制的內容，擁有民主價值觀者的確更明顯地展現更高的威權抵制意識。相較而言，直接民主正當性與比較民主正當性的測量就比較沒有明顯的趨勢，不論是從世代差異或是價值觀群體差異的角度來看。圖 7-2 可以呈現這 3 組指標的世代變化狀況，中國民眾對於直接的與比較的民主正當性，四組價值觀群體間因為世代差異所呈現的變化較為混亂，其中也有一些矛盾；相對而言，威權抵制部分則是與理論預設較具有一致性。在直接民主正當性方面，除民主價值觀者比較穩定外，其他群體的變化較大，方向都是向下滑落。比較民主正當性的變動很大，沒有一致性，在新世代中差異很小。威權抵制方面的世代差異與價值觀群體不同的影響比較清楚，隨著世代而提高，而且民主價值觀者明顯地高於其他價值觀者。

表 7-3 民主支持的變異數分析

(a) 直接民主正當性

		全體	民主價值	混合價值	儒家價值	低價值觀	均值	F 值/Sig.
全體 價值觀者	平均值	.02	-.17	.14	.13	-.18	-.01	15.707***
	標準差	1.00	1.10	.94	.89	1.05	1.00	1-2 1-3 2-4
	個數	2533	551	324	785	341	2001	3-4
年長世代	平均值	.12	-.17	.21	.17	-.09	.08	7.336***
	標準差	.96	1.17	.97	.87	1.01	.98	1-2 1-3 2-4
	個數	1266	165	173	455	138	931	3-4
70 後世代	平均值	-.02	-.18	.06	.18	-.13	.00	3.381*
	標準差	1.04	1.13	.94	.89	1.11	1.02	1-3 3-4
	個數	554	143	77	163	67	450	
80 後世代	平均值	-.11	-.17	.04	-.05	-.30	-.14	2.560
	標準差	1.01	1.05	.88	.93	1.05	1.00	2-4 3-4
	個數	713	243	73	167	136	620	
F 值/Sig. 多重比較: LSD		13.566*** 3-1 2-1	0.012	1.095	4.187* 3-1 3-2	1.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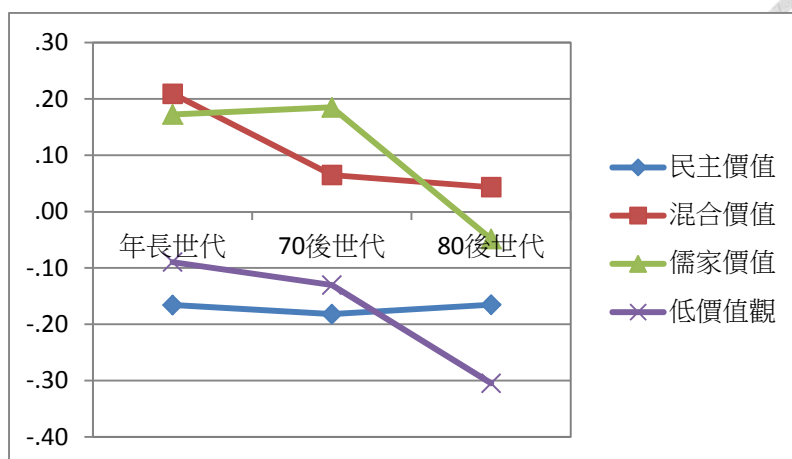
(b) 比較民主正當性

		全體 ^a	民主價值	混合價值	儒家價值	低價值觀	均值	F 值/Sig.
全體 價值觀者	平均值	.01	-.02	.00	.08	-.06	.01	1.971
	標準差	1.00	1.05	1.03	1.01	1.01	1.03	3-4
	個數	2805	599	343	843	371	2156	
年長世代	平均值	.00	-.14	-.01	.15	-.20	.01	6.534***
	標準差	1.02	1.03	1.05	1.03	1.00	1.04	1-3 3-4
	個數	1411	184	183	492	156	1015	
70 後世代	平均值	-.03	.04	.00	-.06	-.08	-.02	0.332
	標準差	1.00	1.09	1.09	.98	.94	1.03	
	個數	617	153	82	177	73	485	
80 後世代	平均值	.04	.03	.05	.01	.10	.04	0.195
	標準差	.99	1.04	.89	.98	1.03	1.01	
	個數	776	262	78	174	142	656	
F 值/Sig. 多重比較: LSD		0.825	1.811	0.103	3.207* 2-1	3.281*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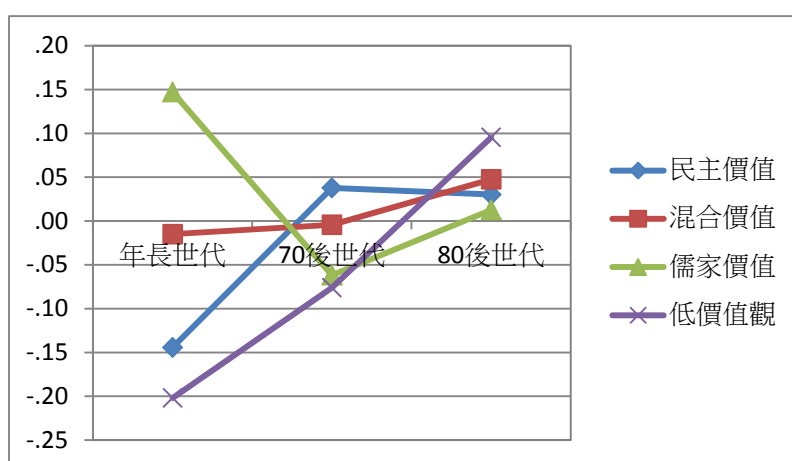
(c) 威權抵制

		全體 ^a	民主價值	混合價值	儒家價值	低價值觀	均值	F 值/Sig.
全體 價值觀者	平均值	.02	.47	.27	-.30	.03	.06	91.213***
	標準差	.99	.74	.94	1.06	.84	.98	1-2-3-4
	個數	2829	604	359	862	362	2187	
年長世代	平均值	-.12	.47	.23	-.42	-.01	-.07	45.967***
	標準差	1.06	.76	.97	1.08	.92	1.04	1-2-3-4
	個數	1422	191	189	499	152	1031	
70 後世代	平均值	.12	.44	.27	-.14	.07	.14	12.176***
	標準差	.92	.73	.97	1.02	.75	.92	1-3 1-4 2-3
	個數	606	149	86	180	71	486	
80 後世代	平均值	.20	.49	.35	-.16	.06	.21	24.338***
	標準差	.88	.74	.86	.99	.80	.88	1-3 1-4 2-3
	個數	802	264	85	183	139	671	2-4 3-4
F 值/Sig. 多重比較: LSD		30.970*** 3-1 2-1	0.217	0.505	6.832** 3-1 2-1	0.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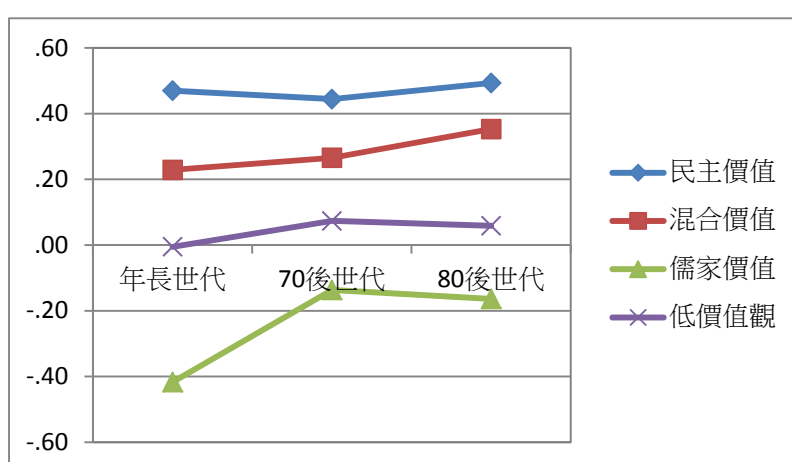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直接民主正當性的世代差異



比較民主正當性的世代差異



威權抵制的世代差異

圖 7-2 民主支持指標的世代差異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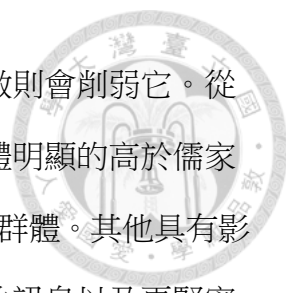
肆、迴歸模型

為了確定民主支持在中國的受訪者中受到那些變數的影響，我們同樣使用先前的迴歸模型來對三組民主支持變項進行分析，分別呈現在表 7-4、表 7-5 以及表 7-6 中，其依變項依序為直接民主正當性、比較民主正當性以及威權抵制。

在表 7-4 的模型 1 與模型 2 中，可以發現民眾對於直接民主正當性是具有世代差異的。投入基本變項控制後，這種差異依然存在，新世代的直接民主正當性顯著地更低。但在模型 3 與模型 4，投入價值觀、訊息管道與相關態度變項後，我們發現基本變項的影響變的不明顯，民主價值與儒家價值都會正面提高民主正當性，但真正具有顯著性的是低價值觀的群體將削弱直接民主正當性。此外，直接民主正當性與部分態度變項有關，正面評價國家經濟情況、具有更高的整體與特定人際信任都會強化直接民主正當性，但更具有政治效能感者會降低其民主正當性。

表 7-5 的迴歸分析中，依變項置換為比較民主正當性。我們可以發現世代差異在每一組模型中都不具顯著性，受訪者的價值觀變項不會影響其比較民主正當性評估。具有影響的變項大多數是受訪者的基本背景，以及少部分的態度變項。男性、居住在西部、具有更多管道數量以及更有政治興趣者會強化其比較民主正當性，表示有這些背景的民眾更認同民主或保護政治自由比經濟發展或減少經濟不平等重要。相對地，居住於城市、東部省分以及會與他人交換小道消息者，其比較民主正當性就比較弱，他們認為經濟發展或減少經濟不平等是更重要的事。

可以符合理論預期的民主支持指標是威權抵制，其迴歸模型呈現於表 7-6。首先，模型 1 顯示了世代差異對於受訪者的威權抵制有所影響，越新世代的抵制越強。其次，模型 2 投入基本變項做為控制後，世代差異的影響只在「70 後」世代仍然保持顯著，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城市居民以及黨員身分對威權抵制有正面影響，居住於西部以及自我認定為社會上層的受訪者則具有較弱的威權抵制。但我們在模型 3、模型 4 投入價值觀變數後，則可以發現價值觀變遷對於威權抵制的顯



著影響。民主價值分數強化了受訪者的威權抵制，儒家價值分數則會削弱它。從價值觀群體的角度出發，可以看出本文所定義的民主價值觀群體明顯的高於儒家價值觀群體，B 係數為.580，接著依序為混合價值觀與低價值觀群體。其他具有影響的變項，包括基本變項中的教育程度提高、更頻繁地閱讀政治訊息以及更緊密的人際關係會提高受訪者的威權抵制；另外，居住於西部、自我認知為社會上層以及與他人交換小道消息者，其威權抵制的程度會比較低。

整體來看，在民主支持的三個指標中，明顯受到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影響的僅有威權抵制一項，其影響內容也符合本文的理論預期，包括新世代以及民主價值觀的擁有者都對於威權政體更為抵制。不過，直接民主正當性與比較民主正當性的影響則比較混亂。直接民主正當性具有世代差異，但方向與理論預期完全相反，經由迴歸分析則發現它與態度變項較為相關；比較民主正當性對於中國民眾而言，從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中都看不出趨勢，在迴歸分析中則是與基本變項與部分態度變項有關。

依本文的脈絡，可以確認的是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會對民主支持中的威權抵制有正面影響，但對直接的與比較的民主正當性影響不顯著。要探究這個情況的原因不在本論文的範圍之內，但可以從 2 個方向進行說明。首先是測量工具問題，或許是無法使用現有指標測出中國民眾民主支持的真實現況，或是說世代間對於測量的反應並非如同研究者所預期；其次是涉及受訪對象的民主認知，在中國的脈絡下，不論是政治宣傳或是長久以來的政治正確，對於「民主」一詞的認知情況十分複雜，加上受訪者的可能迴避，很難從正面測出民主的正當性，反而是反面測量（威權抵制）更具有信度與效度。這種情況也會發生在其他從威權走向民主化的國家，例如台灣民眾在 1970 年代以前，對於政治涉入、民主議題甚或是統獨議題都抱持極保守的態度，一旦制度解放，民意內容很快就發生了變化。研究者很難辨認這種民意測量內容的變化是來自受訪者的轉變（因為結構限制下的理解），還是因為受訪者的無意識隱藏（因為符合政治正確）。

表 7-4 直接民主正當性的迴歸模型分析

依變項:	1		2		3		4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常量)	.121 (.028)	***	.151 (0.062)	*	-1.082 (.214)	***	-1.124 (.219)	***
世代(年長者)								
70 後世代	-.141 (.051)	**	-.116 (0.053)	*	.004 (.064)		-.001 (.064)	
80 後世代	-.235 (.046)	***	-.199 (0.053)	***	-.080 (.067)		-.098 (.068)	
民主價值分數					.068 (.029)	*		
儒家價值分數					.150 (.029)	***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099 (.067)	
低價值觀							-.166 (.073)	*
混合價值							.031 (.072)	
性別(女性)								
男性			.041 (0.042)		.055 (.050)		.068 (.051)	
教育程度			-.013 (0.012)		.015 (.015)		.014 (.016)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002 (0.043)		.042 (.052)		.045 (.053)	
地區別(中部)								
東部			-.069 (0.049)		-.051 (.058)		-.045 (.059)	
西部			-.071 (0.052)		-.130 (.065)	*	-.125 (.065)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208 (0.059)	***	.060 (.069)		.066 (.069)	
曾申請			.040 (0.063)		-.020 (.071)		-.011 (.072)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091 (0.045)	*	-.057 (.054)		-.054 (.054)	
上層			.089 (0.064)		-.042 (.074)		-.028 (.074)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08 (.015)		-.011 (.015)	
閱讀政治訊息					.020 (.019)		.024 (.019)	
管道數量					-.019 (.020)		-.023 (.021)	
小道消息					.021 (.029)		.025 (.029)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129 (.032)	***	.145 (.032)	***
家庭未來經濟					.051 (.035)		.051 (.035)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041 (.022)		.046 (.022)	*
政治效能感					-.082 (.038)	*	-.090 (.038)	*
人際關係								
一般人際信任					.077 (.034)	*	.082 (.034)	*
親近人際信任					.025 (.006)	***	.026 (.006)	***
關係緊密度					.010 (.011)		.012 (.011)	
模型訊息								
R ²	.011		.025		.106		.095	
Adj. R ²	.010		.020		.092		.080	
F/Sig.	13.571***		5.491***		7.509***		6.352***	
N	2533		2416		1549		1546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表 7-5 比較民主正當性的迴歸分析

依變項:	1	2	3	4
制度正當性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常量)	.003 (.027)	-.104 (.058)	.056 (.220)	.070 (.224)
世代(年長者)				
70 後世代	-.033 (.048)	-.026 (.050)	-.030 (.066)	-.028 (.066)
80 後世代	.036 (.045)	.082 (.050)	.037 (.070)	.040 (.070)
民主價值分數			-.018 (.029)	
儒家價值分數			.016 (.030)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084 (.068)
低價值觀				-.047 (.075)
混合價值				-.029 (.075)
性別(女性)				
男性		.208 (.039) ***	.156 (.052) **	.154 (.052) **
教育程度		.000 (.011)	-.015 (.016)	-.015 (.016)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110 (.040) **	-.129 (.054) *	-.127 (.054) *
地區別(中部)				
東部		-.124 (.046) **	-.154 (.060) *	-.151 (.060) *
西部		.376 (.049) ***	.339 (.067) ***	.341 (.067) ***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080 (.055)	-.065 (.071)	-.067 (.071)
曾申請		.047 (.059)	.024 (.073)	.026 (.073)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020 (.042)	-.051 (.056)	-.051 (.056)
上層		.078 (.060)	.009 (.077)	.010 (.077)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15 (.015)	.015 (.015)
閱讀政治訊息			-.034 (.020)	-.033 (.020)
管道數量			.071 (.021) **	.072 (.021) **
小道消息			-.077 (.030) *	-.077 (.030) *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041 (.033)	-.040 (.032)
家庭未來經濟			.014 (.036)	.019 (.036)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104 (.022) ***	.104 (.022) ***
政治效能感			.045 (.039)	.046 (.039)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024 (.035)	-.027 (.035)
親近人際信任			.012 (.006)	.012 (.006)
關係緊密度			.004 (.011)	.003 (.011)
模型訊息				
R ²	.001	.056	.082	.082
Adj. R ²	.000	.052	.068	.068
F/Sig.	.826	14.268***	5.968***	5.739***
N	2805	2672	1635	1633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表 7-6 威權抵制的迴歸分析

依變項:	1	2	3	4
制度正當性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常量)	-.122 (.026) ***	-.376 (.054) ***	-.721 (.187) ***	-.865 (.193) ***
世代(年長者)				
70 後世代	.242 (.048) ***	.170 (.046) ***	.059 (.056)	.079 (.057)
80 後世代	.319 (.043) ***	.066 (.047)	-.036 (.059)	-.030 (.060)
民主價值分數			.235 (.025) ***	
儒家價值分數			-.109 (.025) ***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580 (.059) ***
低價值觀				.237 (.066) ***
混合價值				.490 (.063) ***
性別(女性)				
男性		.016 (.036)	.013 (.044)	.014 (.045)
教育程度		.119 (.010) ***	.095 (.014) ***	.107 (.014) ***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122 (.038) **	.037 (.046)	.030 (.046)
地區別(中部)				
東部		.033 (.043)	.006 (.051)	-.002 (.052)
西部		-.314 (.045) ***	-.369 (.057) ***	-.396 (.058) ***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143 (.051) **	.019 (.060)	.030 (.061)
曾申請		-.027 (.057)	.011 (.063)	-.020 (.064)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067 (.039)	-.042 (.047)	-.054 (.048)
上層		-.210 (.056) ***	-.140 (.065) *	-.171 (.066) *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19 (.013)	-.009 (.013)
閱讀政治訊息			.064 (.017) ***	.067 (.017) ***
管道數量			.015 (.018)	.011 (.018)
小道消息			-.052 (.026) *	-.058 (.026) *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032 (.028)	-.052 (.028)
家庭未來經濟			.025 (.030)	.015 (.031)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016 (.019)	-.022 (.019)
政治效能感			-.029 (.033)	-.010 (.034)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030 (.030)	.030 (.030)
親近人際信任			.001 (.005)	-.001 (.005)
關係緊密度			.034 (.009) ***	.031 (.009) **
模型訊息				
R ²	.021	.134	.253	.232
Adj. R ²	.021	.130	.242	.221
F/Sig.	30.972***	37.745***	23.290***	19.942***
N	2829	2702	1675	1673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第三節 中國民眾的民主認知



壹、基本分佈

在新的民主認知測量中，要求受訪者在連續 4 題，4 組不同的民主意義之中進行選擇，確定其所認知的民主意義內容是什麼。這 4 組具有競爭性的民主概念為「公民權利」、「民主程序」、「社會正義」以及「治理能力」。經由重新計算與配予適當的比重後，結果如圖 7-3，從全體的角度來看，中國民眾對於民主認知更傾向「社會正義」（佔 35%）以及「良好治理」（佔 30%）的概念。而以「民主程序」來認知民主的比重較少（佔 25%），只有 10%比重的回答把民主認知歸屬於「公民權利」。這個趨勢與其他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社會相似，可能不是一個巧合，而是有其文化性的脈絡。

不過，當從世代差異的角度來看，不同民主認知的比例就發生了部分變化。年長世代對於民主的認知，更傾向「社會正義」（佔 37%），減少的部分是「民主程序」（佔 24%）與「公民權利」（佔 9%）；「70 後」世代具有最高比重來認知民主為「民主程序」（佔 27%）；到了「80 後」世代，認知民主為「公民權利」的比重達到 13%，認知為「民主程序」的比重也有 26%，將民主認知為「社會正義」者在三個世代中最低（佔 31%）。另外，把民主認知為「良好治理」的意見比重則十分穩定（佔 30%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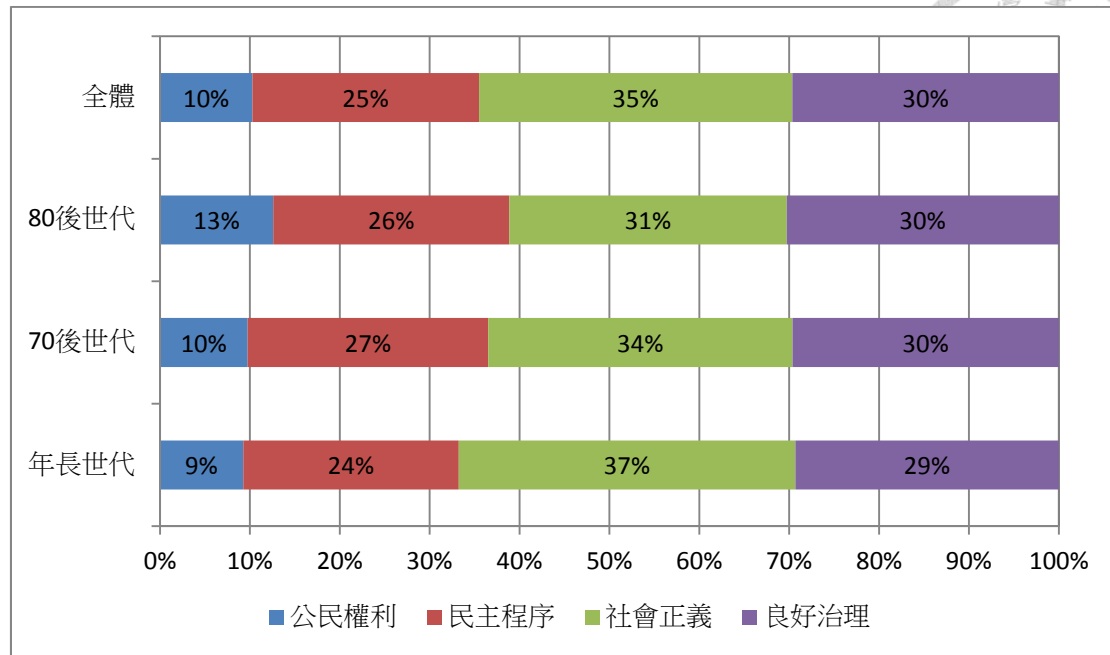


圖 7-3 四類民主概念的百分比分佈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貳、世代與價值觀群體的變異數分析

藉由民主認知題組，我們可以利用民眾對於民主不同認知的內容進行民主類型的分類，包括「權利-程序式民主」與「效能-分配式民主」兩類。前者結合了受訪者在認知民主為「公民權利」以及「民主程序」的得分，更傾向西方的民主標準，後者則結合了認知民主為「社會正義」以及「良好治理」的得分，與儒家文化的某些價值相合。圖 7-5 呈現中國民眾對於兩種民主模式的世代變化，我們將每一受訪者對於每一民主認知概念的進行計數，同時將其加總，將 2 種民主模式的計分與以 10 年為一群的世代變項進行交叉。可以發現，中國民眾對於「效能-分配式民主」的看法，在每一世代都持續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變化不大。但對於「權利-程序式民主」就有比較明顯的世代差異，表示隨著世代的變化，越年青的世代會更傾向把民主認知為「公民權利」或是「民主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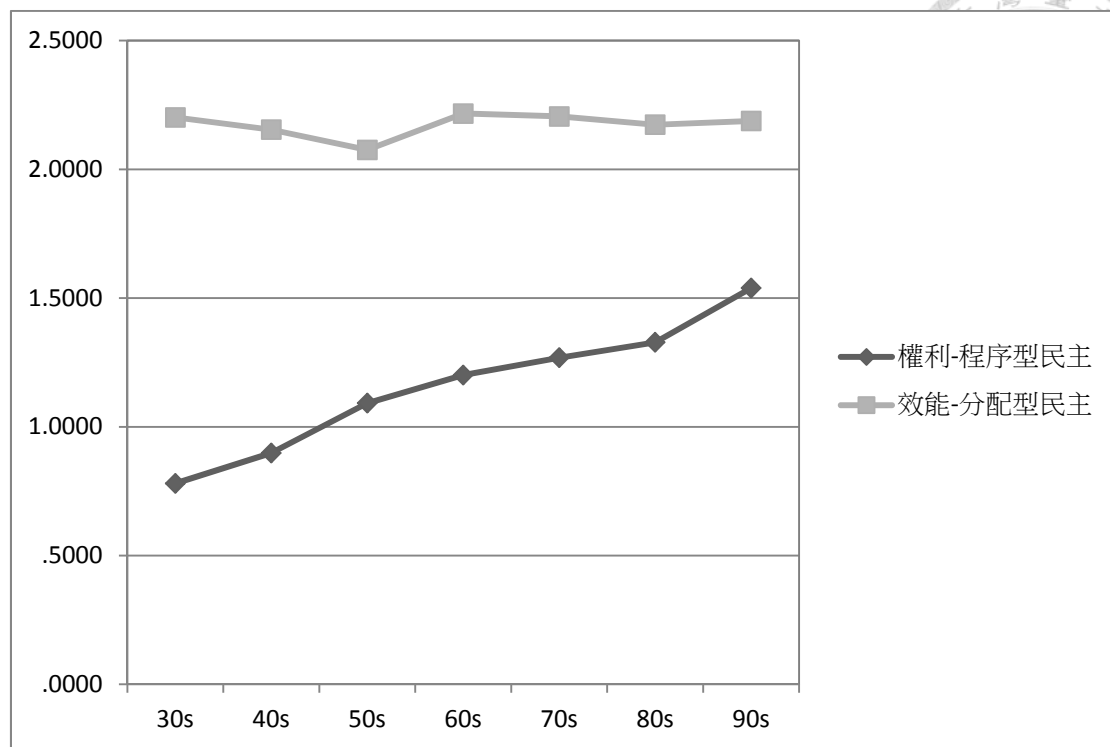


圖 7-4 中國民眾對於兩種民主模式的看法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表 7-7 是進一步以世代差異與價值觀群體來進行變異數分析的結果。上半部的表 7-7-1 的依變項為「權利-程序」式的民主概念，表中的第 1 欄顯示在全體的層次具有顯著差異，年長世代在此概念的平均值為 1.07，「70 後」提高到 1.27，「80 後」世代再提高到 1.38。控制價值觀群體後，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者中仍然具有顯著世代差異，新世代的「權利-程序」式民主認知都高於前世代，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定，但混合價值觀者的「權利-程序」式民主認知較前兩世代更為低下，平均數下降到 1.34。可是在控制世代後，並無法發展價值觀群間的差異。

表 7-7-2 是以「效率-分配」式民主概念為依變項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在圖 7-4 中就已顯示這組民主概念在中國民眾中十分穩定，經由變異數分析，我們更可以確認，不論是世代差異或是價值觀變遷都不會對此概念的穩定發生影響。



表 7-7 兩種不同民主概念的變異數分析

(a) 「權利-程序」式民主

		全體	民主價值	混合價值	儒家價值	低價值觀	均值	F 值/Sig.
全體	平均值	1.20	1.57	1.47	1.34	1.37	1.43	5.344**
價值觀者	標準差	1.13	1.20	1.12	1.10	1.09	1.13	1-3 1-4 2-3
	個數	3472	627	375	944	385	2331	
年長世代	平均值	1.07	1.39	1.51	1.27	1.27	1.34	2.457
	標準差	1.09	1.17	1.13	1.10	1.05	1.11	2-3 2-4
	個數	1838	197	198	552	163	1109	
70 後世代	平均值	1.27	1.64	1.51	1.32	1.40	1.46	2.499
	標準差	1.14	1.22	1.17	1.04	1.10	1.13	1-3
	個數	731	159	91	194	77	521	
80 後世代	平均值	1.38	1.65	1.34	1.56	1.48	1.55	1.824
	標準差	1.16	1.20	1.05	1.16	1.14	1.16	1-2
	個數	903	271	86	198	145	701	
F 值/Sig.		24.251***	3.051*	0.715	5.162**	1.327		
多重比較: LSD		3-2-1	3-1 2-1		3-2 3-1			

(b) 「效率-分配」式民主概念

		全體 ^a	民主價值	混合價值	儒家價值	低價值觀	均值	F 值/Sig.
全體	平均值	2.17	2.30	2.37	2.32	2.48	2.35	2.002
價值觀者	標準差	1.35	1.24	1.18	1.23	1.16	1.21	1-4 3-4
	個數	3472	627	375	944	385	2331	
年長世代	平均值	2.16	2.40	2.35	2.31	2.58	2.37	2.072
	標準差	1.40	1.25	1.19	1.26	1.11	1.23	3-4
	個數	1838	197	198	552	163	1109	
70 後世代	平均值	2.21	2.22	2.40	2.44	2.46	2.37	1.201
	標準差	1.32	1.25	1.20	1.15	1.19	1.20	
	個數	731	159	91	194	77	521	
80 後世代	平均值	2.18	2.27	2.39	2.23	2.37	2.30	.596
	標準差	1.28	1.22	1.13	1.21	1.21	1.21	
	個數	903	271	86	198	145	701	
F 值/Sig.		.337	1.060	.067	1.427	1.241		
多重比較: LSD								

^a 全體受訪者包括無法判別其價值觀者，總數為 3472 筆。

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參、迴歸模型



圖 7-4 的折線變化提供了我們一個關於中國民眾對於兩種民主模式認同程度的變動圖像，大體上是持續穩定較高的認同「效率-分配」式民主，而對於「權利-程序」式民主的概念認同，則是從年長世代到新世代逐步增長。影響中國民眾民主模式認同的背景因素可能有那些，我們可以使用迴歸模型來進行辨認。

表 7-8 針對的依變項為民眾的「權利-程序」式民主概念，這是我們設定為接近自由民主定義的民主模式。從模型 1 中，可以看出世代因素可以影響到民眾在「權利-程序」式民主概念上的差異，跟年長世代相比，「70 後」世代具有更高的「權利-程序」式民主概念認同，B 係數為.195，顯著性為小於.001。「80 後」世代的「權利-程序」式民主概念最高，B 係數為.310，顯著性也是小於.001。模型 2 加入基本變項做為控制，我們可以發現與年長世代相比，「70 後」世代具有較高「權利-程序」式民主概念的情況仍具顯著性。「80 後」世代的 B 係數有點下降，但顯著性仍然介於.05 與.01 之間。表示世代差異仍然具有解釋力。其他基本變項具有影響者，包括受訪者為男性、教育程度更高會提高「權利-程序」式民主概念的認同，城市居民與自我認為是社會基層者則是會削弱這種認同。

模型 3 與模型 4 進一步投入價值觀與其他有關的態度變項。結果發現世代差異與價值觀取向對於認同「權利-程序」式民主概念都失去解釋力，訊息管道的加入也不會有影響。具有正向影響的變項包括，男性、對國家經濟的正向評價以及政治涉入變項中的政治興趣及政治效能感。而城市居民、居住於東部省分、自認為社會基層以及對親近人士的信任則會弱化對其「權利-程序」式民主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的政治涉入，包括政治興趣與政治效能感對於此項民主模式的影響，當民眾認為自己有能力干預政治以及具有更高的政治興趣，這將有助於他們對民主概念的認知更傾向自由民主式的定義。

表 7-8 「權利-程序型」民主的迴歸模型分析

依變項: 權利-程序型民主	1		2		3		4	
(常量)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世代(年長者)	1.074 (.026)	***	.853 (.056)	***	1.541 (.233)	***	1.597 (.237)	***
70 後世代	.195 (.049)	***	.152 (.050)	**	.005 (.069)		.007 (.069)	
80 後世代	.310 (.045)	***	.109 (.051)	*	.006 (.074)		.009 (.074)	
民主價值分數					.040 (.031)			
儒家價值分數					.008 (.032)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008 (.072)	
低價值觀							-.079 (.080)	
混合價值							.090 (.078)	
性別(女性)								
男性			.315 (.039)	***	.112 (.055)	*	.113 (.055)	*
教育程度			.106 (.011)	***	.025 (.017)		.028 (.017)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136 (.040)	**	-.226 (.057)	***	-.228 (.057)	***
地區別(中部)								
東部			-.086 (.046)		-.192 (.063)	**	-.193 (.063)	**
西部			.018 (.048)		.078 (.071)		.075 (.071)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057 (.057)		-.042 (.076)		-.046 (.076)	
曾申請			.096 (.062)		-.011 (.079)		-.018 (.079)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186 (.042)	***	-.172 (.059)	**	-.178 (.059)	**
上層			-.003 (.062)		-.055 (.081)		-.065 (.081)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61 (.034)		-.063 (.034)	
閱讀政治訊息					.046 (.038)		.037 (.038)	
管道數量					.022 (.016)		.025 (.016)	
小道消息					-.030 (.021)		-.032 (.021)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048 (.022)	*	.046 (.022)	*
家庭未來經濟					.031 (.032)		.031 (.032)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062 (.024)	**	.064 (.024)	**
政治效能感					.163 (.041)	***	.167 (.041)	***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014 (.037)		.013 (.037)	
親近人際信任					-.018 (.006)	**	-.019 (.006)	**
關係緊密度					.016 (.012)		.016 (.012)	
模型訊息								
R ²	.014		.091		.087		.087	
Adj. R ²	.014		.088		.074		.074	
F/Sig.	25.258***		29.212***		6.765***		6.554***	
N	3472		3231		1737		1735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表 7-9 中使用了同樣的迴歸模型，不過將依變項置換為「效率-分配型」的民主認知，也就是民眾是否更傾向以社會正義以及良好治理等概念來定義的民主模式。在我們的假設中，這應該是更接近強調政府對人民的照顧責任，以及重視政府的治理能力的所謂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民主型式。

在圖 7-4 中，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民眾對此型式的民主概念，一直具有比較高的認可，不同世代間的差異不大。在表 7-9 的模型 1 中也可以得到同樣的分析結果，世代差異對於民眾的「效率-分配型」民主概念完全沒有影響，R Square 值為.000。當我們進一步在模型 2 中控制基本變項，可以發現「80 後」世代相對於舊世代的「效率-分配型」民主概念就有了影響，B 係數為-.132，顯著性為介於.05 與.01 之間。表示在控制基本變項後，「80 後」世代的「效率-分配型」民主概念會明顯低於舊世代。

模型 3 與模型 4 投入了價值觀變數與其他態度變數。可以發現世代價值差異與價值觀對於認同「效率-分配型」民主概念的影響並不顯著，只有低價值觀者相對儒家價值觀者會提高認同。此外，我們發現受訪者若是屬於城市居民、居住在東部省分以及自認為社會基層者，將會提高其認同「效率-分配型」民主概念，政治效能感則是會減少其認同。這與影響「權利-程序型」民主概念的方向性是相反的，也就是說增加「效率-分配型」民主概念的變項，會減少「權利-程序型」民主概念。另外一個在「效率-分配型」民主概念具有特殊性的影響變項是受訪者的訊息管道，從迴歸模型中可以發現更多的管道數量會降低民眾的「效率-分配型」民主概念，但有接觸小道消息的受訪者則會增加。

這些相關影響必須更多的理論研究，以確定其與中國民眾民主認知之間的相關性。在本文的脈絡之中，可以發現雖然價值觀差異與民眾的民主認知無直接相關，但世代差異正在發生中，新世代對於「權利-程序型」的民主認知相較於舊世代已經增加了。

表 7-9 「效率-分配型」民主的迴歸模型分析

依變項: 效率-分配型民主	1	2	3	4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B (S. E.) sig.
(常量)	2.157 (.032) ***	1.971 (.068) ***	2.116 (.249) ***	2.129 (.253) ***
世代(年長者)				
70 後世代	.048 (.059)	-.016 (.061)	.052 (.074)	.052 (.074)
80 後世代	.020 (.055)	-.132 (.062) *	.053 (.079)	.053 (.079)
民主價值分數			-.043 (.033)	
儒家價值分數			-.044 (.034)	
價值觀(儒家)				
民主價值				.004 (.077)
低價值觀				.178 (.085) *
混合價值				-.027 (.084)
性別(女性)				
男性		.091 (.047)	-.048 (.059)	-.052 (.059)
教育程度		.056 (.013) ***	-.002 (.018)	-.003 (.018)
城鄉差異(農村)				
城市		.245 (.049) ***	.246 (.061) ***	.246 (.061) ***
地區別(中部)				
東部		.084 (.056)	.180 (.067) **	.170 (.068) *
西部		-.116 (.059) *	-.076 (.076)	-.082 (.076)
政治面貌(群眾)				
黨員		.010 (.070)	.049 (.081)	.049 (.081)
曾申請		-.072 (.075)	.010 (.084)	.012 (.084)
社會地位(中層)				
基層		-.031 (.052)	.124 (.063) *	.124 (.063) *
上層		-.068 (.076)	.066 (.087)	.065 (.087)
訊息管道				
網路使用			.012 (.037)	.009 (.037)
閱讀政治訊息			-.024 (.040)	-.032 (.041)
管道數量			-.038 (.017) *	-.038 (.017) *
小道消息			.069 (.022) **	.067 (.022) **
經濟評估				
國家經濟現況			-.034 (.024)	-.033 (.024)
家庭未來經濟			-.038 (.034)	-.040 (.034)
政治涉入				
政治興趣			-.023 (.025)	-.024 (.025)
政治效能感			-.138 (.044) **	-.141 (.044) **
人際關係				
整體人際信任			-.019 (.040)	-.016 (.039)
親近人際信任			.008 (.007)	.009 (.007)
關係緊密度			-.006 (.012)	-.005 (.012)
模型訊息				
R ²	.000	.026	.049	.050
Adj. R ²	.000	.023	.035	.036
F/Sig.	.337	7.920***	3.640***	3.621***
N	3472	3231	1737	1735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變項處理方式請見附錄。

*** p<0.001; ** p<0.01; * p<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第四節 民主支持、民主認知與中國式民主



中國的民主支持一直令研究者困惑，有論者以為原因是民眾對於「民主」有不同認知的原故。此外，也有論者據此指出，中國的文化脈絡中自有一套對於「民主」的特殊解讀（基於民本與仁治），所以民主在中國將會走出不同於西方的道路。本章經由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的角度來對分析中國民眾的民主支持與民主認知，希望可以觸及這個議題的理解。根據前一章的分析，我們發現，從世代差異的角度來看，雖然中國目前的政治參與的數量、型態與內容都在轉變當中，可是目前尚未與價值觀變遷有直接的關係。在本章中，我們也發現，就民主支持而言，僅有威權抵制可以用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來加以解釋，而民主認知的變化尚未與價值觀變遷發生明顯聯繫。

首先，中國民眾的民主支持測量依然令人困惑。整體而言，中國民眾具有很高的直接民主正當性，可是我們發現新世代的直接民主正當性顯得更低。到了比較民主正當性時，整體的民眾具有相對低的比較民主正當性，同時世代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不過，威權抵制的指標就相當符合我們理論預設，較新世代對於威權選項的抵制程度越強，加入價值觀變遷的考量後，民主價值將會強化民眾的威權抵制，同時民主價值觀者也明顯高於儒家價值觀者。

何以如此，筆者以為可能是測量工具的不適當，以及中國政治的脈絡性影響，兩個因素的作用。就前者而言，中國民眾對於「民主」一詞的理解可能十分複雜，包括純粹的無知、受到污染以及有意識或無意識迴避夾雜其間，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與控制來進行指標優化。就本文的分析來看，當我們直接使用「民主」一詞進行訪問時，中國民眾的回應通常是比較混亂或是與理論趨勢相反，但從間接的方式來測量，例如威權抵制，回應內容就會比較清晰。這種情況在其他威權國家也會發生，包括台灣在民主化之前與初期的調查經驗。在中國，對於民主的論述很難在無干擾的情況下進行。鄭永年（2011：74）就認為，不管中國的民主化會走

一條怎樣的道路在很長一端時間內，中國各方面的發展實際上會在國家主導下進行。不管我們的意願如何，客觀的現實要求和政治權力的本質決定了國家權力會一直存在我們身邊。所以，在中國的民主支持測量仍然有其困境。

其次，是否有一個屬於東亞的特殊民主概念，而與儒家價值觀有所關聯呢？這可能有助於儒家主義式民主的制度建構。本文可以從中國民眾的民主認知分析結果來加以討論。根據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一個新題組，可以檢視受訪民眾對於民主認知的內容，可以歸類成「權利-程序式民主」與「效能-分配式民主」兩種模式。前者包括「公民權利」以及「民主程序」的民主認知，更接近自由民主的定義；後者納涵「社會正義」以及「良好治理」的概念，內容接近儒家式民主所可能包含的理念，以民為本的政府照顧或是使政治過程更為理想的仁政。在中國民眾的世代分佈中，我們的確發現多數中國人都更傾向以「效能-分配式民主」來理解民主，而且沒有世代與價值觀的差異。不過，我們也發現對於「權利-程序式民主」的理解正在增加中，新世代的傾向性更高，雖然還沒與價值觀差異明顯有關，可是受訪者的政治興趣與政治效能感等政治態度，可以提高其將民主認知為「權利-程序式民主」的程度。由此可以認定，中國民眾的民主認知因為世代交替，其內容正在轉變當中，本文認為目前各種關於中國式民主的說法會因為世代交替而有其限度。

第八章 結論—遲到的新中國



自從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發生以來，民主與非民主的政府型式之爭基本上得到解決。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或人民，雖然對於政府存在的目的為何仍有爭議，可是不論是在規範層次或是實踐層次，對於民主體制應該是合理政府型的看法大致有了共識。僅存少數專制政府仍然堅持對於人民的全方位管制（如北韓），世界上的大部分政權，甚至是威權政府，多半會宣稱自己是民主的，或是正在朝向民主的道路上。這不僅是福山（Fukuyama）所宣稱的意識型態之爭的歷史終結，也是民眾在現代化的推動下，經濟條件達標、因教育普及而民智大開的結果。

改革開放 30 年後，因為經濟上的顯著成功，中國逐漸邁入現代化國家的水平，西方觀察家與許多政治學者都期待中國將會開始民主化。可是在現實的政治發展中，中國不僅未納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成為新興民主國家之一；同時中共政權也抑制了 90 年代以來的基層民主發展，使其無法進一步擴大；進入 21 世紀後，中共更克服了中央繼承危機、在國際上逐漸崛起、強化對於社會與媒體網路的管制，維持了市場經濟與威權政治結合的穩定政府型式。近來興起的熱門討論是，中國近代的發展脈絡是否是一種新的「中國模式」，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途徑，而且可以持續下去。更有論者以為，「西方式民主」不會在中國出現。

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爭論暫時不會結束。從現代化理論的角度來看，中國在未來很難避免民主化的要求，可是若是從現實的環境來觀察，我們又很難看出中國發生民主化的可能契機。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是，這個中國之謎的原因為何？中國延遲民主化的真正因素為何？未來的中國仍然可以維持現行政權型式，拒絕民主化過程嗎？不同於政治菁英的分析角度，本文是從社會大眾的意見出發，強調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總結來說，本文的研究結論認為，中國現代化歷程十分遲延，真正有意義的現代化發生 1979 年之後，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的政策調整，才使得中國的經濟社會環境得到結構性的改變，進一

步發生了價值觀變遷。這是從世代交替、價值觀結構變化的軌跡中體現出來的。

以下，首先將總結前面統計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新世代的不同價值觀將可能使中國的未來發展與現在不同。接著，我們想用這些發現回應一下民主化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再次，藉由本文的發現與觀點，我們嚐試討論中國未來的發展可能性。最後，筆者將提出未來有關研究中國發展與民主化的幾點建議。

第一節 主要的數據發現

根據 2011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在中國大陸所完成的共 3473 筆調查資料，本文進行了相關統計分析，主要的研究發現包括：中國民眾的價值觀正在變遷之中、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因為價值觀差異而產生了分歧。另外，雖然與價值觀變遷尚未十分相關，但中國新世代的政治參與及威權抵制正在增加。以下分別加以說明。本節最後將針對新世代的不同價值觀以及其政治態度做一綜合性評估。

壹、變遷中的價值觀結構

關於調查數據的第一項發現，就是中國民眾的價值觀正在變遷之中，其特點是「70 後」與「80 後」新世代具有民主價值觀的群體大幅的增加，與具有儒家價值觀的群體齊鼓相當。

首先，依本文的定義，中國的社會中一直存在由儒家價值觀主導的情況。在 70 年代以前出生的世代中，具有儒家價值觀的群體一直佔了受訪民眾的大多數，60 年代出生者為四成二，50 年代及 1949 年以前出生者，比例皆在五成以上。這是指受訪者在家父長階層主義、道德精英、人際和諧、公共利益以及家庭主義等儒家價值傾向指標得到較為高分，而民主價值傾向指標分析較低的一群人。這說

明中國社會仍受傳統價值觀很深的影響，尤其這群人目前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力世代，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皆居於核心地位。

其次，以 70 年代為界，儒家傳統價值佔主導地位的情況開始有了轉變，發生了價值觀結構的轉型。使用本文所定義的競爭性價值觀，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的指標，我們可以區分四類不同的價值觀群體，包括民主價值觀、儒家價值觀、混合價值觀以及低價值觀的受訪者。除了上述的年長世代中的儒家價值觀主導模式，我們發現更為當代模式是儒家價值觀者與民主價值觀者數量相當的分佈型式。民主價值觀的擁有者在這 30 年的社會變遷下，發生了明顯的數量增長。而民主價值觀者，是指在重視政治自由、強調多元主義，以及認為政府權力應合乎制衡原則等更接近目前主流民主理論的價值上得到更高分數，同時在傳統儒家價值得分較低的受訪者。

再次，本文認為新世代中這種價值觀結構的形成與改革開放關係密切。最重要的線索當然是時間因素，「70 後」、「80 後」世代受到的變動最大，自然是他們生活在與他們前輩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的結果。另外，根據迴歸分析的結果，我們也發現現代化指標對於民主價值分數具有提昇的作用。網路使用情況的影響十分關鍵，正面地影響了民主價值觀的提昇，甚至可以涵納世代差異。而儒家價值觀則是受到更為傳統的因素影響，例如更相信親近的人以及更緊密的人際關係。

總體而言，我們可以將這個情況視為中國從經濟賦權進而價值賦權的過程。在經濟生活改善後，正在開始進行一個價值觀變遷的中介過程，民主價值觀正在新世代中逐漸增長。不過，因為中國仍受傳統文化的重要影響，與新興的民主價值觀兩相衝擊，形成了一個不同價值觀相互競爭、價值觀結構因為世代交替而發生變遷的情況。



貳、新世代政治支持的分歧

我們進一步重視的是，世代交替與價值觀變遷是否影響了民眾政治支持的內容。統計分析的結果發現，民眾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在新世代發生了分歧，而且其分歧較前面的世代更為擴大。新世代對制度正當性的分歧雖然沒有擴大，但因為價值觀群體而具有顯著差異，民主價值觀群體的制度正當性較其他價值觀者都來的低。以下進行幾點說明。

首先，從世代差異角度切入，第一個與過去不同的發現是，民眾比較信任中央（政權機構）而比較不信任地方（執行機構）的情況只停留在年長世代，「70 後」世代信任兩者的距離已經拉近，「80 後」世代中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則遠低於執行機構。這主要是因為新世代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度出現重大的下滑，遠低其他兩個世代，也低於他們自己對於執行機構與社會機構的信任。政權機構的內容依本文的處理，包括「共產黨」、「中央政府」、「全國人大」以及「解放軍」，這是中國目前最為核心的政治制度。

其次，價值觀將會影響民眾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尤其是民眾對於傳統儒家價值的信仰將增加其政治信任。若從價值觀群體的角度，擁有民主價值觀的群體，其政權機構信任明顯的低於擁有儒家價值觀的群體。根據迴歸分析，這個情況也同時受到更高的教育程度、城市化、更頻繁的使用網路與接觸小道消息，以及更高的政治效能感的影響。

第三，除了混合價值觀者外，中國民眾對於政治制度的高度認可正在因為世代差異而逐步下滑中。新世代中兩組數目相當的價值觀群體，民主價值觀者與儒家價值觀者，對於制度正當性給出了不同的評價，雖然不像政治信任那樣出現重大的分歧，但兩者之間的差異則仍然可以明顯地被辨認出來。同樣地，根據迴歸分析，這種差異跟價值觀內容關係很顯著，儒家價值觀強化制度正當性，民主價值觀則削弱制度正當性。居住於東部、有黨員身分、經常閱讀政治訊息、對經濟

情況更好的評估都將強化對於制度的認同；相反地，經常與人談論小道消息與具有政治效能度則比較不認同目前的制度。

總而言之，中國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因為價值觀差異而開始有了分歧，具有較高民主價值以及低儒家價值的民眾，其政治信任與制度正當性都較其他類型的價值觀群體更低。民主價值觀者做為關鍵群體，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明顯低於儒家價值觀與混合價值觀的群體，符合趨同理論的假設。更重要的是，民主價值觀群體的出現是建立在現代化的環境之下，包括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世代交替、以及擺脫了先前的狂暴政治運動潮。從這個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從文化賦權到制度賦權的中介條件之一，政治信任的分歧，明顯地正在新世代中發生。

參、政治參與及威權抵制的增加

從價值觀變遷的角度，我們的分析無法發現與「抗議型」政治參與之間的關聯性。目前其主要的解釋變項來自於男性、居住在西部、更多的政治訊息管道、更高的政治興趣以及更緊密的人際關係。不過，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的確隨著時間推移與世代差異推新而快速增加，未來一旦與價值觀變遷密切聯結，或許對於中國民主化就具有實際的推動可能。從 2001 年到 2011 年之間整體的變化，可以用各種類型的政治參與行動同步提高，同時以抗議行動的快速提高做為顯著的特點，此點與大多數中國社會觀察的結果相符。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國民眾曾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的民眾，在 2001 年調查時僅有 2.9%，到了 2011 年，回答曾採取這類行動的人數已經達到 14.3%，增長速度十分驚人。同時就世代差異而言，也可以發現「70 後」與「80 後」世代比年長世代更容易採取「抗議型」政治參與，這些民眾的經驗在未來有可能成為要求民主化的社會資本。

轉向民主支持的內容，指標的建構與結果展現使我們困惑。直接民主正當性具有世代間的差異，但新世代的民主正當性是最低的；比較民主正當性沒有世代

差異；威權體制的抵制是唯一符合理論預期的，年輕世代更傾向抵制威權，而價值觀的影響方向也具有理論上的一致性。這些結果可能顯示的是，我們無法使用現有的題目有效測量出中國民眾的民主支持，因為「民主」在中國受到各種訊息的「污染」。

整體而言，雖然價值觀變遷正在影響中國的政治支持，並使其發生分歧，可是這種價值觀變遷對於政治參與及民主支持都尚未產生直接的關聯。其中，政治參與的增加與社會矛盾的發生較有關聯。而民主支持的問題可能是因為我們無法有效地加以測量。

肆、綜合評估

表 8-1 展現了新世代的價值觀群體與其政治態度的內容。大體而言，我們第一個理論預期是，新世代應該有更反對中國模式的意識型態、具有更低的政治支持以及更高的民主支持。從表 8-1 的第一欄來看，世代間具有差異，同時符合理論預期的變項包括民族主義、政權機構信任、體制正當性、威權抵制以及權利-程序型民主。其次，沒有顯著性的變數包括中國式民主治理、比較民主正當性、以及效率分配型的民主概念。另外，直接民主正當性的世代間變異數分析雖然具有顯著性，但其方向完全與理論預期相反，越年輕的世代反而認為民主不是最好或是有效能的制度選擇。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80 後」的新世代中，各類價值觀群體的差異性。表 8-1 的最後一欄標示了該政治態度的組間差異顯著性，明顯具有差異的包括民族主義、中國式民主治理、政權機構信任、體制正當性以及威權抵制。根據我們的理論預設，民主價值觀的群體必然是更不支持中國模式的意識型態、更低的政治支持以及更高的民主支持。結果，具有顯著性的指標全數符合我們預期，可以發現新世代中的民主價值觀者，民族主義傾向與認同中國式民主治理都是最低；政治支持

的兩個層面，政權機構信任與體制正當性，也都是居於最低的位置；唯一具有顯著性的民主支持指標，威權抵制，則是得到高的支持。相反地，儒家價值觀者在多數指標都處於最高或次高的位置，只有威權抵制的分數最低。兩類價值觀具有明顯的分歧性。

表 8-1 「80 後」新世代的價值觀群體與政治態度

	世代差異	民主價值	低價值觀	混合價值	儒家價值	均值	組間差異
民族主義	.81***	.64	.85	.98	1.01	.83	***
中國式民主治理	2.41	2.13	2.78	3.18	2.80	2.58	***
政權機構信任	-.34***	-.68	-.57	.32	-.02	-.36	***
體制正當性	.57***	.30	.55	.75	.80	.55	***
直接民主正當性	-.11***	-.17	-.30	.04	-.05	-.14	
比較民主正當性	.04	.03	.10	.05	.01	.04	
威權抵制	.20***	.49	.06	.35	-.16	.21	***
權利-程序型民主	1.38***	1.65	1.48	1.34	1.56	1.55	
效率-分配型民主	2.18	2.27	2.37	2.39	2.23	2.30	

說明：***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張佑宗，2011a。

大體上來說，多數指標都符合本文對世代交替以及價值觀變遷對於政治態度影響的假設。不過，在與「民主」相關的問題中，其趨勢就十分不好理解，筆者認為這是「民主」概念在中國場域受到「污染」，產生了特殊性的結果。以目前的指標，我們難以對中國民眾的民主支持做出正確的理解。但是，從新世代中對於民族主義以及中國式民主治理這兩項與「中國模式」相關的態度看來，目前流行的「中國模式」或「中國式民主」的說法仍然有其限度。首先，民族主義在「80 後」世代與民主價值觀群體中得到的反應最低落；其次，在認同中國式民主治理方面，雖然世代間差異不顯著，可是新世代的民主價值觀者則是分數最低的，明顯與其他價值觀不同。



第二節 回應民主化理論

壹、民主化理論在中國為何失敗？

關於趨動民主化的機制問題，與此相關的民主化理論觀點包括，現代化理論所主張的價值變遷機制、從現代化理論發展出來的社會結構變遷機制、以及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精英轉型理論等。另外，強調不同文明與民主共容性問題的文化條件論，以及重視國際局勢影響力的外部因素論，近來也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根據先前的文獻檢閱，我們得到的印象是，肯定中國將會民主化的理論目前都失敗了，留下來的論點主要是解釋目前的政權何以渡過民主化壓力。

為何這些民主化理論對於中國的預測會失敗，根據本文的論點，這是因為對於中國的民主化研究比較忽視文化因素的原故。因為文化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做為經濟結構現代化影響到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中介因素，將會使這個過程從直線轉變為曲線的關係，尤其在具有強勢傳統文化的情況，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而滯後。另一方面，過去許多強調文化因素的研究者則是過於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或異質性，這就忽視了文化仍然會發生變遷的現實，同樣是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南韓與台灣的政治文化都發生了變遷。從過去 30 年的中國發展看來，只要策略適當，中國的變動還是令人驚喜的。陳志武 (2010) 也提出論證指出，中國發展模式並非例外，它的經濟成功正是因為做出了調整以符合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則的結果。

中國具有一項強勢的傳統文化是毋庸置疑的，這就是為何近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一直崎嶇波折，不論是來自整體結構或是個別行動者的因素都使中國很難順利的現代化。直到 1979 年之後，大變動來自結構的真實變遷，而這種結構因

素則是出於當時領導人的正確措施、政治技巧，以及歷史機遇。



貳、價值觀趨動的文化變遷

相對於一般的民主化理論，引用文化變遷理論來觀察中國的變化應該更為合適。文化論中有一支看法特別重視特定政治文化與民主制度之間的相容關係，經由 Inglehart 發展成「文化變遷理論」(the theory of culture shift)，他認為因為不同世代之間的物質環境改變，將使新世代所關注的事物不同於以往，藉由世代交替將會趨動價值觀與制度的變遷。本文認為，在中國具有這種意義的改變應該是從 70 年代開始，而 80 後世代則是完全排除先前的干擾而確定下來。

對於中國近代史有初級涉獵的人都知道，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被認定是充滿挫折與屈辱的。表面繁華的文明帝國，實際上組織鬆散而且不堪一擊，治亂循環史觀下的超穩定結構在 18 世紀與西方列強相比下處處落後，終究被迫改變。可是依 Lucian Pye (1992：4) 的分析，「由於中國人迷戀於他們過去偉大的成就，因此不肯從事那些必須要做的劇烈改革。」所以初期的許多革新運動多強調對於西方器物能力的學習，言下之意是中國文化仍有其優越性，甚至有「中學為體、西方為用」的說法，至今仍在發揮其影響力。

孫文與國民黨所領導的革命以及隨後的五四運動，原先的目的是分別在政治制度與思想上，給予傳統中國一場徹底的變化，可是由於權力結構實在太過分散，實際上改變的範圍與幅度極其有限，很快地就陷入包括內外的戰亂之中，國民黨本身也陷入貪官汙吏橫行的景況，以致於在國共內戰中失去整個中國大陸。依照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看法，此時期「蔣介石及國民黨因抗戰替新中國造成了一種高層機構」。內戰中勝利的共產黨，建國以後相較於近代中國的其他時期，是權力最為集中、最沒有分化挑戰的時期，的確對中國的改造發生了重大影響，黃仁宇認為是「毛澤東及中共因土地改革而造成一種新的低層機構」。可惜的是，由於毛澤

東主義所強調的「不斷革命論」以及奪權鬥爭，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很快就回到傳統政治文化的脈絡上。這在我們的分析中可以發現部分證據，直到 70 年代以前，中國民眾中的傳統儒家價值群體仍然佔了絕大多數。

中國過去的現代化努力，或由於心理因素，或由於結構因素，都沒有真正改變多數中國民眾的價值觀。有意義改變應該來自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1979 年以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終於擺脫了政治運動與意識型態之爭，步上正常的軌道。這是非常重要的機遇，其主要條件，首先當然是因為選擇了正確的道路，放棄了左傾的意識型態與經濟政策，向市場經濟轉型；其次則是鄧小平高度的政治技巧，先處理了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後的內部紛亂，接著防止了學運可能引發的暴裂式民主化，最後則是抵擋了保守勢力的復辟，將當時的中國帶向正確的改革開放方向。經過了 30 年發展，中國終於邁入現代化的路程。

根據 Inglehart and Welzel 的賦權理論，人類社會的賦權至少包括三個層次，從經濟賦權開始、經由文化賦權，最後才能落實到體制賦權，是一段從外圍生活逐漸朝向核心政治制度的過程。根據本文觀察，目前的中國是處在大致完成經濟賦權，文化賦權正在啟動，但仍需與傳統文化發生競爭的階段，體制賦權的條件仍未充分具備。其證據就是 70 年代以後的價值觀結構發生變化，民主價值觀者開始顯著增加。當關注點為 80 後新世代時，則可以發現政治支持已經發生分歧，擁有民主價值觀者明顯低於擁有儒家價值觀者與其他群體。可是，由於仍有傳統文化競爭以及政府主導的政治溝通與政治社會化的干擾，價值觀對於抗爭型政治參與以及民主支持仍然無法直接有所關聯。但我們可以預期，一旦民主價值觀群體的數量達到一定程度，透過對於政治支持的分歧性，將有可能啟動真正的民主化轉變。

第三節 中國發展的十字路口



承上所述，由於世代交替與價值觀變遷，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已經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但除了社會面價值觀結構的整體改變外，尚有國家機器與之互動，實際的發展應該將這兩者互動的結果而論。因為問題的複雜性，熟悉中國的研究者，通常也會對於未來發展提出幾個可能的推論（李侃如，2010：352-6）。本節將討論三項議題，首先是中國目前的政治改革問題。其次是在世代交替下，價值觀變遷的可能發展。最後則是中國政治發展的結局預測。

壹、中國政治改革的辯護

由於中國的政治改革遲遲無法朝向民主化轉型，許多批評中國政治改革停滯或是緩慢的論點也隨之發酵。可是也有許多的觀點認為這些看法過於武斷或是西方中心論，鄭永年（2011）的看法可以做為代表。

鄭氏從三種解讀或觀點說明這些看法，首先是強調中國政治改革的漸進性與次序性。前者的目的是化解改革所帶來的多重壓力，冒然地進行改變會為政經環境帶來不可逆料的後果。後者是指中國的改革應該從經濟到社會再到政治，政治改革階段的到來，應取決於社會改革和進一步的發展（鄭永年，2011：16）。其次是指民主在許多非西方社會並不一定獲得成功。民主需要許多社會經濟條件的配合，目前中國則未達條件（鄭永年，2011：63）。最後，中國目前的政治模式並非完全沒有民主，而是已經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上。鄭永年教授提出兩點，包括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動力已經出現，以及中國已經找到較為可行的實現民主路徑。前者指的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與心理因素的開放，後者則強調中國目前正在實行「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參與式民主」以及「協商式民

主」等等，創新制度的民主實踐。鄭永年的重要論點之一是，中國政治改革必須「國家制度建設在先，民主政治在後，國家制度要透過各種改革來得到建設。」(鄭永年，2011：117-132)

這些看法都展現了中國當局對於西方憲政民主的防禦性質，呼應了中國目前的政治現狀。北京當局既要維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又要回應世界上主流民主價值的挑戰，必須有一套論述說明體制正當性的基礎，又可彰顯其制度的合理性。⁷³ 可是，從本文的發現中，證實了中國新世代的價值觀已經發生變遷，對於政治支持的內容也因為價值觀差異而分歧，持續拒絕朝向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發展終究會遭遇到來自社會壓力，前述對於民主改革滯後的各種防禦性說法將會受到挑戰。

貳、價值觀變遷的可能發展

關於中國新世代價值觀的變遷，目前仍在發展之中。由於改革開放的社經結構變遷，中國民眾的價值觀結構從年長世代中的傳統儒家價值觀群體獨大，演變到目前的新世代中，民主價值觀與儒家價值觀群體比例相當的現況。唯演變仍在發生中，未來中國價值觀的可能變化，應該同時考慮競爭性價值觀的互動情況、以及政府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角色兩方面。筆者認為應該會有四種可能結果，包括了全盤西化、伴隨政治技巧的現代化、中國模式、以及新威權主義。

第一種是快速全盤西化的結局，這是建立在政府對於價值觀內容不加干預或導向民主價值方向，以及社會上關於傳統儒家價值與民主價值之間的競爭不再是政治文化的主要爭議時。那麼，社會上的價值觀將會循著現代化理論的軌跡持續

⁷³ 總體來看，這層論述的立論原則在於中國的民主化前景，架構方式是建構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理論關懷是一條非西方社會民主化的途徑為何，其目標在於維持一個可控制的有序政改路線，同時也抵制民主演變理論。2009年初，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公開談話可以充分表現這種說法的政治目標，他呼籲中國的立法者們，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並記住中國和西方的「本質區別」，中國的體制「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和兩院制」。



向民主價值傾斜，經濟發展的結果將可以帶動一個社會快速從傳統走向現代。可是在中國，首先由政府冒然進行朝向民主的價值觀變遷固然與現實不符，社會上仍然有佔大多數的年長世代保持著傳統儒家觀點，想要短時間排除這種爭議並不現實，何況就算在民主化的日本、南韓跟台灣，儒家文化對於大眾仍保有一定的影響力。

第二種價值觀變遷的可能途徑來自鄧小平經驗的遺緒，即是伴隨政治技巧的現代化。如果政府中的改革派取得優勢，或是有一個具有強大政治領導力的魅力型領袖做為主導，加上對於新興世代中民主價值的信仰與適當的政策。那麼發生在中國 1979 年之後的巨大變化可能進一步深化，被引導到更重視自由與人權的道路上，並維持整體的穩定。不過，這需要高度的政治技巧，一方面在中共內部可能的權力鬥爭中取得勝利，同時也要克服來自右傾與左傾的意識型態挑戰。

第三種可能是發展出中國模式的民主價值觀。這裡所指的中國模式，與目前被提到包括威權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中國模式不同，而是一種儒家價值成功現代化的形式，排除掉原先在儒家文化中有礙民主發展的基本理念，並因應現代社會的需求重塑其意義。要達成這項轉變需要的是當世儒家學者與民主理論學者的合作，以強大的創新能力對傳統儒家價值進行改造，雖然在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2009) 看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⁷⁴

最後一種可能性是新威權主義，這是以政府的強力介入做為背景。以北京當局目前的治理能力與掌權決心，基本上仍然可以主導民眾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甚至是對大眾的政治溝通進行管制。如果它們想要無限期延長執政的時間，除了持續維持經濟成長、提供合理社會重分配外，以價值觀內容來形塑合法性的手段也屬必須，內容可能是新型態的威權主義。可是，這將與目前新世代中已經萌芽的民主價值觀群體發生矛盾，該項措施是否成功，需視這群新世代的動向而定。

⁷⁴ 列文森認為，儒學的確對於傳統中國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其主要內涵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傳統儒學體系不僅無法產生出民主，而且還會成為專制政體的「依附者」或「工具」。



參、中國民主化發展的結局

這個部分我們將討論可能的中國民主化發展結局，這裡並非指政治發展的所有情況，而是建立在民主價值觀在新世代逐漸立足的條件下。除了新世代的價值觀變遷與政治支持改變會對改革帶來壓力外，我們還必須考慮來自國家與社會方面的樣態，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國家層面的樣態，需要關注的是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如果出現立場差異的話）的聚合關係；在社會層面，值得觀察的是社會上的新興力量是否具有相互串聯的可能，或是只能是原子化的碎裂。根據這些變數，我們也可以推論出四種可能的發展，包括自上而下的民主化、上下層相互合作的民主化、爆裂性的民主化，或是走上國家主義狂熱。

首先，不論社會是串聯的或是原子化的，如果原來的政府部門出現了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分歧，並混合權力鬥爭的需求。面對社會上逐漸成為主流的民主價值觀群體，援引社會力量進行政治訴求十分可能。這時，公民中的價值觀差異所形成政治支持分歧也很有可能進入權力場域，如此就進行菁英轉型模式，自上而下進行民主化，菁英分裂後加上社會力量的整合，為了重新確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規則而進行公共談判。

第二種情況也是相對平和的，而且民主化結果可能更為穩定與深化。國家方面雖然仍然是團結的政治菁英，但社會的新興力量得到某種空間進行集結與串聯，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型態逐漸納入政治運行軌道。可能會有幾次大型的群眾集會，但結局仍然是鎖入民主化的進程。這可以說是上下層相互合作的民主化，行動者的兩造分別是團結的政治精英與逐漸成熟並聯合的社會力量。

第三種情況出現在執政當局因無法克服治理危機而逐漸喪失其正當性，政府逐漸衰弱而不自知，也沒有應對之道，只能短期壓制社會上因為結構變遷而出現的矛盾。此時社會上雖然新興力量出現，但因為受到限制而缺乏有效整合，呈現原子化碎裂的狀態。這時的社會將十分緊張，因為一旦頑固的保守派政治菁英無

法處理政治危機，新興的社會力量將可能發起爆裂性的民主化運動促其垮台。因為權力碎裂缺乏整合的政治權威，民主化後的中國有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亂。

第四種情況可能是政府逐漸失去政治信任與制度正當性，但為了持續保有權力與防止社會力量的反撲，強化民族主義論述做為政治支持的來源成為可能選項之一。不過，正如謝淑麗 (Susan Shirk) 所提醒的，「為了鞏固共產黨領導，維護改革開放的社會秩序，中國領導人不得不祭出民族主義，以做為動員力量。在這種民眾的狂熱情緒中，正是一刀兩刃，尤其是在面對主權爭議的問題上。」在謝淑麗看來，最有可能造成某種失控局面的是糾結著濃烈民族主義情結的對日、台、美關係上 (謝淑麗，2008)。其結局有可能步上德國、日本等在二次大戰前夕霸權崛起的後塵，陷入國家主義狂熱。

第四節 未來相關議題研究

西方對於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韋伯的《儒教與道教》首開其路。事實上，本書是其更龐大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一環，其中也包括他最著名的論述《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以「現代化」與「理性」主導著其對於中國文化的解讀，在新教與儒教的對比下，韋伯認為儒教的美學價值觀念排斥了新教所倡導的創造行動，使得資本主義無法在中國出現 (洪天富，1992)。

韋伯的觀點一直引導了後來西方關於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例如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所領導的哈佛學派。費正清認為儒教社會是一個自我封閉、停滯不前的系統，妨礙了中國對西方衝擊的成功反應。政治文化的重要學者裴魯恂，則是認為中國現代化的致命傷就是無法放棄過去的那套價值目標——也就是儒家文化。很明顯，這些觀察都環繞著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議題，所以也容易被批評為西方中心的偏差。事實上，我們的數據表明，傾向儒家文化的價值觀仍然在 60 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國受訪者中佔據主要的地位，儒家價值觀並非一遇上民主價值就土



崩瓦解，而是具有強大的競爭性，即使經過辛亥革命、共產革命與文化大革命的洗禮仍然具有穩固的支持基礎。從西方中心論出發的研究很容易忽視這個現實，自然無法真正理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

不過，儒家價值觀獨佔鰲頭的情況在新世代中發生變化，本文所定義的民主價值觀群體數量正在擴大，這個屬於文化因素的價值觀變遷有可能會成為主導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值得持續予以關注。筆者根據本文研究的限制與經驗，提出以下的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應該分為規範性與實證性兩條道路進行，並且相互補正。規範性方面，從熊十力、牟宗三等當代儒學大師以降，號為新儒家的一批思想家，努力以儒家的原始典籍為起點，找尋其與西方哲學可以互通有無之處，目的多在守護儒學的道統。這些努力值得進一步擴大，不過，應該謹慎應對的是，孔子與傳統儒家所強調的典籍主義有可能限制了新儒家的發展。在實證性方面，對於何為儒家文化，過去的定義多半停留在規範性的層次，但各方定義不僅涉及到文化認知的範圍不同（官方文化、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也涉及文化內涵的歧義（今古文經之爭、先秦儒家與宋明理學以及新儒家興起等爭議）。如何在社會大眾之中理解儒家文化的影響也很重要，因為這關係到民眾的內在觀念與外顯行為。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對於民眾層次的普遍性觀察，關於儒家價值如何影響民眾行為，以及其與現代的民主價值之間的競爭或融合。

其次，為了更有效地觀察這兩種價值觀在中國社會中的消長，我們需要發展更適當的測量工具。在本研究中，由於使用二手資料分析，不可避免地會遭遇測量指標的限制，雖然使用了三個對照層次與指標建構的處理，但在測量儒家價值與民主價值上可能仍然過於粗糙。後續的研究應該要嚐試發展出對於儒家文化與民主價值的個別測量方法，以有效掌握兩種價值觀在民眾之間的變動關係。未來的研究應該沿著有效測量民眾的文化內涵以及區分東、西方價值觀的兩個方向作出努力。



再次，中國的價值觀因為世代交替處於變化之中，吾人應該密切加以關注，尤其是這種變化與其他政治態度與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或許，這正是可以有效回答中國案例的重要關鍵，當我們理解中國新世代的價值觀內容與文化變遷的軌跡，也才能完整回答中國現代化困境的真正原因。另外，如同研究限制所討論的，僅使用量化研究途徑可能還無法完全抓到中國價值觀變遷的內在原因，未來應同時使用量化與質化研究的混合設計，以求對於中國政治文化變遷得出更為深刻的結論。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丁學良，2011，《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9，〈系列報告之五：人口總量適度增長結構明顯改善〉，《慶祝新中國成立 60 週年》。<http://www.stats.gov.cn:82/index.htm>，查閱時間：2011 年 12 月。
- 王巧玲，2006，〈父母電視網路是 80 後的三大伴侶和價值觀來源〉，《新世紀週刊》，由新浪網查閱。<http://www.sina.com.cn>，查閱時間：2011 年 10 月。
- 王福祥，2011，〈網路傳播對當代大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研究：基於網路參政的視角〉，中國選舉治理網。查閱時間：2011 年 10 月。
-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2001，《追尋現代中國：下冊》。溫洽溢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譯自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 全炳根，2011，〈北京共識是否存在？東西方學者爭論〉。朝鮮日報，2011.03.08。朝鮮日報中文網 chn.chosun.com。查閱時間：2011 年 10 月。
- 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2009，《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中國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托起中國夢編寫組，2013，《托起中國夢》，北京：新華出版社。
- 米有錄、王愛平，主編，1999，《靜悄悄的革命——中國村民自治的歷程》，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何增科，2004，〈民主化：政治發展的中國模式與道路〉，收錄於俞可平，Arif Dirlik 主編，2008，《中國學者論民主與法治》，重慶：重慶出版社。
- 吳敬璉，2005，《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索中國經濟順利轉型的秘密》。臺北：麥格羅·希爾國際出版公司。



李侃如，2010，《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胡國成、趙梅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凡，2008，《大變革的前奏：中國民主發展的實踐、戰略和前景》，香港：明報出版社。

李君如，2008，〈怎樣看待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發展的走勢〉，收錄於唐晉主編，《論劍：崛起過程中的中國式民主(壹)》，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李偉南、陳玉梅，2010，〈「向政府洩憤的群體性事件」的生成機理研究〉，《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第 12 卷第 4 期，頁 44-48。

李強，2010，《當代中國社會分層：測量與分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林震岩，2007，《多變量分析 SPSS 的操作與應用》。台北：智勝文化。

林毅夫、蔡昉、李周，2000，《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貝淡寧 (Daniel A. Bell)，2009，《民主先生在中國—東方與西方的人權與民主對話》，孔新峰、張言亮譯，台北：左岸文化。譯自 *Daniel A. Bell. East Meets Wes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

周志強，2010，〈80 後集體焦慮是社會轉型的代價〉，《東方早報》2010 年 3 月 19 日。

周賀，〈1989 年政治風波〉，《人民網》，2004 年 5 月 1 日。2013 年 8 月 27 日查閱。

俞可平，2002，〈增量民主與善治—對民主與治理的一種中國式理解〉，收錄於俞可平、Arif Dirlik 主編，2008，《中國學者論民主與法治》，重慶：重慶出版社。

俞可平，2006，《民主與陀螺》，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哈瑞森 (Lawrence E. Harrison)、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編著，2003，《為什麼文化很重要》。李振昌、林慈淑譯，台北市：聯經。譯自 *Culture matters :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2000。

哈爾玻 (Stefan Halper)，2011，《北京說了算？中國的威權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王鑫、李俊宏等譯，臺北：八旗文化。譯自 Halper, Stefan.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姚先國，2010，〈勞資矛盾升高 威脅社會和諧〉，《經濟日報》，10月24日，A10版／兩岸焦點。

姚洋，2009，〈中國民主化的困境〉，《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15期，頁102-109。

姚洋，2010，〈中國模式及其前景〉，《中國市場》，第24期，頁5。

姚勝南，2010，〈群體性事件中無直接利益衝突現象探析〉，雲南電大學報，第12卷，第3期，頁56-60。

查慶九，1999，〈民主不能超越法律〉，《法制日報》，1999年1月19日。

洪天富，1993，〈譯者序〉，收錄於韋伯（Max Weber），1978，《儒教與道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按圖賓根摩爾出版社1978年版譯出。

胡必亮，2005，《關係共同體》，北京：人民出版社。

胡佛，1998a，《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台北，三民書局。

胡佛，1998b，《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二)：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台北，三民書局。

胡偉，2008，〈第七章 社會空間的成長〉，《現代化的模式選擇：中國道路與經驗》。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榮，2002，〈經濟發展與村委會選舉制度的實施〉，收錄於劉亞偉(編)，《無聲的革命：村民直選的歷史、現實和未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pp157-178。

韋伯（Max Weber），1993，《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按圖賓根摩爾出版社1978年版譯出。

徐行、王海峰，2010，〈關於當前中國群體性事件幾個理論問題〉，《學習與實踐》，第7期，頁69-77。

徐斯儉，2010年，〈『黨國』還是『共和國』？——中共政治變遷的一個內在邏輯〉，《政治科學論叢》，第45期，頁37-68。

康曉光，2008，《中國歸來：當代中國大陸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研究》，新加坡：八



方文化。

張佑宗，2000，《文化變遷與民主鞏固：台灣民主化經驗的比較觀》，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佑宗，2011a，〈大陸地區調查子計劃〉，隸屬台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計畫》，此計畫由胡佛、朱雲漢兩位教授擔任總主持人。

張佑宗，2011b，〈選舉結果、政治學習與民主支持－兩次政黨輪替後台灣公民在民主態度與價值的變遷〉。《台灣民主季刊》，第8卷，第2期，頁99-137。

張佑宗、吳振嘉，2011，〈相對剝奪、政治機會結構與中國社會群眾性事件關係初探－幾個理論假設的檢證〉，收錄於《群體性事件研究》，中國社會穩定研究論叢第二卷，肖唐鏢主編，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142-174頁。

張朋園，2007，《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台北市：聯經出版社。

張傳鶴，2010，〈我國群體性事件的最近發展態勢、成因及對策研究〉，《山東社會科學》，第五期，頁42-46。

張維為，2010，《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鐵志，2010，〈中國維穩 須先維權〉，《中國時報》，4月22日，A25版／時論廣場。

章家敦，2002，《中國即將崩潰》，侯思嘉、閻紀宇譯，臺北：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陳陸輝，2002，〈政治信任感與台灣地區選民投票行為〉，《選舉研究》，第9卷，第2期，頁65-84。

陳陸輝，2003，〈政治信任，施政表現與民眾對台灣民主的展望〉，《台灣政治學刊》，第7卷，第2期，頁149-88。

陳志武，2010，《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臺北：八旗文化。

陶郁，2013，〈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不是一回事〉，《青年參考》2013年12月18日。

http://qnck.cyol.com/html/2013-12/18/nw.D110000qnck_20131218_2-03.htm，查

閱時間：2013 年 12 月。

斐魯恂 (Lucian W. Pye)，1992，《中國人的政治文化：政治發展權威危機之心理文化研究》，胡祖慶譯，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譯自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黃仁宇，1990，《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台北：時報文化。

黃平，2005，〈北京共識還是中國經驗? (前言)〉收錄于黃平、崔之元主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黃秀端，1997，〈政治文化：過去現在與未來〉，《東吳政治學報》，8：47-85。

黃德北，2008，《當代中國雇傭工人之研究》，台北市：韋伯文化。

黃曉陽，2011，《二號首長一》，重慶：重慶出版社。

廉思主編，2009，《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廉思主編，2010，《蟻族 II：誰的時代》，北京：中信出版社。

新華網，2014，〈教育部：2014 年中國高校畢業生規模為 727 萬人〉，2014 年 02 月 04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edu/2014-02/04/c_119210641.htm。查閱時間：2014 年 2 月。

楊婉瑩，2011，〈台灣婦運與世代價值差異〉，《政治科學論叢》，第 49 期，頁 161-196。

裴敏欣，2012，〈中國靜悄悄的政治革命〉，BBC 中文網 10 月 15 日文章。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2/10/121015_cr_china_political_revolution.shtml，查閱時間：2012 年 12 月。

趙鼎新，2010，《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第二次印刷（新序），香港中文大學 2007。

歐博文 (Kevin J. O'brien)，2011，〈專業化時代的中國政治學研究〉，趙新利譯，《國外理論動態》，第 8 期：50-56 頁。



潘維，2010，〈序 中國模式〉，收錄于潘維，瑪雅主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潘維、瑪雅主編，2010，《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香港中評社，2010，〈潘維：中國模式不是為了頂禮膜拜〉，

<http://cnrn.tw/doc/1012/0/6/6/101206631.html?coluid=50&kindid=1074&docid=101206631>。查閱時間：2011 年 10 月。

蔡定劍，2003，〈公民素質與選舉改革調查〉，收錄於俞可平、Arif Dirlik 主編，2008，《中國學者論民主與法治》，重慶：重慶出版社。

鄧正來、景躍進，1992，〈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總第 1 期。

鄭文翔，2008，《中共民族主義論述策略下文化角色之變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永年，2011，《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新北市：揚智文化。

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2007，《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何大明譯，台北市：远流。譯自 Andrew J. Natha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蕭功秦，2008，《中國的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變革》，北京市：新京出版社。

戴東清，2005，《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 1989-2002：以鑲嵌之社會團體自主性為例》。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謝淑麗 (Susan L. Shirk)，2008，溫洽溢譯，《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社。

二、西文部分



- Abramson, Paul R. 1983.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n: Form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and Company Press.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mond, Gabriel A. 1990.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Sage.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tto, Nathan. 2004. "The Government's Bulldozer: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of Trust in Government." Paper present at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Conference, Taipei.
- Boix, Carles and Susan C. Stoke. 2003.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 Booth, John A. and Patricia Bayer Richard. 1998.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Capita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0: 3, pp. 780-800.
- Chang, Yu-tzung, Yun-han Chu, and Frank Tsai. 2005.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Issues and Studies* 41, no. 4: 1-33.
- Chanley, Virginia A. 2002. "Trust in Govern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9/11: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Political Psychology*. 23 (3): 469-83.
- Chen, Jie and Bruce J. Dickson, 2008. "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 pp. 780-804.
- Cheng, Yung-nien. 2004.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Chu Yun-han and Yu-tzung Chang. 2001. "Culture Shif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Shing Hua (ed.). *China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M. E. Sharp, pp. 320-347.
- Chu, Yun-Han, Larry Diamond, and Doh Chull Shin. 2001. "Halting Progress i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2 (1): 122-36.
- Chu, Yun-han. 2013.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The China Review*, Vol. 13, No.1: 1-42.
- Citrin, Jack. 1974. "Comment: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3): 973-88.
- Cohen, Joshua and Joel Rogers. 1992. "Secondary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20: 4, pp. 393-472.
- Craig, Stephen, Richard Niemi, and Glenn Silver. 1990.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 A Report on the NES Pilot Study Items." *Political Behavior*, 12 (3): 289-314.
- Dahl, Robert Alan.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ussell J. 2004. *Democratic Challenges, Democratic Choices: The Erosion of 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ussell J., Doh C. Shin and Willy Jou. 2007. "Understanding Democracy: Data from Unlikely Plac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8(4): 142-156.
- Daniel Bell. 2008.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 Palma, Giuseppe. 1990.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amond, Larr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ickson, Bruce J., 2000,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5(4): 517-540.

Dickson, Bruce J.,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wley, Kathleen M. and Brian D. Silver. 2002. "Social Capital, Ethnicity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he Post-Communist States." *Europe-Asia Studies*, 54: 4, pp. 505-527.

Easton, David. 1957.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9 (3):383-400.

Easton, David. 1965.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Easton, David. 1975.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4): 435-57.

Erickson, Bonnie H. and T. A. Nosanchuk. 1990. "How an Apolitical Association Politicize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7: 2, pp. 206-219.

Feldman, Stanley. 1983. "The Measurement and Meaning of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Methodology*, Vol. 9, No. 3:341-54.

Fukuyama, Francis. 1999.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IMF Conference on Second Generation Reforms.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eminar/1999/reforms/fukuyama.htm>

Gallagher, Mary E. 2002. "Reform and Openness: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Delayed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4 (3): 338-72.

Gamson, William A. 1968.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IL: The Dorsey Press.

Schubert, Gunter. 2008. "One-Party Rule and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setting up a new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7(54 (2008): 191-204.

Gilley, Bruce, 2003, “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18-26.

Gilley, Bruce. 2004.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oldman, Merle. 2005.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therington, Marc J. 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2, No. 4:791-808.

Hetherington, Marc J. 1999.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Trust on the Presidential Vote, 1968-199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2:311-26.

Hetherington, Marc J. 2005. *Why Trust Matters: 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 1983.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keda, Ken’ich et al. 2003.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sian Cultural Context.” *Asian Barometer Survey Working Paper Series*: 10.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newenglish/publications/>

Inglehart, Ronald and Christian Welzel. 2005.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and Wayne E. Baker.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no. 1: 19.

Inglehart, Ronald.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1988.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4): 1203-1230.

Inglehart, Ronald.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2000.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iew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80-97

Jennings, M. Kent. 199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91(2): 361-372.

Kennedy, John J. 2002. "The Face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 *Asian Survey*. 42(3): 456-482.

Kennedy, Scott, 2005,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m, Dae-jung. 1994. "A Response to Lee Kuan Yew 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 *Foreign Affairs* 73, no. 6: 189-194.

Kim, So Young. 2010. "Do Asian Values Exist? Empirical Test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sian Value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0, no. 3: 15-44.

Killion, M. Ulric. 2010. "Post-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Measure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As a Variety of Capitalisms.” (November, 02 201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701868>.



- Lawrence, Susan V. 1994. “Democracy, Chinese Styl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4): 61-68.
- Levi, Margaret. 1998. “A State of Trust.” in 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 Eds. *Trust and Governa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77-101.
-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Way. 2002.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51-65.
- Li, Lianjiang. 2002. “The Politics of Introducing Direct Township Elec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1 (September), pp.704-23.
- Lieberthal, Kenneth. 2004.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Linz, Juan J. 2000.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34.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1.
- Lu, Xiaobo, 2004. *From Players to Referees: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State and Bureaucracy in China*. Hong Kong:
- Manion, Melanie. 1996.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4) (December 1996), pp. 736-748.
- Mannheim, Karl. 1952. “The Problems of Generation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aul Kecskemeti, e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76-320.
- Morlino, Leonardo, and José Ramón Montero. 1995.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in Southern Europe.”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HU Press, pp. 231-260.

McFaul, Michael A. 2006. "The Missing Variabl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the Link between Third and Fourth Wave Models of Democratization", This working paper appears on CDDRL's website: <http://cddrl.stanford.edu>.

Miller, Authur. 1974.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1964-197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3): 951-72.

Moore, Barrington. 200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Vol. 268. Beacon Press.

Nathan, Andrew J.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pp. 6-17.

Nathan, Andrew J. 2012. "Confucius and the Ballot Box." i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On lin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723/andrew-j-nathan/confucius-and-the-ballot-box?page=show>, accessed 2012/2/20.

Norris, Pippa (ed.) (1999).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aughton, Barry,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ughton, Barry. 2010. "Chinas Distinctive System: can it be a model for oth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5): 437-460.

O'Donnell, Guillermo,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Southern Europe*. Vol. 1. JHU Press.

O'Brien, Kevin J. and Lianjiang Li. 2000. "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Party State: 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62 (June), pp. 465-489.



O'Brien, Kevin J. 2001. "Villagers, elections, and citize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2001): 407-435.

Oi, Jean C.; Scott Rozelle. 2000. "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162 (June), pp. 513-539.

Olsen, Marvin. E. 1972.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Voting Turnout: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3, pp. 317-333.

Pei, Minxin. 1995. "Creeping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6.4: 65-79.

Pei, Minxin.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i, Minxin. 2009. "Looming stagna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Apr. On line at http://www.relooney.info/SI_FAO-Asia/China_158.pdf, accessed 20120215.

Pei, Minxin. 2012. "Communist China's Perilous Phas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 On line at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746604577380073854822072.html>, accessed 20120215.

Pei, Minxin. 2013. "5 Ways China Could Become a Democracy." *The Diplomat*. February 13. Onlin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2/5-ways-china-could-become-a-democracy/?all=true>, accessed 20130510.

Przeworski, Adam and Fernando Limongi. 1997.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 (Jan), pp. 155-183.

Przeworski, Adam, Antonio Cheibub, Fernando Limongi, and Michael Alvarez.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Robert.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ye, Lucian W. 1968.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Ramo, Joshua Cooper,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Foreign Affairs Policy Centre. Available: <http://www.fpc.org.uk> (Accessed: 16 January)

Rao, Vijayendra and Michael Walton. 2004. *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 Stanley. 2009.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and the Stat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8, No.2 (May): 359-369.

Rosenstone, Steven J. and John M. Hansen.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Rostow, Walt Whitman.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Rowen, Henry S., 2007, "When Will the Chinese People Be Free?" *Journal of Democracy*, 18. 3: 38-52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K.

Rustow, Dankwart A.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 337-363.

Scholz, John T., and Mark Lubell. 1998. "Trust and Taxpaying: Testing the Heuristic Approach to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2):

398-417.

Schubert, Gunter. 2008. "One-Party Rule and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setting up a new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7, Issue 54, pp. 191-204.

Schumpeter, Joseph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outledge. New edition: 2013.

Shin, Doh Chull. 2011.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rborn, Goran. 199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Eva Etzioni-Halevy ed. *Classes and Elites i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Vol. 1083. Taylor & Francis.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Blackwell.

Tilly, Charles. 2004.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cqueville, Alexis De. 2004.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Distributed to the trade in the U.S. by Penguin Putnam.

Tsai, Kellee S. 2007.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ong, Yangqi. 2011. "Morality, Benevolence, and Responsibility: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from Past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pp. 141–159.

Tu, Weiming, ed. 1996.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7.

Uslaner, Eric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Verba, Sidney et al.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Zhengxu. 2008. *Democratization in Confucian East Asia Citizen Politics in Chin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and Vietnam*. Youngstown, N.Y.: Cambria Press.

Wang, Zhengxu. 2010. "Generational Shift and Its Impacts on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The AB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0. Website: www.asianbarometer.org

Welzel, Christian and Ronald Inglehart. 2008. The Role of Ordinary People in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9(1): 126-140.

Welzel, Christian. 2006. Democratization as an Emancipative Process: The Neglected Role of Mass Motiv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5: 871-896.

Williams, John T. 1985. "Systemic Influence on Political Trust: The Importance on Perceive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Political Methodology*, Vol. 11, No. 1-2: 125-42.

Wu, Yu-Shan. 2002/2003.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 vs. Europe." *Issues & Studies*. 38(4)/39(1): 93-138.

Wu, Jack Chen-chia, Yutzung Chang & Mark Weatherall. 2012. "The Youth's Trust in Institutions," at the conference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Voices of Asia's Youth,"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nd co-sponsored by Asian Barometer Surve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eptember



20-21, 2012, Taipei, Taiwan.

Wucherpennig, Julian and Deutsch, Franziska. 2009.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 Theories and Evidence," *Living Reviews in Democracy*, Vol. 1.
<http://www.livingreviews.org/lrd-2009-4>.

Yang, Dali L. 2004.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ang, Dali L. 2007. "China's Long March to Freedom," *Journal of Democracy*, 18.3: 58-64.

Yang, Guobin. 2003.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36): 453–475, August, 2003.

Yangqi Tong, "Morality, Benevolence, and Responsibility: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from Past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2011), pp. 141-159.

Zakaria, Fareed. 1994. "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73, no. 2: 109–126.

Zheng, Yongnian. 2008,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附錄：變項處理



一、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基本變項			
性別	SE1. 受訪者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男性=1; 女性=0
教育程度	SE3. 您的教育程度？	0. 不識字或小學沒畢業 1. 小學畢業 2. 中學輟學 3. 中學畢業 4. 高中輟學 5. 高中、中專、技校畢業 6. 夜大、職大、電大、函大畢業或通過承認自學考試 7. 全日制大專、大學畢業 8. 研究生畢業或以上	0-8
城鄉差異	level3 依受訪者的居住地編碼的變項	1. 居委會 2. 村委會	居委會=1; 村委會=0
地區別	受訪者居住省分	1 上海市 2 遼寧省 3 河南省 4 廣東省 5 甘肅省 6 北京市 7 天津市 8 河北省 9 山西省 10 吉林省 11 黑龍江省 12 江蘇省 13 浙江省 14 安徽省 15 福建省 16 江西省 17 山東省 18 湖北省 19 湖南省 20 廣西壯族自治區 21 重慶市 22 四川省 23 貴州省	東部省包括: 1 2 4 6 7 12 13 15 17 中部省包括: 3 8 9 10 11 14 16 18 19 20 西部省包括: 5 21 22 23 24 25 東部: 東部省=1; 其他=0 西部: 西部省=1; 其他=0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24 雲南省 25 陝西省	
政治面貌	SE22. 您的政治面貌是什麼？ SE23. 如果不是黨員，您提出過入黨申請嗎？	1 群眾 2 共青團員 3 共產黨員 4 民主黨派 1 申請過 2 沒有申請	黨員：黨員=1；其他=0 申請過：申請過=1；其他=0
主觀社會地位	SE21. 一般人認為家庭的社會地位有高低的不同，假設有一把量尺，1 代表家庭社會地位很低，10 代表家庭社會地位很高。在 1 到 10 之間，請問您覺得目前您家庭的社會地位在哪一個位置上？	1-10	重新編碼如下 基層=1-5； 中層=6-7； 上層=8-10 基層：基層=1；其他=0 上層：上層=1；其他=0
網路使用率	A3. 您經常使用互聯網嗎？	1 幾乎每天都用 2 每週至少一次 3 每月至少一次 4 一年幾次 5 很少用 6 從沒用過	倒轉選項重新編碼
政治閱聽率	A2. 您收聽、收看或者閱讀政治方面的新聞嗎？	1 每天幾次 2 每天一次 3 每週幾次 4 每週一兩次 5 每週不到一次 6 從來不看	倒轉選項重新編碼
管道數目	A4. 您主要通過哪些管道獲取有關政治和政府的資訊？	A4a. 電視 A4b. 報紙 A4c. 電臺/廣播 A4d. 互聯網 A4e. 手機短信 A4f. 個人接觸 A4g. 其他	複選，計數被選中的項目
小道消息	A6.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您聽人談起過經濟、政治或社會方面的小道消息嗎？ A7.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您和別人議論過小道消息嗎？	A6 0 沒有 1 聽過 A7 0 沒有 1 聽過	A6+A7
國家經濟現況	A12 我們國家目前整體經濟狀況怎麼樣？	1 非常好 2 比較好 3 不好不壞 4 不太好 5 非常不好	倒轉選項重新編碼
家庭經濟未來發展	A17 您家的經濟情況五年後會有什麼變化？	1 好很多 2 好一些 3 跟以前一樣	倒轉選項重新編碼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4 差一些 5 差很多	
政治興趣	A8. 您對政治上的事情有沒有興趣去瞭解？	1 完全沒興趣 2 不太有興趣 3 比較有興趣 4 非常有興趣	1-4
政治效能感	A27. 我覺得自己很有能力參與政治。 C10. 有時候政府與政府的事很複雜，像我這樣的人很難理解。 A28. 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A27 倒轉選項編碼; C10 與 A28 維持原順序編碼; 重新編碼為-2 -1 1 2。 政治效能感=叫回 A27 C10 A28 三題之平均數
一般人群信任	A30. 您覺得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嗎？還是與人交往小心為妙？ A31. 您覺得現在大多數人會想方設法占別人的便宜，還是會盡量公道待人？	A30 1 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 2 與人交往小心為妙 A31 1 想方設法占別人的便宜 2 盡量公道待人	A30 選項 1 編碼為 1, 其他為 0; A31 選項 2 編碼為 1, 其他為 0。 一般人群信任=A30+A31
親近人群信任	C18. 有些人可信，有些人不可信，對於下面幾類人，您的信任度怎麼樣？ C18a. 親 戚 C18b. 單位同事/同宗的人 C18c. 鄰居/村人 C18d. 其他有往來的人 C18e. 單位領導	1 完全不可信 2 相當不可信 3 有點不可信 4 有點可信 5 相當可信 6 完全可信	重新編碼: 1=-3, 2=-2, 3=-1, 4=1, 5=2, 6=3 親近人群信任= C18a+C18b+C18c+C18d+C18e
關係緊密度	A11. 您每週平均接觸多少人次？ C12. 是否被他人要求過提供幫助？ C13. 是否有一些人能在這種關鍵時刻幫助您？	A11 1 4 人次以下 2 5-9 人次 3 10-19 人次 4 20-49 人次 5 50 人次或以上 C12 1 從來沒有 2 很少 3 偶爾 4 經常 C13 1 沒有 2 有，但很少 3 有一些 4 有很多	A11+C12+C13
自變項			
世代	SE2.請問您多大歲數？（2011 年）	18-97	年長世代: 1969 年前出生 70 後: 1970-1979 年間出生 80 後: 1980 年後出生
價值觀群體	儒家文化分數 民主價值分數	民主價值觀 混合價值觀 儒家價值觀	民主價值/儒家價值 低價值觀/儒家價值 混合價值/儒家價值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低價值觀	
依變項			
儒家文化分數	E3. 政府的領導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長，他們關於國家事務的決定，人民都應該服從。 E8. 只要有一位道德高尚的領導人，我們就可以讓他決定一切。 C7. 即使和別人發生了矛盾，也應該避免正面衝突。 A19. 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的利益都可以犧牲。 C2. 為了家庭的利益，應該把個人的利益擺在其次。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重新編碼為-2 -1 1 2。 叫回平均數，使用於圖 3-3 其他分析是使用因素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轉化成迴轉係數
民主價值分數	E6. 法院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當地政府的意見。(分權-司法獨立) E7. 如果政府經常受到立法機構的制約，那麼就很難辦好大事情。(分權-立法制衡) E5. 在地方上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會影響地方的安定與和諧。(政治多元化) E9. 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政治多元化) E4. 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政治自由)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倒轉選項，重新編碼為-2 -1 1 2。 叫回平均數，使用於圖 3-3 其他分析是使用因素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轉化成迴轉係數
民族主義	G1. 您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驕傲嗎？ G2. 如果您有機會，您願意離開中國到另一個國家去生活嗎？	G1 1 非常驕傲 2 比較驕傲 3 不怎麼驕傲 4 根本不驕傲 G2 1 非常願意 2 願意 3 不願意 4 根本不願意	G1 倒轉選項，並重新編碼為-2 -1 1 2 G2 依原選項順序，重新編碼為-2 -1 1 2 叫回兩題的平均數
中國式治理	F1-6. 請問您心目中理想的政府應該是什麼樣的。如下兩段話中，您更同意哪一種說法？	F1 (1) 政府決策應該完全遵循人民的意見 (2) 政府認為怎麼做對人民最有利就應該怎麼做 F2 (1) 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應該由人民告訴政府要做什么 (2) 政府就像父母一樣，應該替我們做決	計數選擇選項 2 的次數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定 F3 (1) 媒體應該有權自由地發佈新聞和表達意見，不受政府的控制 (2) 政府應該有權阻止媒體發佈可能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新聞與意見 F4 (1) 每個人生活的好壞，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主要責任。 (2) 人民生活的好壞，政府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F5 (1) 政府領導人應該由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選出 (2) 政府領導人應該根據他們的品格和能力任命，不一定要經過選舉 F6 (1) 多個政黨代表各種利益相互競爭 (2) 由一個政黨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	
政權機構信任	C17a. 法院 C17b. 中央政府 C17c. 共產黨 C17d. 全國人大	1 完全不可信 2 相當不可信 3 有點不可信 4 有點可信 5 相當可信 6 完全可信	依原選項順序，以因素分析區分為 3 個因子，存取迴歸係數
執行機構信任	C17e. 一般政府官員 C17f. 解放軍 C17g. 公安部門 C17h. 地方政府		
社會機構信任	C17i. 報紙 C17j. 廣播電視 C17k. 各種民間組織		
制度正當性	F7. 從長遠來看，我們的政治制度能解決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 F8. 整體而言，我以我們的政治制度為榮。 F9. 即使我們的政治制度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民也應當支持。 F10. 以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相比，我寧願在我國的政治制度下生活。 F11. 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需要有所調整？	F7-9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F11 1 運作很好，沒有必要調整 2 需要較小幅度的調整 3 需要較大幅度的調整 4 根本性的調整	F7-9 依選項順序編碼為 2 1 -1 -2; F11 依選項順序編碼為 2 1 -1 -2 叫回 5 題之平均數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請求型參與	C15a. 直接向領導反映意見 C15b. 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 C15f. 找領導的朋友或熟人說情	0 沒做過 1 偶爾做 2 有時做 3 經常做	1~3 編碼為 1, 0 編碼為 0, 以因素分析區分為三個因子。 在進行分析時, 有採取過行動者編為 1, 未採取行動編為 0
舉報型參與	C15d. 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 C15e. 寫信給報社		
抗議型參與	C15g. 團結大夥一起去理論 C15h. 上訪、遊行、示威、靜坐		
直接民主正當性	B6. 雖然民主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仍然是最好的制度 B2. 請問下列說法哪一個最符合您的看法? B3. 下面兩種說法, 您比較能接受哪一種?	B6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B2 1 無論怎樣, 民主體制總比其他任何政體好 2 在有些情況下, 一個專制的政府比民主體制好 3 對我來說, 民主體制和專制體制都是一樣的 B3 1 民主能解決我們社會中的問題 2 民主不能解決我們社會中的問題	B6 重新編碼為 2 1 -1 -2 B2 重新編碼為 1 -1 0 B3 重新編碼為 1 -1 B4 重新編碼為 -2 -1 1 2 B5 重新編碼為 -2 -1 1 2
比較民主正當性	B4. 如果您必須在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做一選擇, 請問您覺得哪一項比較重要 B5. 如果必須在減少經濟不平等與保護政治自由之間做一選擇, 您認為?	B4 1 經濟發展絕對重要 2 經濟發展比較重要一些 3 民主比較重要一些 4 民主絕對重要 B5 1 減少經濟不平等絕對重要 2 減少經濟不平等比較重要一些 3 保護政治自由比較重要一些 4 保護政治自由絕對比較重要	F16, F19, F17 重新編碼為 -2 -1 1 2 將 B6, B2, B3, B4, B5, F16, F19, F17 投入 SPSS 執行因素分析, 得出三因子
威權抵制	F16. 讓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決策, 代替人大和選舉 F19. 由軍隊來統治國家 F17. 由專家來決定一切, 代替人大和選舉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權利-程序型民主	下面四種說法中, 哪一種是您心目中民主最重要的特徵?	F12. 1 政府能減少貧富差距(平等) 2 人民通過公平的選舉自由選出政府領導人(程序) 3 政府不會浪費公款(治理)	加總受訪者選擇自由或程序概念為民主特徵的次數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效能-分配型民主		4 人民可以自由地對政治表達看法(自由) F13. 1 人大(立法機構)可以有效監督政府(程序) 2 每個人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衣食住行都得到保障(平等) 3 人民可以自由組織政治團體(自由) 4 政府為人民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治理) F14. 1 政府能有效執法維護社會秩序(治理) 2 媒體可以自由批評政府(自由) 3 政府能讓老百姓人人有工作(平等) 4 政府由多個政黨通過選舉公平競爭選出(程序) F15. 1 人民可自由參與抗議和示威活動(自由) 2 政治清廉而沒有貪汙腐敗(治理) 3 如果政府侵害人民的權利,法院可以替人民主持公道(程序) 4 失業人員能從政府得到救濟(平等)	加總受訪者選擇平等或治理概念為民主特徵的次數

二、迴歸模型的變項訊息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有效個數
基本變項					
性別(男)*	0.490	0.500	0.000	1.000	3471
教育程度	2.980	2.166	0.000	8.000	3453
城鄉差異(城市)	0.480	0.500	0.000	1.000	3473
地區別(東部)	0.280	0.450	0.000	1.000	3473
地區別(西部)	0.230	0.422	0.000	1.000	3473
政治面貌(黨員)	0.150	0.355	0.000	1.000	3456
政治面貌(申請過)	0.110	0.316	0.000	1.000	3456
主觀社會地位(基層)	0.530	0.499	0.000	1.000	3250
主觀社會地位(上層)	0.130	0.332	0.000	1.000	3250
網路使用率	2.460	2.072	1.000	6.000	3464
政治閱聽率	4.040	1.545	1.000	6.000	3468
管道數目	2.090	1.325	0.000	7.000	3473
小道消息	0.760	0.872	0.000	2.000	3436
國家經濟現況	3.870	0.857	1.000	5.000	3332
家庭經濟未來發展	4.060	0.752	1.000	5.000	2882
政治興趣	-0.130	1.285	-2.000	2.000	3449
政治效能感	-0.396	0.675	-2.000	2.000	3421
一般人群信任	1.240	0.758	0.000	2.000	3370
親近人群信任	6.331	4.421	-15.000	15.000	3115
關係緊密度	7.624	2.399	3.000	13.000	3169

* 帶有括號的變項，乃是以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 進行處理。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有效個數
自變項					
世代(70 後)	0.210	0.408	0.000	1.000	3472
世代(80 後)	0.260	0.439	0.000	1.000	3472
價值觀群體(民主價值)	0.270	0.444	0.000	1.000	2331
價值觀群體(低度價值)	0.170	0.371	0.000	1.000	2331
價值觀群體(混合價值)	0.160	0.367	0.000	1.000	2331
依變項					
儒家文化分數	0.050	1.001	-2.559	3.105	2453
民主價值分數	-0.008	1.007	-3.536	2.620	2985
民族主義	0.993	0.831	-2.000	2.000	3446
中國式治理	2.434	1.569	0.000	6.000	3473
政權機構信任	-0.060	1.041	-5.482	2.304	2406
執行機構信任	0.014	0.983	-5.024	2.583	2406
社會機構信任	-0.011	0.991	-4.042	2.530	2406
制度正當性	0.739	0.661	-2.000	2.000	3204
請求型參與	0.478	0.500	0.000	1.000	3378
舉報型參與	0.060	0.238	0.000	1.000	3412
抗議型參與	0.141	0.349	0.000	1.000	3401
直接民主正當性	0.024	0.996	-3.755	1.192	2533
比較民主正當性	0.006	1.005	-1.589	2.390	2806
威權抵制	0.020	0.992	-3.187	1.711	2829
權利-程序型民主	1.195	1.126	0.000	4.000	3473
效能-分配型民主	2.172	1.351	0.000	4.000	3473